



陕甘边区 苏维埃政府简史

SHANGANBIANQUSUWEIAIZHENGFUJIANSHI

刘秉政 著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80周年
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共党史出版社

陕甘宁边区 苏维埃政府简史

刘秉政 著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 80 周年
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共党史出版社



刘秉政，男，1963 年 6 月生，甘肃宁县人。大专文化程度，从事过教育、环保、城建及宣传工作。现任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从事党史建理论研究，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各类作品 100 多万字，有 30 多篇作品被《人民日报》社、全国党刊研究会等授予不同等次奖励。20 多篇论文被《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文集》等全国性理论专集收编。参与编著《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等党史党建书籍 10 多本。出版了个人作品专辑《瞬间》及管理专著《轻松当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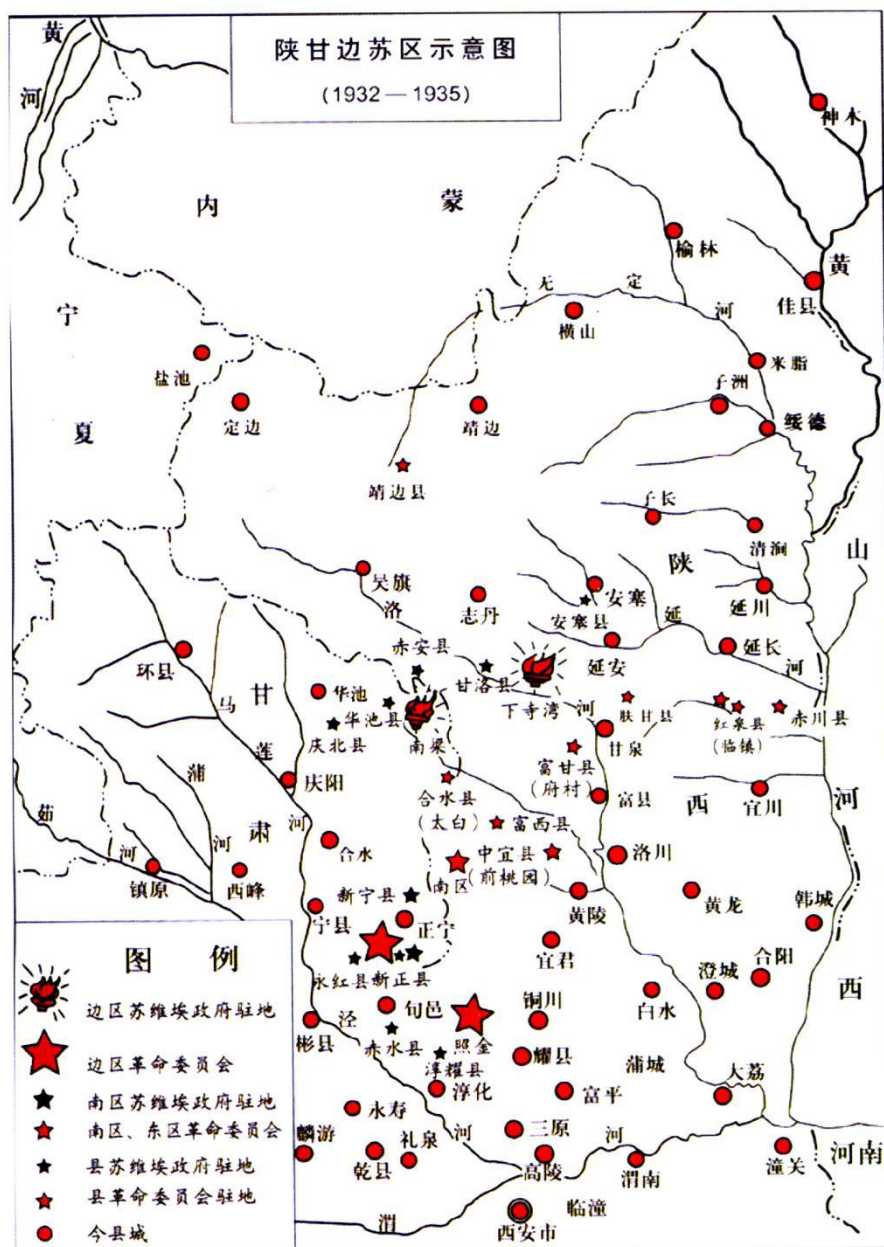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 苏维埃政府简史

SHANGANBIANQUSUWEIAIZHENGFUJIANSHI

刘秉政 著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 80 周年
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共党史出版社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示意图



刘志丹

西北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主要创建人



谢子长

西北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主要创建人



习仲勋

西北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主要创建人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旧址



照金革命委员会驻地旧址



陈家坡会议旧址



包家寨会议旧址



荔园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寨子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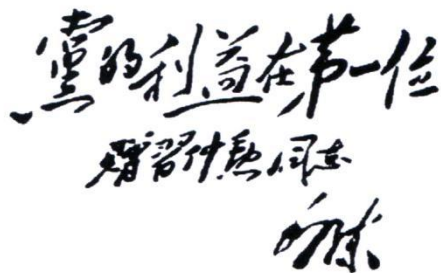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条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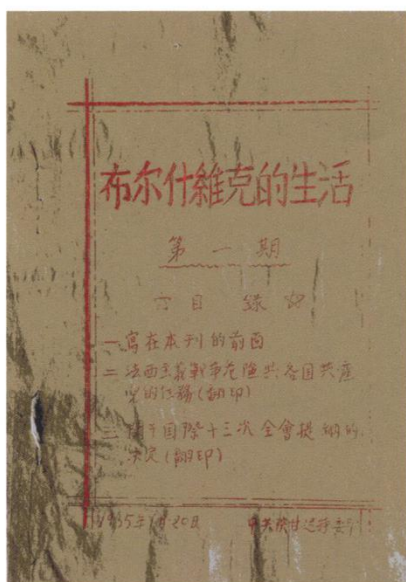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



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



毛泽东为谢子长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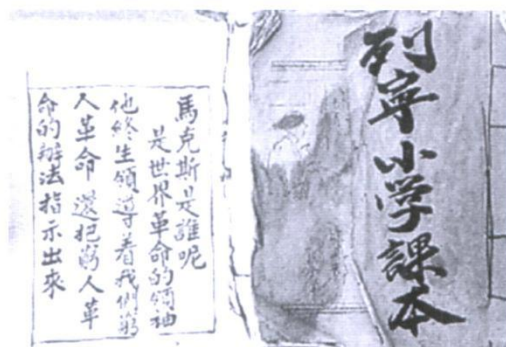
中共陝甘邊區特為創办的刊物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創办的开悟



列宁小学旧址



列宁小学课本

跟上刘志丹上南梁

1=B²/₄

山庄：林镇。南梁等地流行 搜集整理：段桂林

2 2 2 5 6 1	2 —	2 5 2 1	2 1 6
阳 湾 的 桃 树	河 畔 上 柳		
长 枪 短 枪	马 拐 枪		
拔 起 黄 蒿	带 起 根		
地 上 豪 绅	要 打 倒		
上 地 牛 羊	都 要 分		
2 2 5 3 2 3 2 1	6	1 6 5 6 5 4	5 2
共 产 党 来 了	跟 上 走		
跟 上 刘 志 丹	上 南 梁		
跟 上 所 老 刘	闹 革 命		
文 约 帐 簿	放 火 烧		
咱 们 穷 人	翻 了 身		
2 2 5 3 2 3 2 1	6	1 6 5 6 5 4	5 2
咱 们 穷 人	翻 了 身		

南梁民歌《跟上刘志丹上南梁》



列宁小学的学生在上课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币厂旧址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发行的油布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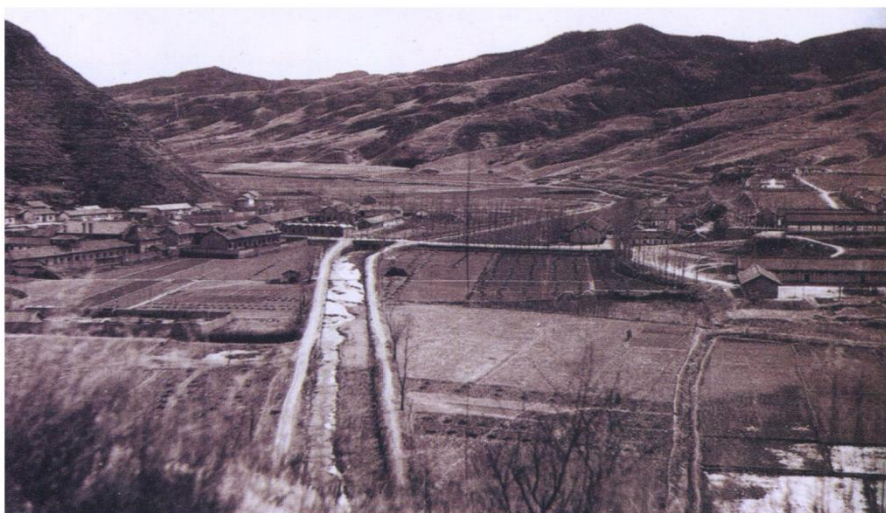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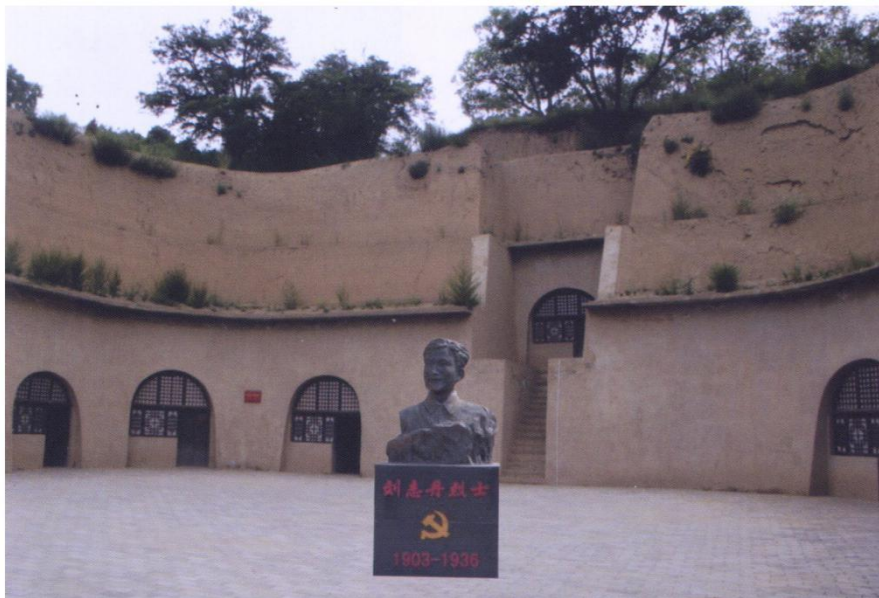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使用过的秤锤



太白起义旧址



红二十六军成立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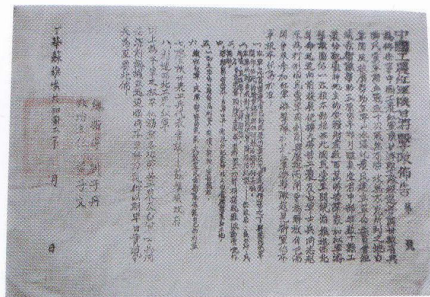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军委旧址



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旧址



红二十六军旗帜



陕甘游击队布告



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一路第一支队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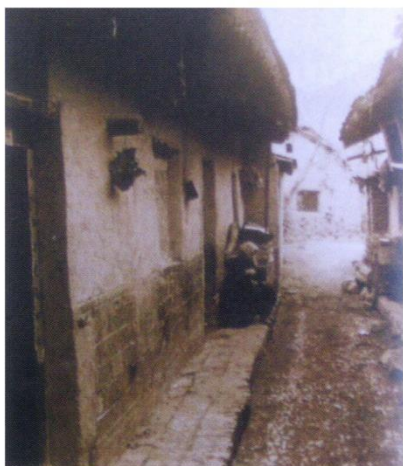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印



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印



二将川农民联合会赤卫队第一中队队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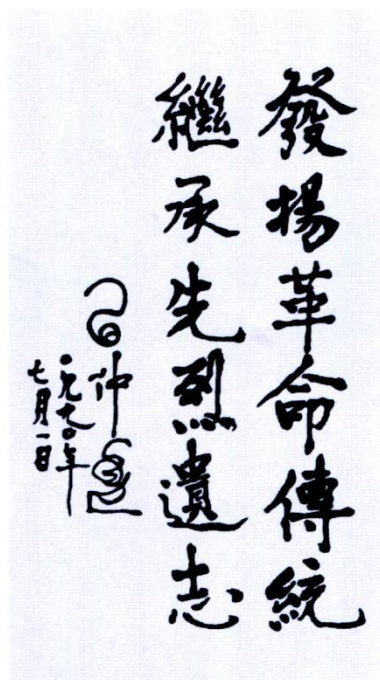
南梁修械厂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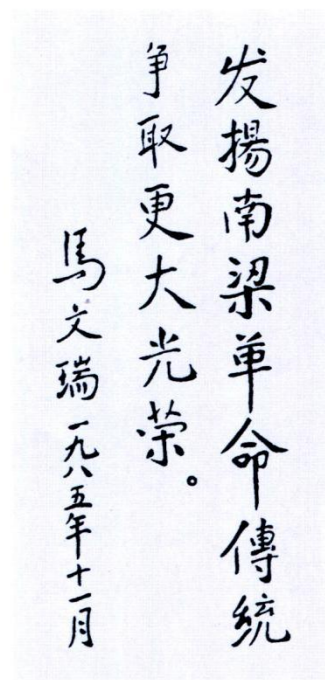
整装待发的红四十二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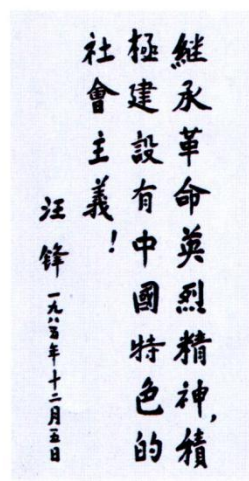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青年积极参加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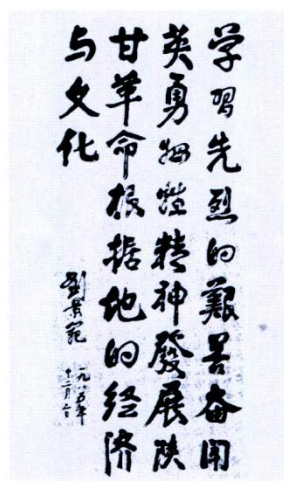
习仲勋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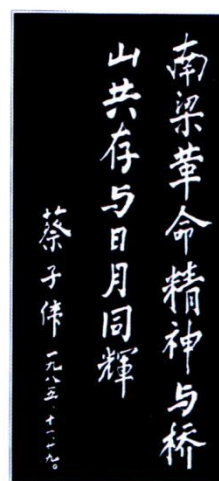
马文瑞题词



汪锋题词



刘景范题词



蔡子伟题词

序

石仲泉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80 周年之际，西北地区的党史工作者，历时数年，耗费心血，收集研磨资料，编纂有关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历史的书籍，很有意义。

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土地革命战争的 10 年苏维埃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1927 年大革命运动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在全国组织和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开辟了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在 1931 年 11 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期间，全国各地建立了几十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和数百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开始了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新中国的建立作了重要预演。

在广袤的西北地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建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以习仲勋任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刘志丹任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苏区是党在北方地区创建新苏区的主要代表，是党在西北地区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重要尝试。党在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也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此后，在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等三个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以陕甘革命根据地

基础形成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大本营，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也是聚集中华民族革命精英的民主圣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秉政同志撰写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一书，比较全面准确地记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创建历程，真实地再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府的不朽历史功勋，寄托了陕甘边区人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怀念和衷心爱戴之情。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党在陕甘边区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记述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面对敌人的封锁和“围剿”，采取的一系列深受群众欢迎的土地、金融、财政等经济社会政策，鼓励人民群众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不断改善军民生活的政策措施。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政权建设的实践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和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各方面的管理人才。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以新的视角总结和回顾了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开展群众工作、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经验，阐述了陕甘边区党和政府之所以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持，根本原因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陕甘边区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符合陕甘边区实际的革命路子，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和敌人顽强斗争，从而形成了陕甘边区群众工作的基本观点和朴素的群众思想，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还就南梁精神的形成、内涵、历史定位、研究现状、现实意义等进行探讨，对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以坚定

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近年来，从中央、省、市到党史学界，重视和深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认识、了解和宣传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研究西北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对于加强包括陕甘边区在内的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建设经验的研究，全面推进革命老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对于大力继承和弘扬苏区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努力实现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就我个人言，我在 10 年前走走党史，考察红军长征到陕北时，也到了陕甘边区的庆阳、华池、环县等地，并且是在考察南梁之后去陕北吴起的。由于时间较紧，正宁、宁县和陕西那边的相关县域没去，当时就深感遗憾。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初步地弥补了 10 年前的不足。这也使我感到欣慰。我也相信这本书能给读者以更多的启迪与思考，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历史的研究中来，多出精品力作，更好地服务大众。鉴于此，我很高兴为这本书作序，并郑重地把它推荐给广大读者。

2014 年 2 月于北京

（作者系著名中共党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前 言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举起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以创建苏维埃政权为核心任务，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中华苏维埃运动，苏维埃革命的星星之火，燃烧成熊熊的燎原之势。

中华苏维埃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运动的社会成果是建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第一个全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遍布全国的几十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和数百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在广大的西北地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先后以甘肃正宁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受挫失败后，又以甘肃华池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 年 11 月 7 日，正式建立以习仲勋任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标志着西北地区第一个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的诞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认真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法令，结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颁布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使根据地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嗣后，在数次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逐步连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拥有 30 多个县城，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陕甘根据地继而发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创建，是西北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西北革命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论断的成功实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实施的政策、法令，体现了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为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和工农民主专政，为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围绕中心任务，支持革命战争，锻炼培养了一批当家理国的人才。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中，党领导陕甘边区人民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建设，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和思想，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宝贵理论、思想作风和革命传统最终凝结为催人奋进、垂裕后昆的南梁精神。南梁精神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巨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党领导陕甘边区人民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历史，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展现历史，着重对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期望本书的出版发行，能为研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历史的各位同仁提供一点有益的素材，并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和宣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 录

第一章 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
一、苏维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
二、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4
三、全国主要苏维埃区域的形成和发展·····	8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5
第二章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寺村塬建立 ·····	20
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时的社会历史环境·····	20
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创建·····	25
三、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丧失·····	32
四、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历史地位·····	36
第三章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重新建立 ·····	40
一、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诞生·····	40
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重建·····	46
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建设·····	47
四、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陷落·····	52
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独特贡献·····	56
第四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60
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60
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再次成立·····	67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	73

四、筹备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79
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辖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83
第五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	95
一、苏维埃政权框架的搭建·····	95
二、制定颁布“十大政策”·····	97
三、民主法制建设·····	99
四、廉政建设·····	101
五、后勤保障建设·····	103
六、以革命英烈名字命名的基层组织·····	106
七、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历史经验·····	123
第六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建设·····	126
一、苏维埃的土地革命·····	126
二、苏维埃的农业生产·····	133
三、苏维埃的财政、商业贸易和金融·····	135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139
第七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教育事业·····	143
一、苏维埃的新型教育事业·····	143
二、苏维埃区域的文艺运动·····	150
三、苏维埃区域的新闻出版工作·····	154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的基本特征·····	156
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的历史地位·····	159
第八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统战工作·····	162

一、区别情况制定统战政策·····	162
二、实事求是地开展统战工作·····	163
三、陕甘边区统战工作的基本特点·····	171
四、陕甘边区统战工作成效与启示·····	173
第九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群众工作·····	178
一、教育引导群众积极支持革命·····	178
二、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181
三、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184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	189
第十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建设·····	195
一、陕甘边区的军事机构·····	195
二、陕甘边区的军事力量·····	196
三、陕甘边区的兵役工作·····	219
四、陕甘边区的军事斗争·····	223
第十一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光耀千秋·····	243
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移至下寺湾·····	243
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	245
三、党中央挽救陕甘革命根据地危机·····	249
四、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分析·····	252
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功勋·····	256
第十二章 垂裕后昆的南梁精神·····	261
一、南梁精神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261

二、南梁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条件·····	264
三、南梁精神的基本内涵·····	267
四、南梁精神的定位·····	274
五、弘扬南梁精神的现实意义·····	277

附录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大事记·····	281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其所属各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名录·····	301
主要参考文献·····	323
后记·····	327

第一章 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苏维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一）苏维埃的历史由来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汉语音译，原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沙皇统治时期的国务会议就叫做国务苏维埃。因俄国 1905 年革命时出现的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而简称“苏维埃”。

1905 年 3 月，乌拉尔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厂的工人首先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领导罢工的机关。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也相继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维埃由领导罢工的机关转变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成为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1905 年俄国革命失败，苏维埃被沙皇专制政府取缔。

俄国二月革命时期，各地又重新建立了苏维埃。1917 年 6 月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国人民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胜利的当天即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从此，苏维埃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1917 年 11 月至 1918 年 3 月，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8 年 1 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同年 7 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简称苏俄宪法），确立了以苏维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22 年 12 月，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联盟条约》和《联盟成立宣言》，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924 年 1 月，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简称

苏联宪法)，确认苏联为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联盟国家。1934年苏联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统治地位。1936年12月苏联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宪法，进一步完善了苏维埃制度。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二）苏维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苏维埃运动高潮的兴起。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解和宣传马列主义和苏维埃运动的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1917年11月，上海《民国日报》、湖南《大公报》先后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介绍苏俄政权的性质和组织状况。此后，各苏维埃政府建立的消息，通过报界不断传入中国。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无产阶级专政表现出极大关注。陈独秀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演，他与李大钊在1919年4月6日创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段落，提出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阶级”。1919年7月至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2、3、4期连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号召民众联合起来，敢于斗争，改造国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还创办了许多报刊和许多团体，宣传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思想。报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团体如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沙的“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天津的“觉悟社”等。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①。《纲领》指出：中国共产党决心“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在这个重建的国家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党的一大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城市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在农村，尝试组织农民协会。不久，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致力于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关于是否应该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问题上展开论战，长达半年之久。1927 年 7 月 28 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时局问题简评》中指出：

“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涨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苏维埃口号在中国最近的将来可能成为当前的口号”。“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口号”，但又指出：“因此，现在，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

②1927 年 8 月 9 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然而，中共中央策略的转变则比共产国际要晚一个多月。8 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在肯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的同时，仍然强调：“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③8 月

23 日，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中，批评了湖南省委关于放弃国民党旗帜，立即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的建议，指出：“政权形式，已在政治决议案中说明，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 1917 年了，这是不对的。”④1927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⑤这个决议案正式取消了组织“左”派国民党的计划，提出苏维埃口号的决议，但并未推广到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

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⑥至此，经历了曲折的革命探索，中国共产党正式举起了苏维埃大旗，确定了宣传苏维埃、组织苏维埃的政治目标。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①该纲领现存俄文和英文两个版本。见《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17 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322—324 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9—290 页。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02 页。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0 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1 页。

二、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中华苏维埃运动从 1927 年 9 月开始到 1937 年 9 月结束历时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中华苏维埃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初期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指从 1927 年到 1930 年这 3 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创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的历史。1927 年 9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根据形势变化，放弃了“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劳动平民会议（苏维埃）的中国。”^①10 月 24 日，中央第 13 号通告指出，南昌起义在政治上的错误是“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着自己应当代表工农贫民去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②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命令广东省委急速发动全省接动，“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11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广州暴动计划的制定，加快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步伐。11 月

中旬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建立，是由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大王”彭湃领导创建的。12月11日，广州起义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是由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领导创建的。但是，广州起义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很快进到失败，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仅存在3天就夭折了。从1927年秋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频繁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若干块较大的苏维埃区域，点燃了农村苏维埃运动的星星之火。到1930年全国红军发展到13个军，6.2万多人，苏区有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东江、琼崖、湘赣、赣东北—闽浙赣等10余个左右，30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学习苏俄革命的模式与道路，在理论上几乎全盘接受了1927年下半年来自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的关于在中国如何开展苏维埃革命的理论。在上述苏维埃理论指导下，中共中央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开展苏维埃革命，进而争取革命能够在不长的时期内取得成功。由于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主观意识超越了客观现实，中华苏维埃运动遭受很大损失。

与此同时，毛泽东、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在以另一种与中共中央意图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以毛泽东、方志敏等为代表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们，以山区为军事依托，以敌对势力相对较为薄弱的县城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广大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进而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参加苏维埃革命，中华苏维埃运动开始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状态。

（二）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中期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指从1931年到1934年这3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随着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好转，党内“左”倾思想有所发展。他们过分夸

大统治阶级的危机，忽视敌强我弱的特点，试图在短期内实行城乡工农革命的配合，夺取一省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进而实现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为此，中共中央加紧了在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干预。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策略和措施。9月12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会后，中共中央根据土地革命是否发展和有无群众基础；是否有强大的红军存在；是否便于向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发展等三个条件，将全国革命根据地划分为六个区域：苏维埃中心区；鄂豫皖特区；湘鄂西特区；闽粤赣特区；赣闽皖特区；广西左右江特区。并决定“一苏大”将在苏维埃中心区召开，1931年11月7日，时值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完全对立的工农民主政权的诞生。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管理国家的最初尝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苏维埃的基本任务是“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③当前的任务是：“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把苏维埃运动推到全国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灭亡中国的阴谋毒计。”^④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虽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的形势下召开的，因此不可能担负起总结经验教训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使命。1934年10月，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华苏维埃运动遭到严重挫折。从此，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开始了由南而北的大转移。

（三）中华苏维埃运动的晚期阶段

这个阶段是指从1935年到1937年这两年多时间里中华苏维埃运动发生巨大转变的历史。在中华苏维埃运动中心开始由南而北的战略转移过程中，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犹如久旱之后的一场透雨，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生机。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长期统治，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探索与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的苏维埃革命理论、苏维埃运动模式以及苏维埃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政策和策略。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会后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具体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提出了人民共和国口号。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又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9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说明。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表示，苏维埃政府将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首先实行了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变。2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特区。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正式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最终完成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变。“苏维埃”的变更，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与国民党政权、西方资产阶级政权以及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的区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走出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一种表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和成熟。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6 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33 页。

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 年 1 月 24、25 日。中国现代史料编辑委员会翻印：《苏维埃中国》，1957 年版，第 254 页。

④《毛泽东的开幕词》（1934 年 1 月 22 日），中国现代史料编辑委员会翻印：《苏维埃中国》，1957 年版，第 236 页。

三、全国主要苏维埃区域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央苏区的形成与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农民群众多次举行武装暴动。在赣西南，建立了万安县苏维埃政权，创建了东固、延福等小块革命根据地，开辟了赣西南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在闽西，创建了永定溪南红色区域和革命武装。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南闽西，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3 月 20 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 20 余县为割据区域，并使之与湘赣边界的割据相连接。4 月 5 日，红四军前委进一步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此后，赣西南、闽西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

1930 年 3 月，赣西南和闽西分别成立了苏维埃政府。8 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全军人数达 4 万人。10 月，红军攻占赣西重镇吉安，清除了赣南与赣西之间的白色梗阻，形成了稳

固的赣西南赤色区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业。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苏区范围最大时包括江西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等21个县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此时，虽然王明“左”倾错误已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并于1931年11月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后在中央苏区逐步贯彻，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的抵制和斗争，中央苏区继续得到发展。1931年12月，赵博生等率领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起义，组成红五军团，红军力量大增。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占闽南重镇漳州，7月2日在广东南雄水口击溃粤敌17个团，巩固了中央苏区南大门。同年8月至翌年3月，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根据地，而且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此后，中央苏区拥有一、三、五、七、八、九共6个军团10万兵力，以及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和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留下的1.6万余名红军指战员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在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二）鄂豫皖苏区的形成和发展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组成。全盛时期包括有20余县的地区，拥有约350万人口，主力红军达4.5万余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一块红色区域，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诞生地。1927年11月3日，中共黄麻特委召开会议，决定以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发动武装起义。14日晨，农民自卫军占领黄安县城，

随后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并逐步创建了鄂豫边根据地。7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与豫东南特委策划商南起义。5月6日，起义按计划进行。9日，各起义武装陆续集结，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打退了国民党军多次进攻，初步建立豫东南根据地。1929年秋，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组织农民起义。1930年1月，六安县委将各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红三十三师经多次转战，建立起多个革命政权，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初步形成。1930年6月，召开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当选为政府主席。至此，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形成。1931年7月，召开鄂豫皖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高敬亭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三）湘鄂西苏区的形成与发展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两省西部边界地区，主要由湘鄂边、洪湖根据地组成。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割据范围最大的三块红色根据地之一。鼎盛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曾覆盖58个县市，拥有2万正规红军和近5万地方武装。

1928年，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贺锦斋等在湘鄂边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开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改为红四军）。此后于1930年开创了洪湖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7月，红四军、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从此，湘鄂边、洪湖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中共湘鄂西省委、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关。1931年12月，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洪湖苏区召开，选举崔琪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武等为副主席。1932年秋，由于王明“左”倾机

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退出洪湖革命根据地。

（四）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的形成与发展

湘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位于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后，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分红军和各县赤卫队，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特别委员会领导下，经过两年的斗争，扩大了根据地。1931年7月，中共湘东南、湘南两特委和西路、南路、北路3个分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所辖的赣江以西地区合并为湘赣省。8月1日，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在永新成立，王首道任省委书记。10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湘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王首道任省委书记，袁德生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省委、省政府及省直机关均驻永新县城。至此，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它包括赣江以西、袁水以南、粤汉铁路以东、大余以北的广大地区，有20余县，人口100余万。此后，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永新、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苏维埃政府。1932年2月，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军独立第一、第三师合编为红军第八军，由李天柱代军长，王震代政委。1933年6月，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同时，以由红八军改编的红十七师和由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调来的红十八师在永新组成红六军团，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1934年8月，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委。随后红六军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的率领下，撤离湘赣革命根据地，向湘中转移，留下部分红军在湘赣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湘鄂赣苏区地跨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的边界地区，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1927年9月及其以后，湘鄂赣边界10多个县的农民举行起义，组成几支游击队，从此开始了湘鄂赣边地区的游击战

争。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和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同年7月24日，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平江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经过深入的土地革命，1929年9月，根据中共湘鄂赣特别委员会决定，红军支队编任由湘赖边转战到湘鄂赣边地区的红五军。之后，红军分兵展开活动，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扩大根据地。1929年冬，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已扩展到十几个县。至1930年6月，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西北的修水、铜鼓、万载，以及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这一广大地区内，除部分城镇外，都已成为革命根据地。1930年3月18日，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的40万革命群众为纪念巴黎公社59周年举行大示威。随后，即以红五军为主力，在边境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的配合下，举行边境红五月总暴动，先后攻占了平江、修水、万载、浏阳等县城。1931年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正式成立，李宗白任省委书记。此时，湘鄂赣省已在20余县建立了党组织，党员发展到4万人。9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赖汝樵任主席，刘建中任副主席。在反对国民党军“清剿”、“围剿”的斗争中，湘鄂赣根据地得到发展，扩展到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的广大地区。11月，红五军主力转往井冈山后，留下的一部红军编为红军支队在湘鄂赣边界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从1933年9月开始，红军和地方武装在国民党军的反复“围剿”下，遭受严重损失。至1934年8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及游击队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处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边界地区。全盛时期包括上饶、横峰、弋阳、崇安、开化等20余县的地区，拥有约100万人口，红军发展到万余人。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江西横峰、弋阳农民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福建崇安等地党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创建了闽北革命根据地。1929年底，中共赣东北特委成立，唐在刚任书记。1930年7月，闽北党组织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周

建屏任军长，胡庭铨任代政委，不久邵式平任政委兼前委书记。1930年11月，成立赣东北省委，唐在刚任书记；同时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1932年12月，党中央鉴于新的形势，改赣东北省为闽浙赣省，仍由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1月，红十军同寻淮洲、乐少华率领的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同时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继续担任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先遣队在转移中因遭优势国民党军围攻而失败，余部突围到浙南地区，在粟裕、刘英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五）两广地区苏区的形成与发展

左右江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之一，位于广西西部左江、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大部地区。1929年12月，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百色起义，成立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选举雷经天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领导龙州起义，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八军军长为俞作豫，政委邓小平（兼）。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逸。同时成立中共广西特委，由王逸担任书记，左江革命根据地正式开辟。同年3月，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左江根据地丧失。11月，红八军余部编入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留下的部队由韦拔群等率领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1932年冬，右江根据地完全丧失。

东江苏区是在海陆丰革命群众运动影响和推动下创建的，地处广东省东部的东江地区，北靠中央革命根据地，东接闽西闽南，西连广州，南临南海，1929年5月蒋桂战争爆发后，占领海陆丰乃至东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陆续调走，中共东江特委乘机把分散活动的革命武装集中起来，相继建立红军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二团，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在五华、丰顺、揭阳交界的八乡山和潮阳、普宁、惠来交界的大南山等地区建立根据地。1930年5

月，东江地区第一次工农兵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以陈魁亚为委员长的东江苏维埃政府。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上述红军各团编组成以古大存为军长的红军第十一军，主力达 3000 多人，各种群众武装达 2 万人左右。至 1930 年夏，苏区人口达 200 万，约占东江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苏区面积达 3 万平方公里，约占东江地区面积的一半，它遍及东江地区 20 多个县市，并发展到福建南部的平和、诏安和江西南部的寻乌。

琼崖苏区位于广东省的海南岛。1927 年 10 月，中共琼崖（即海南岛）特委杨善集、王文明等领导安定、琼山、万宁、乐会（今属琼海）等地农民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和琼崖革命根据地。1928 年春，工农革命军改编为工农红军，成立琼崖工农红军司令部，冯平任总司令。同年 7 月，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王文明任主席。同年 8 月，撤销红军司令部，成立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梁秉枢任师长，黄学增任政委。1929 年 7 月，特委领导机关被破坏，8 月，成立中共琼崖临时特委（不久正式成立特委），冯白驹任书记。1930 年以后，琼崖根据地有了较大发展。1930 年 8 月，中共琼崖特委先后召开全琼第二、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琼崖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符明经任委员长。1932 年秋，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红军遭受挫折，根据地大部丧失。1932 年冬后，留下的少数人由冯白驹等领导在山区坚持斗争。1936 年春，成立琼崖工农红军游击大队，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

（六）川陕苏区的形成与发展

川陕苏区位于四川、陕西边界地区，范围包括 23 个县政权，约 600 万人口。1932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奉命向西战略转移，12 月经陕南到达川北。12 月 18 日，红四方面军抵达通江县河口场，建立了川陕边界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赤北乡苏维埃政府。此后，在川陕两省党组织和王维舟等率领的川东游击队配合下，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32 年 12 月下旬，经过浴血奋战，红军占领了通江、南江、

巴中三座县城及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层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赤江（通江）、红江（涪阳）、南江、清江（巴中）等县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组建了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省委书记。并按照《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的原则，起草和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选举熊国炳为政府主席，宣告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大捷中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派遣的四川军阀田颂尧发动的三路围攻，攻占了长赤、广元、仪阆、苍溪、江口、万源等7个县，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使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一倍。

1933年6月，中共川陕省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红四方面军军事工作会议（即木门会议）先后召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根据地反“围剿”胜利后的新形势，做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红军与地方武装”和“组织问题”等决议。决定扩编军队，加强政治、军事和后勤工作。红四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11个师、29个团，计5万余人。张国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至1933年10月底，川陕苏区共建立23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川陕苏区进入全盛时期。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最后撤离川陕苏区，

（七）湘鄂川黔苏区的形成与发展

湘鄂川黔苏区位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界地区。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黔东革命根据地会师后，即向湖南省西部地区进击，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府、桑植等县城及广大乡村。11月26日，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

军区司令员，夏晓、朱长清任副主席。至 1935 年 1 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根据地包括永顺、大庸、桑植三县的大部地区和龙山、保靖、桃源、常德、慈利五县的部分地区，东西 200 余公里，南北 120 余公里，人口约 50 万，建立了县、区、乡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的组织；主力红军由 7000 余人发展到 1.1 万余人，并建立了独立团、游击队。2 月至 8 月，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 80 余团的“围剿”，保卫了根据地。9 月，国民党军以 130 个团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新的“围剿”。红军因多次寻战未果，于 11 月 19 日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八）陕甘苏区的形成与发展

陕甘苏区位于陕西北部 and 陕西、甘肃边界地区。1930 年 10 月，刘志丹策划实施“太白起义”，建立了南梁游击队。1931 年 10 月，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陕北游击支队，转战至甘肃南梁地区，在林锦庙、东华池一带与南梁游击队会合。不久，相继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2 年 3 月，在甘肃正宁建立寺村塬游击根据地。1932 年 12 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了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 年 10 月，照金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建立了以甘肃华池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 年 11 月，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为主席。在陕北地区，1932 年 3 月开始，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相继建立的几支红军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安等县境内开展游击战争，至 1934 年 8 月开辟了安（定）延（川）、绥（德）清（涧）、佳（县）吴（堡）、神（木）府（谷）四块根据地。1935 年 1 月，陕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马明方为主席，红军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1935 年 2 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了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6 月，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

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陕甘边区苏维埃运动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甘边区苏维埃运动主要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开展的。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立即组织武装暴动，首先是发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中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李象九营举行起义，这即为著名的“清涧起义”。1928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第二十六号通告》中明确指出，“发动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此拉开了陕甘边区及周边区域为主的陕西苏维埃运动。从1927年冬起，中共陕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及其反动统治。1927年10月12日，唐澍^①、李象九^②、谢子长等领导发动清涧起义。1928年5月10日，唐澍、刘志丹等领导发动渭华起义；5月7日许才升、吕佑乾等发动旬邑起义；5月9日赵新三、郭天有等发动淳化起义，还有共产党员王泰吉^③等组织领导的麟游起义等，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发动的上述起义，遍及陕甘边区、渭南以及渭北等广大地区，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陕西苏维埃运动。唐澍、谢子长、刘志丹等作为陕西早期苏维埃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不仅直接和间接地参加并领导武装起义，而且在随后的兵运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着力创建由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为最终创建陕甘边苏区作出了积极贡献。不论从时间、规模和领导者而言，陕西早期苏维埃运动与陕甘边早期苏维埃运动密不可分。没有以武装暴动为特征的陕西早期苏维埃运动，就不可能形成后来的陕甘边苏区。换言之，发生在陕甘边地域及周边地区的陕西早期苏维埃运动也是陕甘边早期苏维埃运动的一部分，共同构成早期中华苏维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陕甘边区是党在北方创建苏维埃区域的主要代表

早期中华苏维埃运动发端于南方，中共中央在审视全国苏维埃运动布局时，认为北方成为创建苏区较为薄弱的地方。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创造出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④同年12月，中共中央批评陕西省委关于陕西民众没有建立苏维埃勇气的思想^⑤。其实，在陕西早期苏维埃运动影响下，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多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将斗争目标转移到陕西北部 and 陕西、甘肃边界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的陕甘边区。1930年10月，刘志丹领导建立了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合不久，相继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终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为主席。

对陕甘边区创建北方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党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给予高度重视。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指出“陕甘边赤色游击队”和农民斗争“日益壮大”，对陕甘边区的苏维埃运动给予充分肯定。明确提出“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要求陕西省委“即刻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红军行动”，进而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⑥1932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陕甘边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创造，燃起了北方苏维埃的火把。”^⑦表明中共中央认为陕甘边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斗争的源头。同年6月24日，中共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认为“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主要特征—创立了北方新苏区的最初的根基。”^⑧6月26日，中共北方会议还专门总结了陕甘边苏区创建的一些经验，指出“在‘闭塞’的陕甘边苏区的创造中，我们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的经验。”^⑨1933年1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告渭北工农劳苦民众书》指出：“事实是非常明显的，要脱离饥饿的苦海，只有推翻这个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走上土地革命与苏维埃的大道。红二十六军正是开辟陕西苏维埃大道路的主力军！”

⑩1934年9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陕甘边的红军游击队，在过去长期英勇的战斗中，已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首先执行着北方会议的决定，开辟中国北部苏维埃革命的道路”。⑪大量史实表明，陕甘边苏区是党领导的北方苏区和北方苏维埃运动的主要代表。

（三）陕甘边苏区的发展壮大为中华苏维埃运动由南向北转移奠定了基础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来，中国革命的重心一直是在南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中心摆在了中国南方，南方始终是早期中华苏维埃运动的重心。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和中华苏维埃首脑机关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随后，南方各大苏区与红军都相继进行战略转移。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各路红军都曾为建立新的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其中，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曾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月到11月）；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3年10月到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1934年12月到1935年7月）等。这些新的苏维埃区域，随着红军的匆匆北进，随即就消失了，但却留下了中华苏维埃运动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的历史足迹。

党在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也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和陕北的党组织和根据地军民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不断得到发展壮大。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了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6月，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

在南方大部分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中央红军和其他各路红军

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后，这里成为红军的落脚点。它对于保存和发展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和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陕甘边苏区的壮大与发展，是中华苏维埃运动重心能够由南向北转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伴随中华苏维埃运动重心由南向北战略转移的基本完成，又促进了中华苏维埃运动在陕甘地区的发展，以陕甘边苏区为基础形成的陕甘苏区逐步成为中华苏维埃运动的新中心。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得知了北方的陕甘根据地保存得比较好，基础比较好，所以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样一个落脚点。客观上来说，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等等，在当时来说，确实打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虽然也有曲折，有危险，有不足，但总体上来说，在当时那样的战略形势之下，有这样一块根据地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各路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到达了这里，在这里休养生息、整合力量、编制队伍，为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通过找到这样一个落脚点，我们革命力经历了、渡过了最低谷。由于反‘围剿’的失败，从盛转衰；但是有了这个落脚点之后，就开始了由衰向盛，^⑫在抗日战争时期，以这块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成为党指导抗日战争的重要政治中心和领导敌后抗战的战略后方。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为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进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陕甘边苏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①唐澍（1903—1928），字东园，河北易县（今徐水县）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历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兼模范大队大队长，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主任教官。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西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等职务。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6月壮烈牺牲。

②李象九（1897—1954），原名李瑞晶，陕西白水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命赴陕北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任石谦营学生连连长，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1927年10月组织发动著名的“清涧起义”。1946年3月，经杜斌丞、韩兆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邓宝珊调来西安后，李象九接受党的指示，八次转送党组织给邓宝珊的信件，劝邓宝珊起义。1948年初，接受第一野战军的指示，在西安进行策反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全国解放后，先后任陕西省政府委

员、省政协常委、西安市政府委员、西北政法委员等职。1954年7月当选为西安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10月在西安病逝，终年58岁。

③王泰吉（1906—1934），陕西临潼人。1924年5月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在麟游率部起义。起义失败后，到渭华地区组织农民武装斗争。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工农革命军参谋长。1933年7月，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11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1934年1月，主动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后被叛徒出卖，3月，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卷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卷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4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卷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卷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⑫《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编委会编：《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第二章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寺村塬建立

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时的社会历史环境

（一）落后封闭的小农经济

陕甘边区地处陕西北部 and 甘肃东部交界地区，是一个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区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甘边区，山大沟深，交通阻塞，资源缺乏，文化科技不发达，工商业经济凋敝，农业生产单一，技术落后，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在风调雨顺的年份，百姓尚可勉强度日，如遇各种灾年，父老乡亲只有在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困境中度过，长期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在这里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霸占着绝大部分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而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却没有或很少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比如庆阳县（今庆城县）的大部分耕地就为所谓的“八大家”占

有。据记载，庆阳县八大家之一的恒义兴（地主李子良的字号）占有耕地 7 万多亩，拥有耕牛 1000 多头，从庆阳到陕北定边沿途几百里地的农民大都是李子良家的佃户，每年收地租达 4000 至 5000 石^①，在土地高度兼并的条件下，农民只有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来维持生计，他们往往要将收获物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遇上荒年，地租颗粒不减，遇上丰年，地租还要增多。地主阶级在用地租这种手段残酷榨取农民血汗的同时，还用苛捐杂税、高利贷等多种野蛮的剥削方式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贫苦农民生活平常就非常艰难，如遇天灾人祸，就更难以度日，不得不向地主借债，但地主给农民借债时的条件却十分苛刻，他们往往以一块银元月息三分来计算，有的地主甚至以“大加一”（即一块银元月息十分）来计算，并以债户的土地、房屋当作抵押品，过期不能偿还者，抵押的土地、房屋就归地主所有。许多农民就是这样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二）混乱的军事政治格局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甘边地区处于一个军事局势变迁极为激烈、政治形势极为动荡的时代。一方面该地区经历了由北洋军阀统治向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地方政权由服从北洋政府到听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变迁。新老军阀的政权更替过程在一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造成了新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由于陕甘边地区地处陕甘宁三省区的交界处，偏离中心城市和交通主干道，加之该地区处于黄土高原腹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使得各派军阀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力极为薄弱。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军事政治条件。

1928 年 12 月底，国民党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后，继之而起的是蒋、冯、阎、桂各派军阀先后爆发为争夺中央权力而进行的战争。在陕北，军阀井岳秀秉承谁掌权跟谁走，偏守榆林，静观全国，审时度势，及时调整陕北与全国政局的关系，决不卷入军阀混战。甘肃地区在冯玉祥国民军开赴反蒋前线后形成了新的权力真空，各地大小军阀为争夺权力，相互混战。1930 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甘肃全省宣

布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但此时的蒋介石由于忙于内战而无暇西顾，甘肃境内仍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地方军阀依然活跃于甘肃各地。

军阀并起时代的陇东各地经历了各类大小军阀相继而起的统治。据《庆阳地区志》记载，1927年至1935年间驻防庆阳的军阀部队主要有：1927年甘军黄得贵部驻庆阳县药王洞和元城镇（今属华池县）。同年，冯玉祥国民军进驻陇东并驱逐了黄部；1931年地方军阀陈珪璋接受蒋介石改编，驻防平凉和庆阳，陈部十三旅高广仁部驻宁县早胜镇，第五旅蒋云台部驻庆阳县西峰镇；1932年甘军新十一旅石英秀部驻防陇东，旅部先驻西峰，后移庆阳县城，部队分驻庆阳、合水和西华池；②军阀统治庆阳期间，征兵派饷，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军阀官府征收的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什么“白地税”、“屠宰税”、“军费”、“壮丁费”、“维持费”、“鞋袜费”等等，名目繁多、不计其数。更有甚者，官吏拷打了百姓，百姓还要缴纳“手棍费”。当时在陇东一带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鬼门关，几道坎，一道更比一道难；官府打人常有理，百姓挨打还出钱。当时陇东军阀陈珪璋给蒋介石的呈文中说“自民国十五年冯军盘踞甘肃，谋窥中原，征兵派饷，民苦更甚，弱者死亡，强者为匪，因与乡人组织自卫团共谋自卫……。”

③

军阀统治的嬗递，给陕甘边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权力真空，形成了当时政治无序、社会失范的危机局面。民团、帮会、土匪等各类地方军事武装相继而起，造成陕甘边区混乱的军事政治格局。军阀统治的瞬息起落，给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带来极大挑战。1928年以后，由各县地方士绅支持组建的民团武装应运而生，以之维持当地社会的正常秩序。至1931年前后，合水有民团20多股，正宁有民团10多股。一般的民团武装组织为20人至30人，大的民团武装有上百人。其武器装备或为大刀长矛，或为现代化的步枪。甘肃庆阳境内的帮会武装主要是红枪会，它是1925年由陕西传入陇东各县，以烧香敬神，结拜兄弟等形式秘密组织武装，练武防身，抗击土匪，使用大刀长矛，

后因思想迷信，武器落后，大部分被官兵和土匪击溃。由于兵灾饥荒不断，庆阳境内土匪蜂起，股多名杂，危害极大，仅见诸史志记载的就有十多股。这些土匪武装规模不等，小股武装仅有数人，大的武装团伙有数千人之众。有些土匪武装乘国内军阀相互混战的局面，发展为后来称霸一方的军阀豪强，如 20 世纪 30 年代初控制平凉和庆阳的陈珪璋军阀武装就是由土匪武装发展而来。

军阀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给地方社会造成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散兵、土匪、帮会、民团等各类地方军事武装并起，他们相互倾轧，肆虐地方，使得社会秩序彻底失范。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就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④正是在这一形势下，陕甘边地区的共产党人拉开了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三）深厚的政治和群众基础

陕甘边区很早就受到革命的影响。1925 年 10 月，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刘郁芬师进驻甘肃，共产党员宣侠父、钱靖泉受中共北方区执委和李大钊之托，随国民军到达兰州。宣、钱到兰州后，很快与张一悟等人取得联系，同年底建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活动至 1927 年 2 月，因为国民党右派的破坏，钱靖泉等人离甘，支部停止活动。在此前的 1926 年 6 月，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受北方区执委领导；后改归中共陕甘区执委，党员发展到 190 余名。1927 年 3 月成立中共陕甘区委时，下属 7 个地执委、4 个部委和直属的 16 个特别支部、4 个支部、党员 388 名。中共陕甘区委确定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人才集中，工作重点首先致力于农民运动。在地域上，首先集中于陕西，渐及甘肃。中共陕甘区执委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统一领导陕甘地区（包括陕北）的群众组织，包括青年团陕甘区执行委员会，陕西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省青年社等。同时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集中开展

陕西工作的同时，中共陕甘区执委决定派人到甘肃秘密重建党的组织。1927年3月成立了兰州、导河（即甘肃临洮）、平凉、宁夏特别支部。到1927年6月，中共陕甘区执委的党员达到2117名。在中共陕甘区执委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广大群众开展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斗争，支援国民军联军出关参加北伐战争，镇压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到1927年6月底，仅陕西省的农协组织即遍及60余县，会员达37万余人，农民自卫武装人数在10万以上，陕西的农民运动成为北方农民运动最高涨的省份之一。在中共兰州特支的领导下，兰州青年社等青年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刊物，宣传共产主义，抨击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展青年社员约300人。中共陕甘区执委还创办机关刊物《西北人民》，宣传革命主张。工人运动与农民、妇女、青年学生运动互相配合，促进了陕甘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7年4月、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陕西反动当局也大力清党反共，解散革命团体，镇压群众运动，西安面临一片恐怖。为了适应突然变化的形势，中共陕甘区执委决定紧急通知各级党组织尽快由半公开活动转入完全秘密状态，重要干部秘密离开西安。7月，中共陕甘区执委撤销，组建中共陕西省委。

从1927年冬起，中共陕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武装起义及三原、泾阳、礼泉围攻县城斗争，澄城农民驱逐反动驻军的斗争，永寿农民围攻县城斗争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及其反动统治。这些斗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却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积累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这也为以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组织、群众基础。

（四）特殊的地缘条件

从地理位置看，陕甘边区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它东临黄河天险，北起环县、定边，以北有沙漠遮蔽，西以子午岭为屏障，南到淳

化、耀县。雄伟苍茫的桥山山脉纵贯南北，绵延数百里。这里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以此为依托，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向东可进军陕北，向西可开辟陇东。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了国民党军队优势装备的发挥，十分利于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是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正是充分利用了这里的地利条件，创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从风土民情角度来看，这里是中华民族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陕甘边区历史上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处于关中地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军事要冲，当地居民大都是屯兵戍边将士的后裔，他们秉性刚毅豪爽，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自古以来，这里的人民无数次地参加反抗残暴统治者的起义行动，骁勇善战，民风强悍。当时，《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西北采访中已经意识到当地民风社情对于陕甘边区的影响因素：“由于交通隔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壤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员以鞭笞与他们间或相见外，其他可谓与政府无丝毫关系。……故此地素为绿林豪杰活动之区，驰名中国各省之樊钟秀，与曾在西北盛极一时的陈珪璋，皆发祥此等地区。”^⑤反抗压迫的民风传统对于陕甘边区民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易于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而嫉恶如仇的文化秉性，又孕育了铲除不平的思想种子。这种不屈不挠的优良品质，构成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土壤，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农业志》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03 页。

②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第四卷，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0 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甘肃省政府代主席王桢等电述甘政分歧情形》，全宗号 1，卷号 1587。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 页。

⑤范长江：《刘志丹之鼓动与民众之向背》，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93 页。

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创建

（一）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起义等一系列大小 70 多次武装起义，但都遭到了失败。从 1930 年开始，他们在认真总结多次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决心走井冈山道路，开始探索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和规模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刘志丹曾说：“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①这是刘志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在认识上的飞跃。那么到哪里去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呢？刘志丹把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目标放在陕甘边区的子午岭一带。这里山大沟深，遍地梢林，交通阻塞，有利于红色武装的依托和隐藏；这里地处陕甘边界，反动统治势力薄弱，易于创建红色政权；这里群众生活非常贫苦，阶级矛盾尖锐，人民自发斗争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易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认为，连土匪搞几支枪，就能在这里占山为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一带闹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呢？为了创建红军，从 1929 年秋开始，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派遣打入西北国民党地方部队挂名建军，从事兵运工作，建立为中国共产党所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长期的兵运工作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认识到，搞武装斗争不直接掌握军队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走独立自主发展革命武装的道路。1930 年 10 月，刘志丹策划实施“太白起义”，将陇东民团军谭世麟^②部第二十四营缴械，创建了 100 余人的南梁游击队。“太白起义”是党在甘肃的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1931 年 1 月，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保安、安塞一带遭国民党井岳秀部高双成旅“剿袭”后，转移到瓦子川。2 月，部队进驻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贾

生财等武装会合，部队扩大到 300 余人，并在固城麻峪村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辖 4 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任连长。整编后部队进驻甘肃宁县盘克张皮塬。经过张皮塬遇袭、彬县下狱、早胜事件等一系列挫折，1931 年 9 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倒水湾对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三支农民武装进行整编，恢复成立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全队 300 余人，下辖三个大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任大队长。1931 年 10 月下旬，杨重远、阎红彦^③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和杨琪^④、师储杰的商贩保运队共计 300 多人，在林锦庙与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三支革命武装力址共达 1000 余人，在南梁山区汇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1932 年 1 月，南梁游击队开赴正宁县月明乡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2 月 12 日，又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咀子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步兵大队两个，警卫大队、骑兵大队各一个。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⑤、政委高岗^⑥，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总指挥部根据陕西省委的预定方针，立即南下，向渭北地区运动，准备进入三原、富平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执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1932 年 2 月 13 日拂晓，游击队占领旬邑县职田镇。2 月 15 日，在职田镇阳坡头伏击来犯之敌大获全胜。随后，游击队沿马栏河进入旬邑与淳化交界的土桥原一线，击溃照金民团，最后转战同官（今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地区，三月中旬回师陇东。

当时，国民党陕甘两省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激烈混战，1932 年 2 月 20 日甘军暂编十三师师长陈珪璋在兰州被杀，其陇东的残部变本加厉地向各地索粮派款，仅驻扎在正宁的残部百余人，就向四乡百姓索要款项达 10 万余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宁南塬一带的农民组织起多支“民团”抗粮抗捐。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在多次催粮失败后，

扬言要“血洗南塬”。看到陇东出现高涨的革命形势，谢子长遂改变原定出击旬邑的计划，决定就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攻打正宁山河镇，开辟革命根据地。

山河镇是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驻有陈珪璋残部警卫团一个排，公安局警察三个班，包括县府公务人员共计不足百人。此外，陈珪璋残部一个骑兵营，由谢牛率领驻距山河镇 40 多公里的早胜镇，陈珪璋残部警卫团副团长刘明发带两个排驻守宁县平子镇。3 月 19 日夜，陕甘游击队同张彦升、杜兴邦率领的寺村塬一带农民“民团”及群众分兵两路向山河城进攻，但因向导迷路，错失战机，内应被捕，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战斗失利。当晚，陕甘游击队撤退到正宁县西坡四疙瘩村，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制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作出五项决定：1.赴南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的破坏；2.将自发组织的农民“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以配合红军的武装斗争；3.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4.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拔除敌人的据点；5.成立革命委员会，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具体办法是各大队划分区域，分工负责，先召集各村的群众大会及建立各村的赤卫队。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用此委员会公布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⑦

3 月 20 日，陕甘游击队移驻正宁寺村塬，分驻寺村塬的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寺村塬又叫永和塬或南塬，是正宁南部一条比较大的塬，由湫头塬、五顷塬等小塬组成。南接旬邑，东靠子午岭大梢山。陕甘游击队移驻寺村塬后，在苟仁村寺院召开会议，宣布将原来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游击队到处张贴标语，广泛发动群众，以村为单位成立农民联合会、少先队等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同时，陕甘游击队立即投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活动。谢子长、杨重远等和其他队员一起，走村串户，张贴标语，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主张，向群众宣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大意义。

1932年3月下旬^⑧，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东至五顷塬，西至永和塬，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正宁县与旬邑交界地以内72个村钺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集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唐贵荣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4个委员会。^⑨各村也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村由5名委员组成，小村由3名委员组成，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驻新庄子西洼。会议决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以农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布告宣言，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县政府、区公所均被推翻。会议决定没收所有豪绅地主富农粮食，一部分分配贫农、雇家、中农、苦力，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会议决定改组赤卫队，禁止富农参加，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由群众选举分队长一人；乡或七八个村成立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一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正副队长各一人，参谋一人。并以同样形式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均属革命委员会领导，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

（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斗争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一经成立，即把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作为主要任务，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及其它财产，镇压恶霸豪绅。游击队组织领导群众先后没收了西城村豪绅刘喜坤、于家庄豪绅赵元亨、琴宅豪绅赵秉义的土地、粮食和牲畜，分配给当地贫苦农民。游击队骑兵团还到正宁永和、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县的底庙等村镇抓捕土豪劣绅。陕甘游击队对豪绅区别对待，对一般豪绅讨保释放，对少数罪大恶极的严加惩办。3月底，游击队在苟仁村寺院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豪绅赵元亨和恶霸巩德功。长期受压迫的穷苦农民欢天喜地，用当地的地方小调唱道：“中华民国二十年，红军起首三嘉塬。谢浩如、刘志丹，领导穷人把身翻。东靠黄河西靠山，锦章、细咀子扎营盘。枪声一响震四方，好像猛虎追

恶狼。反动走狗民团跑，土豪劣绅跑不了。打土豪，分田产，打开仓，把粮散。车子推，口袋掂，家家户户吃白面。常开会，来宣传，你拿斧头我拿镰。都是红军来的好，世道翻了个底朝天。”^⑩

经过 10 多天的准备，3 月 31 日，陕甘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山河城。谢子长、杜兴邦分别率领游击队和赤卫军及群众千余人从寺村塬出发，到达山河城东的路家窑一带。此时，赤卫军和群众停止前进，为部队助威，送水送饭。4 月 1 日，游击队从城东、城北同时发起进攻，山河镇国民党驻军钻入城内，凭借坚固城防顽抗。2 日下午，驻早胜镇的国民党陈珪璋残部骑兵营驰援，于城东数里之西坡坳遭游击队伏击，被毙伤四五十人。随后，国民党军遂调头撤退，被游击队赶入城内。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加之山河城守敌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顽固对抗，红军连攻两日未克，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失利。4 月 2 日，驻西峰镇的国民党军暂编十三师一个营赶来增援，红军给予援军以重创，歼敌 200 余人后，撤离战场，转回寺村塬休整。4 月 13 日，游击队接到旬邑地下党组织报告，旬邑县城驻有陕军警卫团一个营部两个连及少数民团，防守不严。队党委决定，奔袭旬邑县城。当入夜，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从寺村塬出发，14 日拂晓与敌接战，出敌不意，大获全胜，歼敌 300 余人，缴枪 400 余支，子弹 2 万余发。并处决了国民党旬邑县长、警察局长、土豪劣绅数人。攻占旬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建队以来攻克的第一座县城，影响很大。一时红军声威大振，很快发展到近千人。在建队仅仅 70 天时间里，陕甘游击队依托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积极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选择游击战争的战略方向，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标志着党在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已经从徘徊中迈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是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端。

①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24 日。

②谭世麟，甘肃庆阳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党陇东民团军总司令、清乡司令，惯用铡刀残杀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共产党员及无辜群众，血债累累。1950 年 4 月在华池县柔远城被镇压。

③阎红彦（1909—1967），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10 月随部参加清涧起义。1931 年

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任副大队长、大队长。同年10月率部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先后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1932年6月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1936年3月任第三十军军长、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东征战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三团团长、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书记，四川军区副政治委员，四川省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67年1月被陈伯达、江青等迫害自杀。

④杨琪（1895—1936），字建亭，陕西延川人。1925年参加国民军，1928年因家乡参加商贩武装。1931年10月，率商贩武装和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投身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月，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同年2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骑兵队副队长。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1月，任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1934年7月，任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参谋长，1935年1月，任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1936年2月，任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团长，奉命率部东征，3月9日，在指挥红三团攻占绥德县岱王庙战斗中牺牲，时年41岁。

⑤吴岱峰（1903—2005），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26年11月参加革命，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军晋西游击队创始人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先后任红二十六军连长、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长、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红军北路军参谋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陇东军分区司令员、中共陇东地委常委，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三旅副旅长，三边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三边地委常委，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地委常委，独立第一旅旅长兼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旅党委书记，榆（林）横（山）北线部队总指挥、中共榆林地区工委委员，西北军区榆林军分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地委常委，西北军区八十六师整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陕北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陕北行署常务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地委常委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员等职，2005年9月在北京病逝。

⑥高岗（1905—1954），原名高崇德，字硕卿，陕西横山人。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至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交通、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指导员、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等职。1935年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指挥部政委、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局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

发和批判，1954年8月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⑦《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工作报告》，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⑧关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时间，有的书籍记作3月22日，有的资料根据杜衡回忆来到陕甘游击队的时间为3月29日推算，记作4月上旬。但据现有资料，杜衡是4月18日与刘志丹、黄子文一同来到陕甘游击队的。据吴岱峰《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和发展》记载：“陕甘游击队来到马家堡后的第二天，杜衡、刘志丹、黄子文从省委来到部队。”（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页）。根据当地群众和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应在第二次攻打山河城之前。据《代云成1990年8月22日谈寺村塬革命委员会》：“1932年红军来这里活动时，我当过先锋队长。新庄子开大会，我没到。大概是枪毙赵元亨10多天后的事。成立后还打过山河。记得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选唐贵荣当到主席，第二次打山河时，唐说锣和沙毡能挡枪子，动员大家。成立革命委员会前，唐不管这些事。”（见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359页）。另据吴岱峰《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和发展》中记载：“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驻防期间，配合地方党，成立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农民协会、赤卫军、儿童团、妇女等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分粮食“游击队在寺村塬驻了20多天。4月中旬，当地群众要求再次攻打山河城，拔掉据点，以利开展工作，游击队队委会接受了群众的要求，第二次攻打山河，配合行动的赤卫军约有4000多人（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27页）。

⑨据当时任革命委员会文书的李志合回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静元，副主席唐贵荣。这里采用《陕西代表团杜励君报告》的说法，杜励君即杜衡，见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⑩张锋著：《民族英雄谢子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4页。

三、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丧失

正当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之际，1932年4月18日，陕甘游击队进至马家堡。当天，推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①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刘志丹在完成安置伤员和向省委汇报工作的任务后，亦随杜衡归队。杜衡传达了省委指示，批评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党不可饶恕的罪恶”，提出了彻底改造游击队的15条措施。②这一时期，由于斗争环境极其艰苦，游击队发生了极端民主和破坏纪律的现

象，战士没有薪饷、粮食和鞋袜，住宿发生严重困难，部队中出现了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不遵守群众纪律等问题，杜衡附和并诱导这种消极情绪。他认为第一次攻打山河城失利是“逃跑主义”，并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销了谢子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派其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杜衡将陕甘游击队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分散活动。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吴岱峰任参谋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即行消失，各支部党组织则直属省委。随后，三支队进入陕西永寿、礼泉、乾县、彬县一带游击；五支队进入渭北地区活动。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调动数旅兵力，向陕甘游击队发动“围剿”。为了统一指挥，便于反“围剿”斗争，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命令两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队委会也相继恢复，刘志丹任书记。在刘志丹指挥下，部队在外线转战郿县、洛川、中部、宜君等县。至5月底，陕甘游击队历时半个月，转战7个县，挺进300多公里，历经9次战斗，8胜1负，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4个整连、一个整营及大量民团，共计俘获人枪各1400余，粉碎了国民党部队的“围剿”。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

正当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却认为，陕甘游击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命令陕甘游击队东进陕西韩城一带，在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6月23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二五〇团，并山炮、骑兵各一个连，向红军发动进攻，韩城战斗打响，由于敌强我弱，韩城战斗失利，陕甘游击队人员损失过半，为避强敌，休整部队，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向桥山转移。转移途中，部队再次遭受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损失惨重，当总指挥部率第三支队退到宁县麻子掌时，只剩下200余人。由于韩城战斗失败，部队出现思想混乱，领导之间在行动方向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为了统一思想认识，队委会在麻子掌召开会议。会上，政治委员李杰夫、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提出南下，主

张到群众基础好的三原武字区打游击。刘志丹主张依托桥山，就地开展游击战争。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作出了分开行动的决定。正在这时，阎红彦带领五支队百余人到了距麻子掌 5 公里处的梁掌堡，从群众口中得知红军要分开行动的消息，即分别找刘志丹、李杰夫谈了个人意见。他表示同意刘志丹的意见，不能分裂，应就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时原来主张分家的同志也考虑到党的利益，认识到分开不利。于是，在梁掌堡再次召开队委会议。由于阎红彦会前分别作了工作，并且支持刘志丹的正确意见，会议作出了以桥山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的正确决定。会议推选阎红彦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梁掌堡会议后，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部队在盘克塬经过短暂休整，将原来的三、五两个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

梁掌堡会议是陕甘游击队发展过程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明确了游击队今后的发展方向，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纠正了南北分家的错误思想，统一了思想认识，保证了部队的团结和统一，为陕甘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梁掌堡会议以后，陕甘游击队在宁县盘克塬得到西华池起义^③部队的补充，扩大到 500 余人，此后，陕甘游击队转入正宁一带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在行动方针上确定以正宁为军事后方，以此为依托向两翼展开。根据这一方针，第一大队和骑兵大队，北进庆阳游击；第二大队则去旬邑、耀县活动。与此同时，派出得力干部深入农村开展地方工作。经过短期努力，五顷塬、龙嘴子、南邑等村农会迅速恢复起来，还建立了乡级苏维埃政权，乡政权分别设有土地、军事、劳动、粮食、文化、青年、妇女等委员。

7 月 23 日，李艮^④受陕西省委派遣，来到陕甘游击队任政委。他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

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此指示已暴露出中共陕西省委“左”倾错误领导者对陕甘游击队党委的严重不信任。李艮在正宁南邑连续召开六七天干部会议，批判所谓“机会主义领导”，指责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是“逃跑主义”、“上山路线”，空谈创建新苏区和二十六军问题，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限令 20 天内将五顷塬土地分配完毕；在队委会外又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以向“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就在李艮整天泡在会议之中批判“机会主义领导”之时，国民党军从容地完成了进攻游击队的部署。在国民党部队发起进攻后，李艮又命令游击队硬攻和死守。8 月 13 日，李艮命令陕甘游击队强攻王郎坡国民党军据点，王郎坡是国民党部队进攻根据地的战术支点，易守难攻。红军冒着国民党军的密集火力，死打硬拼，围攻两天未能取胜，部队伤亡 60 余人，16 日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塬一带待命。此后，李艮又命令红军进至五顷塬据守。李艮要求红军以阵地战保卫根据地，布阵待敌，坐阵挨打。但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部署，就遭到尾追国民党军的猛攻，陕甘游击队仓促应战，伤亡 30 余人，阵地被国民党军突破，部队又退到三嘉塬地区。8 月 19 日早晨，国民党军分兵三路，合击三嘉塬，红军奋力拼杀，巧借大雾突出重围。20 日，陕甘游击队转移到秦曲、狼牙洼一线。不料国民党军尾随而至，红军不得不继续转移到前马原。21 日，时值大雾弥漫，国民党骑兵借大雾突入庄内，红军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后分散突围，于 24 日转移到旬邑县马栏镇，陕甘游击队只剩下 200 余人。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灾难性后果，部队损失过半，队委会解散。

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遭到破坏，地主豪绅大搞反攻倒算，国民党地方政府也对人民进行疯狂镇压和勒索，“剿赤捐”、“剿赤军队支应费”等苛捐杂税接踵而来，在王郎坡附近的几个村子，群众每日不仅要供给国民党军队 300 人的伙食，还要出 30 块银元。原来参加过革命的积极分子，有的被抄家，许多人被抓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陷落。

①杜衡（1909—1965），又名杜振庭、杜励君，陕西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西安第二部委书记、陕甘区执委会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政委等职。1933年7月28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和地方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湾，任台湾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处长，国民免训练委员会主任等职，1965年4月病歿于台湾。

②见《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议》（1932年3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0页。

③西华池起义是指1932年7月，经谢子长部署，在刘志丹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指导配合下，共产党人高鹏飞等在合水县西华池成功进行的一次武装起义。西华池起义瓦解甘肃军阀王子元、石英秀部两个连的兵力，给西北军阀以沉重打击，壮大充实了红军陕甘游击队。

④李艮（1908—1933），字育初，笔名愚本，陕西长安人。幼读私塾，1920年考入高小，1926年春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参加西北青年社，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军阀刘镇华围西安城时，李艮积极参加守城斗争，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解围后，李艮先后担任中共长安县五楼区区委书记等职。1927年冬，李艮担任中共长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1928年11月28日，由于叛徒出卖，李艮和省委负责人潘自力出席会议时被捕。李艮被捕后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1930年11月成功逃出监狱后到杨虎城部唐嗣桐旅从事兵运工作。不久，以省委委员兼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身份领导恢复和整顿中共在陕东的地方组织。1931年9月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1932年8月，李艮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不久前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政委。同年9月18日李艮在甘肃平凉领导了蒿店兵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任政委。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李艮于1933年初以省委委员的身份在陕南发动武装斗争，1933年2月任红二十九军政委。同年4月1日，红二十九军主要干部在军部马儿岩开会，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五〇二团和骆家坝民团分4路袭击会场，李艮等突出重围后又因叛徒出卖在磨子坪落入敌手，于4月6日壮烈牺牲。

四、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历史地位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党在陕甘边区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尽管这个革命政权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却是党在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它传播了革命思想，给人民带来了希望，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革命政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区创建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开创了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从

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工农劳动阶级的特征，体现了红色政权的本质属性。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体现了红色政权的特点，在筹备革命委员会时，党对红色政权领导成分的成分及表现、能力情况从严要求，严格审查。据当时担任革命委员会文书工作的李志合回忆：“过了不长时间，就筹备成立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当时寻主席费了大事，那时对成分提得严得很，把上下原的贫苦人大都摸遍了，要找一个最穷的人。结果摸到了车家沟的张静元，这人的确穷得很，弟兄、父子常年给人拉长工，一家光棍，可怜得很。可是这人胆子大，嘴头能说，大小场合他不怯，因此就摸准了他。另一个是西城的唐桂荣，他是个中农，可他非常老实。”^①从李志合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陕甘游击队对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骨干的选拔，是按红色政权的基本要求进行的，这样就保证了革命政权领导人的纯洁性，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体现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不是党和红军陕甘游击队包办的，是由党组织提出候选人，然后五六百名农民代表表决通过，这样就保证了寺村塬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和群众性，体现了红色政权来自人民群众，听从人民群众的意愿，并服从人民群众的民主特色。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指导配合下，进一步发动群众，领导赤卫军和广大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体现了红色政权的根本纲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有组织、有计划创造的，并不是宣布革命委员会后就撤走了，它组建了赤卫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它与白色区域是根本不同的。习仲勋早在1943年1月就曾经明确指出：“1932年，革命运动继续高涨，3月间新正一区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地方赤卫军和少先队，在五顷塬一带没收地主奈绅的土地给贫苦农民。”^②因此，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斗争中的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尝试。

第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陕甘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促进了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为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创建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建立后，陕甘游击队按原定计划发起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革命委员会积极组织根据地群众为部队送水送饭，支援前线，赤卫军还配合行动，协同作战。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战斗失利后，陕甘游击队仍退回寺村塬一带休整。此后国民党军为扑灭陕甘边区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向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权发起“围剿”，刘志丹指挥红军转战外线，经九次苦战，至5月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正当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之际，以杜衡为书记的陕西省委却命令红军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东进韩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部队遭国民党重兵“围剿”，受到严重损失，不得不重返寺村塬游击根据地。7月下旬，李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使陕甘游击队和寺村塬红色政权建设受到很大干扰，8月下旬，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由于失去了后方政权的依托，红军游击队接连失利，损失严重，只好退往子午岭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荒无人烟的地区。此时正值严冬季节到来，部队给养困难，伤寒病在部队流行，战士情绪低落，思想混乱，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处在危急之中。史实充分说明，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存在的近半年时间中，陕甘游击队因有后方红色政权的依托，而显得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有利时则打出外线开展游击活动，失利时则回师后方休整，即使遭受严重挫折也因有后方政权和群众的掩护而有回旋余地，并得以休整和补充，因而促进了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此相反，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革命委员会被国民党军摧残后，红军陕甘游击队则失去后方依托，得不到充分的休整和补充，处处被动，处境险恶。因此，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为党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政权提供了典范，积累了经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从建立到丧失，仅仅存在了5个多月时间，它是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区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为党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政权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是创建和巩固革命政权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作保障。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曾经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当时，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仅 300 人左右，西华池起义后，扩充到 500 人，人数极少。红军的武器装备极差，一方面靠战斗中缴获的武器进行扩充，另一方面也靠当地民众的长矛、大刀、土枪、农具进行配合战斗。陕甘游击队力量弱小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猖獗，迫使红军部队经常处于高度的流动作战之中，因而根据地的区域也处于经常性的流动之中，暂时无法形成中心区域的革命根据地。出现了红军在，政权就在，红军撤离，政权就消失的局面。

二是创建革命政权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创建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革命政权过程中，党内曾经发生两种不同的指导意见。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代表坚持在远离国民党统治的边远地区搞游击战的正确路线，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得以建立。另一种就是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建立不久，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杜衡和坚持搞“停止游击战争”、“坚持阵地”的李艮，他们分别来到根据地，强令游击队远离根据地，坚持到三原、富平等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其结果不仅使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丧失了革命武装的支撑并陷于瘫痪，而且使红军陕甘游击队失去根据地的依托，损失较大。这充分说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革命就会取得胜利，否则，革命就遭到失败。

三是创建的革命政权必须有稳定的工作机构和正常的工作程序。受各种条件限制，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红色政权组织尤其是基层政权组织不健全。据当时担任革命委员会文书李志合回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住西洼张进友家，张静元和唐桂荣也住在这里，每晚还有五、六个赤卫队员拿着矛杆子站岗。张和唐分任正副主席，但他们都不识字，当时我已完小毕业在家没事干，张和我是邻居，他就把我叫去给他看上面来的条子，晚上写标语等等，实际上是给办文书工作。

我去后一直和他们在一起，这个革命委员会只有正副主席，再没有什么下设的组织。”^③此外，地方赤卫军也不够稳固，农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也没有广泛建立起来，未能有效地发动和组织农民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支援革命战争，保卫红色政权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此后，由于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革命委员会因此失去支柱，最后消亡。

四是创建的革命政权必须坚持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革命的胜利，首先在于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执行了一整套符合人民利益要求的政策，因此被人民所拥护，为历史所选择。陕甘游击队建立后，就在发布的布告中明确提出了分配地主豪绅土地给贫苦农民的纲领。根据地建立初期，红军就在新庄子等村庄，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访贫问苦；建立根据地后，又发动汉族和回族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和牛羊牲畜，充分代表和体现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和诉求，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调动了群众革命积极性。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真正是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

①《李志合谈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204页。

②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1943年1月9日），陕西省档案馆复制件第048号。

③《李志合谈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205页。

第三章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在照金重新建立

一、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诞生

（一）红二十六军的诞生

根据陕西省委的报告，1932年4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明确指示：“在积极的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并指出，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的红军，红军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共中央要求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①根据中央的决议，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陕西省委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决定“成立红军一团”，“该部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独立团”。②6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问题时，专门研究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红二十六军政委。8月25日，陕西省委又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在陕甘边区建立红二十六军。

1932年12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南下到达陕西淳化县境内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开赴宜君休整待命，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随后，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部队。12月19日，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宜君县杨家店子（今属旬邑）集结。20日，杜衡召集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省委改编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决定。会上，杜衡撤销了坚持正确意见的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的职务，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给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到上海“受训”。杜衡还提出在改编中新任排级以上干部实行民

主选举，候选人从战士和班长中产生，由政治委员任命。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将陕甘游击队排以上干部集体撤职，把干部任免权抓在自己手中。

因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陕甘游击队由 1500 余人减少为 200 余人，无法实现中央有关组成一个师的要求，杜衡只好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12 月 22 日，红二团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班长王世泰^③为红二团团长。12 月 24 日，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汪锋^④任团党委书记，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全军共 200 余人，有长短枪 150 余支。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党在西北地区成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队伍。它的成立，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反动武装，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革命武装斗争的政治影响，坚定了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信心，为西北革命斗争走向胜利树立了一面鲜艳的斗争旗帜。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以后，肩负起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任。

（二）陕甘边新苏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红二十六军诞生后，按照陕西省委关于在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为此，部队在完成改编后，立即开赴照金地区。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西北部，居桥山山脉南端的突出地带，与旬邑、淳化、宜君、同官等县接壤。它北倚子午岭中段，南俯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通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岳连绵，河溪纵横，沟壑交错，地形崎岖不平。中心地带险峰林立，其中以薛家寨为设，海拔 1600

多米，悬崖峭壁上横贯数处天然岩洞，寨势雄奇，极为险要，便于小规模红军开展游击战争。

照金地区土地高度集中。耀县李卜客等大地主和香山寺院霸占了照金地区大多数土地，无地农民多达 60%。多数农民以租种土地为业，由于生产工具原始，操作方法落后，每亩仅收 30—60 公斤，而地租高达总收成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农民生活十分贫困。自 1929 年陕西大旱以后，照金地区涌入大量灾民，土地更趋集中，社会矛盾尖锐。广大农民不断进行抗捐、抗租和抗债斗争，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强烈的革命愿望。

照金地区保甲民团横行。国民党耀县政府在照金建立了严密的保甲民团系统，以后沟寨、坟滩村、照金村为界，南为八保，北为九保，划区治理。两保之中，设一武装民团，以当地劣绅张彦宁为团长。该民团在乡村恣意横行，经常征调民工建造碉堡，营修山寨，强行摊派枪支弹药费用，私设监狱，滥施淫威。

照金地区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十分庞杂。每逢夏收秋割，民团保甲逐户催征，甚至坐场追索。由于照金没有集市贸易，农民手中货币奇缺，大多以粮食、牛羊等实物交纳税捐，民团保甲往往趁机压低品级，以饱私囊。

照金曾是陕甘游击队、渭北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1932 年 8 月，谢子长、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进入照金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期间，两当兵变失败后多方寻找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勋也来到照金。9 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撤离照金时，谢子长叮嘱习仲勋：“你留在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⑤刘志丹还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活动，传播革命火种。

由于照金具有良好的条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 月 27 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以声东

击西的战术，首战焦家坪，全歼国民党民团 60 余人，红军无一伤亡。焦家坪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创建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战后，红二团经衣食村进至香山寺。该寺位于照金北部的笔架山，寺庙中储存有大量的粮食。红军占领香山寺后，没收了寺庙储藏的两三千石粮食，一部分赈济了灾民，一部分作为红军的给养。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离照金只有 30 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人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地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当时，由红军具体负责烧寺，渭北游击队负责分粮。焚千年古寺，从军事角度讲，虽说对巩固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保护祖国文物来说，却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此基础上，红二团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赤卫军，开辟了香山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接着，红二团又消灭了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区。红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自愿参军，红二团扩建了步兵二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全团迅速发展到了 300 人，长短枪 300 余支。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红二团正式成立随营学校。校长由李杰夫担任，汪锋任政委，学员 30 余人。

1933 年 1 月中旬，红二团向西发展，协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园等 5 支游击队。2 月上旬，刘志丹率领红二团北上正宁，在三嘉塬、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产，并在湫头塬与三嘉塬的交通要道石炭沟口设伏，全歼王郎坡民团，击毙国民党民团团总赵世坤。3 月下旬，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攻克同官金锁关，打开了根据地工作的局面。

在主力红军的配合下，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游击队武装也快速发展起来。

3 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⑥根据陕西省委指示，3 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⑦任总

指挥（后由黄子文接任，黄调走后仍由李妙斋担任，9月，李妙斋牺牲后由吴岱峰继任），习仲勋（后张秀山⑧）任政委，统一领导各游击队。3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辖渭北、泾阳、富平三支游击队，共300余人，后又在渭北组建了十多支游击队，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革命武装力量，为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斗争，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金理科⑨（后为秦武山⑩）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特委委员先后有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张秀山，史克寿任青年团书记。特委成立后，领导照金人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到4月底，以薛家寨为中心，西迄淳化黄花山、旬邑七界石，东至耀县沮河西侧山区胡家山、高山槐，北达耀县断头川、旬邑老爷庙，南抵耀县老牛坡、桃曲门，东西相距50余里，南北相距60余里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基地。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③王世泰（1910—2008），陕西洛川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历任陕甘游击队班长、红二十六军团长、安塞县委军事部部长、陕西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庆环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司令员、警三旅政委兼中共三边地委书记、关中警备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西野前委委员、第四军军长、一野第二兵团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党委书记、铁道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西北局委员兼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2008年3月在海口病逝。

④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原名王钧治，曾用名王文钊。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4月参加渭华起义。1929年至1936年，先后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军事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陕西渭北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代理政治委员、中共陕西汉中特委书记兼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中共关中特委党委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军事部部长，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副旅长、关中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关中军分

区兼警备第一旅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副旅长、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豫鄂陕边区委员会党委书记、豫鄂陕边区政府主席、豫鄂陕军区政治委员、太岳兵团前敌指挥委员会委员兼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二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西北局常委、国家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宁夏工委第一书记、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98年12月在北京逝世。

⑤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⑦李妙斋（1903—1933），原名王玉玺，化名李妙斋、王之宪等，山西汾西人。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发动“嵩店兵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任队长。失败后，辗转来到陕甘边区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1932年11月，建立芋园游击队，任政委。1933年3月，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创建和保卫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9月20日，反动民团偷袭游击队后方基地薛家寨，他在指挥战斗中，被埋伏的敌人用冷枪打中，壮烈牺牲。

⑧张秀山（1911—1996），陕西神木人。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参与领导甘肃靖远兵变。1932年秋被派到红二十六军工作，先后任连长、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等职。1933年10月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1935年2月调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5月后改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等职。1936年后，任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红军神府独立师政治委员、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军分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到东北，历任东北支队政治委员兼干部团政治委员，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辽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辽宁省盘山农场副场长，辽宁省农垦局副局长，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6年8月，张秀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⑨金理科（1904—1935），又名李科，化名金礼奎、李奎，陕西三原人。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任中共武字区委南原党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渭北游击队，任政治保卫队副队长。1932年7月，任中共三原县委书记。9月，任渭北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12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渭北特委书记。1933年3月，兼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1934年2月，任中共赤淳工作委员会书记。1935年10月，陕甘苏区错误肃反中，被错杀于甘肃正宁县三嘉塬，1958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金理科为革命烈士。

⑩秦武山（1914—1971），原名刘百成，陕西清涧人。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加红军。1933年至1937年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书记

及红一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地方工作部群众科科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1941年至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盐务局副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三五八旅政治部副主任、警三旅五团政委、黄龙及大荔军分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任渭南军分区副政委，1953年1月至1954年6月任宁夏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宁夏省军区撤销后调西北军区，后曾任陕西省民政厅副厅长、陕西省第三届政协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1971年含冤而死。1979年陕西省委为其平反昭雪。

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重建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群众斗争的迅速开展，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提到了议事日程。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明确指出，“边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经过了红二十六军的英勇斗争，是更有不同的发展，群众斗争更广泛的开展起来，斗争是深入了，群众自动起来消灭豪绅地主的统治，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在现时条件之下，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必须执行一切政权的任务”。①遵照陕西省委指示，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领导下，照金革命根据地建政工作正式开始。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薛家寨召开。经过民主选举，再次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经济、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土地和肃反委员会及赤卫军总指挥部等机构，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守祥任粮食委员，杨在泉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②工作机构驻薛家寨。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又相继建立了区、乡、村革命委员会。还成立了乡村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性武装组织，中心任务是配合主力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监视土豪劣绅和敌探，肃清潜藏敌特分子，维护革命秩序，向红军和游击队输送积极分子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重建，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从经济上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贫苦农民从此翻身做了主人，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9—183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49 页。

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建设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重新建立以后，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根据地经济，开展反“围剿”斗争，为巩固和扩大照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重建后，把开展土地革命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不仅从政治上摧毁封建统治势力，还从经济上铲除封建的剥削制度。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的职责就是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并逐步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以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分配是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政策进行的。原则是按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贫雇农享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①1933 年春季，边区领导机关带领照金地区各级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开始在“芋园、金盆、香山、北梁、韩家山、杨家山、陈家坡、老爷岭、黑田峪、兔儿梁、杨柳坪、谢家庄、孙家山、绣房沟、小崖子等村”②组织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根据地群众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土地革命蓬勃兴起。据当年参与土地分配的小崖子村老农会干部杨玉财、房上村马长贵等介绍，土地分配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发动阶段。边区党政军负责人习仲勋、李妙斋、周冬至等亲自带领干部深入乡村，和基层干部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分配的意义和政策。二是组织阶段。一般是上级指导，乡村革命委员会与农民联合会、妇女会共同负责，具体确定分配对象，统计户数和人数，研究分配方案等。三是实施阶段。首先郑重宣布没收一切地主、反动富农，寺院祠堂的土地；

其次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采取两种形式进行分配。一是谁种归谁，确认佃农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不再向地主交纳佃租；二是由贫雇农代表统一丈量全部没收的土地数目，测定每块土地的标准等级，然后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结合的标准分配，贫雇农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给予适当补充。据调查，当时芋园乡分配了耀县学堂和香山寺占有的土地 2000 余亩；金盆乡分配了耀县大地主李卜客、陈家坡地主梅生玉的土地 5000 余亩；香山、北梁、杨家山等 10 多个乡村分别分配了耀县大地主潘家、雷家、李家、香山寺院等当地地主的大量土地。在分配土地运动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还宣布废除了地主阶级强加于农民的佃租、欠债和反动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③通过土地分配，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世代渴望的土地，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大家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红色政权。

（二）建立基层政权组织

照金苏区创建后，非常注重群众组织的建立和群众斗争的开展。1933 年初，照金地区各村普遍建立农会组织。农会一般设主任 1 人，委员若干，均由觉悟比较高的贫苦农民担任。当时，主要有芋园村农会，主任王文强；房上村农会，主任马长贵，陈家坡农会，主任王满堂；韩家山农会，主任李三少；黑田峪农会，主任杨玉财；金盆村农会，主任潘克顺、丁月良等。根据群众愿望和要求，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在各区普遍建立了妇女联合会，阮金莲、王氏、杨秀珍等为北梁、老爷岭、秀房沟妇女会负责人。同时，照金苏区还先后建立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组织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员站岗放哨，肃清敌特分子，维护革命秩序。在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上，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把建立基层政权组织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苏维埃政府组织法，依靠农会、妇女会，发动农民群众横扫反动的保甲里正机关，破除一切反动制度，民主选举乡村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了桃渠河、照金、金盆、韩家山、芋园、香山、马栏、老爷岭、七界石等 24 个公开或秘密的基层革命委员会，选举一大批有觉悟、有威望的群众骨干担任

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在根据地建立了新的革命秩序。据当年参与基层建政工作的房上村马长贵回忆：乡革命委员会一般由乡主席和文书组成，下辖各行政村革命委员会及其各自然村，行政系统比较完备。以金盆乡为例，乡革命委员会设在金盆村，主席为崔金有，文书为隋得浪，乡政权下辖三个行政村革命委员会，一村是胡家巷，村主席为南吉祥；二村是窑儿沟，村主席为白栋章；三村是房上，村主席为马长贵；乡村干部绝大多数是有觉悟、公道正派的农村革命分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④

（三）建立集市贸易，活跃市场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积极推行发展生产的经济政策，实行生产互助，互帮互救，鼓励群众努力增产增收，改善群众生活。1933年春夏之际，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薛家寨山下的亭子沟口建立了集市。起初规定五天一集，上市物口主要是粮食蔬菜。由于边区后勤部门在交易中买卖公平，上市物品日益增多，并自然打破了五天一集的规定，几乎天天立市。不仅苏区跃上市交易，许多白区群众也千方百计携带粮食和一些重要物资前来出售。据为红军磨面的南云芳回忆：“集市立起后，周围群众都来搞交易，交易的主要品种是粮食和蔬菜。粮食中有面粉、包谷、小麦、小米、豆类；蔬菜中有洋芋、红、白萝卜、白菜、大葱、豆角、辣子，还有豆腐、活鸡、鲜蛋，偶尔也有肉和其他东西。”^⑤红军在贸易中坚持公平买卖的原则，还坚持让群众先买的规定。为了不使交易者受损，在每次快散集时，红军都安排人员把集市上剩余的粮食、蔬菜全买下，再组织战士运往部队。集市贸易的建立，解决了红军、游击队购买粮食、蔬菜和其他必需物资的问题，促使了群众经济往来，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活跃了苏区经济，扩大了苏区影响，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

在开辟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红军针对照金地区农民素质普遍较低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着力抓好苏区文化建设，1933年，陕甘游击队占领龙家寨以后，一方面加强部队训练，一方面深入村寨，开展群众工作。“当时，部队干部战士挨家逐户地到群众家里，促膝谈心、启发阶级觉悟，宣传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组织分粮斗争获得群众热烈拥护。……李妙斋原是陕甘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大队政委，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尤擅长做群众工作。庙湾战斗后，刘志丹从创建根据地的长远目标着想，派他到芋园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工作，李妙斋不负期望，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芋园扎下根，建立党在芋园的群众基础，这样，开辟照金根据地的条件日趋成熟了。”⑥由于深入细致的文化宣传工作，照金掀起群众参军热潮，“先后有三十多名优秀子弟参加了主力红军有百余名热血男儿、英健妇女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他们中许多人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年青生命。照金群众还积极开展支前活动，男人们不分昼夜为部队运粮送草、修建工事、打造堞墙，妇女们任劳任怨，为部队赶做军鞋、磨面制粉，做饭洗衣。”⑦在抓好根据地群众文化建设的同时，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非常重视广大指战员的文化教育工作。1933年春，红二十六军开办了随营学校，吴岱峰任校长。学校设有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主要讲授革命道理，给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军班课注重对学员进行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的培养训练，学习内容古田会议决议、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刘志丹起草的政治工作训令、纪律条例等，培训学员200多人。为活跃战士们的生活，红二十六军在战斗间隙和休整期间，还经常开展一些小型文艺活动，以顺口溜、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灵活多样地向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取得了较好地宣传效果。

（五）加强后方基地建设

薛家寨是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1933年3月初，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即正式移驻薛家寨。为了把薛家寨建成红军和游击队的大本营，成为领导照

金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陕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广大军民据险筑堡，扼要置关，整修岩洞，改造山寨。构筑了北哨门、秀房沟口、党家山等哨门哨卡，在哨卡周围敷设了大量的地雷和滚石垒等，在五个岩洞中建起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后勤单位。红军医院有3名医生，主要任务是抢救诊治重伤员；被服厂有二三十名工人，担负红军和游击队服装和衣被的制作任务，并配合红军、游击队执行战斗任务，亦称为“妇女游击队”；修械所有工人四五十人，惠子俊任所长。技术工人多是陕西省委从西安等地动员来的，革命意志坚强，工作精力充沛，主要任务是为红军和各个游击队修理、制造枪械，配制炸药、子弹、手榴弹。修械所曾研制出威力很大的“麻辫手榴弹”，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仓库主要用来贮存粮食、各种物资器械。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集中建设，薛家寨成了真正的“红军之家”。

（六）配合红二十六军开展反“围剿”斗争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以及照金与渭北苏区的紧密呼应，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一面调拨枪械武装照金周围的反动民团，一面调兵遣将“围剿”照金苏区。苏区军民奋起抵抗，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1933年2月，国民党正规军3个团引领庙湾等地民团联合进攻照金苏区。由于渭北游击队及时在敌侧后突袭，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苏区游击队积极袭扰，国民党军疲惫不堪，被迫撤出苏区。3月初，红二团在取得外线作战胜利后，返回照金。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4个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等6个县的民团，分路进攻照金根据地。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二十六军党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习仲勋、黄子文率领游击队，坚持照金苏区内线斗争，红二团转日外线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随后，红二团在王世泰、汪锋、刘志丹率领下，根据联席会议所赋予的任务，转战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宜君等地，一路破敌，捷报频传。先后在宁县金村庙、段家堡打了几个漂党的歼灭战，消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进犯的国民党军顾

此失彼。坚持苏区内线斗争的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坚持以薛家寨为中心，利用有利地形，相机骚扰敌人。加之此次“围剿”的总指挥王泰吉原系共产党员，同情革命，敷衍应付，致使这次“围剿”草草收场。同时，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军民众志成城，以各种机动灵活的战术袭击国民党军，歼灭其有生力量，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①张秀山：《照金革命根据地忆述》，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8 页。

②房成祥著：《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7 页。

③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内部资料，1988 年版，第 352—354 页。

④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内部资料，1988 年版，第 325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94 页。

⑥张秀山：《照金革命根据地忆述》，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内部资料，1988 年版，第 195 页。

⑦《照金革命根据地历史情况调查》，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内部资料，1988 年版，第 354 页。

四、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陷落

（一）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如何扩大根据地，壮大红二十六军，在哪里建立根据地，成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33 年 6 月 17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团在照金苏区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这时，杜衡也回到照金苏区，他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并提出以下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①。实际上，陕南的红二十九军在 1933 年 5 月已经失败，红二十六军南下只会陷于孤军深入的险地。杜衡的南下方针遭到刘志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刘志丹说：“渭华暴动

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②但杜衡对刘志丹等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6月21日，在杜衡的专断命令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从北梁出发，离开照金南下。22日，红二团在三原二台子与渭北游击队会合。渭北游击队负责人再次对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提出异议，杜衡拒不接受意见，强令部队尽快南渡渭河。23日，杜衡借口有事要回陕西省委汇报，私自离开部队。杜衡离队后，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一道率领部队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至灞桥五里店，歼灭一个地主民团，击毁杨虎城军车10辆，缴获许多物资。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离开灞桥进入骊山。在刘志丹等的指挥下，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英勇战斗，击溃国民党军多次强攻，胜利进入秦岭箭峪口。面对强敌围追，红军分三路冲出包围，刘志丹带领180余人，在焦家坪一带游击，汪锋带领80余人到蓝田活动，王世泰带领100余人向北转移。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汪锋带领的队伍被打散。王世泰带领的队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两月余。后在国民党军加强围攻、红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分散和化装突围。③党在陕甘边地区历经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红二十六军，被杜衡的“左”倾错误断送了。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尽艰险于1933年10月4日回到照金。幸存的红军官兵陆续分散返回照金，开始了新的战斗。

（二）照金革命根据地失陷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陡然逆转。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盯梢，杜衡等人被捕叛变。杜衡投敌后，出卖了知道的所有党组织和党员，使陕甘一带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国

民党的屠刀下。杜衡还可耻地充当奸细，带领密探特务，冒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西安大街上盯梢捕人，逮捕了前来西安汇报工作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及中央交通员冯鸣玉、省委技术科长刘政远等重要干部。新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去西安寻找上级党组织，也遭国民党逮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及中央失去了联系。

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在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消息后，在三原县武字区将地方红军武装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④，政委杨森^⑤，共120余人。红四团成立后，担负起主力红军部队的职责，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调兵遣将，向渭北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在强敌围攻下，红四团为避免受损，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8月初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根据地遂告陷落。

7月21日，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陕军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下辖6个大队，共1200余人。耀县起义后，国民党军调两个团兵力向起义部队发动进攻。由于连战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事件，耀县起义失败，余部100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退入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此后，耀县三支队也转移至照金苏区。

红二十六军南下后，照金苏区陷于危急之境。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照金开展恢复红二十六军的工作。此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干部对革命形势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一种是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主张“埋枪”搞秘密工作，把红四团带到渭北，分散游击，反对集中领导；另一种意见是继续坚持革命的主张，认为还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照金根据地为依托，只有下决心坚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就一定能克服困难走向胜利。为了统一思想，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等在耀县陈家坡主持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正确分析形势，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

军的错误主张。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全军共 500 余人，长短枪 400 余支。

陈家坡会议是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党政军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组建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提出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正确方针。陈家坡会议统一了党、政、军的认识，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是在西北革命斗争重要转折关头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为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思想路线和组织基础。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主力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直接领导和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下，以崭新的阵容开展游击战争。

9 月下旬，红军攻占旬邑县的张洪镇，缴枪 200 余支，并缴获大批物资。10 月 4 日，刘志丹、王世泰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归来，刘志丹被任命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刘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⑥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给予了较高评价：“陈家坡会议总算纠正了错误观点，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就是光明的。”⑦

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形势有了好转。10 月 12 日，国民党军急调 4 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 6 县民团共 6000 余人，发起了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刘志丹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认真分析敌情，认为国民党“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根据地内与其周旋，要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必须转入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决定留下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陇东。

10月15日，国民党军乘红军转入外线，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进攻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薛家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领导人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等率领留守薛家寨的照金红军游击队100余人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挽救危局，薛家寨失陷。国民党军攻克薛家寨后，大肆抢劫破坏，对苏区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和野蛮洗劫。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和许多群众积极分子被国民党军杀害，照金苏区陷落。照金根据地失陷后，突围出来的部分干部和游击队队员北上寻找红军，11月19日，在宁县盘克塬与主力红军会合。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将红军后方机关暂时撤迁至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并指示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迅速组织照金地区内的游击队，坚持照金根据地的斗争，指挥部直属特务队和淳化、宁县、正宁等地游击队伺机向西发展，扩大根据地。”^⑧

①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②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9—230页。

④黄子祥（1895—1982），又名云章，陕西三原人，黄子文之兄。1926年参加杨虎城部队，在赵寿山团任中校团副，1928年因到三原武字区参加当地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1932年任中共武字区区委委员。5月，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同年7月，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任团长。1935年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任组织委员。1947年7月调任渭北游击总队副司令员，后任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1949年任三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建国后，历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政协副主席等职。1982年去世。

⑤杨森（1909—1936），原名杨宗楷，又名杨声，陕西乾州（今乾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从事革命活动。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连长、陕甘游击队大队政委，1933年6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政委，1934年1月接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1935年9月后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红二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1936年5月，在东征返回途中壮烈牺牲。

⑥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⑦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⑧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页。

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独特贡献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重建后虽然存在了 6 个月时间，但它犹如插入国民党心脏的一把钢刀，直接威胁陕西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并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它点燃了西北民主革命的火种，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功创建为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阐明了工农民主政权在敌人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下不仅能够存在下去，而且还要不断发展扩大根据地，以至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态势。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西北革命斗争实际，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确保党在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得以继续发展。党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政权的具体实践过程，充分地验证了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正确性，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建设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按照陕西省委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的要求，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积极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各村建立了党团组织、苏维埃政府、农会、妇女会和赤卫队、游击队，制定了土地分配办法。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并逐步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土地革命斗争蓬勃兴起。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在政治上打倒了地主豪绅，在经济上铲除了封建的剥削制度，苛捐杂税被取消，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权的建立形式和探索性工作，对周边发展红色政权、开展革命斗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第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统战工作实践为党的统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在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当地农民武装，从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使革命武装在照金得到休养生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习仲勋、李妙斋等按照刘志丹提出的“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①的思想，积极与庙湾夏玉山民团、中部县建庄何世兴民团、小石崖罗连城民团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尽量与其维持好现存关系。后来，这些民团大都与红军保持友好关系，他们或为红军掩护寄养伤员，或代购弹药物资等，对红军有一定的帮助。但身为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杜衡，却坚持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只知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消灭。1933年1月，杜衡命令红军攻打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战斗失利，红军伤亡二三十人，骑兵连连长曹胜荣英勇牺牲，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负重伤。此后，夏玉山遂纠集附近民团，联合起来进攻照金苏区。这时，杜衡又命令火烧香山寺，结果引起数百名和尚及广大群众的不满。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照金中心区薛家寨，孤零零地处在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伤员无法安排，粮食无法补给，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由此可见，为了坚持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尽可能团结和争取一切可能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说，照金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重建，是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广泛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结果。在全党处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是非常可贵的。其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党一笔宝贵的财富。

第四，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重建实践再一次证明建立红色政权必须依靠工农大众和广大劳苦人民。在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委

员会的斗争实践中，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动力。他们坚持把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工作。刘志丹认为只有组织群众、动员群众、领导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在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家以访贫问苦，相继建立起农会、贫农会、赤卫队和游击队。”^②以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为骨干的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先后成立起来，在站岗放哨、肃清反霸、维护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革命群众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在照金苏区土地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对于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主要原因，习仲勋做了认真的思考，他总结说：“第一，没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和根据地，把自己株守在一个很小的苏区内；第二，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很近，我们的群众力量不大和不够坚强；第三，红二十六军南下的全部失败，军事上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了敌人进攻苏区的气焰。”^③可见，党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只有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革命事业才能蓬勃发展，结出丰硕果实。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②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③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分区）》，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102页。

第四章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一）陕甘边区军事形势的扭转

1933年10月中旬，为粉碎国民党军对照金苏区的“围剿”，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陕北一支队等部队300余人北上陇东，转入外线，寻机歼敌。为了务求必胜，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首战奔袭合水县城。10月12日，部队由照金出发，沿子午岭北上，行程150多公里，15日到达合水县的黑木原。17日晚在夜幕掩护下，急行军进至合水城（今老城镇）东门下。当时，合水城内驻有西北军杨子恒部赵文治团1个连和民团近300人。红军以骑兵团一连和陕北游击队一支队担任主攻，王世泰为攻城总指挥。18日拂晓开始攻城，守军自睡梦中惊起，一半被俘虏，一半随县长康麟逃跑。合水县公安局局长李彦率部起义。红军打开监狱，救出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队长杨培盛，释放在押农民80余人。是役，红军大获全胜，共击毙、俘虏国民党军200余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银元上万余。战斗结束后，总指挥部命令开仓分粮，赈济群众，并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有不少俘虏参加了红军。同时，对俘虏中民愤较大的豪绅杜家传、盐税局局长李德胜等予以处决，其余教育释放。当晚，部队宿营于包家寨子。合水老城战斗，是陕甘边主力红军攻克的一个重要县城，大涨了红军的志气。合水战斗后，红四团继续北上，在庆阳一带打游击。

红军攻克合水县城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急忙调遣重兵“追剿”红军主力。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采取疲敌战术，牵着国民党军兜圈子，选择有利地形予以消灭。10月19日红军主力离开合水，在宁县盘克塬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后方机关及游击队会合后继续南下。10月21日在宜君县杨家店歼敌一个连。此后，刘志丹又毅然挥师北上，返回陇东。10月26日下午，红军主力部队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谭世麟部朱寿民团40余人，缴枪30余支，镇压了联保主任孙元俊，分兵捣毁三十里铺和华池柳树河天主教堂，活捉葡萄牙传教士薛神甫等2人。这时赵文治团由庆阳尾追而来，谭世麟部也从悦乐、元城方向堵截。10月27日，刘志丹等挥戈东进，跨越上里塬到达华池毛沟门。由于连续奔波作战，部队极为疲劳，刘志丹等决定在毛沟门作短暂休整。毛沟门是元城川辛家沟沟口的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只有数十户人家，散居在沟畔和半山坡的窑洞里。红军到达后，分别驻扎在毛沟门附近各庄头。

10月28日拂晓，赵文治团800余人由毛沟门西辛家沟、南侧山岭两路袭来。担任警戒的红军战士发现国民党骑兵后，立刻鸣枪报警。这时，刚刚起床的红军战士听到警报后，迅速集结。刘志丹、王泰吉命令耀县三支队占据毛沟门西玉皇庙岗阻击敌人，陕北一支队掩护群众转移，红军指挥部、红四团迅速占领河对面墩梁山有利地形。为了达到以少胜多，在反击中消灭敌人的目的，刘志丹和王泰吉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到北山，抢占制高点，控制有利地形。上午9时，红军已全部撤至陈家峁，赵文治看到红军撤退，误以为红军是怯战动摇，即令

部队拼命攻山，配以炮火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下午4时，刘志丹、王泰吉下达反击命令，300多名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口气把国民党军压入沟底。在红军战士凌厉的攻势面前，国民党军溃不成军、狼狈而逃。这次战斗，共毙俘国民党军200多名，缴枪200余支，弹药不计其数。赵文治团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团的建制。毛沟门战斗，是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由于红军接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不仅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信心，也震撼了陕甘边界的国民党驻军和民团，迫使他们暂时采取守势以求自保，从而扭转了陕甘边区的军事形势，客观上为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二）包家寨会议的召开

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后，10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照金，并包围了根据地党政军机关驻地薛家寨，16日，薛家寨失守，照金革命根据地陷落。照金根据地的失守，使陕甘边红军又面临无处立足的严重困难局面。在哪里建立根据地，一直是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的根本问题。刘志丹一贯主张在桥山山脉中段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失陷后，刘志丹一面与王泰吉一起指挥反“围剿”斗争，一面再次认真地思考这个战略性决策问题。毛沟门战斗粉碎国民党军“围剿”后，刘志丹认真总结三年来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及时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

根据刘志丹的建议，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王泰吉等在合水县蒿嘴铺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教训，讨论了主力红军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

（1）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把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归队的百余人与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把红四团逐步改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兵配合作战的需要。

（2）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3）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大根据地建设。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山脉向南北发展。

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三项重大决策，其核心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将陕甘边区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陇东南梁地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认识到，在西北地区敌强我弱的情势之下，要想保存革命力量，壮大红军，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地区作为红军活动的中心区域。包家寨会议根据

刘志丹等的建议，决定将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放在南梁地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决定，因为位于陕甘边界子午岭中段的南梁有着进行武装割据的优越条件。第一，这里的农民深受地主和土匪的压迫，生活极端艰苦。在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林镇、南梁的 295 户农民中，无地农民多达 198 户，他们多为庆阳县大地主韩少文（字号裕茂隆）、李弟（字号恒义兴）的佃户。这一带的 2.6 万亩土地，仅裕茂隆、恒义成（恒义兴分号）及当地几户小地主就霸占了 1.8 万余亩。每年收租四五千石。同时，南梁一带兵匪成灾，主要有土匪赵老五、薛大牛、陶玉山、张廷芝、毛不顺、宋占彪、韩俊卿、徐老么，加上当地民团头子谭世麟、蔺士升等达 52 股之多。①农民深受其害，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第二，地理环境优越，攻守自如。南梁位于甘肃庆阳县（今属华池）、合水县和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鄜县边界的桥山山脉中段的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林镇川、大风川、豹子川、平定川、太白川，以及陕北的白沙川、瓦子川、洛河川等地，沟壑纵横，有数百里的梢山，既可以屯兵养马，养精蓄锐，又有险可依，回旋余地很大，有利于机动作战，开展游击战争。

第三，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以南梁为中心的桥山山脉中段，地广人稀而又远离陕、甘、宁三省国民党统治中心，当地地主武装力量弱小，在当时被称作“三不管”的地方。这里远离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西安和兰州，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统治比较薄弱，当时“张廷芝土匪驻靖边一带，军阀井岳秀所属高双成部驻延安，陇东民团谭世麟部

驻庆阳，陈珪璋部驻平凉。”②这些军阀属于不同的派系，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刘志丹等正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有利地理位置和政治空隙的地方，进行工农武装割据。

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认识到，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必须在广大区域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成功。为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建立陕北、关中、陇东三路游击区的策略方针，这样既可保证南梁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游击区的武装斗争在互相支援中发展壮大，从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目的。

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干扰，研究解决了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并摆脱险境，如何重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并使之走向胜利等重大问题，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走向成熟的标志；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勾画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基本蓝图，为陕甘边区后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指明了光明前景，是陕甘边区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由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三）莲花寺整编

包家寨会议之后，刘志丹、王泰吉率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等部队来到位于合水县葫芦河北岸

的莲花寺。这里川道比较宽阔，两面山上灌木成林，十分隐蔽。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在莲花寺进行休整，并对部队进行整编。

1933年11月8日，在刘志丹、王泰吉主持下，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在莲花寺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供给处主任刘约三^③。下辖两个团，5个连，共500余人，战马200余匹。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红四团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约280人，王世泰任团长^④，李映南任政委，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陈学鼎，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由红四团一、二连编成骑兵团，约180人，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师、团成立了党委，师党委书记杨森，委员有高岗、张秀山、黄罗斌^⑤、黄子文、高锦纯等。连队成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刘志丹对建党工作非常重视，他经常以过去多次起义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要求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由于陕北一支队在安定一带打过游击，地形较熟，包家寨会议决定派队长强世清、政委魏武率领一支队作为第一路游击区的基本部队，同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莲花寺整编时，该部100余人未编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四十二师还抽调魏武、惠泽仁、康健民等干部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领导力量。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在东

华池为陕北一支队举行欢送大会。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党委在会上讲话，他勉励陕北一支队回到陕北后，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以安定为中心，开展第一路游击区的活动，逐步向四周发展，以达到与南梁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的目的。陕北一支队政委魏武在会上表示坚决执行包家寨会议决议，发挥陕甘边红军的优良传统，开展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配合红军主力在南梁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莲花寺整编是陕甘边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整编了部队，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陕甘边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华池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48 页。

②华池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48 页。

③据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记载，供给处主任王世泰，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7 页。此处依据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载《甘肃党史资料通讯》总第 51 期。刘约三（1903—1981），名宗汉，字约三，陕西保安人，出身农民家庭。1927 年毕业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先在保安县教书，后任保安县教育科长。1928 年，经刘志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受中共组织派遣，同吴岱峰到山西吕梁地区组织游击队。9 月，被迫撤回陕北，加入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 年 12 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经理处长。1933 年 11 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供给处主任。12 月，组建保安游击队，任队长。1935 年 9 月，任红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参谋长。1937 年，任蒙汉骑兵支队长，后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任保安司令部参谋处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处秘书长。1941 年 2 月，任边区贸易总局局长。1945 年 10 月，任热河军分区参谋长。1946 年冬，任依兰县城防司令兼独立团团长，带领部队进深山老林剿匪。后又担任骑兵旅旅长、松江省税务局副局长、四野骑兵纵队后勤部副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秘书主任等职，参加过辽沈战役。建国后，任西北国营运输公司总经理，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林业局副局长，陕西省交通厅、农业厅副厅长等职。1981 年在西安病逝。

④一说王泰吉兼红三团团长，此处依据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载《甘肃党史资料通讯》总第 51 期。

⑤黄罗斌（1916—1998），陕西蒲城人。1929 年参加渭北苏区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渭北苏区游击队战士、班长，红二十六军连指导员，红四十二师三团政委，陕北省军事部巡视员，定边

榆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秀延县游击队总指挥兼独立营营长；陕北军分区司令部司令员，红一团团长。1937年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8月起任神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警备三旅副旅长，三八五旅副旅长，警备三旅旅长，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陇东警备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43年至1945年在中央党校一支队学习，出席了“七大”会议。1949年后任西北军区独立二师政委、陕北军区代理司令员，独立一师师长兼政委，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8月任宁夏省委副书记兼宁夏军区政委，1954年8月调任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经理、党委书记。1958年6月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1979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2月任政协甘肃省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12月任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92年被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1998年病逝于兰州。

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再次成立

（一）第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

为了实现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战略方针，红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整编后，立即兵分两路，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东路由师部率红三团向东北出击，奔袭甘泉城，接着又在洛河川葡萄沟门击溃国民党第八十六师一个营；西路红四团（骑兵团）向西北出击，沿途横扫新堡等地的反动民团，经柔远川、二将川，直捣南梁境内的反动据点，先后在荔园堡、阎家洼子歼敌两个连，接着又消灭了赵沟门民团。红四十二师的这次军事行动，为在南梁地区建立红色政权扫清了障碍。

11月下旬，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趁战斗间隙，配合地方干部开展工作，红四十二师抽出刘约三、吴岱峰等军事干部和部分工作人员，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分别在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一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先后组建了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创建红色政

权作准备。1933年12月，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在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各游击部队时而集中作战，时而分散行动，从1933年冬至1934年春的4个月里，先后消灭了南梁地区9股地主民团武装，缴获枪支270余支。此外，游击队还配合和参加了主力红军进行的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在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下，继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之后，庆北、定边、华池、环县、庆华、柔远等地的游击队纷纷建立，这些游击队与主力红军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同时又为主力红军输送了几百名战士，在创建南梁红色政权的战斗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开辟第二路游击区的同时，1934年1月上旬，刘志丹等率领红四十二师南下第三路游击区，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整编游击队，扩大地方红军武装。在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的帮助下，1934年2月，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总指挥先后由张明吾、王安民、陈国栋担任，政委先后由黄子文、张仲良、张邦英担任。第三路游击区主要地方武装有平子游击队、回民支队和宁县三支队、一支队。后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又相继组建了正宁二支队、正宁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正宁八支队、正宁十七支队、特务队、底庙游击队、耀县游击队、赤水游击队、中宜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共计500余人。这些游击队在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坚持集中作战和分散活动相结合，经历了多次艰苦的战斗，锻炼了部队，打击了敌人，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开展创建红色政权准备工作

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1933年冬，红四十二师党委派张策来南梁开展群众工作。1934年春节前夕，久病初愈的习仲勋也从豹子川来到南梁。张策、习仲勋深入到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等地的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并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和休养。经过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南梁地区广大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有了明显提高，他们认清了封建地主剥削和反动政权的压迫是自己苦难重重的根本原因，认清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枪杆子建立红色政权才有光明的出路。因此，他们纷纷表示要为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而斗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张策、习仲勋等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在金岔沟建立了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白阳珍任主任，贺二任副主任。接着又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村建立了农民联合会，还在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建立了5个赤卫军大队，约1000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南梁荔园堡和周围的几道沟川，广大贫苦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农民联合会是贫苦农民自己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临时的基层政权，它在组织农民、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维护社会治安，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打土豪、分财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3年11月25日，在小河沟的四合台，南梁地区第一个基层乡级苏维埃政府正式建立。①这时陕甘边地区的群众武装广泛建立起来，地方游击队得到了迅速发展，

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根据地武装力量。到 1934 年 2 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经过短短四个月的发展，已经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鄜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和中部等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再次成立

为了统一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1934 年 2 月 25 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恢复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会上选举习仲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后贾生秀）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张步清任土地委员长，牛永清任劳动委员长（一说张钦贤），武生秀任财政委员长（一说杨玉亭），呼志禄任粮食委员长，贾生秀任肃反委员长（后郝文明），边金山任军事委员长。同时成立了保卫队，郭锡山任队长，直属革命委员会领导，负责革命委员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②革命委员会的恢复和建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红四十二师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动员群众支援前线，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南梁革命根据地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取得很大进展。至 1934 年秋季，庆阳县的南梁、白马庙、二将川、武泉河、柔远东沟、杜泉河、城壕川，合水县的平定川、太白、东华池以及陕西省的脚扎川、白豹、安塞、

吴堡川、樊川、义正川、麻地台、瓦子川、苗村、阎家川等地都组织了农民联合会这种基层临时政权组织及其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至1934年9月，赤卫军发展到18个大队，主要有南梁、白马庙、二将川、桥河、刘沟、杜河、平定川、东华池、脚扎川、白豹、安塞、吴堡、樊川、义正川、麻地台、瓦子川、苗村、阎家川。在此基础上各地相继建立了区乡革命政权。这样由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到区乡苏维埃政权再到村的农民联合会这种多层次的红色政权组织在南梁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

（四）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建设的新措施

吸取寺村塬、照金红色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南梁红色政权建设上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从而使南梁苏区红色政权的建设较以前有了很大改进。

第一，坚持以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做后盾。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也无法开展土地革命，更不可能充分动员农民群众起来支持革命，即使建立了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为此，在红色政权建设上，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即“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③为了有力地保卫南梁中心苏区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这个红色政权组织，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在大力扩充主力红军的同时，先后在庆阳、合水、宁县、

正宁、保安、安塞、甘泉、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宜君和中部（今黄陵）等地组建游击队和赤卫军，坚持以强有力的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赤卫军武装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系统来开辟根据地，创建红色政权，使红色政权有了坚强的支柱。1934年3月，陕甘两省的国民党军阀，纠集了8个团1万余兵力和宁夏马鸿逵部驻甘肃的一个骑兵旅一起，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一举摧毁红色政权，消灭陕甘边红军。当时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总共不过1300多人，而且武器装备极差，敌我力量悬殊。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南梁中心苏区广大人民群众配合红军同国民党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3月上旬，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和部分游击队转入外线，牵制敌人；部分游击队和赤卫军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坚持原地斗争，保卫红色政权。刘志丹指挥外线红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转战千里，连战连捷。在主力红军转至外线后，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1000余人于1934年5月上旬进入南梁中心区。仇良民和谭世麟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民党军队还在马背上驮若铡刀，到处搜捕和杀害南梁中心苏区的党政军干部及革命群众。5月13日晚，国民党军将李青山、曹思聪等26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拉到阎洼子台地里活埋。还用铡刀将共产党员、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阳珍等6名乡村干部杀害。5月20日，国民党军窜进保安县芦子沟。刘志丹的父亲和妻子因及时转移脱险，但国民党军杀害了刘志丹的其他亲属数十人，烧毁其房屋，还掘开了刘家祖坟，焚

骨扬灰。国民党军在根据地所犯的累累罪行，更加激起红军和群众对敌人的义愤和对红色政权的热爱，反“围剿”斗争空前高涨。

在内线，各级红色政权带领群众坚壁清野，奋勇抗敌，使敌人耳目闭塞，饥恐交加，吃尽了苦头；在外线，4月11日，刘志丹指挥红军取得了西华池大捷的胜利，此役红军全歼国民党部队两个营又一个枪炮连，毙伤俘敌600多人，缴枪600余支，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西华池大捷是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它对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起了决定性作用。5月，国民党军再次纠集了8个团的兵力，重新向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进攻。红军主力在地方政权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避开了不利地形和国民党骑兵的追击，再次转入外线，钳制和打击国民党军，先后在太白镇、马子川、长武、合水等地重创国民党部队骑兵团，然后横扫西兰公路，迫使国民党军退出了南梁中心苏区。至此，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由此可见，建立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系统，采取内外线互相配合的作战原则是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得以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关键，这也是陕甘边红色政权建设上一条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

第二，坚持把基层政权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毛泽东特别重视基层政权建设，认为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在乡这一级。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塔脚，这就是城乡苏维埃了。”④在创建红色政权的过程中，陕甘边区党和

红军充分发动群众，首先建立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农民联合会这种临时基层村级红色政权和区乡苏维埃政权，然后再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采取这样一套红色政权建设的方式，说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红色政权建设上的经验较寺村塬根据地时期大大丰富和成熟了。寺村塬时期，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还不完全懂得“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⑤红军陕甘游击队到寺村塬不久就立即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群众驻本上还不怎么理解革命道理，更谈不上懂得土地革命和建立红色政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现了选举革命委员会成员一人提议大家附和的现象。在南梁地区创建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时，党和红军首先派出得力干部深入穷苦农民中间，扎根串连，访贫问苦，进行广泛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此基础上，党和红军逐渐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和游击队、赤卫军，然后建立农民联合会这样的临时基层政权、区乡苏维埃政权。在当时，像雇农工会这样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群众组织，仅华池境内就多达 12 个，每个雇农工会选举一名主席。农民联合会这种基层的临时政权组织由贫农、雇农、中农参加，并通过选举产生主要负责赤卫军主要由贫苦的年青农民组成，它的主要任务是：搞好递步哨^⑥，在每个村庄都设哨口，传递消息，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向乡主席和政府报告；在政府组织下，打击土豪劣绅，没收豪绅财产和田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同地主武装展开斗争，保卫农民的胜利果实和红色政权的安全。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始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红

色政权已经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真诚拥护，因而它的群众基础较之寺村塬时期更广泛、更巩固，也能够更好地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

第三，坚持建立健全与红色政权的创建相适应的制度框架。制度建设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南梁恢复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健全了工作制度，形成了一整套的组织体系，表明陕甘边区的红色政权建设已趋于成熟。在寺村塬建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仅有正副主席等几名工作人员，它的工作机构简单，专门委员会不健全，工作制度尚未形成，这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工作；在南梁建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克服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缺陷，它下设了七个专门委员会来管各方面的具体事务，建立了必要的工作制度，这些委员会的委员长都来自于人民，了解群众，也热心为群众办事，因而极大地提高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提高了红色政权的办事效率，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人民群众享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权利。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政权建设上的种种探索，为创立正式的工农民主政府打下了坚实基础。

①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16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49—750 页。

③毛泽东：《星圣之火，可以燎原》（1930 年 1 月 5 日），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8 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3 页。

⑤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年 10 月 5 日），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 页。

⑥递步哨是边远山区传递军事文件的一种通信联络组织。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建立“递步哨”传递信息。就是在各村建立

联络地点，并从农村赤卫队中选定可靠贫雇农作为义务交通员，遇有信件、通知及时传送，如发现敌人，村里的交通员要负责将信息传给邻村，再辗转传给其他村庄。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交通员也能机智而迅速地完成任务。遇有急要信件要插上一根鸡毛，特别重要的还可插上两根鸡毛，或在信封上写上“飞送”，群众称它为“鸡毛信”。见到这种信件交通员必须风雨无阻，昼夜兼程传送。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

（一）七月决议的制定和发布

1934年5月下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以后，刘志丹、杨森率外线作战的主力红军回到南梁。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主持和统一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军事工作；红四十二师师长由杨森接任，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兼任参谋长。会议还对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行了周密部署，决定进一步加强南梁中心苏区的群众工作；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和红色政权的基层组织。荔园堡会议后，红四十二师主力和各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分兵出击，扩大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加强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政权建设，使南梁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拓展，建立了东起捻沟川、西至夏家沟、北抵白豹川、南接陕甘边南区游击根据地，纵横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的革命根据地。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动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工作，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部分领导人刘志丹、张秀山、高岗、杨森、习仲勋、张邦英等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党的工作计划，制定并发布了中共陕甘边

区特委《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七月决议》。

《七月决议》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概括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势，指出“中国革命浪潮猛烈的向前推动”，“特别是在陕甘边区红四十二师与各地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愈加深入”。^①第二部分检查总结了陕甘边党政军的工作，集中批评了陕甘边区党组织脱离群众与党内斗争不深入等问题。第三部分全面部署了边区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 9 个方面的任务，即党的建设、政权问题、扩大巩固部队、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工作、肃清右派、深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七月决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提出了正确及时的战略方针，是加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全面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第一，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的组织，保证红色政权建设工作顺利进行。《七月决议》强调把党的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针对“党的政治工作不够深入”、“一切工作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后面”的状况，提出了 13 项任务，这些任务归纳起来有七个方面：一是加强党对华池苏区红色政权的领导，成立一个区委以巩固苏区内的各种群众组织，形成苏区的核心。二是恢复保安党的组织，以脚扎川、吴堡川、白豹川为中心，建立农村党支部。三是在寺村塬、三嘉塬、平子塬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吸收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的雇农、贫农积极分子大批入党，成立三个支部，为红色政权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四是在耀县、淳化、渭北、三原、旬邑等游击区恢复和建立党组

织，并建立第三路游击区党的区委，统一领导该游击区的工作。五是培养干部，以适应红色政权大发展的迫切要求。六是转变党的工作领导方式，一切领导的机关都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密切同群众的联系，严密党的组织，并用启发式和革命竞赛的方式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七是建立健全团的各级组织，使群众工作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七个方面工作的核心是切实加强党的工作，以保证陕甘边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为红色政权建设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

第二，进一步加强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建设，制定施政方针及其他法令，促使陕甘边区临时政权转变为正式苏维埃政权。《七月决议》要求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指出“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立即成立革委党团，以加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整顿各部门的工作，各委员会应该马上颁布一切法令，规定施政方针，以巩固苏区。”并“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苏维埃政权，即以此华池苏区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处发展。”要巩固新生政权，必须加强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根据地的群众组织有农联会、赤卫队、先锋队、雇农会，通过加强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有利于扩大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第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红军主力，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为红色政权建设创造坚强的钢铁支柱。《七月决议》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加强军事训练和发展工作。首先，把扩大红军作为部队建设的中心工作。责成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各

完成扩大一个团红军的任务，建议红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扩大一个师红军的任务，将红四十二师扩大为一个军。其次，决议重申扩大部队的关键是巩固部队。提出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要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开设军事政治学校等，通过有组织的政治教育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决议还要求各级党组织抽调部分同志打入敌人内部，组织革命兵变，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再次，决议强调要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组建游击队，并要求各游击队必须根据特委制定的游击队行动纲领去行动，规范了部队的行为。决议特别强调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要想方设法购置武器，开展对敌斗争，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各路游击区的游击战争开展得愈加猛烈，中心苏区的红色政权就愈巩固，也就愈能迅速地变游击区为根据地，使红色政权建设稳步推进。

第四，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摧毁封建统治的基础。土地革命是红色政权的一项基本任务，《七月决议》强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是陕甘边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要求除了分配苏区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开展，在各游击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

第五，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革命战争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推动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七月决议》提出了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原则和方法。要求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必须联系到反帝斗争，在广大劳苦群众面前作广泛的宣传

与鼓动，以引起群众对帝国主义的反对与仇恨。并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义勇军、反帝同盟军等，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并决定派一名得力同志组织义勇军。决议还对开展游击战争、群众工作、肃清右派等问题作了规定。

第六，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工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获得最广大的群众基础。《七月决议》指出，必须在工人、农民和白军士兵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手工业者工会、农民联合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儿童团和妇女联合会，武装群众、领导群众开展抗捐、抗粮、抗款、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并要求在斗争中“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七月决议》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建设史上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总结了陕甘边红色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规定了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进行红色政权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七月决议》精神的指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红军和人民群众投入了一场建设红色政权的新的伟大斗争。

（二）临时革命政权向正式苏维埃政权的转变

按照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精神，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以正宁寺村塬、耀县照金和华池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为了将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权，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1932年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下

发《关于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明确指出：要“建立革命委员会，由此准备建苏政府。”②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指出：“对于革命委员会应当用最大限度的力量领导。这一革命委员会很快的能执行土地革命，以转变为苏维埃政府。这是党目前一个中心工作，应当而且必须加强他的组织力量，具体的、经济的规定他的工作。”③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的决议》强调：要“在边区广大的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域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二十六军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证之下，革命委员会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④1934年6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向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报告》中指出：“一、二、三路有基础的斗争，成立革命委员会，转变成苏维埃政权。”⑤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印发《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要加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苏维埃政权。根据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将革命委员会转变为正式苏维埃政权的有关精神，陕甘边区党和红军从巩固和扩大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入手，抓好工作落实。一是在南梁中心苏区进行巩固红色政权的工作。首先是整顿各部门的工作，各委员会马上颁布一切法令，规定施政方针，以巩固苏区；对农民联合会、赤卫队、少先队、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也颁布条例与简章；扩大政治保卫队，在近期发展成为5个保卫分队，担任警戒苏区，并宣布戒严令；在巩固

苏区的过程中，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布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法，在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二是恢复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根据《七月决议》关于恢复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的要求，第三路游击区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扩建和新建了正宁二支队、宁县三支队、正宁四支队、五支队、八支队和正宁十七支队、回民支队、特务队、宁县一支队等游击部队，共达 1000 余人。各游击队打击地主豪绅，为民除害，如剪除长乐塬的恶霸任茂祥，月明塬的劣绅李自来、马五娃等，这些活动对于发动群众，恢复和巩固南区红色政权起到积极作用。随着第三路游击区游击队武装迅速壮大，1934 年 9 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定，以正宁四支队、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部分人员，在正宁湫头组成红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红一团组建后，配合第三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消灭了大量的地方反动武装，相继以湫头、照金、小石崖为中心，在正宁、宁县、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同官等县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使南区革命根据地在更广大的区域得到恢复和发展。三是积极扩展南梁中心根据地。为保证华池中心区红色政权的巩固，第二路游击区各武装力量积极在东西两线扩展南梁革命根据地。在东线，1934 年春，第二路游击区的革命武装从保安境内沿洛河向东推进，到同年秋已在西起方家河、东至石门子，以下寺湾为中心的百里大川建立起游击区。这块游击区东进依托黄龙山，可发展甘泉、鄜县、宜川、洛川地区的游击区，直抵韩城，威胁关中；北去安塞、延安、延长，可与陕北苏区衔接，在战略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

游击战争开展的过程中，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的武装也达 1000 余人。1934 年 11 月，红四十二师以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为骨干组建了红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红二团组建后，积极战斗，使游击区迅速变成了正式的根据地，并在保安、安塞、鄜县、甘泉等县相继建立了正式或临时的红色政权。

在西线，庆北地区的局面也逐渐打开。1934 年 2 月，张秀山率游击队在华池柔远一带发动群众，揭露土豪劣绅勾结民团欺压群众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先后在柔远、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一带成立了 3 个农民联合会和 10 余个农民联合会小组。选举成立了庆北办事处，办事处兼有党政二重职能，下设土地、劳动、经济、肃反、文化等委员会。庆北办事处成立后，领导庆阳以北今华池县中、西部地区的广大人民，组织赤卫军、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许多农民联合会，庆北苏区开始形成。庆北苏区东与南梁中心区相接，成为南梁中心苏区西部的重要屏障。

总之，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的恢复和南梁中心区的扩大，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高涨。红军先后解放了庆阳、合水、保安、靖边、安塞、甘泉、鄜县、正宁、宁县、旬邑、耀县、淳化、宜君等 20 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扫除了敌人的反动据点，摧毁了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联合会、贫民团、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展到东到洛河、西至元城川、北至宁条梁，南到耀县的广大地区。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4—225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3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7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1 页。

四、筹备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1934 年秋，根据《七月决议》关于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正式的工农民主政府的精神，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蔡子伟等起草了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及其他文件。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是：“10 人至 20 人产生代表 1 人，代表约 100 余人。”雇农 5 人选一名代表，贫农 10 人选一名代表，中农 20 人选一名代表，地主、富农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这种选举方法体现了很强的阶级性，保证了贫雇农在工农民主政权中的政治和组织优势。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于 1934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②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到会的工农兵代表 100 多人。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会上，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向代表们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介绍了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越本情况，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政工作的经验，并分别作了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

建设的报告和讲话。大会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又称南梁政府），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蔡子伟任政治秘书长（后张文华），李生华任土地委员长，张钦贤任劳动委员长，杨玉亭任财政委员长，呼志禄任粮食委员长，郝文明任肃反委员长，惠子俊任工农监察委员长，蔡子伟兼任文化委员长，高敏珍任妇女委员长（后张景文）。③会上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任副总指挥。梅生贵兼任参谋长。在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的基础上，还组建了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宋飞任副大队长，辖三个中队，共100余人。

（二）威武雄壮的阅兵仪式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除100多名正式代表外，还有南梁地区的群众、红军、游击队员、列宁小学学生、儿童团、少先队、赤卫军共计3000余人。主席台上悬挂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巨幅红色会标，整个会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呈现出节日的热烈景象。10点钟鸣炮开会。会上，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和各界代表

先后讲话。刘志丹讲话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这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下，经过 10 多年流血牺牲取得的。我们虽在耀县、保安、华池等许多县建立了县、区、乡政府，但反动派还没有完全摧毁，我们的政府还在乡村。过去受剥削压迫，就因为没有自己的政府④”②讲到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和日本侵略者杀我同胞时，他顺手拿起红缨枪，端在手中，大声号召人民武装起来，赶走日本侵略军，推翻蒋家卖国王朝。他的声音非常洪亮，刺杀动作敏捷有力，顿时台上台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本侵略军！收复一切失地！……”的口号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赤卫军、少先队千支红缨枪在阳光下寒光闪闪。习仲勋郑重地从刘志丹手中接受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大印，并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庄严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的胜利。⑤

下午 2 时，在马洼子平台举行了阅兵仪式，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领导站在检阅台上，二、三路苏区的人民代表站在观礼台上。当地群众、各机关干部、学校学生坐在大草坪上观看阅兵仪式。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检阅了红军、赤卫军、少先队。人民武装分列式开始了，前面是 10 多路纵队为先导的赤卫军、少先队，接着是红军干部学校、红四十二师第二、三团和二、三路部分游击队（三路游击队是代表队），最后是骑兵团。在一杆杆迎风飘扬的红旗，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各路游击队、十八个赤卫军大队，雄纠纠、气昂昂地通过检阅台前，并绕

场一周，阵容无比壮观；骑兵团的 200 多匹战马昂着头通过检阅台，群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⑥

晚上，举行了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文艺晚会，演出了自编自演的“红军舞”、“红旗颂”以及新戏、京剧、秧歌等文艺节目，举行了军民联欢活动。据张秀山回忆：“晚上演戏，龚逢春唱京剧，用纸条作胡子，白焕章扭秧歌，李登瀛也是好演员。群众反映说，革命队伍里可有能人啦！”⑦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指导陕甘边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的最伟大成果之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最早的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在西北地区根据地建设和政权建设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中国革命政权建设史上有着独特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庆祝大会后，刘志丹挥毫写下了《荔园堡阅兵》诗一首：陕甘儿女有豪气，赤手空拳争权力；今日武器扛肩上，队列阵阵成铜墙。⑧

（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管辖区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横跨陕西中部、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地区。至 1934 年秋冬之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包括今甘肃的华池、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与陕西的旬邑、彬县、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黄陵、郿县、甘泉、志丹、安塞、定边等 18 县（全部或部分）

在内的地域。⑨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至1935年11月陕甘省、陕北省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酈西、酈甘、赤安、华池、庆北、合水、安塞、赤淳、中宜、新宁、新正、荏掌、靖边、定边、赤水、淳耀、永红、肤甘、肤施、红泉、赤川等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和代边区苏维埃政府行施领导权的南区、东区革命委员会及西区办事处。

1934年9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的小石崖同时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派特委组织部长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兼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刘永培任副主席，封正宝任财政委员，陈福从任肃反委员，杨保德任土地、劳动委员，张嘉伯任军事委员。⑩1935年7月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移驻正宁县三嘉塬，后又移至南邑，唐洪澄继任南区党委书记，张邦英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南区革命委员会先后下辖酈西、酈甘、赤淳、中宜、淳耀、赤水、新正、新宁、永红等县级政权组织。1935年8月，酈西、酈甘、中宜县革命委员会划归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10月，陕甘边南区召开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秦善秀⑪、张邦英当选为正、副主席。陕甘边南区所辖的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等诸县的红色政权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5年3月，经刘志丹和习仲勋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派马文瑞承担开辟陕甘边东地区的任务，并由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部长呼志禄、华池县赤卫队队长张彦福、

军政干部学校的几名干部和三十多人的警卫队共同组建了武装工作队，开赴甘泉、宜川等地。在杨森骑兵团的配合下，马文瑞率领工作队，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赤卫军、游击队，捣毁国民党的保甲组织，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一切粮赋、税捐、地租和债务，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和迅速。3月28日，在临镇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书记的中共陕甘边东区工委，6月间，成立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⑫，马文瑞任主席，呼志禄、奚玉山、许克昌、张彦福分别担任土地、粮食、财政、肃反部长。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辖红泉、赤川两县革命委员会。

1934年夏，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派张策负责陕甘边西区工作，主要是以保安（今志丹县）为重点，向安塞、庆阳、合水等地发展。^⑬

①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230—234页。

②一说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时间为11月1日至6日。此处依据“张秀山1986年11月7日下午谈陕甘边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0页。

④王四海：《跟随老刘战斗》，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⑤蔡子伟：《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回忆》，《陕西文史资料》1980年第9期。

⑥王四海：《跟随老刘战斗》，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208页。

⑦《张秀山谈陕甘边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

⑧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3页。

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简述》，油印本，1984年，第1页。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1页，刘永培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在时间上存疑，有待考证。

⑪一说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为张月，此处依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0页；《张邦英1985年5月6日谈陕甘边南区》，见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450页等资料的說法。

⑫高锦纯：《驰骋万里》，中共宜川县委党史办：《红四十二师在宜川的活动及成立东区革委会的情况》，1984年9月22日。原件存中共宜川县委党史研究室。

⑬张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辖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县的革命委员会或办事处等临时红色政权相继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管辖着20多个县的红色政权。

（一）郿西县革命委员会

1934年4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南区办事处派高岗、李彦、陈国栋、张文华、兰志敏等在药埠头召集小河子川和葫芦川的30多名群众代表开会，选举成立郿西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明奎，秘书赵文昌，经济委员任兴才，土地委员何彦江，粮食委员赵全美，军事委员李兴发和郭振明，委员还有张建荣、屈尚文、何占川等。驻地雷家沟，后曾驻李家沟、文家庙等，辖槐树庄、小河子、文家庙、安家川、党家湾等乡。①领导有郿西游击队、保卫队、赤卫队、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组织。同时，还建立了乡政府。并在三么台、柏树塬、油房塬等村建立了村委会，村长分别由刘德功、韩学增等人担任。1935年11月，撤销郿西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副主席韩明奎。

（二）郿甘县革命委员会

1934年4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派马文瑞、贾生秀主持在甘泉县府村川曹家沟成立酈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尚达，后为王居仁、李彦。辖古驿川、畔上、岔口、府村等乡。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军事等部门，粮食委员刘麻子，肃反委员雪万仁，军事委员李涛。②同时建立了酈甘游击队和保卫队两支革命武装。1935年春，酈甘县革命委员会移驻酈县余家塬。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成立后逐渐由甘泉府村川转移到酈县大申号地区活动。1935年11月，撤销酈甘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酈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副主席韩明奎。

（三）安塞县苏维埃政府

1934年夏，王聚德被派往安塞县开展地方工作和发动游击战争。1934年7月，红二十六军消灭了刘老庄、胡皮头等村寨的民团武装，收缴了土匪余丑娃的枪械，解放了洛上川。7月，在安家坪（现属甘泉县桥镇乡）成立了安塞县革命委员会，王聚德任主席，张良才任副主席兼秘书长。下辖桥扶峪、下寺湾、王家坪3个区。1934年12月，安塞县革命委员会转变为安塞县苏维埃政府。1935年4月，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机关迁至洛河川，以上3个区改由边区政府直属，安塞县苏维埃政府迁至高桥川，开辟苏区。共辖6区24个乡。一区，辖磑子沟、社科、云坪、枣圪台、河庄坪、龚家沟、马家沟等7个乡；二区，辖李塌、周屯、谢屯、枣湾等4个乡；三区，辖招安、康岔、白庄、庙沟等4个乡；四区，辖滴哨屯、贾居、苗店等3个乡；五区，

辖洛坪川、魏塌、道渠、高桥等 4 个乡；六区，辖西河口、杜寨等 2 个乡。同年 11 月属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

（四）赤安县苏维埃政府

1934 年夏，保安游击队离开南梁，以吴堡川为中心，向洛河川以南的三道川、义正川广大地区发展。不久，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又派张策到这一带开辟苏区。他们首先在紫坊台发动雇工赵玉文、袁万祥等成立贫农团、雇农工会，组织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接着又在脚扎川、樊家川、义正川、吴堡川、三道川等地建立了群众组织，并着手建立基层政权。1934 年 11 月，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在吴堡川朱家沟正式成立，政府主席边金山（后袁万祥）；秘书张策；经济委员赵玉文；劳动委员王海清；土地委员张鸿钧；粮食委员高占玉；文化委员白光彩；保卫局长王玉忠。县苏维埃政府下辖 4 个区苏维埃政府：一区：永宁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朱王福；二区：义正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郝应春；三区：吴堡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杜福仲；四区：榆树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贺满朝。1935 年以后，全县共辖 10 个区苏维埃政府，其中吴堡区，辖紫坊（今属华池）、桃树嘴、吴堡等乡，永宁区，辖麻台、柏林、槐树庄、崾子川、贺老庄等 5 个乡；旦八区，辖旦八、樊川、义正、麻台等 4 个乡；金鼎区，辖金鼎、马子川、双庙、赵沟门等 4 个乡；子良区，辖曹塔、沟稍渠、白山、李渠等 4 个乡；太平区，辖城关、双河、武家沟门、孙岔等 4 个乡；三台区，辖三台、土门、康家沟、狗儿子河等 4 个乡；高老庄区，辖石岔、凤凰、纸坊、

老庙河、广中等 5 个乡；顺宁区，辖顺宁、宋庄、丁岔、双阳等 4 个乡。

（五）华池县苏维埃政府

华池是指庆阳县北部区域。旧无县的建制。随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在这一带建立了革命政权，始有华池县的建制。1934 年 11 月 7 日，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同时宣布成立。随后，在何沟门召开了华池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 100 多人。大会选举贾生秀任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彦任副主席。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粮、肃反、青年等委员会。土地委员长常元祥，肃反委员长贾生秀（兼），财政委员长武生荣，粮食委员长武生荣（兼）。华池县苏维埃政府管辖 4 个区：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高生荣，管辖小河沟、豹子川、东华池、林锦庙一带；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生荣，管辖玉皇庙、郭峁畔一带；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白登贵，管辖荔园堡、何沟门、白马庙川、白沟门、郭峁湾一带；四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边海旺，管辖二将川、刘坪一带。在健全区乡政权的同时，华池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华池人民为巩固南梁中心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庆北县苏维埃政府

庆北原指庆阳县（今庆城县）北部地区，即今华池县子午岭以西地区。1934 年 6 月，在雷家川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庆北办事处，强家珍任主任。办事处机关设在龙门庄，下设土地、劳动、财贸、畜牧、文化、青年等部门，先后设温台、柔远两个区。不久，办事处改

为庆北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边金山任主席。1934年12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在柳湾沟柏树掌村正式成立，强家珍任主席，高世清任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文化、土地、肃反、劳动、财政委员会。土地委员长李培福，劳动委员长党生喜，财政委员长高登洲，肃反委员长朱培福，文化委员长马仰西，政府秘书长马仰西（兼），办公地点在龙门庄。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下辖3个区：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田河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培福；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柔远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天孝；三区苏维埃政府（又称城壕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兴仁。1935年4月，国民党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庆北县失陷，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苏维埃政府许多工作人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同年秋，在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庆北办事处再次成立，李培福、李树林先后任办事处主任，恢复了柔远、温台、城壕3个区，并逐步向五蛟、元城方向发展。1936年3月，庆北办事处与华池战区合并成立庆华县，庆北县撤销。

（七）庆北县革命委员会

1935年1月，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委派，王英等人在保安二道川、吴旗县三道川以西，华池县元城以北地区成立了赤卫军、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并建立了临时红色政权—庆北县革命委员会。下辖粮食、土地、肃反、军事、财政等部门，王英兼任军事部长。还成立了庆北政府保卫队，队长杨占鳌，下设3个中队，100多人，70多支枪。1935年春，因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剿”，庆北县革命委

员会的工作人员转移到洛河川。这个临时的红色政权大约存在了 3 个月左右时间，它和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之间是并列关系。③

（八）合水县革命委员会

合水县太白镇一带属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1934 年 11 月中旬，在连家砭老城成立了太白区苏维埃政府，潘应乾任主席，高清荣任副主席。1935 年 2 月，在太白镇成立了合水县革命委员会，李彦任主席。同年 4 月，因国民党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合水县革命委员会转移至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太白区苏维埃政府干部相继转入地下斗争。9 月，合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彦在错误“肃反”中被杀害，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和太白区苏维埃政府均解散。

（九）赤淳县苏维埃政府暨革命委员会

1934 年 2 月赤淳工委建立后，在农村秘密组织赤卫军、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打土豪、分粮食，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并因地制宜，将淳化与耀县的游击区划为东区，淳化与旬邑交界的游击区划为西区。1935 年 2 月，陕甘边第三路游击队在淳化开展游击活动期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宋飞受边区政府之命在西区中嘴村成立赤淳县苏维埃政府④，宋飞任主席。下设经济、粮食、军事、土地、肃反、妇女等部门。任贵选任组织部长，姚振华任宣传部长，封正宝任财政部长，马保全任肃反部长。⑤下辖东、西二区。东区为今淳化县南村、安子哇、铁王、秦河等乡，西区为今淳化县北城堡、胡家庙、卜家、十里塬 4 乡及旬邑县土桥、清水原一带。1935 年 8 月，陕甘边南区党委调宋飞前往扶风县搞策反工作，赤淳县苏维埃政

府自行解体。同月，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邦英在蒋家山村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赤淳县革命委员会。会议选举姚殿森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振喜为副主席。赤淳县革命委员会包括东、西两个区。并设立了组织、宣传、土地、粮食、财政、军事、劳动、保卫等工作机构，组织委员任贵选，宣传委员李尚勤，土地委员张喜才，粮食委员姚善芳，财政委员封正宝，军事委员任连俊，劳动委员姚振华，保卫委员马保全。革命委员会机关先后设在蒋家山、桃渠原、铁王等村。10月，赤淳县革命委员会下辖之东区建立淳耀县苏维埃政府。西区建立赤水县苏维埃政府，赤淳县革命委员会撤销。

（十）中宜县革命委员会

1934年初，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驻三路办事处的领导下，小石崖一带就组建了红军游击队。1935年3月，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宜苏区，统一领导土地革命，在黄子文的主持下，于今郿县的寺仙、前桃园等地区宣布成立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仲良，副主席李百顺。4月初，洛川国民党驻军邢长眉带领两个团的兵力对中宜苏区进行“清剿”，革命委员会先后转移到石家塔、南道德等地，最后定驻寺仙镇。同年11月中宜县革命委员会转变为中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良、副主席赵兴帮，秘书长王英，县政府内设财政部、粮食部、文化部、军事部、土地部、肃反部，各部设部长1人，由当地农民选任。财政部长曹秀，保卫部长郝成哉，粮食部长王建邦。县政府下设6个区政府，一区：青儿原；二区：寺仙、李家洼、太平等村；三区：南道德、丁家原、谢家等村；四区：苏家峁、段家原；五区：阿党、孙村、丁

村、康村；六区：吉子峴、安子头、固峴。11月中旬直罗战役开始前夕，中宜县政府迁往张村驿。⑥1936年4月，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撤销中宜县治。

（十一）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

1935年4月，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靖边县西部桃梨峁（今属志丹县顺宁乡）成立了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周子恒（后阴云山）。副主席4人，下设妇女部、经济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肃反委员会、教育部、工农检查（员）、保卫部、交通站等工作机构。辖蒋家寺、郭家沟、谷嘴子、张家洼、二里湾、新城、油坊洼子、胶泥湾子、边墙壕等9个区、35个乡。是年11月，靖边游击队中队长宗文耀、金林叛变，阴云山被叛匪杀害，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全部进到叛匪破坏。

（十二）茺掌办事处

1935年春，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派遣，共产党人王占奎、吕兴财、许兴堂等来到宁县盘克塬的茺掌、潘村、罗候、武洛一带开始革命活动，成立茺掌办事处，许兴堂任主任，王占奎、吕兴财任委员。茺掌办事处管辖范围主要是茺掌、罗候、武洛、潘村一带。茺掌办事处在合水游击队黄克秀部的帮助下，组建了游击队，队长张生才，指导员郭秀宁，并建立了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潘村农民联合会会长李学连；茺掌农民联合会会长刘志霄，赤卫军队长刘志博；罗候农民联合会会长杨怀治，赤卫军队长杨俊岳；武洛农民联合会会长张吉祥，赤卫军队长朱占成。1935年12月，茺掌办事

处与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取得组织联系，荏掌办事处归属新宁县领导，新成立荏掌、宋家庄两个乡，归属新宁县第二区。⑦

（十三）新正县办事处

正宁县南塬一带是陕甘边红军最早开辟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1934年7月，五顷塬乡革命委员会成立，郭自发任主席，何正兴任副主席。同年冬，南邑、湫头、巩家斜、西城、西沟、石家湾子以及龙嘴子回民乡的临时革命政权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湫头、三嘉、长舌头三个区的临时红色政权。1935年春，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在正宁县槐树沟成立了新正县办事处，郭廷藩任主任，封正宝、杜宛协助工作，机关驻地先在槐树沟，后迁至两顷塬。新正县办事处下辖湫头、三嘉、阳坡头（今属陕西）3个区革命委员会。三嘉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唐世英，机关驻南庄子村；湫头区革命委员会，主席赵思廉，机关驻湫头镇。此后，新正县办事处即开始着手筹建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向陕甘边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新正县办事处遭到国民党军的破坏。

1935年8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决定在正宁、旬邑、彬县接壤地区重新设立新正县。在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邦英主持下，新正县在湫头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新正县革命委员会⑧，郭廷藩任主席，左怀玉、李进荣为副主席，下设财政、粮食、军事、土地、劳动、文教、公安等7个工作机构，财政部长高仰月，粮食部长高学智，军事部长张占英，土地部长张崇林，劳动部长左怀玉（兼），文教部长张化民，公安部长张有本。不久又成立了湫坡头、长乐、底

庙 3 个区革命委员会，加上原来的湫头、三嘉、阳坡头 3 个区革命委员会，共辖 6 个区革命委员会，其中，阳坡头区，辖阳坡头、蜈蚣洞、后掌、长舌头、前义阳、下墙村、小峪子、马家堡等 8 个乡；湫坡头区，辖看花宫、平坊、揪坡头、椒村、甘家店等 5 个乡；底庙区，辖麻院、郭村、店子河等 3 个乡。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机关驻湫头镇。同年 10 月，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正式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任职未有变动。全县辖 6 个区，人口 3.7 万。

（十四）宁县办事处

1935 年春，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子午岭的上畛子成立了宁县办事处，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刘永培兼任宁县办事处主任，李尚勤任副主任，机关先驻九岷，后驻金村。⑨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开辟子午岭山区根据地，发动群众，筹建革命政权。1935 年 11 月，南区党委、苏维埃政府派焦怀兴来宁县，在杨家塬子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张有鹏任主席。下设粮食部、财政、保卫、教育、军事、土地等工作机构。粮食部长王立元，财政部长杨万恒，保卫部长王清殿，教育部长屈纪军，军事部长谭得智，土地委员会主任胡金玉。⑩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先后驻杨园子、左家川、石鼓、下齐家等地。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九岷区），主席张荣德，副主席张恩元，机关先后驻马洼、南嘴子和月牛坡等地；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金村区），主席杨玉山，机关先后驻金村、武洛等地；三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湘乐区），主席朱正元，机关先后驻巴原、石鼓等地，管辖 4 个乡苏维埃政府；平子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刘永康，机关驻平子镇。新宁县所辖区域东至芦宝梁、西至石鼓的黑庄子、南至西坡、北到盘克的罗候堡，共有 3 万多人口。

（十五）定边县革命委员会

1935 年 5 月，西北红军主力解放了定边县南部及靖边县宁塞川。同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宁塞川凤凰寺（今属吴旗县五谷城乡）成立定边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王玉海，副主席赵国雄。辖三区。凤凰寺区设凤凰寺、玉谷城、周湾 3 个乡；颍颥川区设毛家砭、党家畔、马家台、帐房湾 4 个乡；乱石头川区设葛沟门、吴台堡、新安边 3 个乡。以上这些地方，有些今属吴旗县。1936 年 7 月，定边区革命委员会改建为定边县苏维埃政府，王文英、王玉海、曹建勋先后任主席。

⑪

（十六）肤甘县革命委员会

1934 年冬，陕甘边游击队第六支队和第八支队，开辟了洛河川游击区，1935 年春摧毁国民党驻登山峪（甘泉县境内）马兆仁民团，1935 年 6 月，在登山峪成立肤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采温，副主席陈传高。设土地、粮食、劳动、财政、教育、国民经济等 6 个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9 月中旬，登山峪遭马崇秀民团袭击，迁驻龙儿寺（今属延安市柳林乡）。肤甘县革命委员会管辖南川、龙儿寺、佛道坪、登山峪等 4 个区。1935 年 9 月，肤甘县撤销，分别设立甘洛县和肤施县。⑫

（十七）赤川县革命委员会

1935 年 7 月，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持在宜川县北部雷多河（今属延长县雷赤乡）成立赤川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黑志德，副主席赵怀德，秘书康永年，教育部部长白彦博，保卫部部长杜汉方，劳动部部长白兆武，军事部部长徐国珍，贸易部部长高思恭，财政部部长赵文献，土地部部长呼育基，粮食部部长呼清河。机关驻地北赤镇。下辖 6 个区革命委员会。1935 年 11 月，赤川县革命委员会改称宜川县苏维埃政府，隶属陕甘省。宜川县苏维埃政府下辖 6 个区苏维埃政府。一区，辖瓷尔庄等地；二区，辖后九殿等地；三区，辖北赤镇等地；四区，辖白家原等地；五区，辖庄头村等地；六区，辖桑柏村等地。

（十八）红泉县革命委员会

1935 年 7 月，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在临镇宣布成立红泉县革命委员会，驻地炭窑沟（今麻洞川乡炭窑沟村），主席刘大才。^⑬设土地部、粮食部、教育部、财政部、肃反委员会、保卫部等部门。辖 4 个区、15 个乡政府。一区，辖宋庄、南泥湾、金屯、麻洞川、北姚家坡等 5 个乡；二区，辖黑舍、中益、条子原、吴太原、临镇街等 5 个乡；三区，设冯坪、南蟠龙、小李渠、偏桥、申庄等 5 个乡；四区，在云岩一带（今属宜川），未设乡，1936 年初，革命委员会改建为红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先后为姚海亮、李万高。1936 年底，撤销红泉县成立红宜县，1937 年 7 月，红宜县改称固临县。

（十九）肤施县革命委员会

1935 年 9 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肤甘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肤施县革命委员会，驻地龙儿寺。同年 11 月，肤施县革命委员会改建为肤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秉温，副主席王耀祖。辖 5 个区政府：一区辖刘家沟、李渠、下坪、郭庄、瓦窑套、碾庄等 6 个乡；二区辖冯坪、南蟠龙、小李渠、偏桥、白庄等 5 个乡；三区辖沟门、麻庄、袁庄等乡；四区辖毛家堡子、佛道坪等乡；五区辖嫁沟、枣圪台、河庄坪、若寺湾、刘庄等 5 个乡。政府除肤甘县原设机构外，增设军事部、保卫局、工农检查部、白区工作部、裁判部等工作机构。1937 年 2 月肤施县与延安县合并。^⑭

（二十）华池战区苏维埃政府

1935 年春，陕甘边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华池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随边区政府撤至洛河川。同年 9 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边区政府决定将华池县改为华池战区，并成立战区苏维埃政府，高生荣任主席，下设保卫、财政、粮食、土地、内务部等 5 个工作机构，保卫局长戴万才，财政部长雷世英，粮食部长折生应，土地部长王崇杰，内务部长李向红。机关驻地在南梁李沟门，并将原来的 4 个区合并为 2 个区，组建了这两个区的苏维埃政府，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白马区苏维埃政府）由原华池县苏维埃政府所辖二、三、四区的部分地区合并组成，机关驻南梁阎洼子，辖玉皇庙、白马庙、刘坪 3 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李兴高。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林镇区苏维埃政府），由原华池县苏维埃政府所

辖一、四区部分地区组成，机关驻林镇梁沟门，辖 3 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安仲成。

（二十一）永红县苏维埃政府

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南区革命委员会派赵红军在正宁的下南坡头、旬邑底庙一带秘密串联，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红色政权组织。在此基础上，于 1935 年 10 月，在正宁县下南坡头西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永红县苏维埃政府，选举梁文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银清为副主席。永红县苏维埃政府下辖郭村、麻院、店子河等 3 个乡苏维埃政府。不久，因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永红县苏维埃政府人员转入地下斗争。

⑮1937 年 4 月，中共关中特委决定撤销永红县制，所辖区域划归新正县底庙区，永红县武装组织保卫队同时撤销。

（二十二）淳耀县苏维埃政府

1935 年 10 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苏维埃政府在淳化县桃渠塬召开赤淳县革命委员会所辖东区根据地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姚殿森任主席，卢德明、陈洪财分别任副主席。下设土地、财政、保卫、劳动、文化等工作部门。经济部长封正宝，粮食部长姚善芳，军事部长李有才，保卫部长王培华，劳动部长罗生春。下辖 5 个区苏维埃政府，桃渠原区辖桃渠原、秦家洼、北坡、王家河、白甫、石窑等 6 个乡；小池区辖小池、铁王、大疙瘩、崖腰、董家等 5 个乡；南村区辖崔家原、北村、丁户等 7 个乡；虎家河（台

儿凹)区辖花豹窝、台儿凹、胡家巷、金马、让义等5个乡;周家河区辖马鞍岭、高尔原、车坊、独石、蒿圪塔、焦子河等6个乡。

(二十三) 赤水县苏维埃政府

1935年10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苏维埃政府在赤淳西区(今旬邑县土桥附近的烽火台)召开100余人的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赤水县苏维埃政府,王振喜任主席,任贵选、吕宏德任副主席。财政部长任贵选(兼),保卫部长马保全,粮食部长梁积仓,土地部长赵英俄,武装部长任连俊。赤水县辖淳化的卜家、润镇、十里原、官庄,旬邑的土桥、大小南乡、清水原、排厦、石门关等地,下辖4个区、21个乡政府。马家山区辖蒋家山、卜家、东奉岭寺、马家山、高硷、宋家沟圈、王家村等7个乡;丰泉区辖镇头、郝家畔、南坡、马家庄、清原等5个乡;官庄区辖仙家、官庄、沟渠头、胡家庙等4个乡;清原区辖郭家掌、七界石、西庄子、班村、吕家等5个乡。赤水县政府先后驻中咀、马家山、马家庄等地。

①韩明奎:《陕甘边根据地富县革命斗争情况回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1—673页。

②刘生玉:《1988年6月3日谈富甘革命委员会》,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

③王英:《在庆北开辟新苏区的斗争》,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1—979页。

④淳化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年版,第19页。

⑤《宋飞1985年6月中旬谈赤淳县》,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⑥黄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陵县志》,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434页。

⑦《吕兴才 1985 年 8 月 28 日谈荏掌办事处》，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8 页。

⑧一说为正旬彬革命委员会。

⑨关于宁县办事处的成立时间，有的书籍记作 1934 年 11 月，有的记作 1935 年 2 月，此处采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 752 页、《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 100 页等相关资料的说法。

⑩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0—101 页。

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60—661 页。

⑫《王华等 7 人 1984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0 页。

⑬一说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奚玉山，见甘泉县志等资料的说法。

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63—664 页。

⑮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9—100 页。

第五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

一、苏维埃政权框架的搭建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在陕甘边区坚持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政权建设作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三项主要任务。尤其是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点燃了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启了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并不断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最终实现党在全国执政作了建树性的实践探索。

陕甘边区的苏维埃政权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充实和完备的。在政权建设的前期与后期以及各地区之间，在具体问题上略有差异，但在组织系统、机构设置以及职能等方面都大体相当。陕甘边区的政权系统由边区、县、区、乡四级苏维埃政府构成。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各群众团体代表、各武装团体代表、党团代表、各革命领袖组成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它闭会期间由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及其主席、副主席行使最高权力机关所赋予的职权；在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中，分别设立了劳动、土地、肃反、革命军事、财政、粮食、文化等委员会，来分管各项工作和处理日常事务；各委员会之间地位平等，委员会与委员会之间的双边问题，由各有关委员会共同协商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须经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各委员会的职权也有明确规定：土地委员会领导

土地革命、分配土地等事宜；经济委员会负责工、农业及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商业等的建设与发展；财政委员会专司金融和财税事务，以及军政开支；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各地列宁学校的创建、审查教师、教材、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指导各地读报、识字和俱乐部工作、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书籍、报刊等工作；保卫委员会专司侦察及捕获罪犯，镇压反革命，维护地方治安等等。边区苏维埃政权具有“议行合一”特点。各专门委员会有委员长一人，下设各科、各股。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基层政权分为县、区、乡三级。其政权结构与边区苏维埃政府一样，由县、区、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区的机构设立与边区苏维埃政府相当，但人员更精干。乡政府一般设有各种经常和临时的委员会，如扩红、土地委员会等。

县苏维埃政权。早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陕甘边区许多地方就通过暴动，建立了临时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作为向苏维埃政权过渡的革命组织形式，有的地方则直接成立县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后，各县区建立的临时政权大多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各县的最高行政机关，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大约 20 至 25 人，由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组成和产生办法，与边区苏维埃政府相同。县苏维埃政府除正副主席外，各委员会设委员长 1 人，另有文书印刷、事务收发、交通等工作人员 3—5 人。若遇经费困难，各委员会的工作可以兼任。各委员会的职权也有明确规定，土地委员会领导土地革命、分配土地等事宜；经济委员会负责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

及合作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财政委员会专司金融和财税事务，以及军事开支；行政委员会管理民政事务；文化委员会负责教育、文化、卫生工作；法庭负责处理诉讼、审判罪犯；保卫局专司侦察及捕获罪犯镇压反革命，维护地方治安；军事委员会负责部队建设、军事方案制定等军事工作；妇女委员会负责与妇女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妇女的翻身解放、妇女作用的发挥等。

区苏维埃政权。区苏维埃政府的权力机关由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代表组成。区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的产生办法同县苏维埃相同。区执行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及各种执行机构，处理日常事务。区苏维埃政府的职能是：执行上级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命令、决议以及本级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决议，制定本区工作规划及实施计划；解决治域内的各种纠纷；清查、登记本区的土地、人口及工商业户；编制执行预算；实施社会救助、管理本区的教育、文化及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协助红军作战等。

乡苏维埃政权。乡苏维埃政府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最基层的政权机关。乡苏维埃政府的具体工作是：执行上级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法令、决议等；制定乡苏维埃一个月至半年的工作计划及实现计划的日程，解决乡管辖范围内的有关问题；办理有关土地问题的事宜，如没收、分配、整理耕田及水利等；组织义务劳动，如帮助红军、救灾、修路等；组织地方武装，办理守卫、放哨、通报消息、帮助红军做好作战事宜，计划并执行乡苏维埃境域内的建设事宜；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与官僚腐化分子作斗争等。乡苏维埃政府设主席团，由乡

代表产生，主席团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主持乡苏维埃的日常工作，乡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原则上不脱产。乡苏维埃政府不分科，一切事情由整个乡政府负责。

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职能是执行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和指示，领导县、区、乡的工作，具体讲主要有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比如军事上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配合革命战争的需要，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进行归队运动、慰劳红军等等。以扩大红军为例，一般方法是将扩红的数量和期限下到乡苏维埃政府，乡苏维埃政府通过乡代表会议和扩大红军委员会等，再将任务分配到各村去完成。为使红军战士安心和放心地在部队进行革命斗争，乡苏维埃政府非常注重做好优待红军家属和慰劳红军等工作，从而保证扩红工作顺利进行。

二、制定颁布“十大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驻地搬到了距荔园堡十多里的南梁寨子湾，为此，群众习惯地称其为“南梁政府”。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随之移驻寨子湾。为了推动陕甘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在寨子湾简陋的窑洞里，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认真总结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法令，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以至关心群众生活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提出并颁布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一）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分川地不分

山地；田、青苗一齐分；红军家属分好地等。（二）财政粮食政策：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成立牧场，养猪放羊；成立集市，便利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票，流通金融等。（三）军事政策：实行自愿兵役制；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对牺牲的战士和赤少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金。（四）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根据地内的民团、土匪、哥老会等能团结争取的，采取措施团结、教育和争取，不能为我所用的，坚决予以消灭。（五）民政劳资政策：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针对个别雇农好吃懒做的问题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劳动；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

（六）文化教育政策：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发展新闻事业，发行报刊等。（七）知识分子政策：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八）肃反政策：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或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九）廉政政策：把干部战士廉洁当作头等大事，颁布和实施《暂行条令十八条》等法规条文，贪污 10 元就枪毙，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最低需要量发给。（十）各种社会政策：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颁布并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引导群众移风易俗。

在寨子湾那些破败的窑洞之中，以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高瞻远瞩，制定和颁布了内容和形式相当完备、非常合乎陕甘边区实际的根据地建设政策。“十大政策”的颁布实施，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十大政策”的颁布实施，有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群众负担，改善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了边区政权的物质基础，为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十大政策”的颁布实施，有效推进了工农革命武装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开展，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军事保证；“十大政策”的颁布实施，达到了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的目的，探索出了一套适合陕甘边区革命实际的统战工作模式，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经验；“十大政策”的颁布实施，摧毁了传统腐朽落后文化，丰富了根据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开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十大政策”的颁布实施，促使了清廉政府的创建，提高了政府威信，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

三、民主法制建设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从它创立起就贯彻了民主执政的精神。民主执政首先表现为民主选举。刘志丹提出代表选举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代表。但有的人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这种民主选举能行得通吗？习仲勋解释说：“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

都知道选有能力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①革命委员会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 and 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苏维埃政府委员。通过民主选举，把群众最满意的人选出来，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在选举中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经过民主选举，新产生的政府就具有合法性，这一做法得到根据地人民的衷心拥护，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民主选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的100多名代表是从陕甘边界贫苦农民、工人、游击队、赤卫队和红二十六军中选举产生的。与会代表认真听取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所作的工作情况报告，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推举出自己想选的候选人。在此基础上，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民主选举，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在选举产生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南梁山区的贫苦农民占政府组成人员的半数。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代表自己选举产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也由大会选举产生。这次大会给了代表们充分酝酿讨论的时间，发扬了民主，充分体现了政权的阶级属性和民主特性，得到了与会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好评。据蔡子伟回忆：“这个办法完全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会议

期间，完全由代表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它和过去由群众团体推举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的办法有所区别。”②

民主选举使苏维埃政府迈开了民主执政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实行民主集中的集体领导制度，政府领导成员还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经常听取群众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不断完善工作方针，改进工作方法。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坚持广开言路，做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不逛只听一面之词，考虑一种方法，而是围绕这一问题，充分听取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措施，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进行利弊比较，选择最优方案进行实施，确保了民主执政的科学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非常注重法制建设。为了确保《七月决议》关于政权建设必须“马上颁布一切法令，规定施政方针以巩固苏区”的指示得到贯彻落实，促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与扩大红色根据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总结长期以来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同时参照中央苏区的有关法规文件，先后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土地、财政、军事、统战、肃反、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法令和制度，逐渐改变了过去临时政权时期那种无法可依的被动局面，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了红色政权对反动派的震慑力。如土地法的制定，是根据1930年中央苏区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制定的。按照边区政府制定、颁布的有关土地革命的法令、政策，各

级苏维埃政权和土地委员会领导广大贫苦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烧毁地契，贫苦农民分配到了土地、牛羊、粮食和其他财产，土地革命迅速地开展起来。据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回忆：“对于违法及民事纠纷问题，虽然当时尚未正式建立人民法院，但是一切案件的处理都是经过各级政府，并按照一定的组织程序进行的。在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过程中，处处以革命大局和苏区的巩固、发展为宗旨，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维护贫苦农民及当事者的合法权益。”^③

为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保卫苏维埃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专门设立了肃反委员会，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

陕甘边区的法制建设，虽然时间不长，但取得了可喜成就，主要表现为：初步建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苏维埃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苏维埃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对法律的需要；初步创建了苏维埃的司法机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为新中国人民司法的建立和发展，构筑了基础框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苏维埃司法干部队伍，为后来新中国司法工作的建立做了人才的准备。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② 蔡子伟：《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回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4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2页。

四、廉政建设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很重。为渡过难关，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当时每人每天供给小米一斤半，每20人一碗盐，衣服、鞋袜自备。为了减轻群众负担，习仲勋等边区政府领导人在发动群众分配土地的同时，领导群众打土豪，没收其财产。习仲勋还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有关廉政规定，在群众家吃饭后，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从而使党和政府在它的最初阶段就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①为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规定：党政军干部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正是有了这样的法令，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中没有发生贪污行为。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高岗犯过错误，就曾受到过撤职处分。^②“这年十月革命节，要举行阅兵式，大家张罗着要修个阅兵台，还要有彩门。志丹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结果只花了一点钱，群众来得多，又敲锣打鼓，十分热闹。”^③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非常注重对干部的严格管理和教育，边区政府成立后就设立了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惠子俊），作为行政监察机关，行使检查监督职责。为了教育干部，特别是不断净化广大党员、干部的心灵，抵挡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诱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防腐倡廉，早在 1934 年 10 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就在南梁创办了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来自红军、游击队的中、下级干部，也有地方干部。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蔡子伟、马文瑞等担任教员，先后开办三期，共有 200 多名红军干部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学习，较好地纠正了干部自身存在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部队和游击队经常进出于南梁，进行短暂休整和补给，因而解决军粮供应和医治伤病员就成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担负的一项极为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为此，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的瓦房院专门设立粮台，专事军粮征购、加工、发放事宜。至今在荔园堡还流传着习仲勋处罚粮台工作人员的故事。当时粮台有一位管理人员叫李银海，对粮食出现库损问题负有责任，按照苏维埃政府法令要以贪污罪处以死刑，习仲勋命令保卫队立即执行。但当地群众认为李银海不该处死，因而挡在粮台门口，坚决不让保卫队入内抓人。保卫队见状一边鸣枪示警，一边反复说服群众离开。习仲勋看到这么多群众一致请求赦免，觉得事出有因，经调查了解，原来是粮库管理不严，李银海自行决定救济困难群众，因而导致库存短缺，就严厉批评了他工作上的失误。李银海在以后工作中记取了教训，做出了成绩。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政府的规章制度，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据老红军、陕甘游击队一班班长王殿斌回忆：在 1935 年 4 月，国民党军马鸿宾部占领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率党、政、军机关转移，那时天气已经热了，习仲勋还穿着三年前穿的旧棉袄、破棉裤。据和习仲勋一块战斗和工作的同志讲，习仲勋就是这样的，他在个人的吃穿住上从来不讲究，因陋就简，同时他还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始终如一、廉洁奉公、一丝不苟的扎实认真工作。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政权建设的实践，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人才。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影响带动下，边区政府各部门以及基层各区、乡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勤俭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群众普遍赞扬和拥护。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24 日。

②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2 页。

③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24 日。

五、后勤保障建设

（一）打土豪，筹集粮款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把“打土豪、分田地”作为行动纲领，领导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在陕甘边界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分财产的斗争。1932 年 3 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攻占

正宁寺村塬后，队委会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开展以打土豪、分财产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斗争，在苟仁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判处决了大土豪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德功，掀起了寺村塬地区群众性反封建斗争热潮。陕甘游击队队委会还派出骑兵分队，到正宁永和、彬县永乐、北极、旬邑底庙等地，抓回逃亡的土豪劣绅，并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说理斗争，队委会将他们的财产没收，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一部分留作军用。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四合台村再次成立后，立即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实行土地革命。1934年6月，习仲勋带领游击队没收华池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500余石粮食，100多头牛，2000多只羊，1000多块银元。秋季，又领导庆阳游击队打开了庆阳大地主“恒义和”（商号名）在华池悦乐上堡子的粮仓，没收粮食2000余石，这些粮食和财物，大部分都分给贫苦农民，一部分充作军饷。这样，不仅为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筹集到一批粮食和款项，而且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缴获敌人的装备和物资

在战争年代，政府和人民军队的后勤物资来源，主要是取之于敌。早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初创时期，刘志丹就领导陕甘边界的革命者，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31年9月，南梁游击队在二将川打败张廷芝的土匪部队，缴获长短枪20余支，战马40多匹。不久，南梁游击队袭击旦八寨（今属陕西省志丹县），收缴当地民团的一批枪支。次年5月，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千余人，缴获敌人各种枪支1200余支，除人手一枪外，还有相当

数量的备用枪械。是年 12 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此后，红二十六军作战数十次，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缴获国民党军大量武器装备，仅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就歼敌 6000 余人，缴获步枪 3000 余支，轻机枪 200 余挺，迫击炮 8 门，战马 300 余匹及大量银元。据刘约三回忆：“不久，又袭击了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缴获枪械 100 多支，棉花百余驮、布匹数百捆、缝衣机 10 余架、西药及医药器械多种，连耀县王泰吉兵变带来的药品，建立了一个小型医院，还成立了个小型修械所和被服厂。”^①随着缴获敌人的装备物资的增多，红军武器装备大为改善，物资得到补充，生活有了改善，红二十六军得到快速扩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三）建立军工生产

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除了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武装自己以外，还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建立修械所、兵工厂、被服厂等后勤保障工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豹子川建立修械所，由马锡五负责，开始只有几名工人，后从西安兵工厂来了一些工人，王泰吉部队起义带来十几个工人，修械所共有几十个人。工具简陋，特别是制造子弹底火的材料十分缺乏，惠子俊、冯永贵、王家朝、刘平安等人因陋就简，一边修理部队送来的旧枪支，一边摸索制造步枪和手枪子弹。为解决原材料缺乏的问题，修械所派人从西安购买底火及药品，同时搜集铜元和麻钱，熔化后制造子弹和手榴弹外壳。为了节约原材料，边区政府责成修械所将旧弹壳加工处理后再使用。为此，边区政府命令打仗用过

的弹壳必须收回。火药是用土办法配制的黑色火药。修械所在照金时，还制造了一种“麻辫手榴弹”，这种手榴弹是在弹壳上绑上几根麻，用一段铁丝压上几根火柴头装在已经装好药的弹壳上，扔出去就响，有一定的杀伤力。“后来，红军游击队袭击了三原泾惠渠仓库，搞到几千公斤黄色炸药，运回来就装成手榴弹、地雷。我们用土办法制造的地雷，有拉火的，也有踩火的，杀伤力很大。当时，这是红军游击队的‘最新式武器’，后来在保卫薛家寨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红军和敌人展开地雷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②边区政府还在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建立了前线修械组织，他们跟着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抢修武器。南梁的李青山，为当地农民打制铁器、农具，为猎户修枪制枪，人称李炮匠，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枪械修理员和秘密联络员。1931年夏，李青山给阎洼子赵富奎民团修理枪支时，为红军游击队转送出一些步枪部件，并帮助游击队活捉了赵富奎，缴枪54支。1933年冬，红军在南梁成立修械所，李青山又是技术员。红军还建立了被服厂，给部队做冬装，缝补军衣，做鞋，做军旗。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来到南梁后，积极组织金岔沟附近农村妇女为红军战士做鞋、缝补军衣。刘志丹关切地说：“同志们找点布很不容易，做好衣服，剩下的布头一定要保存好，战士们衣服破了好补。”③原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区长高明山在习仲勋和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感召下，利用自己的技术制成苏币后，又被调到南梁政府被服厂工作。用他会画画、油漆、剪裁的手艺，在被服厂当师傅。他同工人们一起为红军研制出了统一的军装。这种军装是把白土布用糜草灰染成灰色，

做成八角帽，中山装，军帽上缀有五角星。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红军参加检阅时所穿军装，就是南梁被服厂自制的军装，显得既威武又大方。刘志丹高兴地称赞，高明山是我们红军里的大能人。”④

（四）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伟大实践中，人民军队和党政工作人员的衣食没有固定的来源，除打土豪夺取，缴获敌人物资补充外，解决衣食问题主要靠人民群众的支援。人民群众不仅在兵源、物资等方面全力支援党和政府，而且担负着运输战争物资、转运伤员等方面的艰巨任务。刘志丹领导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界开展革命活动时，广大人民群众主动筹措粮食，缝制衣服，修理枪械，救治伤病员，大力支援红军。当时，部队打仗很频繁，红军不论走到哪个山村，群众就把指战员请到家里，做饭给红军吃。有些群众生活也给艰难，但他们把自己仅有的洋芋蛋、小米饭等全部拿出来，想法让红军战士吃饱。南梁地区流传的一首《信天游》这样唱到：一杆杆红旗崖畔上插，咱把游击队请回家；小米干饭洋芋菜，咱对红军的好招待。1933年9月20日，国民党军进攻薛家寨，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和警卫员武功在战斗中牺牲，群众十分难过，黑田峪祁振海家自愿献出两口棺材，杨玉财、冯夏等几名群众自愿将两人埋在了1号寨山坡上。薛家寨失陷后，敌人把二人的坟扒开了，棺木露在外面，杨玉财又和几个群众冒雪将坟墓重新修好。在陕甘边区的“扩红”工作中，华池县几乎所有的适龄青年都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

新正县当时只有 1 万多人口，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青年达到 1000 余人。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红二十六军发展为拥有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 5 个团的精壮部队，还建立了几十支地方游击队。由于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得以生存、发展、壮大。

①刘约三：《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及其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43 页。

②桂生芳：《红军游击队的军械修理所》，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宝、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06 页。

③杨正发：《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0 页。

④杨正发：《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0 页。

六、以革命英烈名字命名的基层组织

为了缅怀在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党和政府或在烈士故乡，或在烈士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或在烈士牺牲地，以这些英烈的名字命名了一些县区乡村，目前保留下来的只有志丹县和子长县。这里对一些命名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一）志丹县

志丹县地处陕西省北部延安市西北部，东接安塞，北邻靖边，西北与吴旗相连，西南和甘肃交界，南部与甘泉、鄜县毗邻。志丹县史称保安郡、保安州、保安县。1936 年 6 月，为纪念民族英雄刘志丹而命名为志丹县。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中央政府移驻志丹县城，志丹县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志丹县为革命出人、出物，支援前线，为全国解放和新中国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1903年生，陕西保安人。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党的命令，入黄埔军官学校。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1928年，与唐澍等一起组织渭华起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志丹与谢子长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及参谋长。后来，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历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1932年12月成立红二十六军，刘志丹仍负领导责任。1935年秋，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同年秋，陕甘苏区错误“肃反”中，刘志丹被关押。毛泽东、党中央到达陕北，刘志丹才得到释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遵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1936年4月，刘志丹率部东征，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3岁。后来，毛泽东为

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为了纪念刘志丹烈士，1936年6月，中共中央将他的故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二）重远县和子长县

为了纪念为革命献身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参谋长、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杨重远烈士，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建立重远县。

杨重远，1894年生，原名杨敬熙，号弘毅。陕西绥德人。1925年，参加共产党员李子洲等创办的平民夜校学习，苦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同年冬，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当兵，曾任连司务长、文书和连长。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率部参加清涧起义。1928年，奉命打入国民党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作兵运工作，担任该军中共军委书记。以该军师部副官长、军部军需职业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中共党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成为后来平定起义、组建红二十四军的基础。1930年冬，参与筹建红军晋西游击队，任中共山西省委汾阳联络站主任兼临时党支部书记。1931年夏，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成立，任中共山西省委军委代表兼游击队党支部书记，参与指挥游击队转战山西吕梁山区。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任支队政委。同年10月率陕北游击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任参谋长。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

甘游击队，任中共游击队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参谋长。协助谢子长、刘志丹指挥作战，曾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5支游击队，为开创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12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参谋处处长。1933年5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指挥部队取得董家寺等战斗胜利。5月29日，在安定县谭家砭遭国民党军袭击，壮烈牺牲。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在新解放的安定县南区和安塞县北部地区建立重远县（未公开）。正在筹备中，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谢子长不幸逝世，为了纪念谢子长，1935年5月，西北工委决定改重远县为子长县。1936年6月在安塞县白庙岔（今属坪桥乡）召开了子长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刘汉鼎为子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曹九德、高升为副主席。①

谢子长，1897年生，陕西安定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根据党的指示，回安定县继续办民团，利用团总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旅一个团任连长，并在该团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特别支部。1927年2月被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

1927年10月，谢子长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三大队大队长。起义失败后，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1930年8月任中

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1929年至1931年，先后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做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1933年夏被派往察绥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负责中共组织的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同年11月回到陕西，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

1934年7月，谢子长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奇袭安定县城，占领县政府，救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使红军军威大振，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8月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及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开展陕北、陕甘边苏区反“围剿”斗争，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在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胸部中弹，身负重伤。1935年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

为了纪念谢子长，1935年5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重远县改称子长县。1937年10月，复称安定县。1942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将安定县命名为子长县。

（三）安民区

为纪念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王安民，关中分区将陕西淳耀县四区（高山槐）命名为安民区。

王安民，1913年生，又名安太，陕西富平人。1927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参加红军游击队。同年秋，王安民受党组织指派，赴西安国民党唐子丰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任副排长。1932年，在旬邑杨虎城部一营作兵运工作。期间，他经常给红军通风报信，使红军对敌情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和掌握。1933年初，武字区委根据陕西省委决定，派王安民、黄罗斌、赵宝森等到心字区开展工作，王安民任心字区委宣传委员，赵宝森任组织委员，黄罗斌负责团的工作和建立武装。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工作，很快恢复了心字区党的组织，并发动群众组织建立了一支游击队。在群众积极配合下，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使心字区的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1933年4月，心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二补充支队，王安民任渭北游击队中队长。6月，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省委书记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致使红二团官兵在蓝田遭敌袭击，造成很大损失。随红二团南下的王安民，和同志们一起英勇杀敌，奋战在秦岭山中，历经千难万险，于10月4日终于返回照金苏区。之后，王安民任红四团二连政治指导员，继续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2月，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张明吾任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不久，张明吾牺牲，由王安民继任总指挥。在王安民和张仲良带领下，三路游击队从实际出发，紧紧依靠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先后消灭了正宁县王朗坡民团、柴场子民团及淳化民团一部，使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迅速打开了局面。三路游击队从组建起，王安民就非常重视示范作用。行军作战时，他很

少骑马，身先士卒，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战斗中总是锋在前，退却在后，赢得了战士们的衷心爱戴。1933年冬，王安民率领游击队在耀县白家山一带活动时，由于叛徒出卖，王安民被柳林村民团抓捕。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铁骨铮铮的王安民始终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个字。穷凶极恶的敌人看到不可能从其口中得到什么，便将王安民拖到一棵树下，架起干柴，用火活活地烧死，时年仅20岁。王安民牺牲后，张仲良主持为其召开追悼会。1942年8月，为了缅怀革命先烈，褒扬和继承烈士业绩，关中分区特将淳耀县四区（高山槐）命名为安民区。将王安民生活战斗过的白家山玉坪坡村，命名为安民村。

（四）子良区

为纪念赤安县第七区（沟梢渠区）苏维埃政府区长董子良，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将沟梢渠区命名为子良区。

董子良，1906年生，甘肃庆阳人。9岁上小学，中学毕业后，一心报效国家的董子良被家人送到国民党马鸿逵部从军，不久被任命为中队长。但国民党内部相互勾心斗角、残害百姓的现实让他更加痛苦，毅然决定弃暗投明。1933年12月，董子良单身到南梁投奔刘志丹，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在刘志丹领导下，董子良学到许多革命道理。1934年，经张策介绍，董子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党组织指派他以教书先生为名，打入旦八寨国民党民团内部，开展地下工作，不久被人告密，在组织帮助下，董子良及时从寨子上撤离脱险。离开旦八寨后，董子良协助张策开展群众工作，他不畏艰险，不分昼夜，走村串户，先后

在沟梢渠、朱家沟、徐家湾一带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党员，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1935年1月，在沟梢渠成立了赤安县第七区苏维埃政府，董子良任区政府主席。1935年3月8日，董子良随赤安县苏维埃政府秘书张策等人在柳沟、高家沟口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召开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不料他们的这次行动被旦八寨民团团总曹俊章得知，曹俊章派出30多名团丁，连夜赶往高家沟口，为了保护张策、王荣贵、张怀富等人，董子良只带两名随从，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与其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从而保护张策等安全转移，但因敌众我寡，董子良身负重伤被敌逮捕，1935年3月10日，董子良在旦八寨子西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9岁。为了纪念董子良烈士，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将董子良领导的沟梢渠区更名为子良区。

（五）满朝区

满朝区即今志丹县纸坊乡纸坊行政村高老庄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赤安县高老庄区，后为纪念革命烈士贺满朝改为满朝区。

贺满朝，1897年生，小名年成，陕西吴旗人。1928年7月，贺满朝在刘志丹和永宁山党支部的领导下，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为党工作，组织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斗争，秘密发展农会会员。到1931年春季，农会会员发展到40余人。1933年，贺满朝担任新庄农协会主席，组织农会会员与地主、土豪劣绅进行不懈斗争。

1934 年秋，任兴庄成立农民协会，贺满朝担任农协副主席。同年冬，担任赤安二区区长。他积极发动群众，配合当地游击队反击清乡团的破坏活动。1935 年 2 月，贺满朝带领群众武装与游击队包围了蔡丰清乡团驻地蔡贬，当场抓住 9 名清乡团人员，缴枪 8 支。不久，又配合赤安游击队处决了张廷芝叔父张杰儒，为穷苦百姓除了害。3 月初，贺满朝带领游击队在三道川赶走反动地主民团蔺士升，分了蔺家的钱和粮。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按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贺满朝发动群众筹粮捐物，组织运粮队转运粮食，解决了中央红军的吃粮问题。1935 年 11 月，贺满朝担任了赤安县政府秘书。12 月初，赤安县的几个区发生反革命叛乱，在带领政府机关干部转移过程中，遭敌袭击，壮烈牺牲，时年 40 岁。

1936 年 5 月，赤安县的党、政、军组织基本恢复。赤安县召开群众大会，深切悼念赤安事变中牺牲的同志。刘景范亲自主持召开了追悼会。为了纪念贺满朝，赤安县委把烈士生前所在的赤安二区（高老庄区）命名为满朝区，这一名称先后存在十二年，后因行政区划变更被取消。1987 年 3 月，吴旗县委为贺满朝烈士树立纪念碑，原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张策题字：“贺满朝烈士之墓”，原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题词：“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生”。

（六）怀兴区

为纪念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的新宁县县委书记焦怀兴，上级党组织命名焦怀兴的家乡新正县三嘉区为怀兴区。

焦怀兴，1905年生，祖籍陕西旬邑，后迁至甘肃省正宁县三嘉乡南庄村。焦怀兴自幼聪颖好学，品学兼优。1932年初，谢子长、刘志丹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三嘉塬开展农民革命运动，提高了焦怀兴的政治觉悟，次年，陕西省委派杜宛、李尚勤、杜林治来五顷塬开展革命活动，焦怀兴被选拔为积极分子，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他在西坡、湫头一带利用走亲访友之机，秘密串连，开展群众工作，很快打开局面。1934年，焦怀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六七月间，红二十六军在高凤坡战斗失利，有10多名三嘉籍的红军战士被敌冲散后，返回本地。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新正县第五支队，张占英任队长，焦怀兴任指导员。10月间，张占英、焦怀兴率新正五支队配合平子、底庙游击队击溃了进犯湫头的国民党军1个骑兵连。之后的一天晚上，焦怀兴率五支队利用黑夜摸入车家沟国民党民团据点，捕获国民党自卫队2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

1935年10月，焦怀兴受关中特委派遣，到宁县先后发展王秉祥等40多名青年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而建立西坡、贾邑川、月明、九龙川、九岷、平道川、金村等7个乡党支部和苏维埃政府，并在马家洼成立中共新宁县第一区党委和区苏维埃政府。11月，焦怀兴任中共新宁县委书记。12月，焦怀兴又派李社成、雷伟等到盘克地区指导工作，成立了荏掌、川庄子两个党支部和苏维埃政府。同时在金村成立了中共新宁县第二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1936年1月，国民党东北军11个师分3路“围剿”关中苏区，不到半月，除平道川1

个乡外，其余区域全部失陷。为了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焦怀兴领导组建新宁独立营，杨兴才任营长，焦怀兴兼任政委。不久，国民党军进犯正宁县乐兴村，焦怀兴率新宁独立营配合新正独立营攻敌城防，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 31 岁。之后，上级党组织命名他的家乡新正县三嘉区为怀兴区，以示缅怀。②

（七）善秀区

善秀区即今甘肃正宁县湫头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新正县湫头区，后为纪念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秦善秀烈士改为善秀区。

秦善秀，1909 年生，甘肃正宁人，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宁县早期党员之一。1934 年底的一个集日，旬邑县民团团总万盈山等人到底庙镇，下令戒严，对赶集群众搜身检查，把无辜群众以“共党嫌疑”犯当场杀害。同时，派出大批团丁下乡催粮要款，拘捕杀害无力交售粮款的贫苦群众，广大群众恨之入骨。秦善秀与正宁八支队配合，决心除掉这股敌人。一天，得知万盈山手下几个团丁来产场村催粮，秦善秀当机立断，带领游击队抓住这几个团丁，并派游击队员装扮成抗粮不交的老百姓，进入底庙城，收缴了哨兵的枪，冲进城内活捉了万盈山，缴获了武器，释放了被抓来的壮丁和抗粮抗款的群众。事后处决了万盈山和几个罪大恶极的劣绅。1935 年 7 月，秦善秀任关中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土地改革期间，秦善秀主动将大部分财产拿出来资助革命，并把一部分土地分给穷人。1936 年初，秦善秀被任命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张邦英为副主席。不久，国民党东北军“围剿”关中地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关中特委和

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奉命向北转移，秦善秀留下继续坚持斗争。2月，任中共新宁县委书记。当时，新宁县环境异常险恶，秦善秀立场坚定，斗争顽强，战胜了许多困难。5月的一天，秦善秀在九岷康家塬召开秘密会议。次日清晨，不幸被国民党宁县保安队包围。秦善秀沉着勇敢，凭着一支手枪，顽强抵抗，毙敌数名，最后弹尽无援，壮烈牺牲，时年仅27岁。秦善秀牺牲后，上级组织命名他的家乡——新正县一区（湫头区）为善秀区，以示纪念。③

（八）明堂区

为纪念宁县第二十支队队长王明堂，新宁县政府特命名三区（今湘乐镇）为明堂区。

王明堂，1902年生，甘肃宁县人。少年时给人放羊、做工。1931年贩卖瓷器，于华池怀安结识刘志丹，并参加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党在宁县组建第二十支队，王明堂任队长。曾参加过攻打麻子掌堡子、武进忠堡子、小石崖罗连城堡子及莲花池等几次战斗。1935年底，东北军“进剿”苏区，环境险恶，支队暂时停止活动。王明堂带领队员化装成赶场农民，去陕西务工，返回时沿途袭击了几个联保处，缴获许多枪支。1936年5月，王明堂带领二十支队攻打宁县盘克武洛堡国民党地方民团时身负重伤，于同月15日辞世，时年34岁。为纪念王明堂烈士，新宁县政府特命名第三区（湘乐）为明堂区，以志纪念。④

（九）占义区

为纪念宁县第二十支队指导员王占义，新宁县政府命名一区（今九岷乡）为占义区。

王占义，1915年生，甘肃宁县人，少年时入私塾读书两年，青年时随父学过箍箩手艺。1934年秋，同刘永培、杨兴才等组织发动半坡暴动，后投奔红军，被编入宁县三支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9月，同村一恶霸为霸占财产，扬言要向国民党告发王占义参加革命等情况，王占义带领游击队处死其父兄。同年新宁县政府成立，调任县警卫队队长。1936年初为反击国民党东北军的“清剿”，王占义调任宁县第二十支队指导员。1936年5月，在九岷康家原与国民党别动队遭遇，战斗中腹部受重伤。战士用临时做成的简易担架抬其撤退时，为了使其他战士迅速撤离战场，他几次下令“不要管我！”并从担架上滚下。后国民党军追来，支队撤退，王占义躲到路旁梢林中隐蔽。因流血过多，加上当晚一场暴风雨而壮烈牺牲，时年仅21岁。为纪念烈士，新宁县政府命名一区（九岷区）为占义区。王占义牺牲后，国民党民团成员王占彪施行阶级报复，带领民团包围王家，斧杀王占义父兄二人。1939年冬，新宁县游击队除掉了作恶多端的王占彪，为烈士一家报了仇。⑤

（十）占虎区

为纪念淳耀县第七支队队长张占虎烈士，关中分区命名淳耀县第五区（虎家河区）为占虎区。

张占虎，1911年生，陕西耀县人。幼年家贫，随父在家劳动。1931年，因连年干旱，地主逼租，生活更加困难，毅然北上照金参

加革命队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按党的指示回到家乡发动农民，组建耀西游击队，出奇制胜，打击敌人。1933年3月，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将这支地方武装改编为淳耀县第七支队，任连俊任队长，李文喜任指导员。1934年春，赵景春任指导员，8月，张占虎任队长。在对敌作战中，他总是鼓励大家说：“同志们，勇猛地拼，狠狠地打，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伟大的！”

1936年10月，淳耀县第八支队队长任树林在让义村被国民党军拘捕。张占虎闻讯后，立即率队向让义村守敌发起猛攻，不幸腹部中弹，鲜血喷涌。他用带子紧裹伤口，依然沉着指挥作战。一战士腿部负伤，不能行走，他背起战友，忍着剧痛，与国民党军继续周旋。经过一夜激烈战斗，张占虎终因力竭血尽，肠子从伤口流出，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纪念张占虎烈士，1942年12月，关中分区命名淳耀县虎家河区为占虎区。

（十一）葆华区

为纪念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刘葆华烈士，中共红宜县委命名刘葆华牺牲的宜川县康平区为葆华区。

刘葆华，1917年生，陕西宜川人。幼年家贫。1934年在宜川第四高级小学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高小毕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上学，他以卖笔墨纸张养家，并借以掩护为党做秘密工作。1935年春由于叛徒告密，刘葆华的哥哥刘盛祥被集义镇民团杀害，他被迫逃往山西河津县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遭国民党军追捕，又返回宜川，在牛家佃参加了赤川红军游击队，担

任副班长。在和宜川民团作战的高树梁战斗中，他带领 3 名战士向敌人冲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一次他主动请求担负到鹿川的侦察任务。他化装成店员，查明白水川、鹿川一带的敌情。并带回一名要求参军的少年，为红军开辟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 年 9 月，中共赤川县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秋，刘葆华改任县委宣传员兼共青团干部，教战士识字、唱歌、讲故事，讲闹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不久，调任共青团赤川县委担任宣传部长。1935 年 11 月，赤川县改称宜川县，中共赤川县委改称中共宜川县委。1936 年初，刘葆华任宜川县共青团县委书记。在带领工作组下乡检查工作时，于高柏乡郭下村，遭地方民团袭击，身负重伤牺牲。1936 年底，宜川县和红泉县合并为红宜县，中共宜川县委员会改称中共红宜县委员会。为了纪念刘葆华，红宜县委把他牺牲的康平区命名为葆华区。

（十二）光明乡

为纪念在宁县盘克武洛一带作战时壮烈牺牲的李光明烈士，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将英雄牺牲所在地荏掌乡（今盘克镇荏掌村）改名为光明乡。

李光明，1911 年生，原名李建堂，陕西延川人。自幼聪慧。1927 年在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加入共青团，任学生会会长。1928 年春参与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学潮被校长开除，不久复学。同年秋考入延安省立四中。1929 年，陕北大饥荒，李光明因家贫继续留在本县第一高级小学学习并任团支部书记。7 月上旬，他发动学生闹学潮，配合普丰川、青平川农民抗粮抗捐斗争，被拘留并开除学籍。秋，第一高级小

学校长易人，再次入校领导青年学生开展秘密斗争。1930年春，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2月，延川县委派他入西北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学习。1932年初结业后，陕西省委派他赴彬县任游击队队长。李光明率领游击队活动于西兰和咸榆公路沿线，与陕甘游击队配合，伺机打击敌人。是年夏，李光明率领游击队在彬县、乾县交界地段公路两旁埋伏，袭击了一过往车辆，从乘客中查出离任回乡的国民党县长、团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等人，缴获长枪和手枪各一支，没收其携带银元、纸币和所有布匹等日用品。是年深秋，李光明根据中共彬县县委指示，化装进西安城，把所购买的弹药、医药等物资秘密转运出西安。离开西安时，不料碰上曾被她拦截过的汽车驾驶员，瞬间，10余名军警冲进饭馆。李光明冲出饭馆，穿大街、钻小巷、进民宅、翻院墙与敌周旋。后迫于无奈，拔枪抗击敌人，轰动了整个西安。一时，全城戒严，人们大喊“红军进城了！”搞得敌人惶恐万状。从下午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在一位买菜大嫂掩护下摆脱国民党军追捕。李光明从西安脱险后，辗转来到照金革命根据地，刘志丹曾说：“这个李光明胆子真大，一个人敢闯西安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经王世泰举荐，李光明被任命为红二团骑兵连长。⑥1933年4月27日，李光明率领骑兵连在甘肃宁县武洛一带作战时不幸光荣牺牲。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纪念李光明，将英雄牺牲所在地荏掌乡改名为光明乡。

（十三）明吾乡

为纪念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总指挥张明吾，1935年11月，中共赤水县委将其家乡淳化县卜家乡改为明吾乡。

张明吾，1903年生，又名齐儿，陕西淳化人。幼年家贫，长大后在蒋家山村当长工。1932年冬，刘志丹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淳化、耀县照金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时，张明吾参加了红军。他在多次战斗中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18日，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奇袭甘肃省合水县城，张明吾率领攻城突击队第三组战士生擒了驻守在碉堡中的一个班的国民党军，救出在押的党员、干部群众80多名，受到刘志丹等领导人的表彰。同年11月，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三路游击队，划分三路游击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此后，张明吾出任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主要活动在旬邑、淳化、耀县及陇东的正宁、宁县地区，先后消灭国民党正宁县王朗坡民团武装和淳化县铁王等地的民团势力，给地主、豪绅以沉重打击，开辟扩大了红军游击区。他还带领第三路游击队帮助恢复了淳化游击队，后改编为陕甘边游击队第十一支队。1934年3月，因长期积劳成疾，他奉命回家治病，途中遇害。1935年11月，中共赤水县委追认张明吾为革命烈士，并将其生活战斗的淳化县卜家乡命名为明吾乡，以纪念这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⑦

（十四）冬至乡

为了纪念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周冬至烈士，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将其生前战斗过的照金老爷岭命名为冬至乡。

周冬至，1906年生，陕西富平人。1932年秋，李妙斋在照金地区的芋园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建了芋园游击队。受革命思想影响，周冬至积极参加了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南下照金、香山一带后，李妙斋令周冬至担任筑路总指挥。周冬至带领当地群众，修筑了通往薛家寨的盘山道路，并在险要的地方设立哨所，还利用石窟天然条件建成仓库、医院、修械所、营房等，并修筑了鸡儿架栈道，使薛家寨成了红军之家。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金理科任书记，周冬至任特委委员。4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宣告成立。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当选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革委会成立后，周冬至等领导当地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扩大苏区，狠抓地方各级组织的政权建设，带领群众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明令戒烟、戒赌，号召妇女破除缠足的封建陋习，使根据地得到了更大发展和巩固。9月20日，陈克敏、夏老么、陈日春、杨老么等民团和土匪武装千余人，乘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之机，联合偷袭薛家寨和党家山。周冬至带领部分部队坚守党家山东北的鸡儿架，居高临下，掷石块和麻辫手榴弹等，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包家寨会议后，周冬至带领游击队先后在耀县、同官（铜川）、宜君、旬邑、淳化、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了不少胜仗。1934年11月，周冬至被叛徒杀害于旬邑县郭家川甘草坪村一孔窑洞之中，时年仅28岁。为了纪念周冬至烈士，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将他生前战斗过的照金老爷岭命名为冬至乡。

（十五）云仙乡

为纪念与国民党反动民团作战中英勇牺牲的贺云仙烈士，志丹县苏维埃政府将他的出生地白银河乡改名为云仙乡。

贺云仙，字光荣，1913年生，陕西保安人。1926年秋，于金丁小学毕业后回家务农。1933年12月，参加本县小蒜川赤卫队，任队长，配合游击队与国民党民团作斗争。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春，高老庄区委、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任区委书记。9月，调任中共赤安县（今志丹县）委，任执行委员。中共赤安县工委成立后，任县委组织巡视员。不久，奉命带工作队回高老庄区开展工作。12月7日，西靖边县保卫大队两个中队长叛变，勾结反动土豪破坏苏区政权，屠杀干部和红军伤病员，他只身赶到赤安县独立营报告敌情。根据指示，组织游击队同叛徒、反动土豪进行斗争。12月下旬，到小蒜川一带侦察敌情，发动群众期间，与叛徒带领的反动民团遭遇，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在关押期间，痛斥叛徒罪行，最后被敌人用菜刀砍死，壮烈牺牲，时年22岁。1936年7月，志丹县苏维埃政府将贺云仙烈士出生地白银河乡改名为云仙乡，以作纪念。

（十六）兴明镇

为纪念在保安县芦草沟战斗中牺牲的安塞五支队指导员郝兴明，党和人民政府将进士窑村（今志丹县新风村）改为兴明镇。

郝兴明，又名史法直，1908年生，陕西安定人。早在瓦窑堡第二高小读书期间，郝兴明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参加了党组织。

1930年初，响应党的号召，入甘肃军阀苏雨生部八旅十五团学兵队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底，从学兵队毕业，进入陈珪璋部教导

团开展兵运工作，不久，刘耀西等在教导团秘密组建了中共党支部，刘耀西任支部书记，傅宝珊、贺晋年、康明礼、郝兴明任支部委员，统一领导兵运工作。

1932年2月，郝兴明辗转来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随军南征北战，到处打击敌人。曾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指导员。1932年10月初，郝兴明从陕甘游击队回到安定老家准备结婚，并带回来一支手枪。10月下旬，接受高朗亭动员，携枪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2月，郝兴明与从陕甘游击队回到家乡的强世清等人击毙国民党安定县长刘淑明，轰动全省。1933年12月，辗转来到安边杨虎城部骑兵旅张庭芝团当兵，继续开展兵运工作。

1934年夏，郝兴明按照马文瑞指示，举行兵变，拉出一个排20多人，并带领队伍进入南梁根据地，保存下13支枪。1934年6月，第二路游击队安塞五支队成立，任命郝兴明为指导员，胡兆阳任队长。安塞五支队在郝兴明领导下，转战在安塞、保安、甘泉、鄜县、延安数县范围内，打击地主土豪，扩大游击队，保卫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1935年1月，在安塞五支队攻打保安县芦草沟崖窑时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纪念郝兴明烈士，1935年4月，党和人民政府将进士窑村改为兴明镇。

（十七）占奎乡

为纪念刘占奎烈士，赤安县政府将芋子湾（今志丹县金丁镇金汤村）改名为占奎乡。

刘占奎，1898年生，陕西保安人。1929年春，中共永宁山支部决定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抗粮抗税斗争，刘占奎到旦八、义正一带农村张贴标语，串联穷苦农民参加革命斗争。4月间，他和曹士荣等人在旦八附近组织二三百人直奔永宁山，连同永宁一带共千余名群众拥进保安县政府，迫使县长当场答应减免粮款，开仓放粮，刘占奎在革命斗争中初露锋芒，引起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土豪劣绅的关注。后来，吴旗镇地方民团队长高应为了积极开展反革命活动，便多次拉拢刘占奎入伙，遭到痛斥。1935年4月，高应与金佛坪民团张廷芝合谋，将刘占奎杀害，时年37岁。为纪念刘占奎烈士，1935年9月下旬，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将芋子湾改名为占奎乡。

（十八）伯良乡

为纪念保安游击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刘伯良烈士，志丹县委、县政府在金鼎区特设伯良乡。

刘伯良，1908年生，陕西保安人。早年和哥哥刘伯万给冯债主家打长工，懂得了许多道理。1934年2月参加保安游击队。1934年5月，金鼎山寨子副团头王启斌带小股团丁窜到金汤、马营一带骚扰抢劫。保安游击队得到情报，立即派黄克强带领游击小分队前往消灭这股敌人，但驻扎在土河子的张廷芝部前来增援，战局一下子发生转变，危急时刻，刚参加游击队不久的刘伯良奋不顾身，避开敌人的枪林弹雨，挥动手中一根铁头长矛冲入敌群，一人掩护大家安全撤退，还缴获了一支长枪，活捉了一个敌兵。此后，在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中，刘伯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 年初，刘伯良担任保安游击队第一中队中队长。1935 年 7 月，张明科率保安游击队在吴旗洛河以西三道川遭蔺士升部的伏击，敌强我弱，游击队组织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在这危难关头，刘伯良毫不犹豫地向队长张明科请求带一中队 20 多名战士掩护大部队突围。刘伯良指挥一中队全体战士迅速攻上一个山头，占领了制高点，猛烈地向敌人反击，紧紧地吸引住敌人的火力，掩护大部队顺利冲出敌人的包围。游击队突围成功后，刘伯良又命令一班长留在自己身边，让副队长带领一中队全体战士再次突围。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刘伯良和一班长与敌人展开了拼死肉搏，为其余 20 多名战士赢得了时间，安全突围。但是刘伯良和一班长身中数弹，身体多处被敌人用刺刀戳穿，壮烈牺牲。

1936 年 6 月，中共志丹县委、县政府对全县党政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开始撤区并乡工作，全县设 7 个区，由原吴堡区、高嘴子区一部分组成金鼎区，该区共辖 7 个乡，为纪念刘伯良烈士，特设伯良乡。

⑧

（十九）荣贵乡

为纪念赤安县游击队第四支队政委王荣贵烈士，志丹县委、县政府在金鼎区特设荣贵乡。

王荣贵，1911 年生，陕西保安人。青年时，被金佛坪张廷芝民团强拉去当团丁。1933 年，王荣贵得知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在陕甘边地区活动，便乘晚上站岗的机会，携枪投奔红军。金佛坪民团派兵丁四处搜捕，他们抓不到王荣贵，就把王荣贵的父亲抓去枪杀。

1934年11月赤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王荣贵担任保卫队长。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3月8日，县苏维埃政府在永宁区柳沟村召开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国民党驻保安高玉亭营派兵袭击，王荣贵带保卫队沉着应战，打退敌人。5月，保安县民团30余人窜到永宁区象嘴村，偷袭赤安县政府机关，王荣贵带保卫队坚守咽喉要地，在区赤卫队的配合下，痛击来犯之敌，再次保卫了政府机关，受到县政府表彰奖励。

1936年2月，王荣贵担任赤安县游击队第4支队政委，率游击队配合红二十九军第三团围攻旦八寨子。4月10日下午，曹俊章派1个排团丁下山抢水，王荣贵带领游击队打死敌排长赵德贵，缴枪2支，打伤数名。寨中缺水，军心动摇，曹俊章便设下一个“和谈”圈套，想给寨子上搞水。6月10日，他向红军提出和谈，并提名要王荣贵参加。王荣贵知曹俊章不怀好心，但为了革命利益，毅然随同中央红军代表上寨子谈判。曹俊章一面假意应酬，一面密谋对王荣贵下毒手。当日谈判无结果，曹俊章送中央红军代表下山时说：“王荣贵是我的外孙子，留下我们单独谈。”中央红军代表不知曹俊章有诈，便同意王荣贵留下。当晚，王荣贵被曹俊章剥光衣服，活活打死，时年仅25岁。

1936年6月，中共志丹县委、县政府对全县党政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开始撤区并乡工作，全县设7个区，由原吴堡区、高嘴子区一部分组成金鼎区，该区共辖7个乡，为纪念王荣贵烈士，设有荣贵乡。

⑨

（二十）新财乡

为纪念和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的淳化县马家山村赤卫队队长任新财，赤水县政府将马家山乡改名为新财乡。

任新财，1906年生，陕西淳化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马家山村赤卫队队长。1934年，带领赤卫队配合游击队在马家山村一带同国民党军激战，打败了敌人。1935年2月，带领赤卫队缴获国民党淳化县保甲团马家山联保处碉堡的全部枪支、弹药。1936年8月，任新财和赤水县委肃反委员会主任马保全在马家山村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中壮烈牺牲。为纪念任新财烈士，赤水县政府将马家山乡改名为新财乡。^⑩

（二十一）瑞山村

为纪念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牺牲的宁县第一支队队长崔瑞山，新宁县委命名二区三乡梁掌为瑞山村，以作纪念。

崔瑞山，1911年生，甘肃宁县人，贫农出身，父亲靠佃种土地为生。1935年，国民党马鸿宾部“围剿”宁县、正宁红军游击队，崔瑞山被马部拉去当兵，他不愿残害百姓，遂乘机逃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宁县地方武装。经过革命斗争考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宁县十八支队组建后，崔瑞山被任命为十八支队指导员。1936年春，国民党军队向陕甘苏区发动进攻，新宁县大片土地被国民党军占领，地方骨干武装转移陕北，县委、县政府化整为零，隐蔽山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4月，新宁县军事部长王得宽叛变，胁迫宁县十八支队、二十一支队、正宁十七支队部分战士投靠正宁保安队，面对

叛徒威逼利诱，崔瑞山毫不动摇，毅然脱离被叛徒控制的十八支队，向新宁县委报告了情况，被分配到宁县一支队工作。为了打通关中与陕北的联络线，宁县一支队配合陕北南路军，消除国民党军设在新宁县的据点。6月，一支队与南路军在九岷桥子与国民党宁县保安中队庞明胜部作战失利，队长王得胜牺牲，继任队长胡全胜负伤离队，崔瑞山接任队长职务。在攻打合水县店子塬土豪于连喜的寨子时，中敌埋伏，他沉着指挥，英勇作战，撤退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为纪念崔瑞山烈士，新宁县委命名二区三乡梁掌为瑞山村，以作纪念。

⑪

①安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塞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②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217页。

③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6页。

④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⑤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⑥王世泰：《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

⑦淳化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年版，第262页。

⑧中共志丹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志丹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内部资料，1985年12月。

⑨中共志丹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志丹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内部资料，1985年12月。

⑩淳化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年版，第264页。

⑪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272页。

七、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历史经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政权建设有着鲜明的特点，认真总结其历史经验，有着重要作用。

一是突出民主执政，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政权，这就保证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参政、议政、监督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等民主权利，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受教育的权利。苏维埃政权保证彻底实行妇女解放，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边区、县、区、乡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都是由广大群众自己选举出来的。另一方面，广大选民对自己选出的代表又有充分的监督权，对那些犯有重大错误或严重失职不合民意的代表，选民有撤换之权，或由代表会议通过后罢免，较好地体现了监督工作的民主性。各级工农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由坚决的、有阶级觉悟的、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工人雇农贫农，及其他最革命的分子组成。各级工农检察机关通过悬挂控告箱、发动群众举报、建立突击队微服私访等形式开展检查监督，从而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充分贯彻，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体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民主执政的历史证明，民主制度的推行是政权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

二是加强法制建设，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尽管当时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之中，刚刚诞生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特别注意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各级政权建设，为基层政权的运作提供法律制度

保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参照中央苏区的有关法规文件，先后颁布和实施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有关土地、财政、军事、统战、肃反、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法令和制度，这些法令和制度，尽管有许多也不尽完善，但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保证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保障苏维埃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于保证和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不仅重视立法，而且重视法律法令的贯彻执行，从而有力地保障了苏维埃法规的实施。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施政纲领和制定的各项条例、法规和法令的贯彻和落实，推动了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发展，促使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的法律观念和遵法、守法意识的进一步提高，对打破陕甘边区长期以来存在的封建陋习和落后思想，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素质，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为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培养了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是重视群众工作，切切实实为群众谋利益。根据地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个政权是为着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服务的。如果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就会失去群众，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根据地政权必须为民办事，切实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进行各项决策，制定各项措施。如苏维埃政府对土地革命的开展、集市贸易的恢复、发展生产和减轻群众负担等措施的

实施，无不体现了群众利益的需要。同时，苏维埃政府各级工作人员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正是因为苏维埃政府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吸收各阶层群众代表参加政权建设和对各项事务的管理，并在政权中担任相关职务，保证了红色政权的永不变色，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促使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四是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政府机构精干运行。政府机构是否精干，是政权建设的一个大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执政成本和社会负担。如果执政成本过高和社会负担过重，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甚至政权的稳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工作部门全部集中在寨子湾几孔破旧的窑洞之内，政府工作人员包括政府主席习仲勋在内也只有数人。同时，边区政府对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数量也作出了严格限制，经费困难时还必须减少。鉴于当时交通和通讯手段落后的实际情况，县、区、乡级行政区域都适当划小，确保了政府工作机构精干，便于加强管理。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还注意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加强工作的检查监督，经常开展革命竞赛，树立争当第一、争创一流工作的良好风尚。这样，就使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具有较高的办事效率，各项工作任务都能迅速完成。

在陕甘大地上诞生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新中国地方政权的雏形之一。陕甘边区政权建设实践，不仅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准备了条件，而且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权建设工作干部，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六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建设

一、苏维埃的土地革命

（一）制定土地政策

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1931年中共中央提出的《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权限。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①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土地法草案，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就实行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政策。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要求分配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及反革命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分得一份劳动土地。土地应该（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考虑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虑（及）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愿意和帮助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与租税应立即废除。”^②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动根据地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分配地主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边区政府参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的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这些政策、法令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它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雇农或缺少土地、耕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

第二，川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山地根据需求和耕种能力按户划块。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以满足贫穷农民的迫切要求，调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第三，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住在苏区的红军战士，都应分配给土地。白军士兵暂不分配给土地，应分部分暂留作公用。

第四，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土地，随着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土地的区域。中心区域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各地互相调剂余缺。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土地政策，具有个性鲜明的特点：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也非常适合陕甘边区的实际情况。（1）不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全部土地，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并且，参加劳动的地主家庭成员可以分地，这在其他革命根据地比较少见。（2）对川台地和山地分配做了规定，这与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的。

原因是“南梁地区由于土地集中，地多人少，地主又多住在庆阳城，林镇一带多是韩家的土地，元城一带多是田举人家的，都在庆阳，他们对前原的租子收得紧，后山有时顾不过来。因此，群众有比较宽余的土地，对土地的要求不太迫切。”③（3）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这也是其他根据地所没有的。由于当地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群众生产生活非常困难，对青苗的需要甚至比土地的需要更为迫切。（4）规定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不分土地，等到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时再分土地，这和原来红军打到那里，在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就分配土地的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和土地革命战争相适应的。从上述分析中看出，陕甘边区土地革命政策是在充分考虑了该地区农村自然地理环境、农村经济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中央的土地政策因地制宜制定出来的，体现了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二）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为了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土地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执行，边区政府和各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认真履行土地革命法令、政策，组织、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工作由土地委员会领导，最初担任土地委员长的是张步清，由于其家境比较富裕，对土地革命不热心，刘志丹建议由贫农出身的李生华担任土地委员长，苏区的土地分配才得以展开。南梁中心区域的土地分配工作是从 1934 年春开始的，先后在华池县及庆北县的柔远、温台、城壕 3 个区进行了分配土地工作。两县及其所辖区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组织和发动

贫雇农调查各村土地占有情况，宣传土地分配政策，丈量核实土地面积，组织和领导群众分配土地和财产。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土地分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在土地革命斗争中，首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掌握和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然后再定成分，进行分配。在分配时，首先照顾雇农和佃农，然后再按成分分配给其他缺地的农户。山地是采取拨块的分配方法，要多少就给分多少。对其他财产的分配，也是先照顾雇农佃农。给地主什么也没有分，组织他们进行“打生产”。给红军战士和家属优先分给一份土地，给白军中当兵的暂时不分地，但留有公地，待他们回来后再分给地。1935年春，由于农户增多，又采取抽多补少的办法进行二次分地。

在南梁中心苏区土地革命胜利开展的同时，1935年秋季，整个苏区分配土地工作全面展开，中心是解决土地的所有制问题。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洛河川举办了土地分配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干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土地分配过程中采取了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1935年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长李生华带领工作队来到赤安县，在永宁区的何家畔、碾庄村开始土地革命试点工作，赤安县政府主席袁万祥和县委书记张策等积极参加试点，工作队制定了赤安县土地分配政策的《八条原则》，经过一年多的土地革命斗争，全县先后将杏河川大地主李林芳，周河川大地主路登高，洛河川地主张鸿儒、袁成章、王启斌、孙向奎等200多户地主的庄园、田产和钱粮进行划分，摧毁了多处地主武装堡垒，为

广大百姓除了祸根，解除了广大穷苦百姓的疾苦。据王英回忆：“我们选择太平原的寺仙村作为分配土地的试点，首先建立分配土地委员会，经过月余调查，划分了阶级。然后根据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分配土地条例，没收地主的土地、财物和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按人口分给雇农、贫农和中农，先分原地，后分山沟地。分配土地始终由土地委员会领导，依靠贫雇农和农会。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斗争地主豪绅，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先一天研究好分那家地主土地，及其具体方法，第二天即可行动。由于土地丈量计算复杂，分完几个村庄即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先后把太平原、道德原少数村子的土地都分配完了。”④

1935年11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开始土地分配。新正县、新宁县土地分配的具体做法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先行试办，在新正县阳坡头南岭村试点，取得经验后，转到了一区三乡。随后又分成3个组，在三乡、八乡（回民乡）和宁县进行。分配的办法是，对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的余额土地征收。征收的标准是平地5亩以上，山坡地10亩以上，远僻山地20亩至30亩以上。在清查农户人口及田地总亩数、踏勘土地远近肥瘦、核定土地和人口应分亩数的基础上，通过讨论，明确农户分得田地的所有权。在不巩固地区，只是宣布政策，暂不土改。由于方法对头，土改运动进行得比较顺利。截至1935年底，陕甘边苏区方圆五六百里的农民，大多分得了土地，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陕甘边区分配土地工作历时两年之久。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规定了豪绅、地主兼商人，游

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宗教职业者，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分子，土地革命前去当白军团丁的分子及其家属，逃跑的群众、反革命分子等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领导广大群众正确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在划分阶级成分上，边区政府在曾经颁布的《土地分配办法》中提出过一个名为“半地主中农”的成分。后来，在会议讨论中，大家结合南梁地区地广人稀的特点和生活方式以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认为该类农户与地主有根本性区别，又与一般中农不同，因此，刘志丹、习仲勋同意了张文华的提议改为“富裕中农”。这样划分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界限，是陕甘边区的一大创举，对于当时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陕甘边区土地革命的特点

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激发了陕甘边区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热情，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有了增加，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改善。“原来这里牲畜很少，几乎没有羊。加之土匪常来抢掠牛羊，有钱的人都将牛羊赶走了，因缺乏牲畜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土改后分到了牛羊，畜牧业发展了，每村都有了马，有了羊群。当时每套牛可种川山地 100 亩左右，产粮二三十石。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南梁一带农户也多起来了。这一带地多人少，横山、靖边迁来的农民很多。如荔园堡原来只有 5 户，逐渐增加到 20 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⑤这些都说明根据地分配土地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是一项富民的政策。

陕甘边区土地革命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

在当时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内，由于长期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群众生产生活极为困难。以边区中心区域南梁为例，该地区多为外来户，“这些外来户在异乡安家，不得不接受奇重的高利贷盘剥，

‘驴打滚’、‘大加一’外带五分的高利贷，使这些移民，世世代代做牛马。因此，在土地革命中，农民关心废弃债务，甚于关心分配土地”

⑥。苏维埃政府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并将群众的要求体现在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一是废除一切债务（不含农民之间的债务）和高利贷；二是对红军粮食供应的问题，采取“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交‘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⑦的办法；三是采取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敌占区和边缘区暂不分土地，以打土豪，分浮财为主，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再扩大分配范围。四是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因为农民最需要的是苗，如果只分田，不分苗，就会影响农民的生产，降低农民的情绪。

在解决土地问题后，苏维埃政府还采取免除群众农业税、开展生产运动、奖励农耕等措施，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状况。一方面，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并从政府办的牧场中提供牛、羊、马匹给贫苦农民，帮助他们度过因缺少牲畜而造成的生产、生活困境；另一方面，对红军家属和孤寡残疾人实行救济，争取改造“二流子”⑧参加生产，

建立牧场，喂猪养牛。上述一系列政策充分证明，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一切为了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

二是打破了旧的封建秩序。在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习仲勋、张策发动群众在南梁金岔沟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联合会，接着又在白马庙川、玉皇庙川等地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并在这些地方成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军等组织，开展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粮食、财物、牛羊的斗争。在华池县的玉皇庙川、白马川、二将川、豹子川等地，到处都是烧毁契约债据、斗争地主、分配土地和财产的繁忙景象。接着，庆北县的柔远、温台、城壕等区也开始了分地斗争，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运动是一次真正意义的人民大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劳苦大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革命。它发动群众起来分配地主土地，取消苛捐杂税，打破了这一地区数千年以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得广大贫苦群众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

陕甘边区党和政府不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还对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秩序进行彻底颠覆，建立了新的革命秩序。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及其以后的苏维埃政府都专设土地委员会，各县区也设立了土地委员会，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同时，在乡村基层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雇农团、贫农团等，其成员是政府培养起来的新的乡村社会骨干。农村革命群众组织的壮大和发展，不仅对边区土地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旧的封建秩序进行彻底改造和

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哥老会、扇子会等封建组织得到改造，边区的匪患被肃清。

三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土地革命以前，陕甘边区的土地问题和社会分化十分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和富农手中。有的地主有地数千亩，有的甚至达数万亩。南梁一带 69.2%的土地是地主的，67.1%的农户是佃户，这里出租的土地 1.8 万余亩，每年收取租粮四五千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环县的各种摊派名目有 120 余种，官府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便征收“烟亩罚款”，不种者则征收“懒款”。在一些地区还要征缴剿赤捐，“只在王郎坡附近几个村子，每日除供给国民党的军队 300 人的饭以外，还要出洋 30 元”^⑨。作为社会生产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封建的自给和半自给的简单再生产状态，真正在土地上进行生产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加上军阀混战，兵匪成灾，社会生产遭受极度破坏。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始终将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作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的重要手段。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边区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都实行了土地分配。尽管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因各种条件限制存在着一些弱点，但土地革命运动的展开，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人民群众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在解决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摊派勒索，同时采取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的办法保障政府和军队的供给，极大的减轻了农民负担。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分到土地的农民没有负担，衷心拥护党的领导，生产积极性很高，很多其他地区农民也不断投奔过来。随着边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边区的人口数量获得了快速增加，到 1935 年春，根据地户数已由六七百户发展到 1000 户，人口约 6000 余人^⑩。

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地区的成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①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1 页。

②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6 页。

③《李生华 1983 年 7 月 4 日谈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4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6—347 页。

⑤《王生全 1959 年 4 月 21 日谈南梁一带的群众工作、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建设》，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6 页。

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讨论稿）》，内部资料，1982 年版，第 122 页。

⑦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8 页。

⑧“二流子”指那些游手好闲、骗钱害人、装神弄鬼、不务正业的人。

⑨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8 页。

⑩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内部资料，1992 年版，第 85 页。

二、苏维埃的农业生产

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陕甘边区地处陕甘边陲，受资本侵蚀颇迟，经济上比较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只有一些家庭小手工业、小作坊为主的小生产商品经济，其经济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解决苏区军民的吃、穿问题，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有更多的农副产品用于交换，解决苏区急需的紧缺物资；也只有首先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更好地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并为开展苏区的各项建设，改善群众生活，巩固工农联盟和红色政权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据张文华回忆：“当时在南梁根据地初步进行土地分配的基础上，边区政府还注意了苏区的生产发展问题。我们结合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如何组织农民搞好生产，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等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①

为了建立革命战争可靠的物质基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保证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生活的需要，而且为巩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其一是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党政军开支取之于地主豪绅和向敌人夺权，不足部分按市场价向农民购买，余即分配给贫苦农民，对农民免征粮食。其二是经营红军公田。在土地分配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孤寡残疾人，一部分用于过往的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其三是兴办机关农牧场、合作社，喂猪养牛，发展农副业生产。边区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适当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

解决了根据地耕牛不足的问题。耕牛主要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主要供作军用。“南梁政府当时组织了合作社，华池县各区都有，红三团还给捐款六七十元。合作社组织群众养蜂、养猪、养鸡。当时这些都订有计划、并向各区和干部作了传达”。②到了洛河川，又先后在下寺湾、石门子集股兴办了合作社。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否建立“牛犁站”的问题，“刘志丹等同志认为，南梁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建立‘牛犁站’对于群众生产和生活多有不便。所以，这种形式实际上无助于解决群众耕作方面的困难。另外，边区政府还就‘苏区的经济建设’和创办合作社等问题形成过专门的决议。”③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红军、游击队一律实行供给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干部到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筹措，统一安排。这样一来，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50 页。

②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6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50 页。

三、苏维埃的财政、商业贸易和金融

（一）苏维埃的财政

陕甘边区财政的中心任务是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解决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粮食和穿衣等问题。苏区初创时期，财政收入只能依靠主力红军筹款，即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筹款等方式。一是建立流动仓库，

分散储藏，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据蔡子伟回忆：“那时没有什么征粮任务。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做为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以备红军吃用，因此红军走在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的负担，军民关系犹如鱼水。”①二是打土豪、分浮财。打土豪筹款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获得财政支持、保障军需的一个主要财政来源。打土豪筹款主要有派款、征收、罚款、没收等方式。筹款对象主要是豪绅、地主。李生华回忆说：“为了解决活动经费，游击队有时也出去搞些浮财。把豪绅地主抓来押起来，让他们家属出钱来赎。当时老百姓说话算数，大家说这人名声较好，我们收钱后就把这人放了；大家说那人很坏，我们收钱后把那人也杀了，不杀老百姓不答应。”②高生荣回忆说：“除在苏区进行土地斗争外，赤卫队和游击队还深入白区拉土豪、赶牛羊。当时，在白区拉回的土豪四五十人，统交保卫队管押……保卫队管押的土豪，除少数没有什么劣迹，经群众讨论释放外（如元城子姓高的，樊川李家因乡行较好释放），对绝大多数土豪，在把他们的钱财、牛羊搞来后，都杀掉了。”③三是在分配土地时，“每个村还留五六亩公地，是最好的，给红军解决经费供给。”④但这在解决红军给养上不占主要地位。

（二）苏维埃的商业贸易

陕甘边区的社会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占绝对优势。当时，南梁地区地处偏僻的山区，农村经济十分萧条，没有商业贸易活动。参与南梁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张策后来回忆：“原来当地没有什么贸易，只有几个行商，拿几匹布在山沟换些羊皮，除此没有什么生意，老百姓

粮食卖不出去，没有什么家庭副业，自己打粮自己吃，完全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⑤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商业贸易工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农具、山货、布匹、粮食、吃食及其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一派生机。习仲勋、蔡子伟等政府机关领导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边区政府迁驻洛河川后，又在胡皮头村设立了集市，逢五为集，每月3次。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市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蓝布做的鞋，每双一块白洋。”^⑥

在工业生产方面，虽然照金时期红二十六军在薛家寨建立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后勤单位，但国民党占据中心城市，控制着大量的工业生产，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了根据地农副产品同白色区域工业品的交换，造成根据地日用工业品缺乏，农副产品滞销。因此，有计划地组织根据地对外贸易显得尤为重要。陕甘边区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以货换货，以物换物。

对白区来的商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通过各种办法、同白区比较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鼓励商贩来苏区做生意，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和羊畜廉价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他们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它物资

想办法运进来。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给苏区输进货物。为了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商贩们或者昼伏夜出，或者买通国民党的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白区与苏区的流通渠道。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也发展了。“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⑦苏区集市刚设立时，由于小商贩不了解苏区的商业政策，“开始白区商人来苏区者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就逐渐增多。他们来时，驮的盐、粮（细粮）、布匹等东西，回去时贩卖牛羊、烟土等。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脚户还是常到苏区来做生意。”^⑧

集市的建立不仅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而且政府和红军所需的必需品也是从集市贸易中换来。蔡子伟回忆说：“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了，这里群众交易很困难。我们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群众非常欢迎。集市立起来后，我们和外地商人搞交易，我们用羊只换回我们需要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⑨从这些回忆的材料来看，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是比较繁荣的。

（三）苏维埃的金融

货币资金的融通是陕甘边苏区区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苏区的农业和商业贸易息息相关，特别是在支援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业流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荔园堡集市建立初期人非常多，“可是，过了一些时间，却出现了低潮，有时候集市上来

的人不少，就是没有做生意的。”^⑩对此，刘志丹、习仲勋等高度重视，积极了解情况，研究对策。通过

深入开展社会调查，访问群众，他们终于摸清了底细：“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候我们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⑪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认真分析根据地经济情况后，认为要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唯有抵制法币和发行苏币。在抵制法币的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的办法有：禁止法币流通，取缔法币黑市；没收流入根据地的一切法币；一切人员入境时都禁止携带法币，对于已经流入根据地的法币，要么全部没收，要么令所有者限期携带出境。这样，既保护了根据地经济，又维护了一些群众的利益。同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共有 3 名工人，印制货币，建立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机器，怎么印制货币？刘志丹与习仲勋在一起琢磨研究，没有印钞机器，就刻制木板印刷货币；没有纸张，就用粗布代替，制成布币；怕布币褪色，就在印刷好的布币上刷麻油，用热油处理；缺乏技术人员，就从敌占区“请”人才上“梁山”。1934 年 3 月末，红四十二师从吴旗县崖窑进入陇东境内的元城川，一天内连打 3 个胜仗。在高桥没费一枪一弹活捉了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区长高明山及其他 4 个豪绅。在习仲勋和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感召下，高明山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积极出力献策，他利用自

己的技术，反复实验，用手工印制成了苏币，票面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苏币共印制了 3000 元，群众称之为“苏票”。

为了取信于民，解除群众和商人的后顾之忧，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票”与银元兑换处，使“苏票”获得了很高的信誉。边区政府迁到洛河川，又继续发行货币，方便群众交换。这样，老百姓对苏票这种印刷很粗糙的票子和银元一样喜欢。^⑫“苏票”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国民党的货币驱逐出边区市场，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繁荣边区经济奠定了基础。这是一场金融战争，其意义不亚于反“围剿”战斗，刘志丹、习仲勋凭着自己的智慧，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赢得了经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

在南梁中心苏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前后发行了两种“苏票”。第一种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发行的“油布币”，第二种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前者是用粗布印刷，后者是用洋布印刷，反映出随着边区经济条件的改善，货币的印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不仅在南梁地区流通，而且也在陕甘边区其他一些地方流通。如 1935 年 4 月陕甘边苏区政府已经撤离南梁，迁至陕西的甘泉下寺湾，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陕甘边货币中，有一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是 1935 年 8 月 1 日，说明陕甘边的货币在南梁以外的一些地方仍在继续流通使用。

⑬

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和金融流通的革命，南梁山区的经济逐日繁荣起来。南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广大苏区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26—627 页。

②《李生华 1983 年 7 月 4 日谈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3 页。

③《高生荣 1959 年 4 月 22 日、23 日谈苏区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8 页。

④《武海潮 1979 年 6 月 20 日谈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4 页。

⑤《张策谈南梁根据地的创建》，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1986 年版，第 230 页。

⑥《王生金 1959 年 4 月 21 日谈南梁一带的群众工作、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建设》，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6 页。

⑦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1 页。

⑧《高生荣 1959 年 4 月 22 日、23 日谈苏区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8 页。

⑨《蔡子伟 1985 年 5 月 8 日谈苏票发行与集市贸易》，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6 页。

⑩王西林、高有才、张怀仁：《在南梁的几件事》，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1—312 页。

⑪王西林、高有才、张怀仁：《在南梁的几件事》，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2 页。

⑫据张策回忆，苏票是一种在木头上刻制，用布印刷，然后再用麻油刷油的票币，十分粗糙，《张策谈南梁根据地的创建》，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1986 年版，第 230 页。

⑬姚杰：《陕甘边根据地货币考》，《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编委会编：《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0 页。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建设是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而逐步进行的。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

党政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科学的方法领导人民群众开展经济建设，不仅解决了人民生活困难，而且极大地支持了军队的反“围剿”斗争。党在陕甘边区领导经济建设的科学方法和宝贵经验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第一，实事求是地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经济政策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取得成效的根本前提。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为着建设和巩固红色政权而制定的。在陕甘边苏区领导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领导集体，他们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边区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依靠群众，坚决同“左”倾错误做斗争，在远离中共中央乃至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立足实际，独立解决陕甘边区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法规和政策，以促进苏区的建设。如在根据地内坚持实行土地改革，以解决农民对土地最迫切的要求，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苏区的经济建设中，发行苏区货币，设立集市，发展贸易，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等。尤其是《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及《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政策截然不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建设体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萌芽。

第二，抓住重点，把农业生产摆在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取得成效的可靠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解放生产力；就是要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建设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都能过上民主、平等、公平、富足的生活。党取得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了保持政权不受敌人侵袭之外，就是要组织全体人民的经济生产和文化生活。刘志丹曾经对习仲勋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①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一切都要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经济建设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支柱。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在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巩固政权、稳定人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领导开展土地革命、落实土地政策的过程中，紧紧抓住农业生产这一最主要环节，把农民在土地革命中激发出的革命热情引导到农业生产上去，通过广泛发动农民群众，挖掘内部潜力，切实可行地解决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根据地农民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粮食产量有了普遍提高，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第三，有的放矢、创造性地开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环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除了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外，还兴办了军需工业，制造武器和弹药。同时，积极发展民用工业，保障了军需民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内建立的工厂主要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等。此外，苏维埃政府鼓

励和保护、扶植手工业生产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兴办机关农牧场、合作社，鼓励群众喂猪养牛，发展农副业生产。并注意沟通赤白贸易，以边区多余的农产品如小米、牛羊等换回白区的工业品如食盐、布匹、煤油、火柴、药材等。边区政府通过灵活的外贸政策，鼓励各种私商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以发展边区的社会经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的实践与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乃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动员和依靠广大群众参加经济建设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组织革命战争需要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经济建设同样需要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坚持领导、发动、宣传、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开展经济建设，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始终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生死相依，建立了血肉联系，成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了解群众的冷暖，体察群众的疾苦，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才得以建立，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创建、发展和巩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不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政策和法令，比如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问题等等。而且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维护群众关系的严格规定和纪律。边区政府有效地

开展了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运动。政府工作人员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政府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一切用品都由财政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生活十分简朴，没有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展现了廉洁的公仆形象，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习仲勋曾指出：“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由于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②

第五，妥善处理好经济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刘志丹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不重视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互为条件，互为依托，它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相互配套开展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正是立足陕甘边区实际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成功实践，其基本思想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武装斗争是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支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环节。离开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经济建设就不能有效地进行。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广泛发动群众，取得革命战争所必需的战略物力资源，武装斗争就会失败，根据地就会丢失，也就谈不上进行经济建设。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经济建设就失去了群众基础，不能巩固和发展。没有经济建设，根据地得不到巩固，武装斗争就会失去依托，就会变成黄巢、李自成式的流

寇主义，不可能长期存在，土地革命的成果就得不到保障。在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内，只有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才能巩固政权、稳定人心。如果经济工作做不好，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抓住农业这一最主要环节，把握贸易金融财政这一重点环节，使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改善，有力配合了根据地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工作的开展。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创立与实践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建设规律性的认识不足，加上“左”倾错误的影响，有的法规和规章在创立初期，程度不同地带有“左”的色彩，使苏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寺村塬时期，五顷塬土改时，地主不得分地，富农只分给一份“劳动的份地”，在南梁时期这些得到了部分纠正，地主家庭参加劳动的成员，分配给维持其生活的土地和财产。可以看出，这些不足，是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权在初创时期难以完全避免的，是发展中的问题，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及其实践的主流是应该肯定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加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大大巩固和发展了这块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所领导的全国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②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第七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教育事业

一、苏维埃的新型教育事业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发布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和法令的同时，也发布了文化方面的政策和法令，明确规定陕甘边苏区实施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①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根据这一方针，颁布了一些法令和政策，比如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即红校），培养干部；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提高根据地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水平；信任政治上可靠的知识分子，分配适当工作，并注意予以培养等。这些政策法令彻底改变了旧的教育制度，建立了服务战争、结合生产、适应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化教育制度。

（一）红军干部教育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事业萌芽于对部队的教育和干部的培养之中。早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人就将红军干部教育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坚持从纠正部队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部队战斗力入手，对干部战士进行文化教育。一

方面改编整编部队。南梁游击队创建后，先后经过倒水湾、麻峪、锦章等多次整编改编，尤其是西北反帝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党在部队中开始建立政委制度，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下辖的两个大队都设立了政治委员。以上改编不仅是组织的整顿，而且是思想、作风和纪律的整顿。通过整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红军宗旨，对党和红军担负的主要任务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建立了政治部，配备专职政工人员，负责部队的文化教育等工作。“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很重要原因。”②另一方面创办干部学校。

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为了教育这支成分复杂的队伍，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在部队中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有针对性地组织班、排级干部学习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时事政治、如何做群众工作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将训练班扩大为军政训练队。军政训练队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班，开设“游击队怎样活动”、“古田会议决议”等课程。红二十六军建立后，于1933年春开办了随营学校，吴岱峰任校长。1934年秋，陕甘边区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正式创办了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主要为部队培养政治工作和军事指挥人员。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兼军事主任，主持学校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根据培养目标，学校设有政治课、军事课、文化课。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等，旨在使学员懂得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及其远大目标；军事课主要掌握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战术，提高指挥作战能力；文化课主

要是识字扫盲，提高文化水平。当时，军政干部学校既无正规的教室和教学设备，学员也无像样的学习用品，每人只发给一支铅笔和几张粗糙的麻纸，课堂就是窑洞前的空地，学员们席地而坐，边听边记。学员的生活也很艰苦，一日三餐顿顿是糜子米饭，很难吃到生活必需的蔬菜，偶尔吃顿羊肉就算改善生活。从 1934 年秋到 1935 年春，军政干部学校先后共开办训练班 3 期，培训军政干部 300 多名。学员毕业以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区、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为重要的骨干力量，有的成长为重要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员。1935 年 7 月，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迁至延川县永坪镇，易名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政治部主任李登瀛，教育长张文舟。主要培训从红军部队中选送的班、排长，同时培养较高级的军事人员。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红军干部学校与中央红军干部营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 年 2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6 月，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后来，抗大几经变迁，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在红军教育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③

（二）儿童教育

由于封建地主的压迫，在旧社会穷人是上不起学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十分重视教育问题。早在 1932 年 2 月，中国工农红

军陕甘游击队就在正宁五顷塬、两顷塬创办了回民学校，开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普通教育的先河。④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南梁荔园堡转咀子创办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霍建德⑤任校长，张景文⑥任教员。校舍是没收地主的房子，设备十分简陋，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桌子，垒土台当凳子，扫锅墨当墨汁。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学校以学习文化知识为主，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好学好记，还教唱革命歌曲。逢年过节，庆贺战斗胜利，学校师生和当地群众都演出“闹红”的秧歌和文艺节目。学校通过给同学们教授“马克思是谁呢？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终生领导着我们穷苦人革命，还把穷人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这样的内容，不但传授了知识，而且传播了革命思想，培养了学生的革命情感。列宁小学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为培养学生保卫革命成果的军事能力，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军事课程。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武术、拼杀，培养了他们顽强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长大参加红军的雄心壮志。学校除教学生文化知识外，还带领他们参加劳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闹革命，打江山，穷苦人儿把身翻，要想把穷根剜，跟上红军上前线”等革命道理，鼓舞群众参加革命，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南梁列宁小学的创办，在当时的根据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为后来发展小学教育做出了典范。不久，边区政府在合水县太白镇葫芦河也建起了列宁小学，共产党员阴云山任教员，有学生20余人。此后，各乡都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陕甘边东区就依靠政府部门和群

众的大力支持，在洛河川的桥扶峪、阎家沟、下寺湾、王家坪、杏子沟门等地先后办起了列宁小学。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根据地领导不仅以身作则，亲临列宁小学讲课、作报告，传播革命理念，宣传斗争形势，而且关心学校的具体建设工作。当时学校的笔、墨、纸等教学用品缺乏，刘志丹就从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的经费中挤出 30 元送给列宁小学作经费，习仲勋又从边区政府的办公用品中挤出笔、墨、纸送给学校，保证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三）社会教育

革命根据地建立前的陕甘边区，经济文化特别落后，以南梁为例，当时南梁地区有农家 295 户，从未建立起一所学校。这里的群众因不识字，写封信要到几十里以外去找人。春节写对联时，只好用碗蘸上锅墨水，在红纸上印圈圈代替春联。有的群众为了向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通报敌情，农民们只好采取直观的形式。“有的人不会写字，干脆用一片破纸插着一根鸡毛，经多人之手一直传到南梁我们的驻地。还有的用一张破纸包上一块煤炭，插上鸡毛，也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后，只能知道是不好的消息，知道是敌人来了。”^⑦为了使群众根本认识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陕甘边区党和政府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对广大民众进行通俗教育，“经常召集群众大会、演讲会，利用当地的通俗歌谣、小曲、书房、夜校等办法去扩大。”^⑧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加大了对成人文化教育的力度，立即在机关部队和一些有条件的村庄开展“列宁文化运动”，建立“列宁室”，组织列宁

会，举办成人扫盲识字班，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工作。陕甘边区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工农青壮年。教育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识字为主的扫盲教育，如识字班、工余学校、平民夜校、工农夜校，大都设在列宁小学，教员一般由列宁小学教师兼任。二是在县、区苏维埃所在地设立以政治教育为主的俱乐部、列宁室、演讲所，开展办墙报、读报、演戏、唱歌、体育等活动。华池县各区认真开展“列宁文化运动”，在南梁、刘坪、白马庙、柔远等地办起了16处扫盲识字班和夜校。在识字的基础上，相继增加了默写、唱歌、时事、卫生等内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张景文，积极投身到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去。她还给学生教唱鼓励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信天游“婆娘女子脚放开，长头发剪成了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的势力大无边”。⑨动员广大妇女放足，宣传婚姻自由，鼓励妇女参加革命工作。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对当地的哥老会、民团等进行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比如刘志丹亲自去找哥老会的头目，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和教育。在刘志丹的影响下，马锡五、李仲英、马海旺等哥老会大爷纷纷带领其成员参加了革命。

（四）陕甘边区教育的历史经验

因地因时因势办教育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得到初步发展。

第一，坚持教育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击退国民党军事“围

剿”。因而“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革命战争需要大批干部，所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把干部教育摆在了首位，举办干部训练班和创办干部学校，对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培训了大量干部，发挥了骨干作用。边区政府还积极普及社会教育、发展小学教育，办夜校和识字班，扫除文盲，培养革命接班人，对革命战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与生产相联系”。这其实也是陕甘边区党和政府教育从创建到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在陕甘边区，不论是干部学校还是列宁小学，都结合本身特点，组织广大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列宁小学把生产劳动列为重要必修课，在抓好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军政学校的教学更加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特点，学员的日常生活都围绕学习、建校和生产进行，比如学员自己动手挖窑洞、盘土炕、自制黑板和教学用品等农民夜校、识字班等还根据农活的忙闲情况，采用全日、半日授课的方式，便于学生参加劳动，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主义精神，使教育对象养成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了陕甘边区新型教育的鲜明本质。

第三，坚持教育联系实际。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反对教育脱离实际、脱离阶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旧体制。除学习军事技术和政治常识外，着重学习文化。学制、学期、教课内容都是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来规定，并能经常根据经验和实际需要灵活改变。政治课教学除学习《社会发展简史》等课程外，还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不仅教育他们要学文化，而且要懂军事、会打仗，真正把学员培养成为文武双全的革命战士。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根据以往培训军事干部的经验，充分考虑革命战争形势和学员自身实际情况，设计课程内容和训练制度，比如军事课的课程设计为“制式教练”、“基本动作”、“尖兵活动”、“班排连进攻”、“游击战术”等，体现出陕甘边区教育的因时因势性。甚至在小学教育中，也要求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实际去做”，使广大师生牢固树立教育联系实际的新风。

第四，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陕甘边区处在强敌包围封锁的战争状态，经济困难，物质条件匮乏，兴学办教艰苦。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采取了勤俭办学的方针，校舍大多是以旧祠堂、庙宇或征用、借用的民房代替，课桌也是用石块或土台垒成的。同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系列保障措施发展教育，比如边区政府规定：“从分得土豪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并“按情况给每个学校分配土地若干亩作为校田，产品补充学校经费”。^⑩此外，列宁小学学生的文具和教员的吃用，全部由政府供给。正是由于发扬了勤俭办学的作风，同时得到了政府的经费支持，陕甘边区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陕甘边区教育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党领导教育事业的最初实践，为新生的政权建设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为后来党领导教育事业提供了借鉴。

①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②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③曲涛主编：《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2—163 页。

④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教育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1 页。

⑤霍建德（1911—1963），后改名王俊，陕西清涧人。1927 年参加革命，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华池县苏维埃政府秘书、列宁小学校长、团陕北省委秘书长等，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战期间，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青年部长、西安工委书记，关中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1945 年 4 月出席了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敌后武装斗争，曾任陕西工委组织部长，黄龙地委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大荔地委副书记等职。解放后，1949 年 9 月至 1952 年 7 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中共甘肃武威地委书记、武威军分区政治委员。1952 年至 1959 年任兰州炼油厂筹建处主任、兰炼党委书记。1959 年 8 月至 1963 年 1 月任甘肃省总工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1960 年至 1963 年 1 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甘肃省政协常委等职。1963 年 1 月因病在兰州逝世，终年 52 岁。

⑥张景文（1911—1935），女，曾用名秀云，亦名静雯、敬文、静文，陕西蓝田人。1932 年 4 月，在面安女子师范学习时，曾带领学生开展反对国民党卖国政府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34 年春，张景文与丈夫徐国连奔赴陕甘边苏区，是陕西省女师第一个进入根据地的女知识分子，曾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她一面从事妇女教育组织工作，一面担任列宁小学的教员，深受学生和群众爱戴。1935 年九十月间，陕甘边区错谈肃反中，张景文被诬陷为白区来的“奸细”，受迫害致死，时年 24 岁。

⑦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17 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给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 页。

⑨高文、巩世锋编：《陇东红色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 页。

⑩甘肃教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陇东老区教育史》，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

二、苏维埃区域的文艺运动

（一）红色歌谣的传唱

在战争环境恶劣、物质条件困难、专门人才极其缺乏的情况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文艺运动的开展，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以求发展。尤其是歌谣的传唱最为活跃，也最受群众欢迎。

山歌、民歌等歌谣，是民间的传统文化形式，历经多年而不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陕甘边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种形式，注意发挥红色歌谣的战斗作用。从红色歌谣的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控诉国民党统治下民众的苦难和不幸，揭露和鞭挞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比如《封建制度是祸根》中唱到：男人女人都是人，为啥男女不平等，恨爹恨娘不顶用，封建制度是祸根。①《打老谭》中唱到：“民国乱哄哄，出了个谭世麟，他是民团的头，清乡的总司令。谭贼真可恨，元城川他占定，逼粮款又拉兵，苦害老百姓。谭贼真是凶，无恶他不行，大路口安铜铡，铡的是穷人。”②二是歌颂共产党和人民领袖。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紧密联系起来，发出了跟党走的心声。如《共产党来了跟上走》唱到：“阳湾的桃树河畔上柳，共产党来了跟上走。长枪短枪马拐子枪，东路过来些共产党。拔起黄蒿带起根，跟上咱红军闹翻身。地主豪绅要打倒，文约账薄放火烧。土地牛羊都要分，咱们穷人喜盈盈。”③《南梁来了刘志丹》唱到：“日头出来端上端，南梁来了刘志丹，志丹练兵又宣传，要把世事颠倒颠。”④三是表达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厚情谊。如华池信天游《后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唱到：“对面价沟里流河水，后山里下来些游击队。一面面红旗崖畔上插，快把咱们的游击队领回家。滚滚的米汤热腾腾的馍，招待咱们的游击队好吃喝。”⑤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红军战士为了人民的利益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人民群众不怕流血牺牲、踊跃支前，凝成了生动的革命歌谣，在边区广大军民中广泛传颂。四是歌颂纯真的爱情。在红

色歌谣中，情歌占有相当的比重，在苏维埃制度下，青年男女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其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尤其是围绕扩红和送别的歌谣占有相当的数量，妇女们唱出无数送别的歌谣，表现出对红军哥哥的爱和对革命事业的理解。如庆阳民歌《送郎当红军》唱到：“月儿偏西天快亮，情郎哥一心走南梁，百里路上投红军，小妹妹相送大路上。送情郎送到五里坡，手拉手儿叫哥哥，只盼你革命革到头，一心革命莫想我。送情郎送到十里墩，送上个荷包表妹心，荷包虽小情意重，只盼你杀敌常立功。送情郎送到浪子河，隔河扬手叫哥哥，妹妹常爱红军汉，十年八年常等着。”⑥当时流行的一首民歌《悄悄把誓发》这样唱到：“妹妹十七哥十八，二人悄悄把誓发，跟上红军闹革命，瞒着村里财东家。”⑦

红色歌谣一般都是由民歌、流行歌曲的旧谱填新词而成。翟秋白曾指出：“通俗的歌词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就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要好些。”⑧以旧谱填新词，是陕甘边区歌谣的又一显著特征。红色歌谣的广泛传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歌谣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教育群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二）群众性文化活动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坚持通过广泛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对广大军民进行政治动员和时事教育，主要活动方式有墙报、读报、讲演、演出节目等。墙报一般由文化委员会干部、列宁小学的学生和工农群众参加编写，主要内容是配合党和边区政府中心工作，宣传和反映群众

的生产和生活，如扩大红军、生产计划、经验介绍、批评表扬等；读报是利用晚间和休息时间，组织群众听读报和讲读报，许多乡村组织了读报组，组织群众学习报刊的社论、新闻知识、好人好事等。讲演分为政治讲演和科学讲演两类，政治讲演配合政治任务和工作中心进行，科学讲演则是针对当地群众中存在的旧习惯、旧风俗，讲解反对封建迷信、改良风俗、改良卫生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专门成立了文化委员会，由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每逢传统节日或庆祝战斗胜利，文化委员会还组织宣传队下村串户，充分利用陇东道情、秦腔、眉户、皮影戏、快板等文艺形式，组织军民演出“闹红”节目，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残暴，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行军打仗中，逢春同志除了带上武器，还要背上纸、笔、墨、砚和刷标语的刷子。大家开玩笑地说：他身上背了个‘百宝箱’！有了这个‘百宝箱、红军走到哪里，他亲笔写的、亲手刷的大标语就贴到哪里。一时在赤安、定边、靖边一带，墙头、道边，‘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的大标语处处可见。”^⑨另外，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宣传队下村串户，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如给荔园堡群众教唱革命歌曲“穷苦大众一条心，跟上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呀分田地，穷人能过好光景，嗨嗨呀呼嗨，穷人能过好光景”，宣传穷人受苦挨冻的根由，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⑩

（三）体育事业的发展

陕甘边区的红色体育运动开始于红军部队，它是红军部队进行战备训练、增强战士体质、活跃部队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当时普

遍开展的体育项目主要有刺杀、射击、投手榴弹、跳障碍、爬云梯等，另外还有抬担架、背人赛跑等根据实战创造的项目。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红军战士既强健了体魄，又学习了军事技术。边区儿童团在当时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的领导下，除站岗放哨，传送情报、学习文化外，经常进行队列练习、投弹、跑步、跳沙坑、单杠、双杠（用圆木自制）和传统游戏。儿童团员们还根据斗争实践创作了趣味性、象征性的游戏项目，有“骑兵打仗”、“抬飞机”、“捉特务”、“掷铁环”等活动。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在列宁小学开设了体育课。当时小学自建操场，用木料自制篮球架、篮环、跳高架和刀、枪等体育用具。最初体育课主要是进行队列训练，每次1小时，还进行劈刀和拳术训练，以及红、绿棒打法的练习。之后，又相继开展了篮球、跑步、足球、跳高、跳远、踢毽子、拔河等体育项目。体育课教师多由红军派来的先锋队队员担任。

红色体育运动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新型群众性体育运动。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山区农村，边区军民不分贵贱高低，不分男女老幼，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投入到体育运动之中，体现了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运动宗旨。红色体育运动既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也为今天发展全民体育运动提供了基本经验。

（四）普及传播卫生知识和科学思想

为保障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身体健康，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积极改善边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发展医疗卫生、

育婴、养老等事业。部队军医免费为边区群众看病，“在成人识字班的教学内容上增加了卫生等内容”^①，向根据地群众讲解有关妇婴卫生保健方面的知识。同时，边区政府通过小学、夜校、识字班、报刊等途径，充分利用集会表演、张贴标语、现身说法等多种形式，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特别是宣传卫生知识，开展卫生防疫运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广泛发动贫农团、赤卫队、妇女代表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去动员广大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疫运动，极大地改善了边区的生存环境，潜移默化中促进了边区广大工农群众思想观念的改变，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身体健康。

针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存在的迷信、愚昧的旧风俗旧习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批判宗教迷信，强调菩萨并不能免除劳苦群众的任何痛苦，只有斗争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积极开展反宗教迷信的群众运动，教育群众不烧香、不敬菩萨等。边区政府还在根据地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人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①高文、巩世锋编：《陇东红色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5 页。

②高文、巩世锋编：《陇东红色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0 页。

③高文、巩世锋编：《陇东红色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40 页。

- ④高文、巩世锋编：《陇东红色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 页。
- ⑤高文、巩世锋编：《陇东红色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 页。
- ⑥高文、巩世锋编：《陇东红色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0—61 页。
- ⑦郭含殿主编：《华池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2—323 页。
- ⑧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5 页。
- 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等编：《龚逢春纪念文集》，内部资料，1993 年版，第 23 页。
- ⑩《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编委会编：《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7 页。
- ⑪樊为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宣传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意义》，《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编委会编：《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5—332 页。

三、苏维埃区域的新闻出版工作

通过出版红色刊物来推动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①陕甘边区所辖区域，大多处于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包围之中，西安、兰州出版的进步书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很难买到。党内的出版物如《布尔什维克》、《红旗》、《列宁主义概论》等在根据地也很少见到。为了用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文化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发展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在纸张和印刷设备极度缺乏的困难条件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大量翻印了一

些红色书刊，包括马克思列宁经典著作、政治读物、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普及读物等内容。“中央红军未来前，陕甘边区特委印刷处曾大量翻印过中央苏区的书刊。”②“当时报纸和宣传品的印刷主要是油印，而油印字有美术字、钢板字，还有漫画和插图，有时还用几种颜色套板，鲜艳夺目，形象生动，感染力很强。”③1935年3月2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太白镇，在列宁小学“搜获共产书籍多种”④，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宣传和教育群众中所做的积极工作。

为了提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法令，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抓好图书书籍出版的同时，坚持办好《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红色西北》刊物。1933年4月，照金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刘志丹就对习仲勋说：政府工作安排好了，要着手办一张报纸，有了报就等于我们增加了一个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后，按照刘志丹的指示，习仲勋多次与文化委员长蔡子伟、特委宣传部部长龚逢春等商谈筹办事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抽出经费派人秘密到西安购买油印机、油墨、纸张等，很快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⑤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创办了《红色西北》，八开二版，不定期出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部长龚逢春兼任主编，席德仁负责誊写、油印工作。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蔡子伟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经常为《红色西北》撰稿。它主要刊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消息，尤以红军战讯为最多，并刊登陕甘边区党政

军领导机关的决议和宣传号召性文件，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1935年4月，国民党军马鸿宾部侵占南梁革命根据地前夕，《红色西北》被迫中断出版。同年6月，《红色西北》在洛河川下寺湾恢复出版，由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长冯玺玉兼任主编，席德仁、李郁负责誊写、油印工作。同年10月初，在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中，冯玺玉、席德仁、李郁均遭诬陷被捕，《红色西北》被迫停刊。1935年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又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32开本，油印，不定期出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部长龚逢春兼任主编，席德仁负责誊写、油印工作。其宗旨是传达党的经验教训，交换党的工作方法，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调动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同年4月，《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出版第二期后，因国民党军马鸿宾部侵占南梁革命根据地而停刊。《红色西北》《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创办发行后，大家争着读，高兴地说：

“咱们有报纸了！”有的学校老师还拿着报纸给农民念，农民说：“一张纸上什么都有，真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刘志丹很高兴，提出：“报是办给群众看的，要通俗，像和农民交谈一样，这样农民就喜欢了。”习仲勋亦身体力行，一有空就和编报的同志座谈，还帮着审一些稿子，有时自己也写稿，报纸越办内容越丰富多彩。后来习仲勋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时候啥条件？也能把报办好。现在好办得多了，只要脑子装着群众利益，报纸就能受到群众欢迎。”⑥

陕甘边区的新闻出版工作，密切联系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实际，配合马列主义宣传和根据地建设，较好地宣传了革命理论，唤醒了劳

苦大众，激发了革命斗志，密切了军民关系，丰富了边区军民的文艺生活，为身处穷乡僻壤、封闭环境中的广大劳苦大众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②王子宜：《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③王华：《陕甘边东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3页。

④《国民党军队三十五师参谋处1935年4月5日关于‘围剿’红军的通报》，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2页。

⑤刘宪阁：《为什么说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新闻记者》，2013年第11期。

⑥刘宪阁：《为什么说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新闻记者》，2013年第11期。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的基本特征

特定的历史背景铸就了特定的文化。陕甘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陕甘边区军民在进行革命斗争、创建和巩固根据地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

（一）阶级性

陕甘边地区历史上是经济发展极为贫困的地区，也是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的地区。陕甘边区人民长期遭受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封建地主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盘剥，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摊派，“绝大多数民众是经常处在饥寒交迫的境地。”①面对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的疯狂“围剿”和对工农群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陕甘边区党和政

府始终把文教事业放在重要地位，把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作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是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发动人民起来与反动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斗争。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从实际出发，除学习军事技术和政治常识外，着重学习文化。学制、学期、教课内容都是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来规定，并能经常根据经验和实际需要灵活改变。政治课教学除学习《社会发展简史》等课程外，还针对军政干部学校部分学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不仅要学文化，还要学政治、懂军事、会打仗，真正把自己培养成为文武双全的革命战士。同时，教育广大军民团结一致、抵御强敌、克服困难，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认知，增强群众的阶级意识，促进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传播了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使文化建设适应了红色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先进性

文化教育的目的是消除文盲，提高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陕甘边区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如在华池县方圆几百里找不到一所学校，四五百人中竟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人民群众不仅备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的苦头，文化的落后严重阻碍着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陕甘边区党和政府把民主与科学等先进的文化理念作为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植入了这块缺乏先进文化基因的土壤，进行了一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成功试验。它对于千百年来只靠私塾、宗祠、庙会、年节乃至巫婆神汉，来周而复始地延续“文化香火”

的农村来说，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充满着新鲜感，包含着浓厚的先进性。虽然面对国民党铁桶般封锁，陕甘边区的文化建设却一点也不封闭，相反却是处处洋溢着开放的气息，始终保持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互动，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教育。表现在根据地千方百计地坚持出版与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并通过各种手段推动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与普及化。广大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教育，以科学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大脑，以先进文化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的思想，达到了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的目的，从而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三）创新性

民主与科学等价值理念如何转化为民族的心理积淀与行动指南，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与难点。陕甘边区文教事业的实践向世人证明，在文盲占 90%以上的迷信横行的偏僻地区，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却扎根开花了。以民主为例，陕甘边区推进了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妇女思想启蒙，保障妇女经济平等的权利，健全妇女工作领导机构，实现妇女权益的制度化等。从其效果看，妇女解放的价值观念深深地植入了近代中国最为偏远地区，男女平权在这里成了社会现实，边区妇女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在参战支前、扩红和经济建设方面，成为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极大地改变了边区的社会面貌。同时，陕甘边区克服了文化设施严重不足与文化资源极其匮乏的困难，实现了文化传播体制机制方面的系列创新，进而推动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

创新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创设诸如俱乐部列宁室之类的新型文化机构。俱乐部列宁室覆盖了整个边区，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包容了边区最广大的群众。二是创新传播主体。面对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困难，陕甘边区创造性地提出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办法，使得各种困难迎刃而解。三是创造性地选择了艺术化、形象化的传播手段。针对人民群众文化层次普遍不高的现状，努力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使用大众的语言，创造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展示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比如无论是民歌还是戏剧，都非常口语化、明朗化，表现出火热的生活气息，浓郁的乡土情感，它们的创作源泉来自根据地丰富多彩的生活，来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黄土高原，表现的是劳苦大众的心声。其内容和形式既大众化和口语化，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又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陕甘边区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借鉴了歌谣、戏剧、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充分考虑了边区军民的文化水平，在满足他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传播了新的价值理念，使边区的文化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打击敌人、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

（四）群众性

陕甘边区党和政府把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土地革命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吸引和推动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投身到这场社会变革的伟大斗争之中，工农群众为彻底摆脱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封建军

阀的压迫，积极参加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因此，陕甘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性。

为了巩固红色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充分发挥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作用，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踊跃参加土地改革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鼓励他们积极支援土地革命战争，学习革命文化，加紧劳动生产，拥军优属，多交公粮，担负战勤服务，踊跃支援前线，不少青壮年参加红军和地方游击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也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陕甘边区的文化建设，不仅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文化，也是彻底批判和抛弃千百年来腐朽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新文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文化建设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男女平等活动。边区政府还发布相应条例，制定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六劝”活动，用新文化、新思想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由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始终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结合，建立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深深的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和拥护，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性，成为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基础。

①林伯渠：《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的历史地位

第一，摧毁了传统腐朽落后文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党的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

腐朽没落的旧文化”，①通过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群众开展“六劝”等活动，革除了根据地内包办买卖婚姻、赌博、吸食鸦片、妇女缠足、男子留辫子等各种陋习，摧毁了封建迷信等各种腐朽落后文化。过去许多农民家里供奉的菩萨、神主牌位，都换上了马克思、列宁的画像；曾经香火旺盛的宫观庙宇，也变作列宁学校的教室或办公场所。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自尊自强、互敬互爱等蔚然成风，根据地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发生急剧变化，根据地社会风气为之大变。

第二，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党领导开展各种文化教育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粉碎敌人对边区的文化“围剿”，宣传鼓励广大工农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支援红军，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一直把开展文化活动作为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重要手段，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做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要在深刻的宣传鼓动过程中组织灾民联合会，并且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要地方党的同志和群众对妇女群众作深刻的宣传鼓动，以组织拥护红军的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②红军打到哪里，哪里就贴满了各种标语、宣传画和墙头诗；红军来到哪里，哪里就有嘹亮的革命歌声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讲演。在硝烟与烈火中锤炼出的革命歌谣《盼红军》、《跟上哥哥上南梁》、《红军起首月明塬》、《妇女放脚歌》等，以其淳朴的语言，独特的风格，紧密配合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充分发挥了瓦解敌人斗志、壮大红军声威、动员激励人民的战斗作用；通过独特的文化教育活动，在陕甘边区迅速掀起“扩红”运动，到处都是母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

上前线的动人场面。红色武装力量得到了源源不断地补充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得到提高。由于文化建设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面对强敌封锁包围的险恶环境下得到巩固发展。

第三，丰富了根据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只有社会整体精神风貌的提升，才能表明文化建设的显著成果。陕甘边区的传统文化活动主要是与宗族祭祀活动、迷信活动结合在一起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这里的各项文化活动就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演戏、唱歌不再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是为了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据张秀山回忆，为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边区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晚会，组织演出了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举行了军民联欢活动。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发展，根据地文化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各种民众特色文化活动迅速开展，各种文化宣传活动越来越活跃，俱乐部、列宁室等群众娱乐和宣传载体遍布边区各个角落，各种演出活动越来越频繁，不论是喧闹的城镇还是偏远的乡村到处都有文艺宣传队员的歌声和身影。特别是活跃于城乡的戏剧，如陇东道情、秦腔、眉户、皮影戏、快板等，为革命奔走呼号，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日益觉醒，积极拥护并热情参与革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深入开展。

第四，开辟了新民主主义文教事业的新局面。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建设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别于过去历史上任何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在陕甘边区

文教事业的发展实践中，广大文化教育工作者通过戏剧、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进行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播，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文化，帮助劳苦大众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使得他们原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趋向解体，逐渐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共产主义思想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构建起新的文化心理。可见，哪里有红军，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播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种子。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文化建设，普及了革命文化艺术，传播了民主科学思想，提高了群众思想政治觉悟，培养了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后备力量，开辟了新民主主义文教事业的新局面，为陕甘边区人民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7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9 页。

第八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统战工作

一、区别情况制定统战政策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一个重要原因。陕甘一带国民党嫡系部队、地方军队、中小军阀、民团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相互利用。针对这种复杂的状况，“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细，确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①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吸取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按照刘志丹关于“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②的原则，采取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针，在地方军、民团、土匪和哥老会中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引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走向胜利。主要政策是：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坚决消灭，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如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等，红军采取了坚决打击和消灭的方针、政策。而对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促其率部起义，参加红军。

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对共产党、红军和红色政权的认识，并向苏维埃政府靠拢。

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的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对白军俘虏一般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

对一时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的国民党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刘志丹、习仲勋等也尊重他们，向他们讲明道理。在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一些有威信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革命。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③

①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39 页。

②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0 页。

③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24 日。

二、实事求是地开展统战工作

（一）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

哥老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三大帮会之一。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称为红帮，在四川又称为袍哥或汉留。其吸收融合了天地会和青莲教的

某些特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无业游民组织，是游民们为了生计而自发结成的互助的秘密社会团体，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1928年，陕甘两省遭受大旱，赤地千里，庄稼绝收。第二年，灾害继续蔓延，草粮树皮都被吃光，饿殍遍野。封建官府和地方军阀仍然抓丁拉差，强收抢征，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加之地主豪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高利剥削。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陕甘人民起来反抗。华池南梁山区的郑德明、朱志清等人组织起“哥老会”，成群结队吃大户，同反动政府、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做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哥老会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成为当时陕甘边区不可忽视的一股社会力量。但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色彩。因此，它时常为反动政府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

根据哥老会的以上特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认真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结合当地实际，对哥老会组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统战政策，争取改造其中的大多数，变哥老会中反共力量为革命力量，使之为我所用。

第一，承认哥老会组织的合法地位。哥老会是代表广大劳苦民众的组织，受政府军阀官僚的压迫，被诬为“强盗”和非法组织，不能公开合法的存在。陕甘边区党和政府承认哥老会的合法地位，允许其在苏区公开存在，与其建立革命同盟关系。并帮助哥老会中的进步分子开山堂，广招哥老会的“十辈兄弟”、“同路好汉”，还在各地设立

哥老会招待所，招待国民党区域的英雄好汉与龙头大爷，使之在反对苛捐杂税、打富济贫、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下团结起来。

第二，生活上积极帮助。在生活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给予哥老会成员极大帮助，很多哥老会弟兄都分得了土地、粮食、房屋、畜生，解除了破产失业的痛苦。同时，废除哥老会中的酷刑和不人道的刑罚，逐渐消除哥老会中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处罚方式。在苏区，哥老会弟兄、共产党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但是，只要违反苏维埃政府法律的，不论是谁，均应按照苏维埃法律处罚，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哥老会成员感受到革命的美好前途。

第三，积极争取哥老会的支持。早在创建红二十六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对哥老会组织中进步力量的争取工作，党还派一些优秀干部直接加入哥老会，从内部开展工作，使哥老会转变为革命的群众组织，或争取其中广大成员到革命队伍中来。正宁县西渠是红军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当地有一位势力很强的哥老会大爷陈某，经争取与他建立友好关系后，红军与游击队来往经过西渠，可以通行无阻。而且他的家成了革命者的食宿店，很多党政军负责人在他家歇过脚，开过会，他还是个好铁匠，给红军多次修造过枪械。^①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当地哥老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拥护党和红军，踊跃参加革命。有的主动向红军捐献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有的动员兄弟伙伴参加红军；有的掩护、照料红军伤病员；有的给红军传递情报；有的为红军侦察敌情等。如保安县的哥老会首领马锡五带领数百人追随刘志丹投身革命，1936年担任了陕

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成为新中国司法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华池县南梁哥老会的朱志清被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保安县永宁山哥老会大爷马海旺成为当地中华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安定县哥老会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后成为红二十九军军长。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赞扬说：“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②

（二）对民团的统战工作

陕甘边地区的民团武装其构成和政治面貌是比较复杂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为了加强反动统治，镇压工农群众”^③，由内务部颁发了《保卫团条例》，号召各地建立地主武装民团。甘肃省府于1927年冬，在陇东的庆阳、宁县等先行试办，后推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的民团，多数由国民党政府提倡、地方武装及地主、豪绅出资组建，名义上是保家为民，维护治安，防御盗匪，实际上是地主武装的民间反革命团体（也有一小部分由当地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民团）；在组织的运用和作战效率上，有时甚至胜过正规军，但它却不纳入军阀和中央军的编制；民团人数大的乡村百余人，少的数十人，且多数由豪绅把持；武器主要是土枪、鸟枪、刀、矛等，大的民团亦有到外地购买长短枪作为装备。由于民团领导人政治态度各不相同，其中绝大多数民团政治倾向是支持国民党当局的，他们力图压制群众革命活动，进而维护其剥削阶级的利益；团丁主要对象是各村壮丁，也有受苦、受压迫的老百姓，其中也不乏一些不务正业的地痞

无赖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他们除少数人视需要轮住民团团部外，平时无事，在家劳动，有事则鸣号集合。所以，虽然都是民团，但政治上和自身成分上比较复杂。

面对这种情形和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客观形势，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对民团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第一，争取倾向革命的民团。面对众多的地方民团，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首先争取与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团发展关系。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取国民党地方民团沙秉彦^④。沙秉彦，祖籍湖北省，原是个佃农，因生活所迫逃荒来到马栏，在那里聚集了 20 多个穷哥们，劫打富户，占山为王。后被宜君县民团收编，沙秉彦被委任为中队长，长期驻守在马栏街。这个中队装备较好，且战斗力强，对游击队在这里开展工作是一大威胁。后经边区特委和政府派人反复谈话，耐心说服，沙秉彦最终接受了陕甘边区党和政府提出的三点要求：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教育，沙秉彦还以自己的合法身份，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1933 年，党组织派人在石底子、刘家店子秘密组织农会，沙秉彦得知情报后，指示其部不予干涉；1934 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派人在马栏附近开展工作，不料被马栏镇公所抓捕，沙秉彦得知此事后，立即将人提到他那里，声言要拉出去枪毙，实际上是掩护被抓捕的人逃走。此后还为边区政府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第二，团结可以利用的民团。为了化阻力为助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积极团结一切可以利用的民团，尽最大努力使其为我所用。1929 年秋，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利用学校教员、学生、绅士选举团总的机会，动员进步力量，挤走了非常反动的原团总路仰之，当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共产党员曹力如被选为副团总。此后还得到了保安县县长崔焕九的支持，成功地掌握了这支武装，后来又逐步将这个有 30 多人枪的地方武装改造成党领导下的武装。应该说，从这时候起，刘志丹就已经比较注意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尽可能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既是他后来能够在陕甘边区大力发展工农武装力量的根源，也是此后连续遭到整肃的诱因之一。

第三，欢迎愿意革命的民团。最典型的事例是争取王富贵和唐青山。王富贵，出身贫苦家庭，14 岁起给地主扛长工，备受剥削和凌辱。后加入永乐民团，任班长。民团训练残酷，百般虐待，壮丁不堪忍受。1935 年 2 月 18 日晚，王富贵带领暴动队伍来到红二十六军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受到了红军的热情欢迎，被收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四连，王富贵任连长。⑤唐青山，原籍河南，后来落脚到西华池附近，是个江湖武夫出身，喜欢结交叉士侠客，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改编，经过多次考验，刘志丹接收了唐青山的民团，任命其为四营营长。

第四，争取可以中立的民团。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对一些顽固的但明显不敌视红军的民团，采取互不侵犯策略，典型的事例就是劝阻国民党地方民团徐文德。1933 年，徐文德带领正宁县民团一个中队驻

防刘家店，对红军游击队在这里开展工作十分不利。刘志丹、习仲勋派人去做徐文德的转化工作，双方达成协议互不侵犯，没有发生冲突。后来，徐文德自动脱离民团经商去了。另一个事例就是说服刘希坤。刘希坤当时是正宁山河民团的团总，刘志丹、习仲勋派刘希坤的表亲郭廷藩去做工作，其反动情绪大大减弱了，最终辞去团总职务去彬县行医了。⑥

第五，消灭与我为敌的民团。在错综复杂、敌强我弱的斗争环境中，“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黄毓麟、赵老五，梁保定等”⑦。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保存自己力量，发展革命队伍的需要，更是争取人心的需要。1928年初春，刘志丹率领农民武装力量，消灭了渭南高塘塬最大、最反动的孙敬福民团，收缴了其全部枪支，处理了孙家的财产，杀了民愤极大的孙敬福。1930年秋，刘志丹辞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亲自去陕甘边界组织武装起义。9月下旬，刘志丹带骑兵六营进驻合水县太白镇，10月1日，在太白镇举行起义，打死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收缴了该营大部分武装。此后，游击队又先后消灭了黄毓麟的残部和合水、庆阳、保安、安塞地区的民团100多人。1932年9月，陕甘游击队将进占照金的民团军总指挥党谢芳击毙，生擒耀县民团团总蔡子发。1933年10月，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红军在庆阳县消灭“陇东一霸”谭世麟民团40余人，接着在城壕川击溃谭世麟亲自率领的一股民团军；对于赵老五、李鸿轩等与革命为敌的民团，游击队给予有力打击和重点歼灭。

（三）对土匪的统战工作

对于活动在陕甘一带的土匪，党和政府也采取区别对待、积极争取、分化瓦解、教育改造的政策，但决不允许其在根据地内继续活动。一是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暂时隐蔽在土匪武装中。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与辗转到达的陕北游击支队在华池县林锦庙一带会师。不久，谢子长也来到了南梁，会师之初接近寒冬，部队既无吃穿，又缺少弹药，没有安身之所，随时都有失败、覆没的危险。为了解决眼前困难，刘志丹、谢子长灵活运用统战策略，决定暂时投靠陈珪璋，经谈判，陈再次任命刘志丹为第十一旅旅长，把庆阳新堡一带划为十一旅防地，并拨给了棉衣、枪支弹药。年底，队伍离开新堡南下正宁，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此外，刘志丹等为了保存革命武装，还先后与军阀苏雨生等搞过统战关系，为公开“打红旗”创造了条件。

二是发展有土匪背景的穷苦人参加革命队伍。刘志丹多次深入南梁山区，引导和教育改造绿林武装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武装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刘志丹等耐心细致的教育，原来南梁一带的绿林武装头领如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都先后树立了革命思想，决心跟着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毅然将各自带领的绿林武装交给刘志丹，整编为南梁游击队。当时，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曾以营长的头衔来诱骗赵连璧，赵连璧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愿跟你陈珪璋当营长。杨培盛参加游击队后曾在“三嘉塬事件”中被迫遣散回家，他牢记刘志丹的教诲，继续革命，后来在合水县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受尽酷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直至红军攻克合水县城时获救

出狱。出狱后，杨培盛担任庆阳游击队队长，积极打击敌人，使队伍发展到 200 余人。

三是收编有基础的“山大王”为党领导的队伍并进行改造。如李培霄饥民武装，基本成分为贫苦农民，曾经保护过红军游击队员，刘志丹等做了许多工作准备收编，但是由于陈珪璋部的破坏，收编没有成功。又如，收编郭宝珊部，这是在陕甘边时期所有的统战工作中，成绩最为突出的一例。郭宝珊，河北人，贫苦出身，当过长工，下过煤窑，终因反动派的剥削压榨而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只得上山为匪，在惯匪梁占奎手下当营长。早在 1931 年，刘志丹就曾多次写信，争取其弃暗投明。1932 年，刘志丹又通过让俘虏虎给其捎话等方式，教育引导郭宝珊参加红军。经多方努力，1934 年 10 月 20 日，郭宝珊在新堡正式宣布起义，率本营 120 余人来到南梁苏区，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直属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指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选派了一些党员，加强义勇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建立了党组织，郭宝珊和其不少弟兄都入了党。后来，郭宝珊历任红二十八军团长、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副司令员、警四旅旅长、十二师师长，解放后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0 年逝世。⑧

（四）对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对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开展了细致的统战工作，并取得很大成效。杨虎城素具爱国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十七路军并未进行认真的“清党”，其部队中党的地下组织比较健全。

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教育引导十七路军官兵树立爱国爱民的思想，并用抗日救亡的主张去感化上层人士，争取他们的同情。据习仲勋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⑨在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党中央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毛泽东于 1935 年 12 月专门派原红二十六军代理政委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秘密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事宜。^⑩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先后停止剿共，形成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局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和平解决。后来，刘志丹在旧军队中培养的统战对象如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都先后走上革命道路，韩练成、牛化东还成为解放军的中将、少将；刘保堂旅长也成为红军的忠实朋友。

（五）做好面民群众的统战工作

早在 1929 年，中共陕西省委就根据中央指示，在《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中要求加强回民工作，扩大民族自决，反对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正宁县龙嘴子、西渠两乡聚居着 300 多户、2300 多名回民，除 3 户地富外，其余均为佃农，多是从陕西商洛和甘肃平凉等地逃荒而来的。根据陕西省委上述精神，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就开始做他们的工作。1932 年 3 月，谢子长带领游击队在寺村塬建立农

会、赤卫军时，就派人到这两个乡发动回民群众与汉族兄弟一起打土豪、分财产、闹革命，并在两乡建立了党组织，吸收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入党，组织回民代表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使这里的回民第一次享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1934年夏季，王世平、王世英等19名回族青年，组成了回民支队。同年10月，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将回民支队改编为正宁第十六支队，队长王世平，指导员王世英。

⑪到1934年秋天，第三路游击队发展到1000多人，其中所辖回民支队有43人。⑫1935年9月被正式编入红一团，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愈战愈勇，旗帜一直不倒。1934年4月下旬，平子游击队和耀县游击队在正宁县南邑胡同伏击了进犯边区的马鸿逵部骑兵连，打死打伤敌人7名，俘虏16名。为了体现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游击队将死者送到龙嘴子清真寺，按照伊斯兰宗教仪式进行安葬。又给伤兵和俘虏每人发10块银元，由阿訇蔡登霄负责送往山河镇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反响。不久，就有国民党士兵携武器向游击队投诚。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陕甘边南区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在组建革命武装的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也陆续成立。继五顷塬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龙嘴子回民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⑬回族贫雇农当家做主人，管理自己的事务。

①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7页。

②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6—770页。

③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④郭廷藩：《争取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回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421页。

⑤李振海：《国民党永乐镇民团起义经过》，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428页。

⑥郭廷藩：《争取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回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422页。

⑦习仲勋：《陕甘宁边区实施的几项主要政策》，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271页。

⑧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1—20页。

⑨《习仲勋冯文彬谈原十七路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第12页。

⑩《汪锋传》编委会编：《汪锋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2—128页。

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16页。

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

⑬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3页。

三、陕甘边区统战工作的基本特点

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的统战工作虽然带有很大的尝试性、探索性。但是，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功，也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点。

第一，机动灵活，把政策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统一战线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扩大同盟的工作。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党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对此，既不能简单地苟且偷生，又不能到处树敌。党中央对陕甘边地方党组织如何开展对士兵、土匪、哥老会和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思想明确，认识深刻。

《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中就指出：要加紧对士兵的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争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之与工农斗争

结合起来，具体工作上要“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争取士兵；对土匪、哥老会的争取，还要“确立党在里边的领导地位”。对回族等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要加强“联合奋斗的宣传”，“反对民族间一切歧异不平等的待遇，……在以回族士兵为主要成分的部队中，……要特别加紧工作。”^①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领导人，不但对中央的部署认真贯彻，而且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总体上看基本坚持了“需要争取的就争取，能争取的就争取”的思路，采取阶级分析方法，区别情况，灵活开展统战活动，不但成功打入各种旧式武装之中，而且成功争取了士兵，掌握了部分领导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特别是他们对“不反对红军”的开明士绅实行团结，对“回民中的小地主区别对待”等统一战线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是难得的创新，也是很成功的。

第二，把握策略，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陕甘边交界地区，旧式武装力量各种各样，有地方杂牌军队、民团、土匪、哥老会等，他们之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政治面貌复杂且多变。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根据这种情况，一方面坚持党的基本原则、立场和观点，另一方面，广泛利用亲戚、朋友、师生、同学、同乡等各种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刘志丹本人曾经争取到保安县民团团长、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第八旅第十六团副团长、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部第十一旅旅长等身份，也和哥老会大爷拜把子……这些对于发展革命力量，特别是保存革命力量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为了培养军事干部，陕甘边区党和政府没有采取简单划一的办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置。

用各种关系进入旧军队的红军干部，有的当军官，有的当士兵。还在苏雨生部第八旅第十五团成立学兵队，张秀山、高鹏飞、贺晋年等几十个党团员都在这里接受了学习和锤炼。

对于土匪武装，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分化利用和改造的方针。能够争取改造的尽可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则下决心消灭之。“鉴于南梁地区哥老会极多，团结他们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对哥老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法更加灵活，“能使其保持中立的争取保持中立；能使其为我所用的为我所用；能引导其进步的争取一切条件促其进步。哥老会大多数都和我们拉上了友好关系……”
②。

第三，勇于实践，把探索性与务实性结合起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从搞兵运起步，在利用旧式武装派系的矛盾中实现了保存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力量的目的。事实上，在革命武装还很幼稚，敌强我弱，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的情况下，为设法隐蔽、求生并获得发展壮大，必须依靠成功的统战活动。虽然陕甘边区的统战工作从总体上看尚处在探索阶段，面对许多复杂的情况，陕甘边区党和政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和环境独立探索。但是，从后来实践的结果看，陕甘边区的统战工作很务实，效果明显。譬如，在“兵运”工作初期，党组织派一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利用一切机会进入旧式武装中，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教育、争取士兵群众，一旦时机成熟，即举行武装起义。正因为在军队中的统战工作很务实，不但成功组织了一次次武装起义，建立起了革命武装，也培养训练了

从事武装斗争的干部。革命武装建立起来后，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从实际出发，以保存革命力量为重，先后把部队挂名在苏雨生、陈珪璋名下，既克服了当时的困难，又取得了一些物资装备，可谓一举多得。又譬如，争取白区商人到苏区经商、给白军士兵分配土地、对与红军有合作关系的开明地主采取少收土地等政策以及对民团、哥老会、土匪和地方军阀的许多统战策略，也都很务实，很有创造性。

陕甘边区党和政府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积极因素，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为以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①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59—60页。

②蔡子伟：《中共党在陕甘边的统战工作》，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416页。

四、陕甘边区统战工作的成效与启示

统战工作在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基本成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三色”革命思想。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法宝。“左”倾冒险主义在陕甘边区的代表人物杜衡，却否定统一战线，污蔑做统战工作的刘志丹等人是“投降主义”；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反对，使红军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导致寺村塬、照金苏区先后丧失。刘志丹等对此做了坚决的斗争，创造性地提出“三色”革命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1929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红石峡会议，通过了刘志丹提出的“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方针，决定采用“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方式，创建革命武装。“红色”，即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白色”，即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即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储备武装力量。“三色”斗争方式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性质，实质就是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三色”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刘志丹顶住“左”倾领导人的压力，到马鸿逵部开展统战工作，做通了马鸿逵部营长韩练成的工作。后来，韩练成始终铭记刘志丹的教诲，利用他的秘密身份给党送情报，为解放战争时期莱芜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①经过努力，刘志丹还成功地说服保安县哥老会老大马锡五、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民团团总马海旺等参加了革命。1931年10月，陕甘游击队在陇东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根据“三色”革命精神，谢子长、刘志丹大胆接受陇东军阀陈珪璋的收编。陈珪璋拨给游击队冬装1500套，军饷3000元，修理械工具15驮，西药一驮，军医护士两名，工人20余名。②收编后的部队主要领导仍为原游击队人员，保持了游击队的独立性。接受陈珪璋收编，对陕甘游击队度过难关、东山再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当时许多根据地都视统一战线为禁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坚持实行“三色”

革命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一个伟大创举，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

二是促使了陕甘边区工农武装的诞生。陕甘边区的主力红军是由游击队发展壮大而成的。而红军游击队的主要组成人员大多来自旧军队、民团和土匪。陕甘边区最早的工农武装——刘志丹游击队是从永宁山民团抽调 10 多人枪组建而成的。南梁游击队在倒水湾整编时，其核心是刘志丹、刘景范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党在几年兵运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参加整编的有赵连璧部 200 多人、杨培盛部几十人、贾生财部五六十人，共计 300 多人，分编为 3 个大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任大队长。这些队伍大部分人员是组织起来的土匪、争取过来的民团③。

关于陕甘游击队的人员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队委 1932 年 3 月 20 日关于游击活动情况的报告中说：“当驻扎三家[嘉]原时分为二个支队，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杂合而成。”

④杜衡 1932 年 6 月 2 日《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向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说：“游击队是由三部分组织成的：1.山西工农革命游击队完全是在山西特委领导之下的，大部分是同志，成份多半是白军中的下级官长和兵士，还有兵工厂工人、农民，一部分学生，人数有 20 余人，枪枝 30 余支。2.史柱吉[师储杰]完全是土匪，在山西贩鸦片、拉票子，在山西时和游击队有相当关系，人数 100 余，枪六七十支，都是陕北人。3.刘志丹部都是土匪，在保安一带，人 100 余，枪六七十支。”⑤这些记述虽然带有明显的“左”倾教条主义色彩，

但也反映了初创时期的工农武装大部分来源于旧军队、民团、土匪的事实。正是积极实践了“三色”革命思想，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得以不断发展壮大，陕甘边区由此成为西北红军的摇篮。

三是确保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经创建即处于白色势力的包围之中，应对这种态势，除军事手段外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拉拢处于观望状态的中间势力至少使之继续保持中立。为了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府扼杀在摇篮里，从1934年2月到1935年夏，国民党先后抽调正规军和地方民团数十万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集中兵力大范围地运动作战，连续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这固然要归功于红军领导人指挥得当、战士英勇作战以及红军拥有较为巩固的根据地等因素。但是，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对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民团所作的统战工作成效不容忽视。如果所有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民团都以红军为死敌，那么弱小的红军必定会处处受敌，很难顺利地实施作战计划，能否打破“围剿”就很值得怀疑。1933年1月17日，杜衡强令红二团攻打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失利，伤亡二三十人。1月27日，红二团骑兵连在衣食村宿营时遭到夏玉山民团偷袭，战马损失过半。由此可见，破坏与中间势力之间的统战关系，等同于破坏了根据地的政治环境，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陕甘边区革命斗争过程中，始终贯彻着党的统战思想，在全党处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之境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根据实

际情况，灵活地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是非常可贵的。其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其基本启示是：

第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前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动统治阶级尽管人数不多，但掌握着全国政权，并且有帝国主义支持，力量异常强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到 1%，而且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无数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的队伍由原来的 5.7 万人减少到 1 万人左右，全国革命力量骤减，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这力量悬殊、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仅有革命英雄气概是不行的，无产阶级要想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战胜三大敌人，只有同一切革命的阶级、阶层和其他进步力量结成同盟，取得支持，掩护自己，壮大队伍，才能最后取得胜利。陕甘边区党政组织在既无立足之地、人马又少的特定历史环境里，想方设法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开展形式多样的统战工作，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创建了红色政权，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第二，在错综复杂、敌强我弱的斗争环境里，要想争取最大的同盟者，孤立敌人，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列宁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

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⑥毛泽东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当前反对主要敌人之用。”⑦他特别强调，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⑧并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采取不同的政策。陕甘边区在党的统战工作中，既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同时，又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及时改变自己的策略，一方面利用各种矛盾，在民团哥老会等各个阶层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促使了统一战线的建立。

第三，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革命目标。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⑨陕甘边区统战工作的实践也证明，在统一战线中，哪个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它就能在统一战线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并决定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要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但要努力争取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反对一切错误倾向，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四，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走群众路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是党内滋长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日益严重的时期，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承认有第三势力存在，把建立统战关系诬为“与上层军官勾结”，“与地主豪绅勾结”，他们主张“消灭白点”，打掉了几乎所有统战关系，致使许多原保持中立态度的武装势力联合起来帮敌人进攻

红军，造成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建越小的困难局面。1933年7月，陕西省委遭到破坏，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失去了与上级党委的联系，但同时也摆脱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束缚，至此，陕甘边区党的统战工作得以从当地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重大问题。嗣后，刘志丹、习仲勋等坚持走群众路线，灵活利用各种关系，创造性地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统战工作，陕甘边区的民主革命运动从此步入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①皖东、舒平：《刘志丹与统战工作》，《文史天地》2003年第12期，第24—26页。

②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③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3页。

④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⑤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⑥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25页。

⑦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⑧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⑨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第九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群众工作

一、教育引导群众积极支持革命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动力。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大众并以人民大众为革命基本力量的，革命过程就是党和人民结合的过程。胡乔木曾说，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不等于农民自然就追随共产党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是经过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边区政府创建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坚持把工农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当时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与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为党的群众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可能。

（一）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群众

为了使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通过召集群众大会、张贴标语、走街串巷，深入家庭院落等形式，宣传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人民子弟兵，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用具体生动的事例说明红军不害百姓不抓兵，不抢财物不打人，专打土豪和劣绅，济苦安贫，使天下穷人有地可种，号召军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1932

年2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利用集日召开了旬邑县职田镇群众大会。大会推选了3个农民主席，参加大会的群众有四五百人。大会首先宣布红军的任务，解释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红军的任务是什么；其次，宣布解散区公所，焚毁区公所及民团一切账项；第三，将所逮捕豪绅的一切帐债契约当场焚毁；第四，进行分粮。在开始分粮时，一般群众多不敢分本村地主或豪绅的粮食。后来，游击队便将职田镇的粮食运到城外召开群众大会的场地上，请群众自由去取，谁来就给谁，没有领到的，再到职田镇内去领。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正宁寺村塬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立即投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活动。谢子长、高岗、杨重远等和其他队员一起，走村串户，张贴标语，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主张，向群众宣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大意义。1933年春，陕甘游击队占领龙家寨以后，集中于照金、香山地区，一方面加强部队训练，一方面深入村寨，开展群众工作。当时，部队干部战士挨家逐户地到群众家里，促膝谈心、启发阶级觉悟，宣传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组织分粮斗争，获得群众热烈拥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习仲勋、张策等来到南梁地区，积极开展党、政、军工作，挨家挨户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南方苏区革命的大好形势，讲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讲军阀和民团的暴行，大大地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

（二）通过基层组织带动群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建过程中，非常重视建立健全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并积极引导这些革命

群众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使其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早在 1932 年春，正宁寺村塬就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积极支持陕甘游击队建立革命政权。后来，湫头、三嘉、阳坡头等地也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军等群众组织，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

在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家以访贫问苦，相继建立起芋园、房上、陈家坡、韩家山等农会，同时，北梁、老爷岭、绣房沟等村相继建立起妇女联合会，以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为骨干的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也先后成立起来，在站岗放哨、肃特反霸、维护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习仲勋、张策等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③南梁地区最早建立的群众组织是金岔沟农民联合会，1933 年秋成立，主任白阳珍。之后，白马庙、玉皇庙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等。这些群众组织有的是半政权性质的，他们代表农民管理部分政务，如召开群众大会、分配牛羊等。1934 年秋，甘肃的东华池、平定川、太白镇，陕西的白

豹川等地普遍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1935年初，庆北地区柔远一带成立了7个农民联合总会，分管武家河、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城壕等地的20多个农民联合会。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苏维埃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等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通过实际行动影响群众

用实际行动教育影响群众是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一大优势。在南梁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开始，群众对红军还不很了解，红军一来，都吓跑了。红军就以实际行动扩大影响，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要折算成钱，并给留下字条：‘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解放穷苦老百姓，等等，离开时，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一来，群众对红军由害怕到不怕，再到关系密切。”④一次，红军在正宁县的一个地方驻防，司令部的一个马夫拿了群众的一条布腰带，抓了一只鸡，群众随后跑来告状。刘志丹知道后，第二天召开了全体军人公审大会，宣布了这个马夫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并结合他过去一再违犯纪律的不良表现，经战士讨论，决定立即予以枪毙。有一次，刘志丹在行路中误伤了群众的护羊狗，为此他不仅替群众守护了大半夜羊群，还主动赔偿群众的损失，自罚禁闭3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建初期，习仲勋等采取挨门挨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带领游击队打土豪，分牛羊、财产、土地，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

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

⑤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让群众晓谕党的主张，从而把群众团结到党和苏维埃的旗帜下，为革命事业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陕甘边区群众工作和革命斗争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⑥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1 页。

②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陕甘边根据地与照金苏区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集》（二），内部资料，2013 年版，第 25 页。

③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6 页。

④《王殿试 1959 年 4 月 28 日谈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1 页。

⑤蔡子伟：《南梁革命斗争片段回忆》，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35 页。

⑥王首道：《中央为刘志丹平反》，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7 页。

二、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群众是革命运动的力量源泉，有了群众，就能战无不胜；没有群众，则一事无成。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各项工作中，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去开展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

地革命、动员参军、拥军拥政、民主参政等群众运动，汇成了热浪滚滚的革命洪流。

（一）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对广大人民的庄严承诺。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宣告成立。随后，各县陆续建立了革命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党在陕甘边区进行民主政治的有益尝试。苏维埃政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群众从民主制度中首次表达自主的意愿，首次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首次成为自己的主人。同时，苏维埃各级政府实施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并管理自己的政权，极大地增强了陕甘边区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了各级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获得新生的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政权，积极保卫自己的政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此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底，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十多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已达2.3万平方公里。

（二）保障群众享有基本生产资料的权利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关革命、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提问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①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刘志丹等就开始了领导以打土豪、分浮

财、废除地主债权等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在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中，习仲勋深知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于是指导各县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紧密团结贫农团和雇农工会，调查各村土地占有情况，宣传土地政策，丈量核实土地，组织领导群众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地少地农民。并且在分配土地时，习仲勋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整天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很快就将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使玉皇庙、白马庙、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地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心。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依据农户经济状况，划分了阶级成分。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成分极为重视，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中热情接待因划定成分等问题来访的群众，及时纠正政府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偏差。陕甘边区土地革命的开展，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扩大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三）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

陕甘边区的党组织和政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关心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疾苦，切实解决群众衣食住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部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比较重。为度过难关，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为了减轻群众负

担，政府在向敌人夺取的同时，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打土豪或缴获敌人的财物，除留给政府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还发动、依靠人民的力量，兴办合作社，发展农副业生产，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例如，“当时，军队和干部买鞋的人很多，集市供不应求，后来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群众发布让做鞋，并规定了合理的手续费，群众都抢着做”。^②这些经济措施，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使他们把自己的切身利益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踊跃参加革命武装，积极支持革命战争，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了解群众的冷暖，体察群众的疾苦，是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自幼就生活在群众之中，耳闻目睹了陕甘一带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悲惨社会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很早就萌发了改变不公平社会的雄心壮志。在陕甘边区的革命实践中，他们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时处处注意维护群众利益。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都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称他是“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称呼“老刘”、“老谢”、“仲勋”。很多传唱至今的陕甘民歌就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美国友人李敦白回忆当年在陕甘边时，与习仲勋在一块，走到哪里，老百姓都会亲热地喊“仲勋啊”，亲密无间^③。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

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④历史证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与党和红军坚持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①埃德加·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7 页。

②《张志富 1959 年 4 月谈苏区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5 页。

③李忠杰：《在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编委会编：《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 页。

④边民：《陕北共匪猖獗的原因及今后围剿之步骤》，原载《秦风》1934 年 11 月，现载祁玉江编：《志丹书库·刘志丹卷（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41 页。

三、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一切工作有赖于党员发动群众去做，依靠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得以生存，使根据地得以发展。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灵活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一）依靠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建立，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两次转移活动中心，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三个阶段。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

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入到群众中去，打土豪，分田地，让穷苦百姓有田可耕，有衣可穿，有饭可吃，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次，刘志丹和马锡五路过合水县一个叫老场的村子时，两人又累又渴，就来到当年曾住过的刘大娘家里讨水喝。刘大娘见了帮助穷人闹革命的恩人来了，坚持要他们留下吃过饭再走，推辞不过，他们就留下来。因为太累，一会儿就睡着了。等他们醒来时，刘大娘已做好了两碗新鲜的荞面，可当时大家没有存粮，新荞麦还没有收割，大娘哪来的荞面？在刘志丹的再三追问下，刘大娘才说，是刚从地里割了些半熟的荞麦，用棍子捶，用手揉下颗粒来，再在锅里炒干，用碗压碎碾细，为刘志丹做了顿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详情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在南梁革命斗争时期，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保卫红色政权，他们倾其所有，奉献出了自己的粮食、财产，乃至宝贵的生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当时，到处可见母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的动人场面。以至于在边区苏维埃政府为打退国民党“围剿”主动撤出南梁时，人民群众不怕流血牺牲，勇往直前地选择跟着中国共产党。他们坚壁清野，躲藏隐蔽于深山老林，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既找不着人，也没有粮食，甚至连做饭用的锅都找不到，敌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边区政府领导成员时，人民群众忍受残酷的严刑拷打也决不泄密，用生命保卫红色根据地，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

（二）依靠国统区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陕甘边区党和政府认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群众工作难度大，风险多，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采取恰当的方法，开展群众工作，积极消除“红白对立”。“志丹同志很会利用各种关系为我们开展白区秘密工作。通过志丹同志的关系，安塞、保安县伪政府的不少人经常给我们送来了关于敌人方面的情报。”^①“当时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我们就用单线联系的方法，以严密党的组织，主要任务是调查敌情，培养骨干。在彬县、旬邑、宜君和正宁县城内从广交朋友、拉关系人手，经过许多周折，大体上掌握了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随之大力选拔了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作为开展活动的基本力量，还团结了除反动的地主分子以外的开明人士。对地方上的老知识分子也进行争取和团结，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②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成效显著，赢得了根据地外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国统区的群众中流传着“天干望雨水，人穷望志丹”的歌谣。1934年，有一次，国民党官吏强迫贫苦农民缴纳烟款，老百姓不堪忍受，于是暗中虚传刘志丹红军一定要来集义镇，甚至有人晚上写标语欢迎刘志丹红军，使国民党官吏惶恐不安。^③在危险的战场上，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也心向红军、支援红军。“当时，国民党军打仗，总拉老百姓用毛驴驮子弹、粮草。我们在前面和敌人一开火，老百姓就拉着牲口朝后边跑，送给红军。”^④1933年7月，红二十六军在“左”倾错误的强迫下脱离根据地，南下终南山全军覆没后，渭华一带的群众和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寻找失散的红军指战员。在群众的掩护下，

刘志丹、王世泰、高锦纯、吴岱峰等 80 余名指战员安全返回了陕甘边区。

（三）做好各路长征红军支前工作

1935 年 7 月下旬，在收到甘泉、延安、酈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印发的“八一宣言”材料中得知中央红军准备北上的消息后，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积极开展长征红军将要路过地区的群众工作。8 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代理书记、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在研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时，专门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在 8 月 5 日通过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中，对于长征红军行动方向的判断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强调：“向甘肃发展，在策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方面有着重大意义。因此，应责成定边党向西开展庆环工作，并恢复庆北苏区。”“虽然自曲（子）环（县）以至宁（县）、正（宁）是人烟稀少的千百荒山，但为了与中央红军的呼应，必须争取陇东的发展，而宁（县）、正（宁）、庆（阳）、合（水）、环（县）是争取陇东的必要阵地。”^⑤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中央红军将要到达地区的工作。陕甘边区党和政府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主要体现在粮食和物资方面的工作。

关于红二十五军的支前工作。据当时任甘洛县第一区赤卫军大队长李世俊回忆：1935 年 7 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下寺湾的河滩上，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红二十六军的部分部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干部及政治保卫队，甘洛县各区赤卫队，及延安、部

县几个临近区的赤卫队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大会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首先讲话，他说，我们根据地的形势发展很快、很好。最近，我们的一支兄弟部队要到陕甘苏区来，我们要积极做好迎接他们的一切准备工作。接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长马锡五讲话。马锡五在讲了形势问题后，重点讲了粮食工作。他说：“现在我们根据地军民要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习仲勋同志讲了，我们的兄弟部队要来。这样，粮食工作就更显得重要。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兄弟部队一到，我们就需要比现在还多的粮食。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向农民要更多的粮食，咋办呢？我的意见，今后打下地主、土豪劣绅的粮食，都要节约使用，要保管好这些粮食，防止霉烂，使兄弟部队来我们这里后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多，我们粮食的主要来源还只是打土豪、打地主，所以，大家要十分注意节约粮食；同时，还要争取多种、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马锡五讲完后，甘洛县第一区区委书记王英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种好庄稼，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李世俊接着回忆说，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个兄弟部队要来。过了不久，到这年八月，红二十五军果然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的带领下，转战陕南、陇东来到陕北苏区，有好多部队还在我们甘洛县一区的永宁山附近宿了营。这时，已担任甘洛县一区区主席的李世俊，送了十多头猪、一百多只羊等许多慰劳品慰问红二十五军的将士。⑥

红二十五军到来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动根据地群众积极支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群众也像接待亲人一

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⑦到处洋溢喜迎亲人的欢乐景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军委主席刘景范前往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在下寺湾一带休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派团长黄罗斌为代表，到刘家堡欢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

习仲勋主持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徐海东、戴季英和红二十五军全体将士与边区军民一道参加会议。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会后，还演出了眉户剧，款待红二十五军的将士。徐海东看后连声称赞道：“好戏！好戏！”⑧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热心照料下，红二十五军将士很快恢复了体力。

关于中央红军的支前工作。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后，当地群众将这一特大喜讯传遍了整个陕甘边区。赤源县委派了赤卫军大队长赶着牛、羊慰劳中央红军。陕甘晋省委也派人前去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苏区人民全体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碾米磨面，赶制棉衣、棉鞋，保证了中央红军的物资供应。对于中央红军长征在陕甘边区的顺利通过以及吴起镇“切尾巴”战斗的胜利原因，《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如跟踪以入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亡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而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彭德怀在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作猛烈反攻，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

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⑨范长江在当时情况下能直接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陕甘边区时得以顺利行军直至取得吴起镇战斗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刘志丹、习仲勋在陕甘边区有效的群众工作，是很有见地的。

11月21日，直罗镇战役开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积极行动起来，支援红军作战。邠县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准备担架，在短期内就为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筹集粮食10多万公斤，组织担架队员1000余人，担架500余副。^⑩在陕甘边区军民的大力支援下，直罗镇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举行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作了总结，他指出：群众和我们一致，没有这个条件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草，都不可能做得这样好。他强调，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胜利与敌人失败。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对直罗镇战役作出高度评价，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⑪

^①蔡子伟：《中共党在陕甘边的统战工作》，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决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415页。

^②《郭廷藩1985年7月谈陕甘边南区、新正县》，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

③刘葆璋：《刘志丹同志给集义镇学生和人民的印象》，《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3日。

④杨培盛：《和老刘在一起“闹红”的日子》，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

⑤《中共陕甘边区特委1935年8月5日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⑥李世俊：《回忆马锡五同志》，革命回忆录：《陇原星火》，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⑦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⑧张文华：《陕甘边领导机关在洛河川》，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⑨范长江：《刘志丹之鼓动与民众之背向》，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4页。

⑩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页。

⑪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都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伟大开拓者之一。毛泽东先后为刘志丹、谢子长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中，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坚持把实现党的总目标同发动组织群众、团结依靠群众结合起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确保了苏维埃革命的开展，初步显示出党在陕甘边区局部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创造了党群关系密切和谐的典范。

第一，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群众工作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党在陕甘边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局部执政，关

键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而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提出“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问题，他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在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①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最根本的宗旨，也是红军最根本的宗旨。陕甘边区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努力为最广大的群众谋利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刘志丹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都非常重视时时处处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与战士的利益。部队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首先分给劳苦大众，然后才是部队。部队分配东西时，先分给战士，然后才是干部。红军打下合水县后，分发没收豪绅衣物时，他要求先分给战士和群众，分到最后给刘志丹分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他只得将它翻过来穿。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党的号召，带头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他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战时带头抬担架，用给自己配备的马匹运送伤员、驮行李。有一次他看到一位老人病倒在路上，就背起送到医疗所。而且他记性很好，和群众见一面就能记下，过多年再见，他还能叫出其名字。在照金时，红军严格执

行买卖公平原则，坚持集市交易时让群众先买，让群众参加“红军寨”施工、做军鞋等任务时，付给工钱，有时也付烟土作为劳动报酬。正因为党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群众才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当地群众动情地唱到：“打倒了土豪分牛羊，分了那个田地又分粮，千年的枯树还了阳，受苦人翻身喜洋洋”。②

第二，紧密依靠群众，坚持调查研究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群众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中，刘志丹十分重视实际调查，哪一塬、哪一村人家多少、窑多少、锅多少，一清二楚。当地居民惊呼：“老刘咋比咱还知根底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非常注重做调查研究，先后深入到二将川、南梁堡等地的贫苦农民中，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分粮食、分牛羊、分财产，逐步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习仲勋坚持深入广大农民群众之中，进行社会调查，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从而为制定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提供依据。如在土地政策方面，规定给农民分配土地时，不能只分田，不分苗，影响农民的生产，降低农民的情绪，而且还将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农；边区政府还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设立了集贸市场，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并发行苏区货币，建立苏区金融体系，每逢集日，习仲勋都要到集市上去看交易情况，

探讨活跃市场的办法，保证了边区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③而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正是陕甘边区党和政府致力于革命和从事群众工作宝贵历史经验的总结，靠着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第三，改进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增强做好群众工作本领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群众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措施。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必须通过正确的工作方式方法来完成。毛泽东曾经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④为了广泛地宣传鼓动群众，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特别注重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随形势发展而变动，通俗易懂，行之有效。对党员干部主要是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教育方式有召开支部大会或党员干部会议、出版报刊、创办干部学校和举办各级政治训练班等，重点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针对红军队伍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比较盛行的现状，红二十六军政治部有计划地在红军队伍中开展了革命形

势和任务教育、红军常识教育、政治常识教育、军民关系教育等，并采取集会、上政治课、早晚点名、个别谈话等方式，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军事、文化等专题训练，一边学习，一边做群众工作。对广大群众主要是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方式方法上，则根据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一般群众主要是以业余的文化教育为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其中。通过组织演讲会、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教唱红色歌谣等，向广大群众宣传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扩大红军的影响。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既是识字教材，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对妇女这一群体首先是灌输男女平等思想，解除思想桎梏，然后再进行文化知识与政治理论教育。对列宁小学的学生除灌输阶级意识和政治观点外，还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党团社会活动，如扩红宣传队、给前线战士写慰问信、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收集破铜烂铁支援军工生产等。对各种社会势力的群众工作重点放在团结、教育、引导上，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促其思想观念逐步变化。陕甘边区党和政府还通过发文通电等形式，教育民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比如，1932年5、6月间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1933年4月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进攻华北宣言》等。先进的革命思想理论就这样通过灵活多样、通俗易懂的形式，植入教育对象的头脑之中，成为他们行动时的思想指南。实践证明，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采取的这些群众工作方式，通俗易懂，能较好地为广大民众接受，因此取得了很大成效。

第四，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群众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巨大优势。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都是以身作则的典范。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他密切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在南梁革命斗争时期，刘志丹自觉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想到的总是人民群众，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刘”。他作为部队的总指挥配备有一匹马，但他几乎从来不骑，行军总是步行，把马让给病号骑。他穿的一件缴获来的破呢子大衣，白天搭在马鞍上当坐垫，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总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正因为如此，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说他是活地图。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去世前，还遗憾地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情太少了！”^⑤习仲勋在陕甘边时期，不避寒暑，走村串户，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深受群众的敬重和信赖。据张策回忆，他和习仲勋到南梁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村村演讲，经过一个春天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民团、雇农会等组织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⑥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正是由于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陕甘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和异常困难的

条件下，创建和发展了陕甘边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人民群众生活有了一定保障，对于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成效和影响力，当时，著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通过在西北的实地采访，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他针对着政府（指国民党）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羊子给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⑦

党在陕甘边区群众工作的经验启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关系到党的兴旺发达和生死存亡。在做群众工作时，既要为民造福又要清正廉洁，既要立党为公又要执政为民，既要宣传动员群众又要组织群众，既要关心群众生活又要注意工作方法。只有不断巩固和扩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有可能实现长期执政。

①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②高文、巩世锋编：《陇东红色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15页。

④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页。

⑤叶滨：《子长负伤以后》，《解放日报》1946年3月1日。

⑥张策：《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0 页。

⑦范长江：《刘志丹之鼓动与民众之背向》，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93—794 页。

第十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建设

一、陕甘边区的军事机构

“六大”以前，中央曾对地方军委的组织、指挥系统和职任做了明确规定。要求军委书记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苏维埃的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须由得力同志组织之。苏维埃的军委同时即为党的军委，不仅有建议领导权，而且应负指挥管理军事之责。在陕甘边区苏维埃运动全过程中，依据军事力量和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先后建立起党的地方军委。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1933年6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失败。7月下旬，驻防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与此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建的游击队和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进入照金。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恢复党籍的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继续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

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刘志丹、习仲勋等任委员，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机构，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统一指挥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任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

1934年11月7日，在南梁召开的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寨子湾，主席刘志丹（后为刘景范），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秘书长张策（后为杨在泉），供给部长马锡五，委员有刘志丹、高岗、杨森、杨琪、黄子文、边金山、张秀山、吴岱峰、郑伯翔、王世泰、张仲良、孔令甫、刘景范、黄罗斌、高锦纯、黄子祥、赵国卿、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

①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辖陕甘边区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等。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政治部主任兼秘书长白坚，参谋长朱子休。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北特委，保留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由李生华、刘景范分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书记。9月，党中央和长征红军到达陕甘地区，11月调整陕甘地区的党政军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

二、陕甘边区的军事力量

（一）主力红军

红二十六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陕甘边区革命的主要武装力量，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有力支柱和重要保障。1930年10月，刘志丹发动“太白起义”，成立了南梁游击队。嗣后，相继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主持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杨重远任团参谋处长，刘约三任团经理处长，杨琪任团管理处长，史克寿任共青团委书记，骑兵连连长曹胜荣，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步兵第一连连长李亚夫，指导员李秉荣；步兵第二连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指导员魏武。全军共200余人。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陕西蓝田失败。1933年1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恢复后的红二十六军未建立军部，只建立了第四十二师。1935年9月，红四十二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建制不复存在。

红四十二师。1933年11月上旬，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成立。在刘志丹等陕甘边区党政领导的主持下，1933年11月8日，陕甘边区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在合水县莲花寺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供给处主任刘约三。下辖两个团，5个连，共500余人，战马200

余匹。次年1月，王泰吉去白区做兵运工作，刘志丹接任师长。高岗因违犯军纪调职，杨森接任政委。5月，刘志丹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杨森接任师长，高岗复任政委。7月，阎家洼子会议上，撤销高岗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政委。8月，谢子长在陕北作战负重伤，10月伤势恶化，不能坚持工作，由张秀山接任政委。

红一团。1934年9月中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在正宁湫头召开会议，决定以第三路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②。红一团以三路游击指挥部所属特务队、四支队为主，并从正宁五支队等抽调部分人员组成。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下辖2个连，共约200红。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炳坤，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红一团成立后，与三路游击队配合，主要在陕甘边南区活动。1935年4月1日，瓦扇子战斗中受到损失，团长陈国栋负伤离队，政委张仲良调离，陕甘边区军委派黄子文代理团长，张文华任政委。以后，寇金财、贾文义等先后任团长，郭炳坤等曾任政委。红一团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组建了1个骑兵连。后来又以正宁回民支队、彬县民团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第四连，为巩固、发展、保卫陕甘边南区作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5月，红一团作为主力红军，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

红二团。1934年1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二路游击队的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重新组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刘景范任团长（1935年4月，刘景范调任边区军委主席，孔令甫接任），胡彦英任政委，王生荣任参谋长，

朱奎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团下辖两个步兵连和 1 个少年先锋队，③全团 180 多人。1934 年 2 月，红二团随刘志丹北上安定地区活动。1935 年春，红二团在兵力充实的基础上，将一连分编为一、三两个连。2 月，由安定回到南梁苏区，积极投入反“围剿”斗争。6 月中旬，红二团归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建制。1935 年 9 月 18 日，红十五军团在延川县永坪镇成立，红二团编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二三四团，郭宝珊任团长，马佩勋任政委。

红三团。1933 年 11 月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 and 红四团少年先锋队合编而成，约 280 余人，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次年 5 月，黄罗斌接任政委。1935 年 1 月，柳村塬战斗中王世泰负伤，吴岱峰代理团长。红三团作为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转战南北，在开辟陕甘边苏区、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斗争中，经历大小数十次战斗，不断得到地方游击队的补充，扩编为 4 个连。1935 年 9 月 18 日，红三团被编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二二二团，王富贵代团长，黄罗斌任政委。

红四团。1933 年 7 月 24 日，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活动在陕西省三原县武字区的渭北游击队正式整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赦任参谋长，下辖两个步兵连。步兵一连连长马志舟，指导员王柏栋；步兵二连连长高占胜，指导员王安民，共 120 多人，枪 80 余支。8 月上旬，红四团冲破国民党军“围剿”，

转移到照金根据地。不久，又北上南梁。同年 11 月，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

骑兵团。1933 年 11 月由红四团一、二连等整编而成，约 180 余人，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张秀山、高锦纯先后继任骑兵团政委），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骑兵团成立之初，只有 2 个连队，因马匹很少，二连为步兵。1935 年 3 月上旬柳村塬战斗，团长赵国卿负伤，康健民继任团长。在革命斗争的烽火岁月里，骑兵团在陕甘两省南征北战，为创造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5 年 9 月 18 日，骑兵团被编为红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康健民任团长，高锦纯任政委，刘约三任参谋长。10 月，又改编为中央军委直属骑兵团。

西北抗日义勇军。1934 年秋，盘踞黄龙山的土匪梁占奎手下营长郭宝珊，在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影响下，于当年 10 月 20 日率 120 多人在庆北新堡起义，投奔南梁革命根据地，被红军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华任政委（后由黄罗斌、马佩勋先后接任政委），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队长段荣启，二大队队长王东来，三大队队长杨茂堂。④1935 年 5 月 1 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⑤第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胜利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会师时，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兵力近 1000 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一、二、三团共有兵力 1250 余人，两部共 2100 余人。1935 年 9 月，与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第二三四团。

（二）地方游击队

陕甘边区苏维埃运动中，除正规的主力红军外，还建立了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等军事或半军事性质的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以各种手段展开对敌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是红二十六军的有力助手和不可缺少的后备力量，在红色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根据陕西省委指示，1933年3月中旬，红二十六军在照金正式建立了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总指挥部成立后，组建起21支游击队，有队员五六百人。5月，习仲勋作战负伤，由张秀山接任政委，将游击队整编为旬邑、耀县、淳化3支游击队。9月下旬，陕军4个团在6县民团配合下，对照金根据地发动“围剿”，李妙斋率队抗击敌人，英勇牺牲，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定吴峰和高锦纯任游击队正副指挥，组织反“围剿”斗争。10月16日，照金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占领，该指挥部转移至甘肃合水县，包家寨会议后撤销。

芋园游击队。1932年秋，李妙斋在照金地区的芋园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10月，组建了芋园游击队，全队约40多人，队长邓克勤，副队长王金海。主要活动在耀县以北的土桥原一带。年底编为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一支队。

妇女游击队。1933年2月，李妙斋率领游击队到达照金北梁村，组成一支30余人的妇女游击队，队长王有莲。主要任务是放哨、送信、护理伤员及缝制军装。1933年10月中旬，照金薛家寨被国民党

军偷袭后失守。国民党军攻上寨子后，妇女游击队向山顶撤退，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上来。女战士有的高举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其余 20 多名女战士跃身跳下悬崖，除 2 名女战士被树枝托住，幸存下来，其他均壮烈牺牲。妇女游击队长王有莲为掩护战友突围，只身冲出梢林，将国民党军引向他方，英勇献身。

⑥

淳化游击队。1933 年 3 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主持召开淳化县白庙、薛家党支部会议，决定成立淳化游击队。后刘志丹亲自授旗、授枪，共产党员任连俊、罗述存等在淳化县白庙村老城成立淳化游击队，队长罗述存，副队长任连俊，指导员聂俊成，有队员 20 多人，下设三个班，李三合、薛有明、卜应林分别任班长。4 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纸房沟对其进行整编，命名为陕甘边区游击队第十一支队，直接归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队长罗述存，指导员聂俊成。1934 年 10 月，因国民党淳化县政府军事“围剿”，游击队被迫解散。⑦

耀县游击队。1933 年 7 月 22 日，按照渭北工委和耀县县委决定，耀县游击队在阿姑社成立，计有 120 多人。28 日在白家庄进行整编，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任指导员。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长陈国栋，二中队长安仁，三中队队长张治怀。8 月，耀县游击队被编为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三支队。⑧

旬邑游击队。1928 年 5 月，许才升领导的旬邑暴动失败后，有 30 多人的暴动农民在吕振邦、程双印带领下转入石门山区，整编成

旬邑游击队，队长吕振邦、副队长程双印。1932年初，红军陕甘游击队将旬邑游击队改编为特务队，程双印任队长。程双印被叛徒陈克敏杀害之后，特务队编入三原武字区游击队。1933年7月，红二十六军派吕自诚重建游击队，当月，旬邑游击队在旬邑底庙组建，队长吕自诚，指导员刘正发。1934年9月编入红四十二师第一团。

2.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一路指挥部。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决定，在陕甘边区建立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同年底，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一路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派强世清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作为第一路游击队主力部队的红一支队在返回陕北安定作战中，强世清、魏武先后牺牲，后红一支队在李盛唐、贺晋年等领导下，顽强战斗，成为陕北独立师第一团的基本部分。

陕北红一支队。1932年3月12日，刘善忠、高朗亭和杨秉权等人，化装到清涧县的淮宁湾雷珠山寨子，缴了地主民团的6支步枪。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4月，延川游击队在群众配合下，袭击延川县永坪镇地主武装民团，缴获步枪17支，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刘善忠任司令员，高朗亭任政委，杨作栋任参谋长，刘益三任经理处长。1932年10月上旬，在延川县高家圪塔，中共陕北特委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任政委。⑨1932年11月，陕甘游击队骑兵连连长强世清、史法直等回到陕北老家，先后参加红九支队。不久，陕北特委任命强世清为九支队副队长。1933年4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决定，

把红九支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⑩强世清任支队长，李成荣任政委。5月10日，强世清带领20余名战士南下寻找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取经并补充枪械，当时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杜衡指派杨重远为红一支队政委，并给补充了些枪械。强世清与杨重远率队于5月29日回到安定县谭家峪时，杨重远政委在战斗中殉职。1933年9月上旬，强世清带三个分队，二次南下陕甘边，在甘肃合水县固城川与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会合，一起进行作战活动，先后取得了旬邑张洪镇、合水县城等战斗胜利，人员装备得到充实。由于陕北一支队在安定一带打过游击，地形较熟，包家寨会议决定派队长强世清、政委魏武率领一支队作为第一路游击区的基本部队，回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红四十二师还抽调魏武、惠泽仁、康健民等干部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领导力量。莲花寺整编后，1933年11月15日，强世清、魏武率领陕北一支队100余人由陇东回到陕北安定。11月20日，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游击队仓促向驻守枣树坪的井岳秀部一个连发动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未克敌据点，部队伤亡很大。惠泽仁等牺牲，总指挥强世清身负重伤，离队养伤，后被叛徒出卖，惨遭国民党军杀害。强世清牺牲后，红一支队队长由白德胜代理。为了摆脱困境，部队分两路，一路由政委魏武率领在安定坚持游击活动，途中遭敌袭击，魏武不幸牺牲，后张承忠代理支队政委。一路由白德胜、谢绍安、任志贞等率领到延川县永坪、关庄等地活动。此后，白德胜、任志贞先后遭敌逮捕。剩余战士由张承忠、谢绍安等带回安定北区。面对失利，张承忠等决定埋枪分散活动。陕北一支队

虽然未现预定的任务，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影响，其中有不少革命骨干坚持战斗，为后来恢复陕北一支队，扩大陕北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回到陕北，了解到红一支队的情况，严肃地批评了埋枪散伙的错误，决定马上恢复红一支队。中共陕北特委遂派红二支队的白雪山、崔正冉等护送谢子长到安定、延川地区进行恢复一支队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集中了分散人员，于1934年3月8日，在刘家圪崂恢复了第一支队，李盛唐任支队长，谢绍安任副支队长，刘明山任经济委员，以后谢子长又任命贺晋年为红一支队政委。此后，红一支队在横山县的大庙山、冷窑子等地打了几次胜仗，队伍扩大到50多人，50多支枪，赤卫军、少先队也发展到五六千人，成为陕北游击队的一支劲旅。

3.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二路指挥部。1934年1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包括庆阳、合水、保安等地的第二路游击区，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二路指挥部，总指挥杨琪（1935年春马福吉任总指挥^⑪），政治委员高岗（1934年5月，惠子俊任政委，1935年春龚逢春任政委）。1934年5月后隶属陕甘边区军委领导，辖庆阳、合水、保安、庆北、环县、庆华等游击队，队员发展到1000多人。

庆阳游击队。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小河沟成立，队长杨培盛，指导员习仲勋^⑫，活动于二将川、柔远川一带。1934年夏，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下编5个中队和一个少年先锋队^⑬，队长邵怀

德，政委张秀山。同年 11 月，抽调大部人员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第二连，游击队将剩余 40 多人进行整编，整编后，队长张志孝，政委王宝珊。1935 年 3 月，编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所留 10 多名骨干在元城子重新组成庆阳游击队，队长王宝珊。11 月后隶属华池战区军事部。1936 年春，游击队发展到 100 多人，改名为庆北游击支队。⑭

合水游击队。1933 年 11 月，在南梁豹子川王街成立，张振东、王志林、赵生、李树林先后任队长，孙铭章、刘约三、白天章、武海潮先后任指导员。1934 年 1 月后，隶属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合水游击队成立后，首战东华池堡，诱缴张怀治民团步枪 25 支，后活动于东华他、太白一带。到 1934 年 11 月，游击队发展到 180 多人，编为 3 个中队。一中队中队长朱天胜（后为朱炳财），指导员罗义福，朱炳财调任骑兵团排长后，第一中队随之解散；第二中队中队长赵生，指导员曹森；第三中队中队长夏松柏，指导员白天章（后为武海潮）。1935 年 11 月转隶华池战区军事部。⑮

郿县游击队。1933 年 6 月，何彦江受红军指示，在直罗镇小河子川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地方武装。9 月，何彦江等在槐树庄创建了一支 30 多人的自卫队，队长张生太。受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派，11 月，李彦等在小河子川创建了 20 多人的赤卫队。为了有力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不久，两支赤卫队合并，改编为郿县游击队，队长张生太，指导员段保全。⑯1934 年春，红二十六军骑兵连长边德荣担任了郿县游击队队长，段保全任指导员。郿县游击队下设 3 个中队，

共有队员 60 多人。一中队队长韩明奎，二中队队长李兴发，三中队为少先队，队长白光明。游击队经常在陕甘交界的中部、洛川、甘泉等地打土豪，分田地，扩大了红军影响，壮大了游击队，为发展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①⑦

保安游击队。1933 年 11 月，在南梁小河沟成立，队长刘约三，指导员王英，下编两个班，一班长王文昌，二班长黄克强，共有队员 20 余人，主要活动于南梁、洛河川一带。1934 年 2 月，改编为保安游击支队，支队长刘景范，政委王英。同年 11 月，游击队发展到 100 多人，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二连。尚余 30 余人，仍称保安游击支队，支队长兼指导员张明科。①⑧

华池游击队。1933 年，共产党员黄德明受刘志丹派遣，在合水县葫芦河一带建立了 30 多人的赤卫队。1934 年春，改编为华池游击队，共 40 余人，队长黄克秀，指导员张朝贵（后为陈梅利），军事参谋长黄德明。1935 年 11 月转隶陕甘省华池战区军事部领导。①⑨

庆北游击队。1934 年春在华池县柔远川成立，队长赵占魁，指导员任有升，活动于柔远、温台一带，4 月，由于叛徒出卖，队长、指导员遇害，游击队解散。秋季，庆阳游击队帮助恢复了庆北游击队，队长李树林、指导员赵志善。1935 年 9 月，隶属庆北办事处领导。1936 年 2 月撤销。②⑩

安塞四支队。1934 年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委派王志昌、吴亚雄到安塞壮大地方武装力量。同年 7 月，王志昌等率人收缴了刘老庄、胡皮头等地的民团武装，组建了安塞四支队。王志昌任队长，

吴亚雄任副队长，队员 100 余人。是年 10 月，游击队大部分编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小部分仍编为四支队，吴亚雄任队长。四支队主要活动在三边、保安、安塞等地，配合红二十六军作战。1935 年老君殿战斗结束后，编入陕北游击队一纵队。^{②①}

酈甘游击队。甘泉道镇、府村一带有股匪经常活动，为首头领茆青山，共 50 多人，有枪 20 余支。1934 年 4 月，酈甘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配合陕甘边游击队将其收编，命名为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二路第六支队，亦称酈甘游击一支队。主要活动在酈县西北部和甘泉道镇、府村及洛河川一带。1934 年 6 月，酈甘县革命委员会又在大申号川一带创建了一支游击队，称酈甘游击二支队，队长高怀春。因茆青山恶习未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利用茆青山到南梁堡开会之机，将其击毙。7 月，在酈甘游击一、二支队的基础上，经过整顿改编，成立了酈甘游击队，队长郝占海。^{②②}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派刘秉财任队长，杨庚武任指导员，队员增至 200 余人，辖 3 个小队。

酈西保卫队。1934 年 4 月，酈西保卫队正式成立，队长薛生荣，指导员方有才，队员由开始的 10 多人发展到 30 多人，编为三个班，一班长李景春，二班长杨森林，三班长何彦勋，其具体任务是保卫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②③}1935 年 11 月，酈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酈西与酈甘保卫队统编为酈县独立营。

酈甘保卫队。1934 年 4 月，酈甘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了酈甘保卫队，队长先后为郭西山、崔云华，

主要活动在大申号川及甘泉府村川一带。1935年11月，酃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酃西与酃甘保卫队统编为酃县独立营。^{②④}

酃西警卫队。1934年4月，酃西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了保卫和扩大苏区，建立了酃西警卫队。下设两个支队，南川为一支队，队长郭振明，有队员20多人；西川为二支队，队长刘新汉，10多人，主要活动于小河子川一带。1935年11月，酃西警卫队同酃西、酃甘保卫队统编为酃县独立营。^{②⑤}

安塞五支队。1933年秋，刘志丹、高岗先后到安塞县洛上川的胡皮头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1934年春，中共安塞县支部书记康全明借府君店民团团总冯继顺离任之机，收藏了民团长枪12支、机枪1挺、子弹12袋、手榴弹20枚。同时，策动民团团丁王世明等7人离开民团，成立游击队。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遂派郝兴明前来指导工作。是年6月，在孟家庄召开群众大会，正式组建了安塞五支队。选举胡兆阳为支队长，任命郝兴明为指导员，有队员30余人。9月，胡兆阳调离，王世明任支队长，刘彦胜任副支队长，队员发展到60余人，枪40余支。支队下设1个先锋队、2个中队。1935年春，郝兴明牺牲，安塞县革命委员会对游击队重新进行整编，张志效任支队长，龚逢春任政治委员。5月，张志效调离，方志厚接任支队长。7月，五支队在配合红军骑兵团、红一团攻打延安的战斗后，其中280人编入红二十六军补充营，所余50人编为安塞一支队。^{②⑥}

保安保卫队。1934年7月组建，队长王荣贵，辖3个班，24人。1935年4月，部分人员编入赤安游击队第四支队。

靖边游击队，1934年8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靖边游击队，队长黄万英，指导员阴云山。1935年4月，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游击队协助下，成立了3个警卫连，8月，靖边游击队发展一个骑兵连。10月，靖边游击队大部分队员补充给红军正规部队，西靖边县政府便将3个警卫连编入靖边游击队，设两个中队。同时，成立了西靖边县骑兵连。1935年11月，靖边游击队中队长宗文耀、金林叛变革命，杀害靖边游击队队长黄万英、政治指导员杨占鳌，胁迫整个部队叛变。此后，叛军偷袭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先后杀害了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和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阴云山、赤安县委书记任文明等10余名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党员骨干，史称“赤安事变”，这次事变使三边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郿西游击队。1934年9月，郿西县革命委员会派宋桐高组建了郿西游击队，队长宋桐高，经济员兼政治指导员高禄瑞。12月，郿西游击队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区与国民党军发生激烈战斗，后被国民党军包围，多数队员阵亡，宋桐高、高禄瑞被捕后遭杀害，其他队员失散。^{②⑦}

定边游击队。1934年秋成立，共19人，队长黄兴仁，活动于华池桥川李岷岷一带。同年冬编入庆北游击队。^{②⑧}

赤安游击支队。1934年11月，赤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保安游击支队改称赤安游击支队，1935年2月发展到70多人。与此同时，永宁、义正、吴堡等也成立了小型游击队。为了统一领导，便于指挥，4月，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对全县游击队进行整编，成立了赤安游击队第一、二、三、四支队。赤安游击支队改编为一支队，队长兼指导员仍由张明科担任，副队长戴同孝，辖3个中队，80多人。永宁区游击队编为二支队，队长惠占元（后乔志山），指导员黄克强，辖2个中队，40多人。义正区游击队编为三支队，队长马青山，指导员惠占元，辖3个中队，60多人。县保卫队部分人员和子良区警卫连编为四支队，队长乔兴志，指导员王荣贵。1935年11月，第三支队编入红一军团，参加直罗镇战役。同时，赤安县对全县游击队再次进行整编，新成立4个支队，支队长分别为郝正山、袁德清、屈生华、乔兴志，指导员分别为黄克强、袁耀秀、刘克功、王荣贵，4个支队共350多人。^{②⑨}

华池保卫队。1934年11月在南梁成立，共50多人，20支枪，队长何兴旺，副队长郑兴财，次年春扩编为保卫大队。^{③⑩}

庆北游击大队。1934年冬在华池坪庄成立，下编3个中队，共60多人，队长王英，党代表杨占鳌，活动于坪庄和陕西吴旗头道川一带。1936年编入红军陕甘独立师。^{③⑪}

环县游击队。1934年冬成立，8人3支枪，队长王怀刚，活动于华池五蛟、元城一带，后游击队发展到40多人，队长逃跑，游击队解散。^{③⑫}

肤甘游击支队。1934年冬，甘泉县石门村石匠冯长斗、杨文贤联络附近李海德、贺红清、白国福、高治厚等石匠自发组成“石匠游击队”，打豪绅、济贫民。1935年1月，陕甘边区军委在石门村将其正式改编为陕甘边工农游击队第二路第八支队，亦称肤甘游击队支队和红泉游击队。队长冯长斗，副队长杨文贤，指导员杨庚武，有队员10多人，活动于劳山和临镇一带。1935年春游击队增加到100多人，秋季，发展到300多人，后编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③③

华池保卫大队。1935年春，由华池保卫队扩编，下辖3个中队，大队长黄克秀，指导员刘培清。1936年秋改编为红军陕甘独立师第四团。③④

庆华游击队。1935年6月在华池柔远川成立，共60多人，队长田生弟，指导员李树林。同年11月编入庆北游击队。③⑤

安塞一支队。1935年7月，安塞一区、二区游击队合编为安塞游击队，队长刘海步，教导员黄克祥。7月下旬，安塞五支队的大部编入红二十六军，所余50余人，与安塞游击队合并，称安塞一支队。队长方志厚，政委龚逢春，有队员200余人。主要任务是把守沿河湾和西川口，防止和打击南边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对安塞的进攻。1935年10月，劳山战役后，安塞一支队编入延安独立营。③⑥

赤安独立营。1935年10月末，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决定以赤安游击队第一支队为基础，抽调其他地方武装人员成立赤安独立营，营长马福吉，营总支部书记张明科。全营共200多人，编为3个连。第一连连长戴同孝，指导员雷海清；第二连连长白万章，指导员高会亭；

第三连连长阎怀智，指导员李义。1936年6月，赤安独立营改为志丹县独立营。^{③⑦}

4.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1934年2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第三路游击区，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领导陕甘边南区各游击队，隶属陕甘边区军委领导。同年10月改名为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先后为张明吾、王安民、陈国栋，政治委员先后为黄子文、张仲良。辖平子游击队（即第四支队）、回民支队五支队、八支队、三支队、一支队及新正县特务队、中宜游击队等。1936年1月，关中特区军事部成立，该指挥部撤销。

淳耀七支队。1933年3月，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照金将张占虎组建的耀西游击队改编为第七游击支队。任连俊任队长，李文喜任指导员，有武装人员30余名，枪30余支。1934年春，赵景春任指导员，8月，张占虎任队长。隶属陕甘边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领导。1936年1月，归关中特区司令部和中共淳耀县委领导。1936年12月，淳耀县第七游击支队在淳化县润镇被编入关中独立团。

^{③⑧}

赤水十二支队。1933年9月，在红二十六军大力支持下，梁德全、吴春荣在淳化县中咀村组建成立了赤水县第十二游击支队。有队员30余人，枪20余支。队长吴春荣（后张连合），指导员梁德全（后李文喜），经济员郭文学。初归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后归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1936年5月，归关中特区司令部

和赤水县委领导。1936年5月，一部分编入关中红三团，另一部分留作地方武装力量。1937年3月编入赤水县保安大队。③⑨

正宁四支队。1933年9月，正宁县榆林子镇文乐村青年农民何炳正联络本村10多名青年，杀了催粮要款的正宁县民团团丁，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到合水固城一带打富济贫。同年11月，何炳正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取得联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被红二十六军命名为平子游击队，队长何炳正，指导员张策（后为阴云山），下辖两个分队，共40余人，活动于榆林子、平子一带，1934年2月，改编为正宁四支队，队长刘玉才，指导员郭秉坤。同年9月，编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④⑩

正宁五支队。1934年6月，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以高凤坡战斗中失散的红二十六军10多名正宁县三嘉籍战士为骨干，建立第五支队，因主要活动于正宁一带，习称正宁五支队，队长张占英，指导员焦怀兴。1935年秋，五支队战士增加到150多人，下属4个分队。当年冬编入新正县独立二营。④⑪

淳耀六支队。1934年6月，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在淳化县何家山成立了第六游击支队。张嘉伯、冯聚财先后任支队长，刘文沛、汪嘉兴先后任指导员。有40余人，40余支枪。1935年8月，中共淳耀县委成立，隶属淳耀县委和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双重领导。1935年11月，关中特区司令部成立后，淳耀县第六游击支队被编入独立三营。④⑫

洛南游击大队。1934年7月，杨森率红四十二师骑兵团收缴了洛川县东南乡白马儿村、贝郊村、寨头村土豪白焕章、雷在阳、孟亚东等家财及枪支，资助王忠秀、白英、陈平顺、张福奎、吕正生等组建了洛川县第一支游击队——洛南游击大队，王忠秀为队长，有队员七八人，不久发展到30余人，1935年7月下旬，国民党洛川县政府命令县保安大队长李子珍“剿匪”，在仁里府胡同与洛南游击大队相遇，经过一昼夜激烈战斗，双方伤亡惨重，加之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游击队全部溃散，王忠秀、白英、陈平顺壮烈牺牲。

正宁十六支队（回民支队）。1933年秋，正宁县龙嘴子、西渠一带回民群众王世平、王世英等19人，组成回民支队，队长王世平，指导员王世英。下辖3个班，一班长马彦秀，二班长孙长青，三班长王长贵。1934年秋，被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编为十六支队，当地群众仍习称回民支队，下辖3个班。1935年9月，编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④③}

中宜游击队。1932年夏，刘志丹带领陕甘游击队在黄陵西部山区活动时，以一些倾向革命的民团团丁为基础组建中宜游击队，魏老五任队长，不久贾生堂继任。小石崖苏区逐渐形成以后，在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的帮助下，1934年9月，又建立一支中宜游击队，队长邵凤麟，指导员苏继堂。同年10月，苏继堂率30多人的中宜游击队在建庄松树台被国民党军包围，大多数队员壮烈牺牲，苏继堂被捕牺牲。此后，南区党委将中宜保卫队改编为中宜游击队，亦叫苏继堂游击队，队长邵凤麟，指导员牛书申。11月，被正式命

名为“中宜游击队第一支队”，队长孙振海，政委牛书申，1935年2月，中宜保卫队队长贾生意继任队长，新成立中宜游击队第三支队，调孙振海出任第三支队队长，另任命雷占英为中宜游击队第二支队队长。^{④④}3月，李景西继任队长。至1935年6月，中宜游击队第一支队发展到100多人，编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聂德荣，二中队队长田怀真，三中队队长陈志高，少年先锋队队长何思恭。

宁县三支队。1934年10月，宁县平子镇半坡村刘永培、杨兴才等10多名青年农民，效仿红军游击队秘密地组织起来，他们以大刀、长矛、锄头等为武器，打富济贫，抗粮抗款。以后，他们与正宁县西堡子村王清殿带领的10多名青年农民联合起来，队伍发展到40多人，推举刘永培为队长。并在平子游击队的配合下，举行了半坡暴动，杀了当地劣绅赵新玉兄弟，赴正宁湫头投奔红军。11月被整编为陕甘边工农游击队第三路第三支队，两个班，20多人，主要活动于宁县东部子午岭一带，习称“宁县三支队”。王德宽、鲁生治、卜凤鸣、杨兴财先后任队长，李士新、刘永培先后任指导员。1936年1月编入新宁县独立营。^{④⑤}

正宁八支队。1934年10月组建，因经常活动于正宁一带，习称正宁八支队，队长刘富魁，指导员赵德荣。1935年，发展到160多人，下属4个分队，活动足迹遍及陕西职田、张洪、底庙、北极、永乐一带。1935年冬编入新正县独立二营。^{④⑥}

新正县特务队。1934年后季，新正县从各游击队抽调10多名训练有素、机智勇敢的干部、战士，组成特务班。1935年8月，改名

新正县特务队，队长先后由唐致祥、秦善合、王德义担任。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装备较好，精悍灵活，经常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镇压恶顽，宣传组织群众，开辟红区工作。同年冬改称新正县武工队。

④⑦

宁县一支队，1934年11月，由杨德明和潘老么两支农民武装改编为陕甘边工农游击队第三路第一支队，共10多人，活动于正宁、宁县、合水3县的子午岭山区，习称“宁县一支队”。至1935年10月，人数增加至33人。杨德明、张占荣、樊生奎、樊登甲、王得胜、胡全胜、崔瑞山、王秉祥先后任队长，乔占财任指导员。同年11月后隶属关中特区新宁县领导。

正宁十七支队。1935年3月，秦善秀带领正宁二支队收缴了产场七先生的12支步枪，后在红一团团长寇金财组织下，于底庙三家庄成立了正宁十七支队，队长刘彦芳，指导员任书勤，全队30多人，分3个班，黄得得、万树学、衡向儒分任班长。永红县成立后，正宁十七支队改为永红县保卫队，队长万银祥，共10多人，其余战士编入正宁二支队。④⑧

中宜保卫队。1935年2月，中宜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为了保卫革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成立了中宜保卫队，承担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保卫工作，队长王世选。1936年4月，中宜县制取消，该队编入中宜独立营。④⑨

中宜独立营。1934年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派张邦英和几名党员来双龙地区加强中宜游击队工作。同时成立游击队党支部，书记

张邦英，1935年5月，以中宜游击队和鄯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中宜独立营，杨德魁任营长，牛书申任政委，编制3个连，共200余人。
⑤一连连长聂德荣，二连连长王世选，三连连长姓马，并设有少年先锋连队，队长何思恭。①

正宁二支队。1933年，在正宁永和的罗沟圈成立了北后游击队，队长万东根，指导员梁岁月。1935年前季，北后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正宁二支队，队长赵德荣。西安事变后，一部分编入大部队，一部分编入永红县保卫队。②

新正县警卫队。1935年8月成立，负责保卫新正县党政机关的安全，队长王凤鸣。同年12月编入新正县独立二营。③

淳耀九支队。1935年8月，淳耀县委组建成立了淳耀县第九游击支队。归淳耀县委和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1936年1月后归关中特区司令部领导。何冬子任队长，罗恒彩任指导员。后孙彦德、陈德发继任队长。有武装队员30余名，枪30余支。到1937年2月，第九游击支队发展到400余人，有枪400余支，被关中特区司令部编为独立营。④

宁县十八支队。1935年11月由新宁县军事部长谭德智负责组建，有队员20余人，张有财、邹辅财先后任队长，邹辅财、周孝堂先后任指导员，1936年春部分队员被王德宽、邹辅财带领投降国民党正宁县保安队。⑤

宁县十九支队。1935年11月成立于新宁县九岷北庄子，由杨伯伦、谭德智从南梁领回的一批武器装备，有队员20余人。王运来任队长，董自贵任指导员，1936年2月编入新宁县独立营。⑥

宁县二十支队。1935年12月由新宁县湘乐纸坊村赤卫军和新宁县警卫队改编而成，有队员30多人。王明堂、樊占荣先后任队长，唐思有、王占义先后任指导员，活动于宁县、正宁一带。1937年3月在石鼓编入新宁县独立营。⑦

宁县二十一支队。1935年冬组建于新宁县杨园子，有队员20多人。何进财任队长，周孝堂任指导员，1936年春部分队员被新宁县军事部长王德宽带领投降国民党正宁县保安队。⑧

新宁县警卫队。1935年11月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组建，有队员20余人。后改为新宁县保安大队，张彦兴任队长。⑨

赤水十三支队。1935年冬，中共赤水县军事部长任连俊等在淳化县马家山一带组建了赤水县第十三游击支队，任连俊、卜应林先后任队长，王新兴、梁春全先后任指导员，归赤水县和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有队员50余人，枪约50支。1936年1月归赤水县和关中特区司令部领导。1937年3月，编入赤水县保安大队。⑩

淳耀十支队。1935年春，中共淳耀县委第二区委书记张为民和区军事部长苏万林组织淳化县铁王、小池一带农民，建立了20余人的区游击队。后国民党东北军高振武排率部起义，参加了二区游击队，中共淳耀县委在此基础上，组建淳耀县第十游击支队。李楚乾、苏万

林先后任队长，朱登科任指导员，后高振武任队长。有武装队员 30 余名，枪 30 余支。归陕甘边南区游击总指挥部和淳耀县委领导。1936 年 1 月后，归关中特区司令部和淳耀县委领导。1937 年 2 月，淳耀县第十游击支队和其他部队组成新兵团，被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特务团。⑪

5.陕甘边东路游击队总指挥部。1935 年 2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解放了延安南川。同年 5 月，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陕甘边区军委决定在宜川、临镇一带建立东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曹力如任总指挥，马文瑞任政委。

宜川第一游击队。1935 年 2 月，杨森骑兵团围攻宜川县城后成立宜川第一游击队，由赵正化带领，起初仅六七人，后发展到七八十人，曾在高树梁、集义、赤塬等地和民团作战。同年 5 月间，被合编为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⑫

宜川第十支队。1935 年 4 月，杨森骑兵团将后九殿哗变民团改编为宜川第十支队，有队员 30 余人，武器装备良好，李振海任队长，刘安祥任指导员，后改称宜川游击队，1935 年 5 月被编入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⑬

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又称宜川抗日义勇军。1935 年 4 月，由宜川第一游击队、宜川游击队改编而成，有 100 多人，枪七八十支，黑志德任司令，赵正化任政委。在宜川、洛川等地活动，后来发展到 200 多人，枪支约占兵力的 80%。最多时发展到 400 多人。10 月，黑

志德、赵正化先后调离，由闫志俊接任司令，后改编为红军第二路游击师。⑭

宜川第十一支队。1935年5月，杨森骑兵团在阁楼组建了宜川游击队第十一支队。有队员40多人。吴浩任队长，曹贤德任政委，后编入红军第二路游击师。⑮

宜川第十三支队。1935年5月，杨森骑兵团在宜川殿头、阁楼组建了宜川游击队第十三支队，队员约50多人。张志孝任队长，刘葆璋任政委。后编入红军第二路游击师。⑯

集义游击队。1935年6月，由集义党支部组建了集义游击队，队员40多名。后编入红军第二路游击师。

红军第二路游击师。1935年7月，在宜川太留附近，由宜川义勇军、宜川游击队第十、第十一、第十三支队、延长十八支队、甘泉六支队、延长四支队共同组编为红军第二路游击师（后改为第四路游击师）。游击师共600多人，辖7个支队。司令员邵凤麟，政委杨凤岐。10月初，红军骑兵团来宜川整编游击师，邵凤麟、杨凤岐调走，游击师大部分改编为宜川独立营。其余人员编为宜川游击支队，贺廷智任支队长，刘葆璋任政委。⑰

宜川独立营。1935年10月，红军第二路游击师司令邵凤麟、政委杨凤岐决定，将红军第二路游击师中的200多名战士改编为宜川独立营，营长王大国、政委刘安国。其余100多人编为宜川游击支队。

6.陕甘边区第五路游击队总指挥部。1935年10月，在华池战区建立陕甘边区第五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也即华池战区总指挥部），领

导华池、庆北一带的游击队，总指挥王德胜。不久，王德胜叛变，总指挥部即行解体。

7.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1934年2月，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成立，8人3支枪，负责陕甘边区党政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队长郭锡山。同年11月改编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

8.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1934年1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将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改编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下辖3个中队，共100多人，大队长郭锡山，副大队长宋飞。1935年春，国民党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保卫大队随政府机关转移到陕北洛河川。

（三）赤卫军

赤卫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组织。赤卫军的主要任务是：（1）搞好递步哨，每村都设哨口，白天1人，晚上2人，负责值勤。（2）传递信息，一发现敌情立即向乡主席和政府报告，当地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送的信大都是纸摺的一个角，在上面插一根鸡毛，表示情况紧急，这些信传送很快，一村转一村都按时送到了政府；（3）清查外人，对进入本地区的陌生人立即报告给乡政府进行审查；（4）打土豪，打土豪是政府组织的。⑩据王生金回忆：“赤卫队在当时活动很积极，对保卫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例如赤卫队曾配合游击队打旦八寨子，将地主的羊赶了一群。赤卫队还配合红军守卫老爷岭一线。我们这个队共有100多人，9枝枪，每

隔3夜就骚扰敌人1次，使他们不能安宁。”^{①9}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相继建立了许多赤卫军组织。

正宁县寺村塬赤卫军。1932年3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抵正宁县南部的寺村塬，将当地农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任命杜兴邦为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为副总指挥。同月下旬，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唐桂荣任副主席。革委会成立后，领导赤卫军和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分财产，分牛羊。3月底召开大会，处决了当地豪绅赵元亨和走狗巩德功，没收了赵家的粮食和牛羊，分给群众。此后，寺村塬附近的许多村子，也都建立了赤卫军。4月1日，部分赤卫军配合红军游击队攻打山河镇（今正宁县城），不克；4月13日，赤卫军配合红军游击队奔袭张洪镇（今陕西旬邑县城），获胜。寺村塬赤卫军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正宁县五顷塬赤卫军。1932年6月，红军陕甘游击队返回正宁县东部地区五顷塬，开展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经过短期工作，在五顷塬、两顷塬、挂坡头、龙嘴子、新庄子、南邑堡等地建立了基层苏维埃政权和赤卫军组织。8月，国民党部队围攻五顷塬地区，红军陕甘游击队抵抗失败，退入陕西，建立不久的赤卫军瓦解。

南梁地区赤卫军。1933年11月，习仲勋、张策等在南梁一带（今华池县东部）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建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等革命群众组织。是年底，南梁已建立4个赤卫军大队：小河沟、豹子

川一带为第一大队，大队长郑德明，下属 3 个中队；玉皇庙、马莲岔一带为第二大队，大队长高生贵；白马庙为第三大队，大队长朱志清；二将川为第四大队，大队长梅生贵。次年 3 月，组建第五大队，大队长王殿斌。到 1934 年 10 月，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赤卫军已发展到 18 个大队，主要有白马庙、二将川、玉皇庙川、桥河、刘沟、杜河、平定川、东华池、脚扎川、白豹、安寨、吴堡、樊川、义正川、麻地台川、瓦子川、苗村、阎家川等，红色区域扩大到北至吴堡川（今属陕西吴旗县），南至固城川（今属合水县），西至柔远川（今属华池县），东至大东沟（今属陕西富县），方圆 100 余公里。11 月，在南梁荔园堡举行的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产生了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朱志清任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统一指挥各赤卫军大队。1935 年春，国民党军队“围剿”南梁革命根据地，总指挥部转移到陕北洛河川一带。

鄜西赤卫军大队。1934 年 3 月成立，大队长宋定金，一村一个班，共有赤卫队员 100 多人。

正宁、宁县东部地区赤卫军。1934 年春，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成立后，在正宁县的湫头、孟家河，宁县的九岘、金村、鸦儿沟、康家塬、桃树庄、西洼等村庄，组织了农会和赤卫军，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军队“清剿”的战斗，许多赤卫队员站岗、放哨、送信、侦察敌情，积极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为粉碎国民党军“围剿”作出了贡献。

赤安县赤卫军大队。1934年11月成立，大队长袁万祥（后王启孝、王生贵），辖永宁、义正、吴堡、榆树嘴4个区赤卫军大队，永宁、义正、吴堡区赤卫军大队大队长分别为杨海旺、魏炳良、王启孝。1935年，全县10个区均建立赤卫军大队。1936年1月，改称赤安县军事部，管辖全县武装力量。各区仍称赤卫军大队。^{②⑩}

陕甘边直属区赤卫军总指挥部。1935年4月在甘泉县成立，总指挥刘金声，副总指挥王继之，参谋长陈德福，辖3个大队，队员700余人。第一大队大队长杨登华，第二大队大队长曹秀，第三大队大队长刘金声（兼），各大队均辖4个中队，后改编为自卫军。^{②⑪}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8页。

②一说“红一团于1935年2月在淳化马家山正式成立”，见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此处依据：昧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白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4页。

③庆阳、安塞游击队合编为一连，连长王志昌；保安游击队编为二连，连长王四贵。少年先锋队队长不详。

④杨茂堂：“回忆西北抗日义勇军”，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4页。

⑤红二十七军，是陕北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1935年1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北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治委员张达志。同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成立，下辖第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分别由原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改编。1935年11月，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会师，并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7年，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加抗日战争。

⑥中共铜川市委、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铜川革命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6—83页。

⑦淳化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年版，第87页。

⑧张邦英：《忆陕甘边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页。

⑨关于红九支队的全称，有的书籍记作“中共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相关资料：1932年12月13日《陕北代表团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第三号报告记载：“全队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因我们知道陕甘共有八个支队）”（见该书第112页）。艾龙飞《忆陕甘九支队》记载：“1932年农历八月，陕北特委派我到绥德、清涧、安定（今子长）等县巡视，我巡视完毕，返回清涧城外霍建德家里。惠金瑞拿来特委的密信，信上写道：‘龙飞暂勿返回，将高朗亭的先锋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你担任政治委员，高朗亭任队长，其他人员随后派来。’”（见该书第487页）。

⑩有资料称红一支队名称是刘志丹授予的，据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革命英烈》1982年第3期封二任志贞烈士使用过的袖章，名称为：“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一路第一支队”。红一支队名称是如何演变的，待查。

⑪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等编：《龚逢春纪念文集》，内部资料，1993年版，第84页。

⑫据刘约三：《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记载，庆阳游击队指导员张志孝。此处依据中共庆阳地委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庆阳地区组织史资料》，第21页。

⑬赵文善、张志孝、王兴成、李占义、杨凯分别任一、二、三、四、五中队队长，刘全任先锋队队长。其中三中队于1934年11月改为骑兵中队。

⑭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⑮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⑯富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⑰韩明奎：《陕甘边根据地富县革命斗争情况回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1—673页。

⑱志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志丹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页。

⑲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⑳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

㉑安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塞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㉒富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㉓韩明奎：《陕甘边根据地富县革命斗争情况回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1—673页。

㉔富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②⑤韩明奎：《陕甘边根据地富县革命斗争情况回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71—673 页。

②⑥安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塞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8—489 页。

②⑦富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6 页。

②⑧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2 页。

②⑨志丹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志丹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7—78 页。

③⑩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2 页。

③⑪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2 页。

③⑫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2 页。

③⑬《王华等 7 人 1984 年 7 月 24 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7—468 页。

③⑭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2 页。

③⑮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2 页。

③⑯安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塞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0 页。

③⑰志丹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志丹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8 页。

③⑱淳化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 年版，第 90 页。

③⑲淳化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 年版，第 87 页。

④⑩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3 页。

④⑪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3 页。

④⑫淳化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 年版，第 90 页。

④⑬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3 页。

④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01—702 页。

④⑮马兴文主编：《民主革命时期宁县党史资料汇编》（上），内部资料，2007 年版，第 427 页。

④⑥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3 页。

④⑦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3 页。

④⑧《刘彦芳 1984 年谈正宁十七支队》、《李清海谈正宁十七支队》，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0 页。

④⑨富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7 页。

⑤⑩黄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陵县志》，陕西地图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6 页。

①牛小梅：《我的父亲牛书申》，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0 页。

②《李普青谈北后游击队》，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0—401 页。

③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3 页。

④⑪淳化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 年版，第 91 页。

⑤⑫马兴文主编：《民主革命时期宁县党史资料汇编》（上），内部资料，2007 年版，第 429 页。

⑥⑬马兴文主编：《民主革命时期宁县党史资料汇编》（上），内部资料，2007 年版，第 428 页。

⑦⑭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5 页。

⑧⑮马兴文主编：《民主革命时期宁县党史资料汇编》（上），内部资料，2007 年版，第 429 页。

⑨⑯马兴文主编：《民主革命时期宁县党史资料汇编》（上），内部资料，2007 年版，第 429 页。

⑩⑰淳化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 年版，第 87 页。

⑪⑱淳化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 年版，第 91 页。

⑫⑲宜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68 页。

⑬⑳宜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68 页。

⑭㉑宜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68—669 页。

⑮㉒宜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68—669 页。

⑯㉓宜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68—669 页。

⑰㉔宜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68 页。

⑮《蒋成英 1985 年 10 月谈南梁中心苏区的创建》，见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1 页。

⑯王生金：《南梁苏区的土地改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70 页。

⑰志丹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志丹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8—79 页。

⑱延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安地区志》，西安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31 页。

三、陕甘边区的兵役工作

（一）志愿兵役制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党和红军始终实行志愿兵役制度。这种新型兵役制度，对发展壮大人民军队，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使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起义士兵和其他爱国分子了解志愿兵役制度，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通过政治教育，激发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提高政治觉悟，唤起民族精神；通过阶级教育，唤醒阶级意识，提高阶级觉悟，促使劳苦大众懂得所受压迫剥削的阶级根源，明白参加加入民军队是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通过广泛的参军宣传动员和思想工作，激发广大民众的参军热情，使其自觉自愿地参加加入民军队，并不计物质报酬，长期服役。

在革命战争年代，虽然环境十分恶劣，斗争异常激烈，行军打仗极为频繁，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且基本上无报酬，但广大群众的参军热情却非常高涨，入伍十分踊跃。

陕甘边区各级党政军机关把扩大红军（简称“扩红”）作为经常性的中心任务，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采取各种形式扩大红军。“扩

红”起初由军队直接负责，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协助进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日益健全，“扩红”工作改由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负责承办，军队派人协助。陕甘边区各县区在“扩红”过程中，坚持贯彻自觉自愿的原则，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使群众了解红军的性质及其宗旨。每次“扩红”都由地方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组成宣传队，开展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一般采取召开贫农团、雇工会、妇女会、赤少队等各种群众团体会议，进行广泛动员；培养积极分子，动员干部、党团员带头参军；利用群众集会、演讲演戏、发传单、贴标语、参军竞赛等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利用打胜仗之机突击“扩红”；制定具体优抚政策解决群众后顾之忧，提高群众参军热情。当时，许多贫苦农民自愿参加游击队、赤卫队。据有关资料，“陕甘苏区人口约……，但壮年男人百分之七十已加入红军，儿童和青年则全部加入了儿童团和少先队，18至45岁的壮年则加入赤卫军，妇女百分之六十以上加入妇女代表会，不参与各种组织的只占极少数。”^①正是由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革命武装力量才得到源源不断地补充和发展。

（二）兵员补充

为巩固根据地，加强对敌军事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各种战斗动员条例和一系列的军事政策，内容包括：在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礎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群众参加游击队经过战斗锻炼和军事训练后，编入红军主力部队；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武器弹药主要靠向敌人夺取，并收缴豪绅地

主的武器，收缴到的武器归收缴者使用；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武器给予特别奖励。这些法令和政策实行后，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根据地人民立即掀起了“扩红”运动，红色武装力量得到不断补充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得到提高。在红军部队兵员补充上，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动员群众参军。陕甘边区的兵员主要来自边区所辖县区工农子弟。据王生金回忆：“这一带开展初期，参加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的人很多，每区每村都有赤卫军组织，壮年男子几乎全部参加，有些老人也参加了。”“红军军纪严明，威信很高，群众主动要求参军，当了红军的不少，”②1932年6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到武字区“扩红”，3天内就动员了近百名赤少队员参军。据统计，华池县在1935年前，约有420人参加红军。其中1934年冬，创建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二连战士多为华池籍士兵。从1932年至1936年仅新正、华池两县就有944人参加红军，578人参加地方游击队③。1934年冬至1935年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根据地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红四十二师扩充到2000余人，各县游击队扩大到3000余人，赤卫军增加到5000余人。

二是群众武装升级。陕甘边区部队兵员的另一来源，就是广泛建立各级群众武装，并使之逐步升级，及时地补充部队。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建制编入红军队伍。群众武装的建立，不仅为部队储备了大量后备兵员，形成了主力部队兵员补充系统，而且在开展对敌斗争和维护边区的社会治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 年 12 月，中共陕西省委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当时仅编第二团。1933 年 7 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又以渭北游击队为基础，在照金苏区组建了第四团，11 月，特委将所有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1934 年 7 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第二路和第三游击队总指挥部在两个月内各完成组建一个团红军的任务。在决议号召下，9 月中旬，以第三路游击队为基础在正宁县湫头组建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1934 年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二路游击队为基础，重新组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下辖 2 个步兵连队。兰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刘懋功将军回忆说：“第一连主要成员为庆阳游击队老底子，当时挑选了 60 多人，包括我在内，又从安塞游击队调来 20 多人合并为红二团一连；第二连是保安游击队和合水游击队各选调部分精干组成。”④此外，还有一个少年先锋队，全团 180 余人，之后又发展了骑兵排。

三是将被俘和投诚、起义人员编入人民军队。陕甘边区积极开展“瓦解敌军”工作，争取了一批白军弃暗投明，起义投诚，将其吸收和改编为红军。1932 年 7 月，在共产党员高鹏飞、杨林等组织领导下，驻甘肃合水县西华池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两个连举行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1933 年 7 月，西北军杨虎城部骑兵团长王泰吉，率千余人发动兵变，部队被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34 年 10 月，在黄龙山惯匪梁占奎手下当营长的郭宝珊在新堡正式宣布起义，率本营 120 余

人来到南梁苏区，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1935年7月，国民党耀县民团和驻湫头的六十一师侦察排各数十人，经淳耀七支队策反，举行武装起义，加入红一团和游击队。⑤通过投诚、起义等方式进行“扩红”，成为陕甘边区人民武装的主要来源之一。

（三）优抚制度

优抚制度即优待和抚恤的制度，就是对武装组织成员及其家属进行精神安慰和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为减少红军战士后顾之忧，激发群众参军热情，根据地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优待士兵及其家属的工作，制订了一系列优抚政策，把扩军与优抚紧密结合起来。对阵亡的红军、赤卫军、少先队战士均发给埋葬费，对其家属实行抚恤政策。

陕甘边区各级政府都制订了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措施，成立了优待红军家属的群众组织，发动和组织边区群众开展各种“优红”活动。分配土地时，红军及其家属优先分配好田，并组织劳役队或机关工作人员为其耕种收割；分发土豪财物时，优先分配给红军家属；供应生活物资时，红军家属优先，并对家庭生活困难者给予经济补助；组织妇女、儿童为其担水砍柴，给红军家属以较高的政治地位；组织群众慰问红军及伤病员，帮助洗衣服、送慰问品；发动妇女为红军做鞋袜，送饭菜等。边区政府和群众在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拥军优属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军的积极性，保证了历次“扩红”任务的完成。

①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8页。

②《王生金谈南梁一带的群众工作、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建设》，见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5 页。

③庆阳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民政志》，卷四，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06—808 页。

④刘懋功：《梦回吹角连营》，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 页。

⑤中共铜川市委、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照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7 页。

四、陕甘边区的军事斗争

陕甘边区的历史，实际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在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坚持多区域发展战略，坚持流动作战，坚持在游击战争中壮大和发展红军，提出了许多带有前瞻性的战略措施，确保了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一）灵活的军事思想

陕甘边区的特点决定了陕甘边区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党和红军如果不能同农民建立最可靠、最广泛的同盟关系，把千百万农民群众组织动员起来，就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开创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边区党和政府充分地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动员根据地内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大限度地组织和依靠群众，形成了主力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最广泛的人民战争军事体系。实行这样的结合，主力红军可以灵活机动地开展对敌斗争，主要对付和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则在赤卫队、少先队等广大群众组织的协同下就地坚

持斗争，组织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打击消灭当地敌人，保卫和巩固根据地。实行这样的结合，可以使赤卫军随时补充地方红军游击队，群众参加地方红军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军事训练和战斗锻炼，成连、成排地编入红军主力部队，充实和加强主力红军的力量，做到了全民皆兵。

与此同时，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较早地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大胆探索本地区武装斗争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白色”、“灰色”、“红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按照“三色”建军原则，1930年10月，刘志丹领导发动“太白起义”，建立南梁游击队，打响甘肃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嗣后，这支队伍先后发展成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这是陕甘地区建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二）“狡兔三窟”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过程中，最富有独创性的战略思想，就是实行“狡兔三窟”的武装斗争模式，成功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态势。

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总结兵运失败的经验教训，大胆借鉴井冈山斗争经验，于1933年11月召开的包家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邻近地

区建立几个根据地，即“狡兔三窟”的设想，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会议决定建立三个游击战略区，建立三路游击队指挥部。三路游击区都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四面出击，骚扰敌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经过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游击队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到1934年2月，基本形成了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战略思想，既保证了南梁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游击区的斗争得以顺利开展，从而达到了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战略目的。刘志丹等创立的这一武装斗争模式，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毛泽东赞扬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②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毛泽东将这种以一个根据地为主，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模式推广到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形象地说明了多个根据地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敌我相互包围和反包围的态势。③

（三）系统的战略战术

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在战略战术上，没有盲目照搬内线歼敌、后发制敌、诱敌深入、先打弱敌的红军反“围剿”基本作战方针，而是根据陕甘地区根据地范围较小、红军力量薄弱和“围剿”的国民党部队指挥不统一的实际情况，采取“敌进我进，外线破敌”的方针，有时采取先打强敌的方针，有时乘两路敌军合围未成之机，集中兵力，先发制人，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成功地解决了陕甘边区苏维埃运动中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敌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陕甘边区革命战争特点的系统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和根据地由小到大顽强地发展起来。

1.把握全局，运筹帷幄。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善于调查研究，精于分析敌情、地形，综合做出判断，并结合红军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方针部署。1934年2月，国民党军队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习仲勋分析认为，国民党军来势汹汹，规模空前，大有踏平根据地之势，但国民党军骄枉冒进，协同混乱，于是部署游击队、赤卫队在内线牵制打击国民党军，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乘隙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经大小30余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在1935年春的第二次反“围剿”中，刘志丹、习仲勋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们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它人地生疏，没有同红二十六军作战的经验，

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陕北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红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还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于战略决策正确，部署和指挥得当，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

1935年9月，刘志丹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并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9月下旬，蒋介石即部署陕、甘、宁、青等省的部队对进入陕北的红军实行分割围歼。刘志丹协助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研究部署伏击歼敌方案。对当地地形十分熟悉的刘志丹，提出了有利于部队隐蔽和歼敌的劳山作为伏击区，并精心部署红军摆下口袋阵。10月1日，红十五军团终于取

得劳山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歼敌 3700 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

2.灵活机动，出奇制胜。刘志丹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必须周密部署，才有取胜的把握。1934 年 2 月，陕甘边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开始时，刘志丹分析了敌人的弱点，决定转外线作战。3 月中旬，红四十二师采取了声东击西战术，佯装进攻陕西保安，当部队行至保安小蒜川时，突然挥戈向西，袭击蔺家砭，消灭了蔺士耀民团。接着，又将陕北军阀张廷芝一骑兵连全歼。部队向西奔袭华池元城的高桥，活捉了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消灭了元城民团，又在赵家梁子击溃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一个骑兵连。接着在庆阳城虚晃一枪，甩开了国民党军一个骑兵团的追击，红军主力突然掉头南下，4 月 2 日进兵合水，乘胜占领了西华池城。1935 年 7 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刘志丹周密分析敌情，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阎锡山晋绥军。他认为，打退晋绥军的进攻，对于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具有关键意义。1935 年 8 月 20 日，他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国民党晋绥军发起突然进攻，在定仙塬歼其一个团，迫使入陕之敌退回山西。

3.审时度势，避强击弱。刘志丹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

④刘志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

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刘志丹熟读兵书，但又不循规蹈矩，而是从实际出发，依不同敌情运用不同战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慕家塬战斗中，针对国民党军修堡筑垒，步步为营和“移民并村”的方针，刘志丹利用夜幕奇袭群众基础较好的郭家沟，静悄悄地将慕家塬之敌团团包围。次日拂晓，刘志丹指挥部队采取“猛虎掏心”和“围堡打援”战术，以少数部队强攻慕家塬之敌，吸引敌之援兵，将宋家川增援的国民党一个营消灭一大半。然后红军回师慕家塬，刘志丹亲自组织火力，准备云梯，夜间发起攻击，逃跑的国民党守军沿着通往宋家川的一条路逃窜，被设伏的赤卫队全部消灭。还有一次，刘志丹指挥部队远距离奔袭孤立无援的合水县城，在夜色和深草的掩护下，进抵城下，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城楼，攻进城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守敌数百人全部被消灭。

（四）坚持实事求是的建军治军原则

西北红军建立初期，部队成分比较复杂。为了把这支部队建设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刘志丹等坚持从西北红军自身特点出发，坚持政治建军，不断加强部队的整顿改造，为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提供了成功经验。

一是健全组织，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刘志丹等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

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⑤，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设有党委，连设有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坚持官兵一致等原则。西北红军各级军政领导职务，均由共产党员担任，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且规定红军除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开展群众工作、筹款、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任务。同时，开展红军性质和宗旨的教育，使红军指战员克服了雇佣思想，激发了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刘志丹按照无产阶级建军原则建设红军，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

二是赏罚严明，注重铁的纪律的养成。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认为，严明的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刘志丹、习仲勋等主张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指战员，及时给予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受处分后改正了错误表现好的，还可再提升干部或官复原职。刘志丹极为重视部队纪律建设，在自己遭到撤职的情况下，仍帮助红二团团长王世泰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⑥。他在为西北军委起草的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动员令中，特别强调了加强红军纪律性的重要性，要求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反对散漫现象和游击习气。1935年5月初，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和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攻打延长、延川时，西北红军缴获和没收了大量国民党政府和土豪劣绅的大量物资，为了严明军纪，专门

成立了以张达志为主任的没收委员会，规定“没收的东西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准拿走一点；没收人员都要佩戴红袖章，防止有人混水摸鱼；没收的东西要清算上账，工作人员要互相检查，一丝不苟。”⑦当红军攻占延长县后，为维护秩序，要求部队严格军纪，遵守法规，不得随意上街，不准私入民房。指定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带队维持治安，对违纪和违规行为者予以惩处。由于西北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三是不虐待俘虏，确立瓦解敌军的原则。为了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领导人坚决主张对被俘的国民党官兵不杀不辱，进行宣传教育，对愿参加红军者表示欢迎；愿回家者发放路费遣送回家；对主动向红军缴械者，还可以得到奖赏。优待俘虏政策的实行，对红军建设和瓦解国民党军起了重要作用。参加红军的一些俘虏经过教育改造，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红军的排长、连长。⑧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被放回的国民党军官兵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不仅动摇了国民党部队的军心，还令国民党军将领大伤脑筋。国民党第八十四师第二五一旅旅长高建白回忆说：“如何安置俘虏，成了最大的难事，第二五一旅为了免得影响部队的思想，将所有放回官兵，都送绥德师部设法安置。”⑨

（五）陕甘边区党和政府进行的反“围剿”斗争

1.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从1934年2月开始，国民党部署了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国民党军采取分片负责的划

区“驻剿”和竭泽而渔的“进剿”、“堵剿”手段，对陕甘边红军实施反复“清剿”。这次“围剿”中，国民党调集 8 个团的正规军及各地地方民团，总兵力达 1 万余人，兵分 8 路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区梯次推进，以达到逐渐缩小红军主力的活动区域，限制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压迫红军主力于南梁地区，迫使红军在狭小区域与其作战，进而全歼陕甘边区红军。

国民党“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部队构成是：第一路，驻守耀县的干部团；第二路，驻守耀县小丘的孙友仁特务团；第三路，驻守正宁的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四路，驻守庆阳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五路，驻守旬邑的何高侯团；第六路，驻守合水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七路，驻守洛川的冯钦哉部一个团；第八路，驻守保安的高双城部一个团。各地民团武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的进攻行动。“围剿”的具体部署是：以驻守庆阳、合水一线的甘肃警备第二旅的两个团配以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分兵“进剿”；以驻守耀县、旬邑、洛川、正宁、保安等地的 6 个团陈兵堵截。最终实现其在中宜一带截击红军不能东进，封锁洛河一带阻止红军不能北退，南面大军压境使红军不能交锋，西部重兵扼守使红军不能突围，最后逼迫红军与其在南梁地区决战，达到聚而歼之目的。

当时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总共不过 1300 多人，而且武器装备极差，敌我力量悬殊。刘志丹针对国民党军平分兵力和战线过长的弱点，决定集中主力红军，跳出外线，寻找战机，粉碎国民党军“围

剿”。在军事部署上，以第二路游击队一部坚持在南梁中心区内线开展斗争，第三路游击队各部牵制和袭击南线国民党军，使其不敢冒进；以红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和第二路游击队的一部跳出外线，采取机动灵活、声东击西、避敌主力、击其疲弱、各个击破的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2月上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500余人由南梁秘密出发，经宁县、正宁南下，突然出现在照金以北地区。国民党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南进，慌忙调集南线“进剿”部队沿旬邑、耀县、淳化一带截击，防止红军南下关中。红军当即转首向北，挥师同官、宜君方向的咸榆公路作战，在姚渠歼敌一个排，在石板歼灭国民党民团一部，在王雷镇歼国民党军一个连。不待其查明动向，红军又转兵西北，涉过沮水，在店头歼国民党民团一个排。此后，红军经槐村庄、张村驿、黑水寺，过太白镇回到南梁革命根据地东华池一带，作短暂休整。3月下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主力和庆阳、合水两支游击队再次出击外线作战。红军主力由南梁北上，渡过洛河，扬言要向安塞、安定进军，虚张声势。当部队行至保安刘家砭，距保安尚有40公里时，突然调兵向西，经过小蒜川，奔袭蔺家砭，出其不意，歼灭了陕西警备骑兵旅张廷芝部的一个连。接着一举围歼了该部驻中河岔的一个营，又在崖窑歼国民党一个辎重连，取得了歼灭国民党4个连及民团一部的胜利。红军还攻取了张廷芝部的一个兵工厂，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修造枪炮的机器，而且有几名修械工人自愿参加红军，为后来开办南梁兵工厂打下了基础。当晚红军封锁向西的交通要道，隐蔽

作战意图。翌日，红军主力继续西进，长途奔袭庆阳县元城镇，抓获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歼灭元城民团 30 余人，包围了谭世麒老巢元城，然后迅速南下，在赵梁子打垮了谭世麟的儿子谭振武率领的骑兵连。

在这一阶段反“围剿”作战中，陕甘边红军主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迂回外线，转战千里，歼灭陕军第四十二师、陕西警备骑兵旅、甘肃警备第二旅及民团各一部，达到了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的目的，为红军以后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战机。

红军在赵梁子取得歼灭国民党一个骑兵连的胜利后，谭世麟向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二旅驻合水的王子义团求援，王子义立刻令其团副率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赶往元城增援。当国民党军赶到元城一带时，红军经五蛟、悦乐、城壕川进至合水县赵家原，摆出攻打合水的架势。合水国民党军见红军主力兵临城下，连忙命令抵达元城的部队星夜兼程向合水回援。没等其赶回合水县城，红军于 4 月 2 日早晨，转兵合水南原，中午抵达西华池。国民党军两次扑空，不顾疲惫，紧追红军不放。

王子义团是 1932 年秋天红军歼灭国民党赵文智团之后，新来换防的正规步兵团。他们骄横自负，不可一世，大有把红军一口吞掉的架势。在驰援合水时，王子义欺骗部下说：“红军都是土匪，身上有银元和大烟土，但是没有钢枪，尽些些大刀长矛，抓住后拿绳子一捆就行了。”因此，国民党骑兵的马鞍后都带着一捆绳子，叫嚣要捆红军。

就在国民党军气势汹汹扑向合水县城之时，刘志丹却指挥红军离开赵家塬，于4月2日中午突然攻占合水县重镇西华池。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赶了四五十公里来到合水县城，又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地掉头向西华池追来。西华池是个古老的城镇，当时只有二三百户人家。城墙前有外壕，外壕前面是开阔地，地形对红军展开火力十分有利，刘志丹便决定在此给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

下午3时许，红军干部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二路游击队侦察员报告说，发现国民党一个团的正规军正在赶来。刘志丹冷静分析，国民党军有两个营和一个团部直属机炮连共7个连，约600余人，红军也有骑兵、步兵7个连，约500人，加上第二路游击队的武装，双方兵力大体相等，国民党军虽然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但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疲劳不堪，战斗力已大大减弱。红军士气高昂，取得胜利有较大把握，另外，西华池处于东西两侧临沟的南北狭长平原地段，中间夹着破旧的小城，地形对红军步兵骑兵协同作战十分有利。据此，刘志丹决定在西华池歼灭这股国民党军。他当机立断，命令干部返回部队指挥作战。刘志丹登上西华池的城墙，看见国民党军在一里以外，以两路纵队的行军队形向红军猛扑而来，当即命令红三团从正面狙击，骑兵团从侧后投入战斗。王世泰指挥部队集合，命令红三团第一、二连隐蔽在北门外的一条横沟渠下待命，先锋连防守北城墙，掩护第一、二连的冲锋。

骄横的国民党军在进至距红军阵地三四百米时，散开队形攻击前进。进入伏击圈后，红军突然开火，打得国民党军慌乱后退。一连一

排排长李守成见敌后撤，忙率全排战士向其展开追击。国民党军困兽犹斗，顽强抵抗，李守成阵亡。国民党军气焰更加嚣张，狂呼乱叫着反冲过来。王世泰急令三团战士集中火力射击，压住了国民党军的攻击。国民党军以为红军人少，武器不如他们，接着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时，骑兵团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已迂回到敌后，切断了其退路，直捣国民党军临时指挥部和机炮连。这时，在杨琪指挥下，二路游击队也从东沟畔包抄过来，将逃散的国民党军又赶了回来。在北城墙上担任守城任务的先锋连战士，奋不顾身，跳下城来，冲向逃敌。在红军的合围打击下，国民党军无力抵抗，大部分缴械投降，少数逃到西沟畔后，又被张秀山带领的一队骑兵堵住，进退无路，只好当了俘虏。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共毙伤国民党军 200 多人，俘虏约 500 人，缴获步枪 600 余支，迫击炮 2 门，重机枪 2 挺，骡马 50 余匹，炮弹数十箱。红军只伤亡四五人。

西华池战斗是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这次战斗打出了红军的军威，是红四十二师成立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对于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斗结束后，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回到南梁革命根据地，部队驻扎在东华池一带进行休整补充。

经过短暂的休整，刘志丹、杨森又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再次南下关中，支援第三路游击区的反“围剿”斗争。5月10日，杨森率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在淳化县三里原，将国民党陕西保安团两个连紧紧包围，国民党军盘踞村落负隅顽抗。骑兵团经过激烈拼杀，全歼国民党

军 180 余人。从战斗缴获的国民党军机密文件中，刘志丹掌握了国民党军新的“围剿”计划：以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的一个团和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为主攻部队，由庆阳、合水一带向南梁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长驱直入；冯钦哉部一个营配以几百名地方民团武装由鄜县黑水寺一带向太白围堵；国民党井岳秀部驻延安、保安的一个团从东、北两线进行战略配合，进击南梁，妄图一举将南梁中心区的红色政权摧毁。同时，为对付活动在照金地区的红军主力，增调马弘章骑兵团由南向北“追剿”红军，李贵清部在正宁山河一线负责堵击，何高侯部一个营和民团武装数百人在淳化、土桥一线负责堵击，冯钦哉部的两个营在杨家店、转角镇一线拦截，国民党军企图切断第三路游击区与南梁中心区的联系，堵死红军回师通道，将红军主力围歼于照金地区。

面对新的敌情，红四十二师党委在照金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行动方针。鉴于红军主力在第三路游击区处境险恶，师党委和刘志丹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北上，跳出合击圈，回师南梁革命根据地，争取战场主动权，会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动员和部署。

5 月中旬，红四十二师主力离开第三路游击区北返。红军由耀县照金一带出发，经香山河、油房沟，准备从马栏一带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但部队在行军途中，经侦察得知沿马栏至刘家店一线都有国民党重兵严密封锁。刘志丹当即召开干部会议，重新研究行军路线，决定以红三团为前卫，骑兵团为后卫，连夜急行军，天亮前赶到正宁五顷塬，绕道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次日早晨，红军到达五顷塬下面的峁子。不料，国民党马弘章的骑兵团突然尾追而至，同红军后卫部队骑兵团展开混战。团长王世泰即带红三团一个连在五顷塬西侧山岭上阻击国民党军，其余部队继续突围。红三团阻击部队撤退后，红三团先锋连奉命在五顷塬西侧高凤坡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主力突围。先锋连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打得十分顽强，阻止了国民党军的攻势，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红军主力转移至雕翎关时，又遇国民党冯钦哉部一个营及 200 余民团的堵截，部队奋勇冲杀，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

高凤坡战斗，红军主力冲破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赢得了反“围剿”斗争第二阶段的战场主动权，粉碎了国民党军在照金地区消灭红军主力的企图。但是，战斗中红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部队牺牲 30 余人，另有 20 余名红军战士受伤被俘后，宁死不屈，被凶残的国民党军拉到正宁县山河镇的老爷庙内活埋。战后，当地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安葬在五顷塬高凤坡上。地方党组织和当地人民还到五顷塬一带的梢林中四处寻找负伤后分散隐蔽的红军战士，待其伤口治愈后送回部队。因高凤坡战斗红军损失较大，刘志丹、杨森立即改变了回师南梁的计划，决定红三团、骑兵团兵分两路转移外线作战。与此同时，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 second 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军立即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进山隐蔽，相机袭扰敌人。

在主力红军转至外线后，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 1000 余人于 1934 年 5 月上旬进入南梁中心区。仇良民和谭

世麟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民党军队还在马背上驮着铡刀，到处搜捕和杀害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及革命群众。5月13日晚，国民党军将李青山、张侯福、曹思聪等26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拉到阎洼子台地里活埋，还用铡刀将共产党员、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阳珍等6名乡村干部杀害。5月20日，国民党仇良民、谭世麟部窜进保安县芦子沟。刘志丹的父亲和妻子因及时转移脱险，但国民党军杀害了刘志丹的其他亲属数十人，烧毁了其房屋，还掘开了刘家祖坟，焚骨扬灰，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这期间，转移至外线的两路红军主力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纵横驰骋，连战告捷。红三团在刘志丹、王世泰率领下，从正宁五顷塬向合水太白镇转移途中，于合水县和尚塬与国民党冯钦哉部骑兵团一个营及鄜县民团激战终日，将国民党军击溃。然后，红三团北上转战洛河川。6月20日，在保安县马子川，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三团给井岳秀部的精锐部队高玉亭营和金鼎山民团以沉重打击。当时，刘志丹带领的红三团只有三个连200余人，而高玉亭营则是井岳秀的精锐部队，加上民团兵力达700余人，战斗一开始，高玉亭命令其“敢死队”抢占制高点，企图切断红军的退路。红军先发制人，夺取了制高点，连续5次击退国民党军的集团冲锋，二连和先锋连在团长王世泰的率领下，以机枪为掩护，向国民党军发起冲锋，将“敢死队”歼灭大半，残敌退回保安。此战红军歼敌4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接着，刘志丹、王世泰率红三团挥师南下，挺进大凤川，连夜与甘肃警备第二旅窜犯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一个营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大半。此时，红军骑兵团在杨森、高锦纯、赵国卿的率领下，在进入中部小石崖休整之后，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各部东出咸（阳）榆（林）大道，截获国民党军汽车一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此后，骑兵团又转战延长、临镇一带，在交道塬取得歼敌一个连的胜利。

在主力红军的支援下，各路地方红军游击队也主动出击，接连获得重大胜利。庆阳游击队袭入保安柳村洼，直捣敌张廷芝部的后方；保安游击队连续袭击吴旗镇、宋家砭、金鼎山、王家桥等国民党军据点，重创和消灭大批敌人；合水游击队继两次袭入合水县城之后，又在宁县盘克塬、合水固城川连续伏击国民党骑兵，歼敌 100 余人。

至此，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经过大小 30 多次战斗，歼敌 3000 余人，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在中心区域，以南梁为中心，东起蔡家沟，西至五蛟堡，南到固城川，北抵吴旗镇，方圆 200 多平方公里内的国民党据点都先后被拔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 18 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2.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不断深入的时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却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下遭到失败。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确立

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中央红军长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取得的胜利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使蒋介石惊慌万状，坐卧不安。1935年春，蒋介石急调陕、甘、宁、豫、晋5省军阀，计4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是：北线，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3个团部署在保安、定边、靖边、横山、榆林、佳县、神木、府谷一带“剿防”；在东线，晋军七十一师，集结在黄河东岸各要点驻防，并派遣第二〇六旅2个团西渡黄河进驻吴堡和宋家川、辛家沟、绥德县的义合镇一带“剿防”；南线，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4个团摆在宜君、中部、洛川、郃县、甘泉一线，固守咸（阳）榆（林）大道，作为战略警戒；西线，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3个旅，加上陇东警二旅，共7个团的兵力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形的战线，向南梁地区逐次推进；在西南面，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分别进驻合水、宁县、正宁地区，楔入南梁、照金之间待机。为了割断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蒋介石从河南洛阳地区调来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4个团进驻延安、安塞、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一带，并向陕北苏区进攻。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中调集了陕西、甘肃、山西、宁夏、河南五省军阀及嫡系部队6个师约30个团共4万余人的兵力。为了平息各军阀部队之间，尤其是井岳秀部与高桂滋部之间的矛盾，蒋介石还派出参谋团，进驻绥德，调解各军阀的关系，监督部队的行动。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不到 4000 人。为了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共同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2 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与在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统一机构反“围剿”问题深入交换意见。2 月 5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志丹主持，讨论了统一两地党政军的领导和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工委书记，习仲勋任工委委员，刘志丹为军委主席^⑩。不久，又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周家硷会议是西北红军发展时期一次重要会议，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和党的领导，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月 18 日，刘志丹发布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强调，红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打破高桂滋部的防线，然后向南、向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为了达到上述战略目标，红军在战略部署上作了如下安排：红四十二师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红一团进至耀县柳林地区钳制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师；红二团在完成阻击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向环县、三边发展，开辟定边、环县新苏区；骑兵团相机东

进宜川，积极向韩城一带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河川一带转移。就在反“围剿”部署刚刚下达，反“围剿”斗争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谢子长因伤势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逝世。谢子长的逝世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人民的巨大损失。

1935年2月初，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向陕甘边苏区发起了攻。国民党军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抵悦乐；一路经固原、西峰、庆阳进驻六寸塬。2月21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等地。国民党军采取“堡垒”战术，在到达悦乐后，一面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战略村”，企图割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一面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修筑碉堡，仅在新堡、悦乐、五蛟、柔远等地就修筑碉堡30余座。

在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赤卫军用疑兵之计，迷惑打击敌人，他们在老爷岭的山头搭起许多毛毡帐篷，在密林中升起许多红旗。白天，游击队员高举红旗到处游击。夜晚，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小股部队不断游击骚扰，造成主力红军在老爷岭一带据险抵抗的假象，迫使国民党军在老爷岭以西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胜利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行动。

按照既定的作战部署，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向东挺进，迎击由宜君、中部、郃县、甘泉地区向根据地进犯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歼敌两个排。3月下旬，骑兵团经元

城川南下奔袭，消灭了进犯五蚊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两个排，歼敌 50 余人。

在此前后，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发起了田岷岷战斗。经半小时激战，红军全歼驻守高地的国民党军一个连。此后，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及政府保卫大队乘胜追击，从三面包围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处境孤立，惧遭全歼，逃回悦乐。这次战斗歼敌 100 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在红二团等部队取得田岷岷战斗胜利后，红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又发起了六寸塬战斗。4 月 3 日凌晨，红军经长途行军到达六寸塬附近。拂晓前，西北抗日义勇军首先攻进村子，歼敌 20 余人。由于国民党军占据有利地形，修筑了工事，火力狠猛，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多次冲锋未果，伤亡严重，红三团主动撤退，六寸塬战斗失利。战斗中，骑兵团团长赵国卿负重伤，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受伤。六寸塬战斗后，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由张秀山率领开赴陕北，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地区的作战。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和各路游击队，由杨森指挥，坚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4 月 14 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占领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南梁苏区沦陷。国民党军 500 多人紧紧追击转移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4 月 16 日，习仲勋等政府工作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被国民党军包围，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

关工作人员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战斗中梅生贵伤重被俘，壮烈牺牲。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侵入南梁革命根据地后，根据地人民在游击队的带领下，坚壁清野，把粮食、灶具全部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蔽。根据地人民还以生命掩护革命干部和军队，使国民党军一无所获。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国民党军进行并村，实行保甲制度，将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国民党军队还严刑拷打走出山林的群众，追问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去向。并张贴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声称抓到习仲勋，赏洋 2000 块，马两匹；抓到贾生秀，赏洋 1000 块，马 1 匹。同时，国民党地方政府网罗地主“还乡团”对人民实行反攻倒算。“还乡团”熟悉地形和情况，仇视革命，他们四处搜捕残害共产党员和红军伤病员，加重了根据地的灾难。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陕甘边斗争的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继续纵横驰骋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地区，牵制了西线、南线、西南线三个方面国民党军的行动。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军，除跟随主力红军转战陕北外，都转入地下活动，侦察敌情，袭扰敌人。

根据西北军委的指示，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由下寺湾挺进宜川、甘泉一带活动。5 月 21 日，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在宜川的屯石岵岷歼灭国民党民团武装 160 余人后，北上临镇。此时，西北前敌总指挥部命

令骑兵团开赴延长作战，当骑兵团到达延长时，战斗已经胜利结束，西北前敌总指挥部遂将缴获的 170 余匹战马补充给骑兵团，扩建了第四连。此时骑兵团已拥有兵力 500 余人，战马 500 余匹。此后，骑兵团配合红一团在宜川、鄜县、澄城、合阳、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扫荡了观音堂、芝川等地 50 余个反动民团据点，打土豪，分粮食，摧毁反动政权，开辟了洛川、中部、宜君游击区，控制了咸榆大道，切断了国民党军的交通运输线，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7 月，骑兵团在完成任务后，回到下寺湾地区。

红二十六军第一团进军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随后红一团退回陕甘边南区根据地，配合第三路游击区的各游击队，以正宁湫头塬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5 年 3 月，国民党军驻底庙的一个骑兵连进犯下南坡头，正宁四支队阻击失利。红一团闻讯将其击退。4 月，回民支队在正宁龙嘴子一带设伏袭击国民党军一个骑兵连，俘敌连长以下 7 人，缴获步枪 6 支，机枪 1 挺。4 月 1 日，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宁县三支队开赴宁县金村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当红一团由瓦扇子行军到金村庙附近时，得知金村庙已驻扎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红一团立即向湘乐川转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穷追不舍。红一团由湘乐川北上盘克塬，在半坡受到优势国民党军前后夹击。危急时刻，红一团二连连长张治怀率领全连战士抢占一个高地，凭借有利地形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主力突围。在二连的有力掩护下，团部及一连、先锋连、宁县三支队安全突围。在国民党军的

重重包围中，二连顽强抵抗，战斗从上午 11 时进行到夜晚，打退了国民党军多次强攻，但终因众寡悬殊，被迫跳崖突围。这次战斗，红一团损失严重，团长陈国栋负重伤，二连长张治怀等 30 余人壮烈牺牲，20 余人被俘。突围后，红一团转移到九岷塬桃树庄一带休整补充。战后第四天，党组织派宁县三支队政委刘永培从小石崖前往金村庙一带收容失散和受伤的红军战士，失散的战士陆续回到红军部队，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坚持在陕甘边苏区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开展游击活动。4 月 21 日，红二团在杨青川伏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警三团一个骑兵连，全歼国民党军，并用缴获的战马扩建了一个骑兵排。5 月 20 日，又在保安县顺宁川和安塞川的五城镇，全歼国民党民团 100 余人。接着北上定边，深入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的后方活动，摧毁了陕军警骑旅三团张廷祥部设在韩家集的一个修械所，扫荡了国民党的保甲政权，逼迫靖边、安边据点的陕军警骑旅二团张廷芝等部撤退。然后，红二团又挥师南下，奔袭驻守吴起镇（今吴起县）民团，解放了吴起镇。红二团在两个多月的游击活动中，粉碎了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警三团对保安苏区的“围剿”，开辟了定边以东，靖边以西、以北的大片游击区。6 月，红二团奉西北军委命令，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序列，北上靖边作战。

在红二十六军部分主力部队坚持在陕甘边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南梁中心区的地方红军武装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3 月，庆阳游击队大部编入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主力北上陕北，其余人员在元

城进行整编。整编后，庆阳游击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灵活多样地开展斗争，部队得到很快发展，达到 100 余人。4 月中旬，庆阳游击队突破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包围后，在麻地台又一次进行整编，正式成立庆北游击队，下辖 2 个大队，7 个分队。庆北游击队成立后奉命在保安、吴起、定边、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8 月，李培福联络失散的老游击队员李树林、田生弟等 10 余人，以此为骨干，在二将川一带重新组织起庆华游击队，共 60 余人。庆华游击队在南梁地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恢复红色政权。此时，红二十五军长征来到陇东泾川一带，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前去阻击，南梁中心区一带国民党军大部撤离，李培福、李树林等加紧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工作，先后恢复了温台区、柔远区、城壕区、白豹区的红色政权。9 月，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南梁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基本上得到了恢复。9 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崔凤鸣任党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地在南梁李沟门。在华池战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梁革命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

在陕甘边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的配合下，陕北主战场捷报频传。4 月 15 日，张秀山、吴岱峰、黄罗斌率领红二十六军第三团，郭宝珊、任浪花率领西北抗日义勇军离开南梁，北上到达陕北。4 月 21 日，红二团在杨清川伏击国民党警二旅第二团骑兵连获胜。22 日，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横山寺儿畔首战告捷，歼灭井岳秀部一个精锐连。

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安定（今子长县）白庙岔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此时，高桂滋的王牌郭子封营进入苏区杨家园子以及周围村庄，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力量消灭这个营”。5月7日至9日，红军在吴家寨、马家坪取得重大军事胜利。7日上午8时，一战吴家寨，歼敌100余人，缴枪90余支以及许多弹药。上午10时，高桂滋部郭子封营前来增援，红军再战吴家寨，全歼郭子封营，击毙营长以下5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枪500余支，轻机枪27挺。一天两战两捷、全歼高桂滋部五〇二团一个营。9日，三战杨家园子附近的马家坪，将高桂滋部护送军饷、物资的五〇〇团第三营和团属机炮连全部歼灭，缴获甚众，击毙敌40余人，俘虏450余人，抓到逃亡地主和“铲共义勇队”100余人，缴获一个团的军饷和装备400余驮，包括长短枪450余支，轻、重机枪近30挺，迫击炮2门，军衣2000套，银洋数十万元和许多医疗药品。在刘志丹的正确指挥下，红军连续取得胜利，共歼灭高桂滋部7个连，俘虏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轻机枪60余挺。5月10日，安定县城国民党军队弃城逃跑，红军占领安定县城。这次战斗，消灭了高桂滋总兵力的1/4，给其以沉重打击。由于高桂滋是这次“围剿”红军的急先锋，对高部的打击，使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不敢轻举妄动，逼迫收缩战线，采取守势。

5月10日，西北军委在安定县玉家湾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郭洪涛、高岗、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高长久、张达志，主要研究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红军先打延长、安塞之敌，

打通陕北、陕甘边两大苏区，使之连成一片，彻底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5月下旬，红军主力兵团摆出要攻打绥德、清涧的态势，国民党军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准备拦截时，红军则秘密南下到延长县大连沟一带隐蔽待机攻打延长县城。驻守延长县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民团、矿警等共计400余人，红军先引诱民团出城100余里后，于5月20日拂晓攻打县城，全歼国民党守军。民团在返回县城时也被红军消灭。此役生俘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和骑兵连连长，毙伤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轻机枪15挺，无线电台1部，战马100余匹。红军占领延长后，延川国民党军弃城逃往清涧，延川也被红军占领。6月4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延长县城出发，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县城。国民党甘泉守军第四十二师一个营知悉红军解放延长、延川的消息，加紧戒备，严密防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甘泉时，发现甘泉县城戒备森严，偷袭计划无法实现。刘志丹立即改变计划，沿洛河川西进，到陕甘边中心苏区的下寺湾一带休整补充，待机破敌。

6月20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围攻安塞县城兴隆寨。战斗开始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担任主攻。红二十七军第二团挖地道爆破。当天红军炸开城墙，攻进城内，歼敌200余人，俘获国民党新旧两任县长，缴获其全部公文档案和关防印信，解放了安塞县城。

6月22日，红军全歼李家塌寨子据点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和民团武装400余人。此后，安塞境内各据点的国民党军闻风丧胆，安塞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扫荡残敌，安塞全境解放。陕甘边、

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组建时的 2100 余人发展到 3000 余人，全部装备了新式武器，并配备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火力较强的武器，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此后，北线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继续向根据地进攻。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以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作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阶段作战的打击目标。经过慎重分析，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攻克靖边县城，打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解除陕甘革命根据地北线的威胁。

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方针，6 月 28 日凌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入进攻阵地，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发起强攻，在东南城角打开突破口，夺取东门。上午，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投入战斗，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夺取其城隍庙据点，与红二十六军部队形成夹攻态势。经过反复争夺，红二十六军攻占钟鼓楼，全歼国民党守军。此时，西北抗日义勇军也经过激战，歼灭西山寨守敌，控制制高点。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一部攻占北城门楼。城内大部国民党军被歼灭。残部退居祖师庙，负隅顽抗。红军各部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最后攻击，击毙国民党营长屈子鹏，歼敌 600 余人，靖边战斗胜利结束。

6 月 30 日，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北线攻势下，驻守保安县城的国民党第八十六师一部弃城而逃，红军兵不血刃解放了保安县城。至此，国民党第八十六师的北线“围剿”行动被彻底粉碎，进攻南线的国民党军被迫撤退，西线国民党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闻风而逃。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

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是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红军在5个月的反“围剿”斗争中，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迫击炮8门，解放了定边、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根据地。这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耀，东到黄河，形成了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包括30余个县的广大的红色区域。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战术水平和战斗力有了较大提高，不仅学会了打游击战、运动战，而且初步积累了阵地攻坚战的经验，红军主力的正规化建设也有了较快发展。

①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②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④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⑤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⑥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宣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⑧参见朱根生：《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5页。

⑩一说西北军委主席为谢子长。

第十一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光耀千秋

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移至下寺湾

1935年4月16日，国民党军在豹子川、白沙川的交汇处张岔岭将习仲勋率领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包围。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率部阻击国民党军。习仲勋在赤卫军的掩护下，奋力拼杀，冲出重围。

此后，习仲勋带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赤卫军和机关工作人员，经过连续拼杀，又突破国民党军的三次包围，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的石峁湾。4月下旬，国民党军尾追而来，习仲勋又率领陕甘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洛河川的阎家湾。在这里，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胡皮头村召开群众大会，会议由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聚德主持，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赤卫军、群众约20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宣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进驻洛河川，原属安塞县苏维埃政府管辖的桥扶峪区、下寺湾区、王家坪区转为边区政府直辖一、二、三区。^①

6月上旬，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阎家沟庙灵台（下寺湾北）召开杨家园子、延长战役祝捷大会，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主力部队及当地赤卫军、群众约四五千人参加大会，会议由习仲勋主持，刘志丹、习仲勋分别讲话。当地群众抬着猪羊等慰问红军。8月1日，在史家河滩召开赤卫军检阅大会，洛河川、安塞、保安等地的游击队、赤卫军约4000多人参加会议，大会由习仲勋主持，李景林、张文华等讲

话。会场设有加入共产党、参加红军报名处。9月7日，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到达保安县腰子川，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习仲勋、刘景范前往永宁山迎接。随之，陕甘边区党政军各界在屈沟坪召开大会，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会后设宴招待了红二十五军连以上干部。②

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习仲勋发动根据地群众积极支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群众也像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③，到处洋溢喜迎亲人的欢乐景象。在下寺湾一带休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立即派团长黄罗斌为代表，前往刘家堡欢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

10月上旬，在习仲勋主持下，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在史家河滩召开劳山战役祝捷大会，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都讲了话。④

陕甘边区党政机关迁至距甘泉县城70余里的下寺湾以后，下寺湾就成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不久，习仲勋担任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代理书记。据当时的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景范回忆，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时书记惠子俊后调西北工委书记，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由李生华继任，李生华担任后又去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是由习仲勋兼着。”⑤与此同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根据形势的发展，设立了南区和东区革命委员会，政府各委员会的领导人亦有变动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土地委员长李生华；劳动委员长牛永清；财政委员长杨玉亭；粮食委员长马锡五；文化委员长冯玺玉；肃反委员长郝文明；妇女委员长张景

文；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后张邦英、秦善秀）；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陕甘边区党政机关迁至下寺湾以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不负众望，领导根据地军民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①《王华等 7 人 1984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9—472 页。

②《王华等 7 人 1984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2 页。

③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16 日。

④《王华等 7 人 1984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2 页。

⑤《刘景范 1984 年 5 月谈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机关移住洛河川》，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9 页。

⑥《陕西省志·第五十卷政务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9 页。

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

（一）陕甘边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开始

1935 年 7 月间，国民党军在对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消灭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次“围剿”规模更大，先后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部队，兵力达 15 万余人。为了统一指挥这次“围剿”，国民党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国民党军的“围剿”兵力部署是：东线，阎锡山的晋军主力沿黄河一线从陕甘革命根据地东线进攻；西线，除原来的陕、甘、宁三省军阀部队外，又投入东北军 8 个

师的兵力，沿环县、庆阳、合水至彬县、长武一线向根据地推进；北线，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和第八十四师在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神府等地驻防；在南线，东北军主力第六十七军等部沿洛川一线向根据地大举进攻。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的作战方针是以东北军为进攻主力，以根据地南线为主攻方向，运用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术，企图聚歼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陕甘地区。

7月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到达杨家园，刘志丹召集团以上干部召开反“围剿”军事会议，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及军事部署。会议决定，集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趁敌之隙，各个击破，积小胜为大胜，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在蒋介石的“围剿”部署完成前，首先打击深入东线一带根据地的晋军先头部队，挫败晋军西渡黄河的企图，然后挥师南下，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寻机歼灭深入根据地南线一带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部，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为了保证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行动，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骑兵团仍在洛河以南和咸榆大道东西两侧的苏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南线国民党军的行动。陕甘边各路游击队、赤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西线国民党军的行动。

按照作战方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游击队、根据地群众迅速作好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红军主力兵团乘国民党整个“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先发制人，迎头痛击西渡黄河的晋军先头部队。8月11日，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突然挥师吴堡，向慕家塬晋军据点发动进攻，经过苦战，歼灭慕家塬守军及增援部队，歼敌600余人。国

国民党军误以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要北上神府，在黄河两岸增兵加强防御。根据敌情特点，刘志丹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声言北上打通佳（县）、吴（堡）、神（木）、府（谷）苏区的联系，造成国民党军部署上的失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则秘密南下，寻机再战。

8月中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延家畔打垮国民党军一个营后，转进到绥德东南部的新庄一带待机。这时，晋军孙楚、李生达率 2500 余人，由宋家川渡过黄河，到达吴堡寻找主力部队决战。当国民党“进剿”部队到达定仙塬时，前敌总指挥部决定，趁国民党军立足未稳之机，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消灭敌人。8月2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定仙塬歼李生达部 20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1980 余支，轻机枪 69 挺，迫击炮 2 门，骡马 80 余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定仙塬战斗打垮了东线国民党军的攻势，东线战场形势得到扭转。

8月下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迅速向南运动，准备寻机歼灭南线的国民党东北军。8月25日，红军抵达延川县文安驿一带。这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来到文安驿。8月27日，在文安驿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在反“围剿”作战方针上，西北代表团成员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在作战形式上，要求红军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阵地战。在行动方向上，要求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泾阳发展。要主力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敌军的中心据点①。

文安驿会议之后，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被迫进行攻击瓦窑堡的准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沿永坪川、青坪川两路向瓦窑堡城郊外围运动。同时，刘志丹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到南线侦察敌情，了解东北军的作战规律和装备情况，以保证尔后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的胜利。8月30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团长黄罗斌、政委马佩勋的率领下，南下部县地区。9月10日，红三团与酃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密切配合，诱出驻中部龙坊镇的国民党东北军一一〇师两个营，并采用伏击战术，歼敌一个营，俘敌200余人。此时，从俘虏口中得知东北军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红三团上报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命令红三团转移至洛河川的下寺湾一带集结待命。

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进抵瓦窑堡郊外集结。在勘察国民党城防工事后，刘志丹认为国民党军防御体系坚固，依红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必遭失败。经过研究，刘志丹决定放弃强攻瓦窑堡，另寻战机歼灭敌人。

此后，刘志丹又对清涧县城守敌的布防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清涧县城的国民党军兵力更多，防御工事更强，地形更险要，更不能硬攻。刘志丹决定奔袭北线的横山县城，趁敌不备，歼灭敌人。横山一旦得手，驻守石湾镇的国民党军第二五八旅高双城部可能不战自退，根据地能进一步巩固，还可以牵制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对神府苏区的行动，有利于集中力世打击南线的东北军。

9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各部向横山县城发动偷袭行动，虽攻城未克，但还是达到了打击北线敌人，巩固苏区的战略目的。国

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为了加强横山地区的防御，被迫撤回“围剿”神府苏区的部分兵力，减轻了红军独立三团和神府各游击队的压力，神府苏区的危急局面得到扭转。

（二）陕甘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严重危机局面

1935年10月，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时候，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却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内发动了一场错误的“肃反”，造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错误“肃反”的发生，有其错误指导思想上的根源。1934年3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者戴上“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帽子；1935年6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右倾”严重，要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暴露和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1935年6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甘革命根据地，他们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和现实不作正确的估计和分析，指责刘志丹和其他负责人“右倾”，把两块根据地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说成是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战略上退却逃跑以及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革命战争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之配合。7月15日，在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决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开展肃反。

9月间，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改组后，省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方针，将“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强加于刘志丹等陕甘革命根据地干部身上，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一个月先后将根据地县级以上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刘志丹、张秀山、杨森、习仲勋、高岗、刘景范、郭宝珊等陕甘苏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均被关押。“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对关押的同志进行严刑逼供，有的甚至被杀害。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错误“肃反”导致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干部200多人被杀害，给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危机。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②因为错误的“肃反”，使陕甘革命根据地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东地区群众听到他们的领导人马文瑞等被捕，大批向白区“跑反”^③，仅宜川南原靠近白区一带就跑了700多户。保安、安塞、靖边等几个县发生“反水”^④，有些边沿苏区变成了白区。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

^①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②王华：《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延安文史资料》第10辑，延安市政协，2006年编。

^③旧时指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

^④即叛变之意。

⑤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0日。

三、党中央挽救陕甘革命根据地危机

（一）党中央纠正陕甘苏区错误肃反

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急时刻，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当天，中共党员、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景全就向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汇报了陕甘苏区错误“肃反”的有关情况。10月20日，毛泽东分别接见了定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玉海和保安县（今志丹县）独立营教导员龚逢春、赤安县游击队一支队队长张明科。他们向中央汇报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肃反”中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被杀害的情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十分震惊，立即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前往瓦窑堡接管被“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控制的西北军委保卫局。要求“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县下寺湾，边区政府在此召开欢迎大会，庆祝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3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负责人关于西北根据地“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中央决定成立党务委员会，由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等组成，负责审查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问题。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着力解决错误“肃反”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过问，参与处理。先期到达的王首道等在瓦窑堡仔细审阅了案卷，调查研究，证明刘志丹等同志的“罪状”

纯属诬蔑。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当天即将刘志丹等被捕同志全部释放。张闻天、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刘志丹等同志，亲切地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①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同志感谢党中央的正确处理。一再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迫害的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勤恳工作，使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

11月中旬，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②。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为刘志丹等人的平反大会，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郑重宣布：刘志丹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为他分配工作。

毛泽东、党中央及时制止和纠正“左”倾错误“肃反”，挽救了西北革命的危机，恢复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往日生机，这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进而保障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实现以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方针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指出的那样：“1935

年9、10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只是因为党中央的到达才得以挽救。”陕甘苏区错误肃反的及时纠正，“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③

（二）陕甘省、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及关中特区的建立

1.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在谋划和组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同时，着手开展巩固和恢复政权的工作。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并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将陕甘革命根据地划分为陕西省、陕甘省、关中特区和神府特区，统归西北办事处领导。同时，成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两个省委和特委的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行政区划调整后，原属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即由陕甘省领导。11月，中共陕甘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在甘泉县下寺湾正式成立，不久又移至鄜县套洞原。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组织部长李富春（兼），宣传部长李景林（后李一氓），军事部长肖劲光，妇女部长蔡畅，白区工作部长张策，秘书长曹力如，共青团省委书记白向银；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后李生华、朱开铨接任），副主席朱开铨，土地裁判部长朱开铨（兼），国民经济部长马锡五，财政部长张慕尧，粮食部长王朴，内务部长马仰西，教育部长王之匀，工农检察部长任泽义，保卫局长郑自兴。④陕甘省管辖甘洛、肤施、红泉、宜川、鄜县、中宜、华池、庆北等8个县。同月，陕甘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派马仰西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回到华池战

区指导工作。为了加强与庆北苏区的联系，华池战区党政机构先移至二将川的山庄，后迁至武家河，并召开了华池战区工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所有干部迅速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基层组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陕甘边区的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都基本得到恢复。

2.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后，原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作为西北办事处的下属单位开始行使职权。1936年3月11日至15日，陕西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瓦窑堡举行。会议总结了上届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苏维埃政府。由49名执委和10名候补执委组成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由马明方、马佩勋任主席，霍维德（兼工农监察部长）、崔田夫、惠子民（兼国民经济部部长）任副主席。财政部长艾楚南，土地部长辛兰亭、王海山（后），劳动部长祁明珍、梁月明（后），粮食部长高旭光，教育部长陈蓬飞、郭青廷（后），保卫局长刘子义，军事部长钟赤兵，裁判部长罗成德，惠子民、陈蓬飞先后任秘书长，政府机关驻瓦窑堡。⑤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下辖吴堡、绥德、清涧、靖边、新城、瓦窑堡、赤安、延安、宜川（红宜）、部县等23个县市苏维埃政府。

3.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边南区根据地建立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并派遣贾拓夫、习仲勋负责关中特区的工作。因当时道路阻隔，交通不便，贾拓夫、习仲勋于1936年1月下旬才来到陕甘边南区，关中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实际成立时间要比中央宣布建立的时间晚几个月。1936年1月下旬，

在贾拓夫、习仲勋的主持下，关中特区成立大会正式召开，陕甘边南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从此改名为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关中特区党委书记贾拓夫，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仍由原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担任，并增补习仲勋为副主席。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机关驻新正县南邑村，从此，关中特区工作逐步摆脱了“左”倾错误干扰，革命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②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写组：《刘志丹年谱》，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2页。

③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④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38页。

⑤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337页。

四、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分析

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一）具有得天独厚的主客观条件

陕甘边区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最终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主要原因在于陕甘边区具有创造红色政权的必要条件。首先，陕甘边区地理环境复杂，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横跨陕西、甘肃两省，北起环县、定边，南至淳化、耀县，苍茫的子午岭纵贯其间。区间内地形复杂，黄土丘陵沟壑纵横，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利于发展游击战争。其次，陕甘边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极其有限。比如庆阳县城，地域辽阔，距兰州 600 多公里，西南边界距县城 100 多公里，南梁一带距县城也近 100 公里，国民党对这一带的控制实在是力不从心。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这一点，发动群众闹革命。国民党庆阳县政府为避“闹红”，竟将政府驻地迁到了距县城 50 多公里的西峰镇，城里只留有一个区政府。庆阳的防务一直由陇东清乡司令部谭世麟负责，谭部缺乏正规训练，装备落后，战斗力不强。国民党先后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过三次“围剿”，都是地方军阀杨虎城、马鸿宾、马鸿逵等部所为，虽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但因各怀鬼胎，步调不一，均遭失败。显而易见，国民党政府对陕甘边一带统治的薄弱，为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留下了极大的活动空间。第三，陕甘边区民不聊生，民众反抗社会黑暗的要求强烈。陕甘边地区民众具有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优良品质。自古以来，这一地区的人民无数次地参加反抗残暴统治者的起义行动，英勇善战、具有反抗压迫的传统民风，易于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加之从 1929 年起，陕甘边界地区连续大旱，土地荒芜，饥民遍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农村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饥民斗争此起彼伏。国民党报刊就说道：“陕北土地贫瘠，交通梗阻，一般民众旧有道德观念颇深，风俗淳朴。以此民情，若以其他意识，很难打破。惟政治黑暗，经济破产，而以酿成今日之势。……催索之

吏，遍布乡间，不肖之徒，更中饱私囊。民众破产者频频，致命者累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共党乘机而入，煽动民众，抗交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民听之成理，遂响应之。乱机四伏，共匪丛生，成决堤之水，横溢而不可收拾。”^①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顺势而为，广洒革命火种，终成燎原之势。

（二）形成了坚强、正确的领导集体

毛泽东曾经指出，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且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②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刘志丹等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刘志丹、谢子长等多次受到打击和排挤，使陕甘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几遭严重损失，使刚开辟的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以及后来创建的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等先后丧失。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执行者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集体领导，高高在上，作风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在敌人“围剿”面前，不顾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的情况，反对刘志丹等主要领导人提出的在陕甘边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意见，主张红军到人口稠密、物资丰富的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1933年6月，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坚决反对，放弃照金根据地，强令部队南下渭华，向敌人统治势力很强的关中平原进攻，认为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并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刘志丹等人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右倾机会主义”

的帽子。结果红二十六军在南下途中，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照金根据地也随之丧失。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后，陕西省委和陕甘各地的党组织都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先后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会议，从而消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保证了陕甘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表现为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和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区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并按照客观情况制定方针政策，独立自主地处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初步解决了陕甘边区农民土地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等，表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1943年4月29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论断不但是对刘志丹革命实践的高度评价，也是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创建、发展作出贡

献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高度评价。 历史实践表明，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并发展壮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革命路线。

（三）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陕甘边区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重要客观条件。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胜利之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人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把建立人民政权、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针对群众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当地实际的土地政策和法令，在分配土地时优先照顾红军烈属、家属，对农民减免征粮、不派款，党政军的各项开支主要靠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对流落人口和残疾孤寡老人实行政府救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在经济政策上，边区政府通过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边币、保护小商贩等措施，活跃和繁荣了边区经济，有效化解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赢得了群众对边区政府的更大支持。同时，根据地坚持一切依靠群众，把群众作为革命的重要力量来培育，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鼓励群众积极参加红军，踊跃支前，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革命战争，筑起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在创建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渐探索出一条革命致胜的根本路线，这就是群众路线。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始，到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党在陕甘边区之所以没有被压倒，正是依托农村，依靠农民，在农村创建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中找到了出路，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四）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

毛泽东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在创建陕甘边区红色政权的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从陕甘边区实际情况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游击战”、开辟“山区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先后在正宁寺村塬、耀县照金和和池南梁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区域性的红色政权。而党内以杜衡、李杰夫、李艮等人代表却坚持教条主义、机会主义，不切实际地要求进行“阵地战”和军事冒进，开辟“平原根据地”，责令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创建和领导的革命军队撤离革命根据地，开赴平原地带，与凶猛强悍的敌人面对面的冒险斗争，造成革命军队屡次受到严重摧残，并直接导致了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据地及其政权的陷落。在经过多次失败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总结出军事运动要与农民运动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要把建设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结合起来，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

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的成功经验，促使了红色政权的创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组织、领导根据地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开展战勤服务，配合和支持主力红军和游击队对敌作战，有力保卫和巩固了土地革命的成果，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为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史实表明，党在陕甘边区的局部执政是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结果。而局部执政开始以后，仍然离不开革命武装力量的保护和支持。否则，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就有被枪杆子推翻的风险。因此，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是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靠保障。

①边民：《陕北共匪猖獗的原因及今后围剿之步骤》，原载《秦风》1934年11月，现载祁玉江编：《志丹书库·刘志丹卷（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0—1241页。

②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③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功勋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得到完整保存并不断壮大起来的。之后，陕甘边主力红军与陕北红军相互配合，进行反“围剿”斗争，使陕甘边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陕甘革命根据地继而发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作出了重大贡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早在 1936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①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写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中国西北部，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②不言而喻，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其历史功绩自然也在“两点一存”中得到体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卓越的历史功绩。

第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创建，是西北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西北革命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的成功实践。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国民党的腥风血雨，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而沮丧、消沉，“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举起苏维埃革命的旗帜，“群雄四起”，为创建

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曾一度迷信“城市中心论”，想在一个或者数个大中城市获得政权，赢得革命胜利，进一步扩散到全国。实践表明：“城市中心论”的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在诸多共产党人领导的攻打大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武装起义相继失败的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在尝试中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推行的“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俄国模式”，创造出了以广大农村为依托，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广大的西北地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在不断克服错误路线，在不断的失败中自觉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历史时期，最终以南梁为中心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实践，是与西北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符合陕甘边区实际情况的。这一成功实践从理论上证明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正确性，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第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实施的政策、法令，体现了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为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革命的胜利，首先在于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执行了一整套符合人民利益要求

的政策，因此被人民所拥护，为历史所选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制定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的措施，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使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以土地政策为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针对“群众对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大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③的实际，边区政府实行了八项政策，充分体现了边区政府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符合贫苦农民的需要，深得民心。土地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豪绅地主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针对陕甘边区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苦的现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要采取了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食，也不“欢迎”粮食；靠收买军粮供应军队；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成立牧场，养猪养羊等措施^④，减轻了群众负担，增加了群众收入，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国民党的报刊曾感叹道：“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发挥效力。”^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执政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真正是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执政实践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脉络，为党实现全国范围全面执政奠定了基础。

第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和工农民主专政，为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苏维埃政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制度的实施，使千百年来封建制度统治下的苏区广大劳苦大众，能够充分享受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权利，是党在陕甘边区进行民主政治的有益尝试。同时，苏维埃各级政府实施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并管理自己的政权，极大地增强了陕甘边区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了各级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的工农民主专政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既不同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也不同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的政权，它是陕甘边区历史上广大农民阶级第一次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是陕甘边区局部范围内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政权的产生方式、组织方式、行使职权方式以及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为后来抗日战争时的边区参议会、解放战争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建国后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了借鉴。其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已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政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围绕中心任务，支持革命战争，锻炼培养了一批当家理国的人才。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处在白色包围之中，置身于“围剿”与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中。正如毛泽东所言：“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

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中心问题。”⑥围绕武装斗争这一中心工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挥政府职能，动员、组织、带领根据地军民努力完成兵源扩充、粮食、医药筹备、物资运输等后勤物资的供给和保障工作。同时，积极做好经济、文化教育、卫生防疫、架桥修路等社会公益事业。正是在这些建设管理的各项工作之中，党的大批干部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锻炼、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优秀军事指挥员和革命干部，除刘志丹、谢子长英年早逝外，大多成为陕甘宁边区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后各条战线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为延安大生产中22位劳动模范题词，其中有9人就先后在陕甘边区战斗和生活过。比如给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题词：“密切联系群众”，给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给华池县县长李培福题词：“面向群众”，给边区保安司令、原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王世泰题词：“忠实努力，不夸不躁”，给延安县县长刘秉温题词：“善于领导群众”，给赤水县委书记任成玉题词：“为群众谋福利”，给三边分区司令员、原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骑兵大队副大队长贺晋年题词：“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给边区保安司令部供给部部长、西华池起义领导者之一杨林题词：“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这些题词是对陕甘边区干部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充分肯定。在党的七大会议上，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144名代表中，有50多人曾在陕甘边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作过，从陕甘革命根

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党的七大代表中约占 8%。一些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习仲勋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马文瑞、汪锋分别任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还有一批人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和人民军队优秀的指挥员，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年 12 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5—187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1 页。

③《刘景范 1959 年 4 月 25 日谈陕甘边苏区创建的历史条件》，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6 页。

④参见《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1 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1986 年版，第 106—107 页。

⑤成柏人：《陕北匪祸之再认识》，原载《政治旬刊》1935 年 11 月，现载祁玉江编：《志丹书库·刘志丹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51 页。

⑥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 页。

第十二章 垂裕后昆的南梁精神

一、南梁精神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陕甘边区实际紧密结合，领导陕甘边区军民自觉排除“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建设，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和思想，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宝贵理论、思想作风和革命传统最终凝结为催人奋进、垂裕后昆的南梁精神。南梁精神不仅承载着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更蕴涵了陕甘边区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为民情怀、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南梁精神的概念，最早见于 1985 年 11、12 月间一些在陕甘边区战斗工作过的老革命、老领导为南梁革命纪念馆的题词。如蔡子伟题词：“南梁革命精神与桥山共存，与日月同辉”；马文瑞题词：“发扬南梁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汪锋题词：“继承革命英烈精神，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刘景范题词：“学习先烈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精神，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与文化”。^①据 2000 年 10 月 29 日习仲勋办公室寄给两当县政协副主席龙宗尧的照片显示，习仲勋曾为重修《华池县志》题词：“发扬南梁精神，再展华池宏图”。

从以上题词不难看出，南梁精神作为一种革命传统，是客观存在的，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认可。2009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视察南梁革命纪念馆时说：“我是第一次到庆阳，第一次到南梁陕甘边区根据地，我们到这里是来受教育的，今天看了一下，很有感触，很受启发。南梁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铸就的革命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庆阳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办好，大力传承南梁精神，使其发扬光大。”②这段讲话表明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南梁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大力继承并发扬光大。

近年来，一些报刊常常使用南梁精神这一概念，也有一些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和学者初步涉及研究，南梁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重要地位开始受到重视。比如原华池县委书记闫晓峰、马斌先后将南梁精神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红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现任华池县委书记赵昌军提出：“南梁精神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和政治财富，在改革开放、西部开发的今天，南梁精神更需要我们把它发扬光大，使其永放光芒。”③陇东学院教授曲涛在庆阳电视台“名家讲坛”中所作的《延安精神的形成》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南梁精神对延安精神的影响。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刘治立经过多年系统研究，撰写研究论文，对南梁精神的内涵和特征、南梁精神的定位、研究南梁精神的

意义等进行系统阐述。④2012年8月，由甘肃省历史学会、庆阳市历史学会、陇东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南梁革命历史文化研究会四单位联合主办的“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在甘肃省庆阳市召开。这是一次关于南梁精神的集中研究，在入选论坛的59篇论文中，专题研究南梁精神的有4篇文章。通过广泛论证，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梁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凝聚起来的特定地域下的精神载体和宝贵财富，南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重要源头。2013年6月，甘肃省军区政治部、甘肃省委宣传部和庆阳市委联合召开“南梁精神”研讨会。来自中央、总政、兰州军区政治部机关和有关省市党史研究部门、革命纪念馆的专家学者等100余人出席研讨会。研讨会共收到63篇论文，经专家认真评审，从中遴选出41篇优秀论文。此次研讨会，首次从学术理论层面对南梁精神进行总结概括和理论分析。与会者认为：“坚定信念、百折不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顾全大局、团结进取，一心为民、面向群众”是南梁精神的精髓。15位专家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发言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思想路线、工作作风等层面，对南梁精神进行重点解读，内容涉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群众路线等各个领域；会议增强了对南梁精神历史定位的认同，深化了对南梁精神科学内涵的认知，强化了南梁精神时代价值的认识。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大家普遍认为，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确实存在一种万众归心的追求，一种社会共仰的风范，一种磅礴于世的精神，

它融入在陕甘边区红色政权曲折的创建历程，震撼人心的革命斗争故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等之中。这种革命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特殊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根植在陕甘边区这块红色的土地之上，代表了这个地域当时最高的精神文明成果。这种精神就是陕甘边区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总称的南梁精神。南梁精神不是一个理论体系，而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一种精神、一种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理论、思想和精神的结晶。概括而言，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群众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行为准则、工作作风的精华和结晶。它是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形成的。换言之，千百万陕甘边区人民流血牺牲的伟大实践，是南梁精神赖以形成的根基，而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指导，又是形成南梁精神的理论指南。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陕甘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孕育了南梁精神。南梁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长征精神、中央苏区精神等同为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它是陕甘边区最大的政治优势。如果否定南梁精神，实际上就是否定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的光荣传统，忽视了陕甘边苏区伟大贡献的客观事实，也无法解释“硕果仅存”。

①南梁革命纪念馆编：《南梁革命纪念馆》，内部资料，第52—72页。

②徐爱龙、白德斌：《和风惠陇原 深情寄厚土——习近平视察甘肃纪行》，《甘肃日报》2009年6月16日。

③赵昌军：《传承南梁红色精神谱写华池绚丽篇章》，《发展》2011年第7期。

④刘治立：《论南梁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二、南梁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条件

特殊的时代产生特殊的实践，特殊的实践孕育特殊的成果。南梁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和深刻的社会基础，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特殊的自然条件、落后的经济文化和恶劣的斗争环境，是南梁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条件

陕甘边区位于甘肃、陕西、宁夏交界的子午岭山脉中段的边陲地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川塬交错。从军事角度看，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这里距离敌人重兵驻守的兰州、西安、银川等中心城市较远，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在由北洋军阀统治向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演变过程中，新老军阀的政权更替造成了在一定时间内的权力“真空”。因此，在这里开展革命斗争，既可迅速发展，又可以影响陕甘宁三省的广大地区。这里恶霸地主、反动民团和地方小军阀众多，对民众进行野蛮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具有强烈的翻身求解放的愿望，易于发动和组织。这里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这里既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也没有固定的商业网点，只有为数不多的集市。另外，从当时的客观形势来看，陕甘边区革命斗争是在白色势力的四周包围境况下进行的。加之在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南方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红军相继踏上了长征路，一度与党中央和陕西省委中断了联系。严峻的斗争形势、残酷的斗争环境锻炼了陕甘边区革命者敢闯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风貌。这种特殊的现实环境，锤炼着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的信仰、胆略、气概和毅力，要求他们必须战胜艰难险阻，磨练意志，自强不息，不屈不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的实际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革命斗争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革命风貌。

（二）光荣的革命传统，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南梁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条件

陕甘边区虽然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但这里群众基础深厚，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 1927 年，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早期革命活动家王孝锡就在甘肃宁县组织青年社，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邠宁支部，不久又建立了中共太昌临时区委，开始了唤起民众的革命活动。1927 年清涧起义、1928 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于 1930 年初辗转来到陕甘交界的庆阳，开展“兵运”活动。1930 年 10 月，刘志丹成功领导“太白起义”，打响甘肃境内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此基础上，刘志丹等人组建了南梁游击队，拉开了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序幕。这支武装后来发展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为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有正规番号的工农革命武装。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陕甘边区党和红军

创建了正宁寺村塬、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均遭失败。后逐渐摆脱“左”倾错误路线干扰，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选择以华池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正式建立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党领导陕甘边区人民群众，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特别是西征战役和山城堡战役期间，边区人民踊跃支前，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创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形成南梁精神的基础和政治保证。

（三）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是南梁精神产生和形成的主观条件

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坚持从实际出发，艰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时、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符合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照金革命根据地丧失后，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习仲勋抱病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会议批判了分散活动，不打红旗的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和行动，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陈家坡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自觉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结合陕甘边区

实际，及时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为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好转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33年11月，根据刘志丹的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主持召开包家寨会议，排除“左”倾错误路线干扰，总结了以往的斗争经验和教训，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创造性提出“狡兔三窟”的根据地建设策略。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危急时刻召开的又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是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在红军处于危难的时刻，刘志丹、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自觉寻找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革命道路，保证了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挽救了西北红军，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势力弱小的艰苦环境中，锻炼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水平，并培育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保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也为南梁精神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主观条件。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对刘志丹作出准确评价，也是对陕甘边区领导集体和广大军民革命斗争实践的最好诠释。

三、南梁精神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曾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①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从本质上看，南梁精神是

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在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拼搏中，用生命与鲜血构筑、凝聚而成的一种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是陕甘边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与无产阶级世界观融合在一起形成的先进的思想作风和独特的精神风貌。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坚定信念、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以人为本、面向群众的公仆精神；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

（一）坚定信念、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

坚定信念、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灵魂。它集中表现为陕甘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追求，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忠诚。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一系列大小 70 多次武装起义，但都遭到失败。从 1930 年开始，他们在认真总结多次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决心走井冈山道路，开始探索在敌人统治薄弱的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刘志丹曾说：“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②由此可见，刘志丹认定的革命道路，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井冈山道路。坚持走井冈山道路，是刘志丹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在认识上的飞跃。李维汉说：“我们党在陕北出了两

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谢子长。他们是井冈山道路在陕西的代表。”③但是，当时“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陕西省委坚持南下关中，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一再否决刘志丹的正确意见。1933年5月，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执行“左”倾路线，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行作出红军南下渭华的决定。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渡过渭河后，进退维谷，虽经英勇奋战，但众寡悬殊，几乎全军覆没，给陕甘边区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面对重大挫折和艰难处境，刘志丹等耐心地为战士讲解革命道理，教育大家坚定革命信心。他还安慰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时，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先后召开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会议，排除“左”倾错误路线干扰，总结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渡过了最危险的时刻。1932年9月中旬，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北上陕北，奔袭保安县城失利，游击队损失很大，不到300人的部队，伤病员就有三四十名。这时，天气渐渐冷了，指战员还穿着单衣，粮食、经费也发生了困难，敌人还到处“围剿”。谢子长带着游击队钻进了陕甘交界的子午岭梢山。为了渡过眼前的困难，谢子长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亲自带吴岱峰、高鹏飞等30余名伤病员留在子午岭豹子川、瓦子川、墩儿梁一带养伤。子午岭的冬天，滴水成冰。为了防止敌人来袭，战士们靠群众借给的一件羊皮袄，轮流穿着放哨。晚上，大家坐在烂土窑洞里烧火取暖，在烤热的地方轮流睡觉。没有吃的东西，就靠野芹菜、野杜梨度日子。没有药物，就用草

药、烟油和南瓜瓢等土方给伤员疗伤。谢子长在篝火旁细心地用盐水给伤员清洗伤口，然后敷上草药。面对困境，谢子长却指着前面莽莽苍苍的山林乐观地说：“熬过冬天，春天就会到来！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④1932年12月，各路游击队又在子午岭西部边缘地区的合水县拓儿原会合。此时，经过分兵打土豪，发动群众，游击队不仅解决了困难，还有很大发展。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磨炼，指战员们精神焕发地踏上新的革命征程。实践证明，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没有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

（二）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

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是南梁精神的核心。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坚持以党的利益为重，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被错误“肃反”、身险囹圄，他们都能以革命大局为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1932年12月20日，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区创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并撤消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强令远到上海“受训”。24日，部队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宣布自任军政委和团政委，红军班长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坚决服从省委的决定。在王世泰坚持不当团长的情况下，刘志丹从部队建设的大局出发，鼓励王世泰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仗，总还是个老兵吧，我要不走，会

帮你的，⑤他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尽一切可能维护部队的团结。刘志丹的行为得到了部队指战员的一致称赞，虽然他没有正式职务，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⑥在陈家坡会议上，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顾全大局，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从秦岭山中返回后担任参谋长，并没因为王泰吉在渭华起义时是自己的下级而有怨言。恢复红四十二师时，刘志丹仍然推举王泰吉任师长，直到王泰吉离任后才接替师长一职。

1935年九十月间开始的错误“肃反”波及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为了避免红军内部的分裂，当刘志丹从通信员那里看到抓捕自己的密令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瓦窑堡说明情况，结果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关押。面对被枪毙、活埋的危险，他坦然告诫狱中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⑦在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央接见出狱后的刘志丹时，他毫无怨言地说：“我们的工作也有错误”，“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⑧一些受迫害的同志有委屈情绪，他劝大家说：“不要着急嘛，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的。”⑨在奔赴东征前线的途中，他对习仲勋说：“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搞好工作。”⑩在错误肃反中，习仲勋罹祸其中，经历了非同寻常、难以承受的考验。本来，他有机会选择离开此地、躲过此难，刘景范也曾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

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但习仲勋拒绝了，因为他担保了许多人；并且肃反主持者多以习仲勋的名义把当事人调回后方加以逮捕。习仲勋决心为这些同志负责，“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⑪已经预测要逮捕他，但他仍遵照通知前往，结果身陷监禁。虽然受到严酷体罚和折磨，但他坚决拒绝枉加给他的罪名，习仲勋回忆说：“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⑫正是因为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才维护了党内团结，避免了分裂，确保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

（三）以人为本、面向群众的公仆精神

以人为本、面向群众的公仆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精髓。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得以保存，并得到发展壮大，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能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有盐共咸，无盐同淡”，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鱼水关系。在陕甘边区的革命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时处处注意维护群众利益。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他密切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充分发挥着模范作用。在开始建立根据地的时候，老百姓不明真相，误把红军当土匪，见队伍来了就跑。刘志丹就教育部队，要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每到一个村庄，要求战士把老百姓家里的地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担得满满的。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要统计清楚，折合成现金留给群众。他还经常教

育战士，对老百姓态度和蔼，见了老汉要叫干爹，年纪大的叫老哥，老百姓知道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就不跑了，还经常为部队提供情报、带路和找地方住。红军打开合水县城后，给每个指战员分发3元钱，刘志丹将它缝在衣袋里，一个未用。后来，都是在紧急情况下替部队付了伙食费。一次，部队赴绥德作战，时值五六月天气，烈日炎炎，为走近道，一个连从群众庄稼地里走过。刘志丹知道后，一到驻地，马上召集队伍开会。他说：咱们不久前还是种庄稼的农民，为什么刚从土窑走出来不久，就忘记老百姓了。群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以后要时时刻刻注意群众利益，不要再踏坏老百姓的庄稼。

刘志丹在红军部队先后担任过师长、军长、总指挥等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从不摆官架子、耍威风、搞特殊，对待下级干部特别是战士像亲兄弟一样。有一次战斗失利，部队退到深山峡谷，处境十分困难，当时缺乏粮食，只能弄些蘑菇、草根和米拌在一起煮着吃。可是吃饭的时候，刘志丹总是先让别人吃，等战士吃饱了他才吃。有时饭不够吃，他就捡一块锅巴，或是摘些野杜梨吃。刘志丹有一手炒菜的本事，有一次部队在安塞消灭了李家塌的守敌之后，群众送来些羊肉慰劳部队，他就亲自动手爆炒了羊肉分给大家吃。还有一次部队长途行军宿营后，大家都蒙头睡觉，醒来之后，发现刘志丹用部队分给自己的一块白洋买了肉，给大家包了一顿饺子。刘志丹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几支缴获来的香烟。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谢子长是一位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军事指挥

员，他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处处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有的同志说，子长是见面熟。连白军也说，谢子长是个“擦子”，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擦”红。他在负伤牺牲之前还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⑬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了碑文。习仲勋在主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期间，不避寒暑，走村串户，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当时流行于南梁一带的民歌唱到：“三月里来是春风，边区主席习仲勋，仲勋本是富平人，二十三岁逞英雄；打倒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翻了身。”^⑭毛泽东后来评价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并为其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四）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是南梁精神的重要方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按照客观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只知道南下到平原地区、到靠近大城市的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考虑根据地在这样的地方是否能够生存，结果导致红二十六军的南下失败和寺村塬、照金两块革命根据地先后丢失。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受挫的严重时刻，也出现过“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有些人主张部队分散游击。

面对这些来自“左”的或右的负面干扰，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注重从陕甘边区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自觉抵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从而坚持了陕甘边区的游击战争，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使陕甘边区革命形势转危为安，为以后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落脚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发展经济，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符合陕甘边区实际的、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注重发展工商业，搞活流通贸易，开设集市，为当地农民提供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满足了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需要。针对当地物产匮乏的问题，习仲勋专门指示苏维埃政府以优惠价格将山货和牲畜卖给白区商贩，使他们有利可图，鼓励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而且他还曾亲自请白区来庆阳的大商人吃饭，以真情感动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因受到革命影响，逐步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为苏区输送货物，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总结道：“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⑮由此可见，南梁精神就是在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

（五）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是南梁精神的本质。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自己的翻身解放。许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革命当作心中无上光荣的旗帜，为了保卫根据地，保卫苏维埃政权，争取全国解放，他们倾其所有，尽了最大努力，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1933年6月，习仲勋身负重伤，又面临国民党军追击，柳林贫苦农民郑老四不畏艰险，为习仲勋隐蔽疗伤，使其脱离危险。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边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边区人民坚壁清野，将粮食、灶具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藏起来。面对国民党军的严刑拷打，甚至砍头、活埋，他们始终保守红军的机密，成为根据地的铜墙铁壁。⑩1934年2月，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被捕后，无论是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或者在监狱中，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国民党坚决斗争到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写下铿锵有力的《绝命诗》：“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⑪1934年5月，为了保住红军游击队的秘密和主力红军坚壁的枪械弹药，李青山、曹思聪等3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军绑到南梁阎洼子台地里，那里早已挖好了埋人坑。国民党军在深坑前再次逼讯，并把他们一个个推下坑去。先烈们在惨遭活埋前仍同国民党军进行顽强拼搏，始终没有一个人面对国民党军惨烈的活埋而投敌变节，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及边区人民群众英勇不屈的英雄气概。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有许多烈士为革命英勇牺牲。比如：谢子长于 1934 年 8 月 26 在清涧县河口镇战斗中胸部受伤，流血过多伤势严重，于 1935 年 2 月辞世，年仅 38 岁。1936 年 2 月，刘志丹率部参加东征，4 月 14 日，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33 岁。在南梁革命英雄纪念碑上，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 609 人。这些革命烈士，有的家庭环境优裕，有的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等地的高等院校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然而，他们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放弃了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回到陕甘边区开展革命斗争，并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献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甘于牺牲的革命精神的真实体现。

①毛泽东：《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56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2 页。

②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24 日。

③薄一波：《怀念子长》，《人民日报》1987 年 1 月 13 日。

④张锋：《谢子长在庆阳》，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95 页。

⑤王世泰：《刘志丹与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0 页。

⑥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16 日。

⑦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16 日。

⑧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16 日。

⑨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16 日。

⑩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16 日。

⑪《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4 页。

⑫《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5 页。

⑬叶滨：《子长负伤以后》，《解放日报》1946 年 3 月 1 日。

⑭王永魁：《充分利用档案资源做好党史资料抢救工作》，《庆阳党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81 页。

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3 页。

⑯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8 页。

⑰习仲勋：《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人民日报》1984 年 3 月 3 日。

四、南梁精神的定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形成了各种“精神”系列，如以人物高尚品德立论的，有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等；以地区革命精神的特点立论的，有红岩精神、沂蒙精神等；以重要会议立论的，有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以在非常状态下执行非常任务、表现出的非常精神面貌立论的，有 98 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还有以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有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精神汇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①

研究南梁精神，确定其历史定位，很有必要将其与同时期的苏区精神以及产生于西北地区的延安精神、庆阳老区精神和照金精神进行比较。

（一）南梁精神与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多块苏区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总称，“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研讨苏区精神，最好是以全苏区的历史作背景来进行论述，这样更全面、更准确、更完整。”②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之一，其革命实践所培育起来的南梁精神是苏区精

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仲泉、余伯流、凌步机等专家多年研究苏区精神，取得丰硕成果。2011年11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③，明确概括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中央苏区精神为苏区精神的代表，但各个苏区的创造性活动所培育出的苏区精神也有各自的特色，一些研究学者诚恳地提出，苏区精神既然不是仅仅指中央苏区，而是指所有的苏区，对于苏区精神就应该用各个苏区的事例加以论证和说明^④。因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之一，既有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共性，又因为领导者、参与者的不同、斗争方式的不尽相同以及在活动空间范围、持续时间、所受干扰程度、所遭受进攻的不同等因素，使陕甘边苏区的斗争有着自身的许多特殊性。作为其精神化的体现，南梁精神作为苏区精神的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的特性，我们需要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际中加以梳理和凝练。

（二）南梁精神与延安精神

有研究者认为，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⑤，石仲泉认为这种提法不够完善，首先是忽略了苏区精神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时期，这个跨度太大，只有加上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才比较完整，不会使人有缺环断档之感^⑥。延安精神与作为陕甘宁边区前身的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所培育的革命精神有什么关系呢？有些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程的学者认为，包括陕甘边革命活动在内的西北革命斗争是延安精神的萌生阶段，“刘志丹与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坚贞不二，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政治方向，他们的奋斗精神，是延安精神的萌芽。”^⑦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西北革命的核心区和策源地，南梁精神是一种独特的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不仅与延安精神不存在抵牾，相反，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南梁精神与长征精神、中央苏区精神等同为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

（三）南梁精神与庆阳老区精神

庆阳作为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为基本内容的老区精神。对老区精神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90年代，原庆阳地委副书记马西林、地委副秘书长王钊林、地委党史办主任任愚公、原庆阳市委副秘书长郭文奎、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占年、陇东学院教授闫庆生等积极开展老区精神的研究工作，涉及到老区精神的形成、内涵、特点以及老区精神的价值、意义和传承等多个方面。在研究庆阳老区革命精神时，为了避免其与其他革命老区精神混淆，一些学者明确把老区精神定义为“庆阳老区精神”，并将其创造的时间段界定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

近年来，随着革命精神史序列的完善，各地分别以能够集中反映本地革命精神风貌的富有特色的名称来替代老区精神的称谓，以打造各自响亮的革命精神“名片”，如山东沂蒙山老区精神为沂蒙精神替代。那么是否用南梁精神替代庆阳老区精神呢？由于两者之间时间跨度和内涵本质等方面的差异性，替代是不妥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庆阳老区精神包括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南梁精神，后一阶段则融入延安精神。宣传南梁精神丝毫不意味着否认庆阳老区精神，而是庆阳老区精神研究更加具体、更加深化的结果。

根据发生时间段、空间范围、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等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南梁精神就是陕甘边苏区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及其他苏区精神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和特色；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革命精神，南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头之一；南梁精神是庆阳老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庆阳老区精神中具有肇始的地位和作用。

（四）南梁精神与照金精神

近年来，陕西省的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照金精神”，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笔者认为，照金和南梁都是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要历史时期，产生于照金大地的照金精神和产生于南梁大地的南梁精神，都是陕甘边区革命精神，虽然两者的革命精神创造者完全相同，革命精神产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也大体一致。如照金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群众建立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西北根据地的革命精神，^⑧而南梁

精神“是在土地革命的峥嵘岁月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代表，带领广大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在陕甘边区筚路蓝缕开展革命实践，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的过程中发展成熟的革命精神，是陕甘边的革命者生命和智慧的结晶。”^⑨但两者如同一对孪生姊妹，不能因为二者相像，就试图用一个代替另一个，二者都是客观存在的。今后的宣传研究中，不仅不能互相拆台，反而要相互补台，要研究其中的异同，深入挖掘其深层次内涵和时代价值，进一步推动当地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①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②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③习近平：《弘扬苏区精神，坚定信念创先争优》，《人民日报》2011年11月5日。

④郭德宏：《苏区精神的内涵和特点》，《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⑤金鑫：《延安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6期。

⑥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⑦傅治平：《精神的升华——中国共产党的精气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⑧万生更：《照金精神探析》，《党史博采》2010年第4期。

⑨刘治立：《论南梁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五、弘扬南梁精神的现实意义

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是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精神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以南梁精神为代表的陕甘边区革命精神，已成为重要的党史文化资源，南梁精神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第一，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伟大实践中，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坚信马克思主义“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①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注意总结和汲取“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陕甘边区革命带来的严重损失和危害，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探索出了具有陕甘边区特色的“狡兔三窟”根据地建设理论、“三色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和流动中作战的军事斗争策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陕甘边区的具体体现，也是南梁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很多问题都涉及到我们党的历史。境外敌对势力为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往往利用歪曲和抵毁我们党的历史来制造思想混乱。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欲亡其党，必先灭其史；欲兴其党，也必先兴其史。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迫切需要我们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高度，教育干部群众正确

认识 and 对待党的历史；迫切需要我们 from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在引导干部群众对党的历史文化的认同中更好地凝聚人心，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增强大局意识，正确认识大局、把握大局、维护大局、服务大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党的利益为重，始终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在维护大局中建设和发展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建发展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也是南梁精神的核心。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要领导 13 亿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而且需要有千千万万识大局、讲大局、顾大局、卓有成效工作的领导干部。没有这样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就难以凝聚亿万人民的力量，解决错综复杂的矛盾，从而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识大体、顾大局，把党、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胸中有大局，摆

正位置，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做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而且，领导干部要重视当前发展，更要考虑长远发展，不能只顾当前，牺牲长远。一方面要继续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忌盲目追求增长速度，片面依靠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南梁时期，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坚决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靠对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和全心全意的服务，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赢得人民群众真心诚意的拥护和全力以赴的支持。这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

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多发期。我们既面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也面临着如何抑制和缩小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切实解决广大群众就医、就业、上学、住房、社保、收入增长缓慢和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无序、失地人口剧增等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困难。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

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最大的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则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切实解决事关国计民生的困难，认真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安定团结的关系，真正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政绩观和群众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群众工作，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实际行动增进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第四，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增强淡泊名利、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意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及党员干部的自身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正是依靠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党领导陕甘边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培育了光芒四射的南梁精神。无私奉献的南梁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表现。毛泽东曾指出，富于牺牲精神，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大公无私，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党章》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奉献精

神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力量源泉。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切实维护党的观念和党性修养。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用权、如何用权”的问题，用南梁精神来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真正做到为人民掌好权，为人民用好权。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注意发挥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和带动群众发扬无私奉献精神，常怀为民之心、常思益民之策、常兴富民之举、常办利民之事，做到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豁得出去。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发展市场经济与坚持党性原则的关系，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耐得住清贫，经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与革命气节。

①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大事记

(1927 年——1935 年)

1927 年

2 月 成立中共陕甘区委，由其统一领导陕西、甘肃两省的工作和革命斗争。耿炳光任区委书记。

7 月 11 日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

9 月 26 日至 27 日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确定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方针和措施，通过了政治形势和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 9 项决议案。

10 月 12 日 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等领导的清涧起义爆发。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12 月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谢子长率领的清涧起义部队 1 个营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

1928 年

1 月 共产党员唐澍、谢子长等领导的清涧起义余部 19 人到达南梁豹子川，分散隐蔽到群众中活动。

5月 在唐澍、刘志丹等领导指挥下，许权中旅由潼关开赴渭南、华县地区，参加渭华起义，形成了方圆数百里的红色区域和革命武装割据的局面。

秋季 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回陕北，并参加中共陕北特委工作。

1929年

2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3月1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23日**，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杜衡任书记。

4、5月间 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认为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白色（兵运工作）、灰色（改造土匪）、红色（建立革命武装）。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派党员、团员打入国民党军队。会议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

5月 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今志丹），同中共地下党组织一起与敌人展开斗争，夺取了该县民团的领导权。

6月22日 中共中央通过《陕西问题决议案》。根据中央决议，中共陕西省委把瓦解敌人，组织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

11月23日 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目前扩大红军计划大纲》，指出扩大红军与有计划地组织兵变，成为目前军事工作的两大任务。

1930年

1月 刘志丹在南梁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启发教育哥老会成员郑德明、朱志清等克服封建思想，维护穷苦百姓的利益。

2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指出党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4月15日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致信中共陕北特委，指出党在陕北的中心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发动兵变，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伍，发动游击战争。

7月1日至8日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陕西蓝田巩村小学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兵运、组织、宣传及共青团等7项决议案，提出陕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准备武装暴动。总的策略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创造并扩大红军。以西安、榆林、三原为中心，延安、绥德、潼关为次，建立全省的中心工作。会议决定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杜衡（杜振庭、励君）任书记。

7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陕西革命的客观条件比全国更加成熟，党的任务是在全党政治路线和任务之下，努力地加强主观力量，准备总的革命斗争，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建立局部以至全省的苏维埃政权。

夏 谢子长、刘志丹在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部搞兵运，分别以直辖三团团长和该团六营营长身份，率部进入庆阳和吴旗交界处的三道川。

秋 谢子长、刘志丹率部队驻三道川，遭惯匪张廷芝袭击。兵运计划失败，史称“三道川事件”。

9月14日 中共陕西省委通过杜衡起草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并报中央。决议认为“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党的战略总方针是坚决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创建与发展红军，会合各种势力的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在陕北、西安、渭南 华县、蓝田、陕南组织武装暴动以配合武汉的夺取，特别要以陕西为首先胜利之区，以促进全陕的革命高潮。

10月1日 刘志丹带领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保安县民团 20 多人，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从永宁山来到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用计智毙了太白民团团总黄毓麟、营副王凤珠，收缴枪支 60 余支，建立了南梁游击队。此后，刘志丹带领这支部队在保安、合水、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0月初 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中共北方局派高维翰（李杰夫）传达 6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为贯彻立三错误路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谢子长任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通知，中共陕西省委划归北方局领导。并指出，陕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的政治与经济斗争，领导农民开展反捐税、抗租、抗债斗争，开辟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组织革命兵变，领导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1931 年

1月 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保安、安塞一带扩大到 150 多人，遭到井岳秀部高双城旅剿袭，转移到瓦子川。

2月下旬 刘志丹率部队到合水县固城川麻峪村，整编队伍，后被陈珪璋部第五旅包围，部队被打散，刘志丹率百余人进入子午岭休整。

3月14日 中共中央作出《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强调开展兵运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在敌人军队中积极“进行破坏和瓦解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

4月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率部编入国民党驻守在彬县的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嗣后，补充团中共支部建立，书记杨树荣，宣传委员刘志丹，组织委员王世泰，有党员二三十人。

6月 补充团在职田镇筹粮中，致豪绅刘日新自杀，刘志丹被苏雨生扣押，下狱彬县。后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营救，刘志丹获释。

7月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去平凉陈珪璋部从事“兵运”活动，以陈部十一旅旅长名义率 300 余人驻防宁县。

春夏之交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山西省孝义县成立，在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8月 陈珪璋第十三旅旅长高广仁背叛，设计收缴了刘志丹、刘宝堂的枪支，制造了“早胜事件”。刘志丹的兵运活动再告失败。后刘志丹到合水姚家园子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刘宝堂返回平凉。

9月3日 拓克宽、阎红彦率领晋西游击队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在保安、靖边、定边和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开展游击战争。

9月11日 晋西游击队收编了师储杰、杨琪、杨鼎三支保运武装，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杨重远。

9月 刘志丹带领马锡五到南梁进行实地考察。此时，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别搞起百余人或几十人的队伍。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集合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的部队，恢复成立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3个大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任大队长，在二将川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10月 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林锦庙会师。

11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到庆阳新堡游击队驻地，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红军的指示。整编了队伍，晋西游击队、保运队为第一支队，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为第二支队。不日成立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为委员。

11月9日 谢子长率领一支队移驻新堡，刘志丹率第二支队移驻城壕川、张家沟门一带。

12月中旬 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负责人荣子卿到南梁地区，传达省委要求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指示，要部队整顿后南下，并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2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提出目前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反帝尤其是反日运动，加紧扩大苏维埃运动，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派得力干部到陕甘边境游击队中去。游击队要向陕西之三水（今旬邑县）、淳化发展，和渭北农民斗争会合，使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32年

1月初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 700 余人，下辖两个支队，一支队队长师储杰，二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到部队巡视，指示部队立即改编为红军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纲领，开辟苏维埃区域。

2月6日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发生缴枪事件，一支队以整顿纪律为由收了二支队的枪，打死了第二支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事后，师储杰带领一支队大部分人员离开队伍，投靠了杨虎城，使刚刚建立的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受到严重削弱。

2月12日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书记李杰夫。各大队成立了党支部，游击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

2月13日 陕甘游击队攻占旬邑县职田镇。

2月15日 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县职田镇阳坡头设伏，歼灭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卫团和民团 300 余人。

2月20日 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乘陕西耀县照金街道办社火之机，将当地民团包围缴械。

3月6日至7日 中共陕西省委相继作出《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要求游击队加紧两条路线斗争，执行省委指示，向陕西三原、富平、耀县以至西路去游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苏区。

3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布《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规定游击战争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和苏维埃的影响，摧毁豪绅在乡村的一切政权，指示游击队要努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加强政治工作，实行严格的纪律。

3月19日 陕甘游击队乘陕军十七师与甘军暂编十三师混战于陇东之机，向陇东出击。3月19日夜，陕甘游击队奔袭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20日，陕甘游击队在山河镇攻坚失利。

3月20日 陕甘游击队进至山河镇以南的寺村塬，将群众武装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

3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中提出：陕甘边武装斗争在“军事上必须准备成立正式红军”，要求中央给予正式番号。

3月下旬 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寺村塬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唐贵荣任副主席。

4月1日 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南塬千余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正宁县城山河镇，攻城两日未克。

4月2日 习仲勋、刘林圃等发动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在甘肃两当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不久部队遭国民党军围攻溃散。

4月13日 陕甘游击队奔袭旬邑县城，歼敌100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攻占的第一个县城。

4月18日 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驻地旬邑县马家堡传达指示，撤消谢子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撤销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陕甘游击队分编为第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第三支队支队长，阎红彦任第五支队支队长。

4月20日 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陕西省委请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5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治委员，杨重远为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同日，陕甘游击队发布布告，宣告红军的性质和根本任务，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和白军士兵，积极拥护和支援红军游击队。

5月15日 陕甘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歼国民党第八十六师五一一团2个连和一个营部及民团一部，缴获长短枪200余支。17日，在杨家店凤凰山再歼五一一团2个连。

6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提出根据西北地区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成立红军1个团，番号暂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独立团，在此基础上以后再扩充为红军第四十一师。

6月2日 陕甘游击队在甘泉临真镇战斗失利后转移到韩城。4日中共韩城县委与游击队总指挥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不夺取城市，到乡村游击，帮助农民建立赤卫队、穷人会等组织，在韩城开辟苏区。8日，游击队在韩城上官庄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纲领，揭露地主阶级剥削人民的罪恶。会后没收分配了数户劣绅的粮食，焚烧了契约。不日韩城赤卫队建立，队长徐岱云，政委高德辉。

6月12日 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三旅和第四十二师的两个团在韩城围攻陕甘游击队，经过激战，游击队退出韩城。刘志丹率主力回师陕甘边境，阎红彦、杨琪带领骑兵和少先队去黄龙山、洛川一带游击。

6月13日 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到三原武字区“扩大红军”，3天内近百名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6月24日 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会上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要红二十六军“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

6月底 陕甘游击队在韩城作战失利后，部队转移到甘肃宁县麻子掌、梁掌堡一带。为克服悲观情绪，队委会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并免去刘志丹总指挥职务，推选阎红彦任总指挥。同时，将第三、第五支队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会后，部队开往正宁湫头、南邑一带休整，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

7月9日 在共产党员高鹏飞、杨林等组织领导下，驻甘肃合水县西华池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两个连举行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西华池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兵运史上的首次胜利。

7月23日 陕西省委代表李艮到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并传达省委关于“为实现创建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边新苏区和游击队的工作”的指示。推行“左”倾路线，致使湫头、五顷塬一带的革命政权遭到破坏，部队也受到重大损失。

8月1日 中共临时中央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重申中央关于创建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要求“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地加紧这一工作”。

8月中旬 李艮不顾大敌当前，在五顷塬强行分配土地，命令部队打阵地战、攻坚战，致使陕甘游击队在王郎坡、五顷塬、三嘉塬战斗失利，遭受严重损失。

8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按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即编成红军一团”。

8月30日 谢子长再次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9月初 陕甘游击队奔袭照金，歼灭民团400余人。

9月中旬 陕甘游击队进入南梁、二将川一带活动。后北上，强攻保安县城未克，一大队队长高山保牺牲，部队伤亡很大，人员减少到200余名，总指挥部决定分散活动，伺机歼敌。

9月 陕甘游击队特务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队长程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

10月1日 共青团陕西省委通过“冲锋季”工作决定。决定从1932年10月21日至1933年1月21日为“冲锋季”，主要工作为拥护红军和苏区，动员青年到陕甘边和渭北去，深入土地革命，创造陕甘边和渭北新苏区。

10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要求把革命兵变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为统一指挥陇东、陇南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组织，省委决定建立陇东军特委，书记刘杰三。

10月下旬 在中共陇东军特委领导下，从西安接运枪械返回兰州的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在平凉蒿店举行兵变，宣布成

立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队长李华锋，政委李艮。后遭民团袭击而失败。

10月 中共陕北特委指示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

12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杜衡到陕甘游击队，着手筹建红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奉陕西省委指示，进至陕西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

12月24日 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红二十六军兼第二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

12月26日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攻打焦家坪，消灭宜君县民团60余人，缴枪60余支。

1933年

1月初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耀县香山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思想，并将香山寺粮食分给饥民。后由杜衡提议，焚毁了香山寺。

1月10日 杜衡命令红二团攻打庙湾夏玉山民团失利。战后，杜衡撤销了郑毅的参谋长职务，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

1月 红二团随营学校成立，校长李杰夫，政委汪锋。

1月中旬 红二团向西发展，协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园等5支游击队。

2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红二十六军目前还不能与敌人作对垒战，主要应采取游击战术。并指出在保留红二十六军番号的情况下，不要强“撑架子”，可将部队编成几个小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以巩固和扩大红二十六军。

2月上旬 红二团北上正宁，在三嘉塬、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并在湫头石炭沟口设伏，全歼王郎坡寨子民团，击毙团长赵世坤。

3月初 红二团返回照金。

2月中旬 耀县照金妇女游击队在北梁建立。

2月 李妙斋率领照金一带的游击队进驻薛家寨，整修崖洞，据险筑堡。

3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要求建立统一指挥部，领导边区和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3月8日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

3月上旬 杜衡回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由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政委。

3月中旬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李妙斋，政委习仲勋。下辖第一、三、五、七、九、十一支队，

4月5日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重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担任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并兼任党团书记。

4月15日 杜衡重返红二十六军，继续担任军、团两级政委。

4月下旬 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4个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等6县民团，兵分4路进攻照金苏区，红二团避实就虚，转战旬邑、宁县、宜君等地，坚持斗争，打击敌人。

4月 根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指示，中共旬邑县委将戚清振领导的灾民武装改编为红军游击队，队长戚清振，指导员吴润林。

5月10日 强世清、李成荣率陕北红军游击队一支队南下，在宜君上畛子与红二团会合，一支队将所带的马匹交给红二团骑兵连；红二团给一支队补充了枪械弹药。为了加强一支队的领导，刘志丹派杨重远担任一支队政委，马佩勋任副支队长，调李成荣去西安工作。

5月25日 红军在照金北梁村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杜衡推行“左”倾路线，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率主力红二团南下终南山。

6月17日 红二十六军党委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下一步工作行动计划。杜衡凭借职权强制会议通过了部队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

6月29日 红二团在三原县二台子，同渭北游击队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杜衡强令部队尽快渡过渭河。

7月中旬 红二团在陕西蓝田张家坪村遭国民党军袭击，战斗失利，伤亡很大。刘志丹、汪锋、王世泰带领部分战士分头突围，在秦岭山中进行艰苦斗争。

7月21日 王泰吉率杨虎城部骑兵团全体官兵千余人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部队在三原县辘轳把遭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孙友仁特务团，战斗失利，余部撤入照金根据地。

7月24日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渭北游击队在三原武字区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参谋长李天赦，经济员杨玉亭，下设两个连，一连连长马志舟，二连连长高占胜。

7月28日 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在西安被捕，随即叛变，中共陕西省委因此遭到严重破坏。

8月14日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并确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8月 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6个团兵力对三原武字区、心字区进行“围剿”。红四团被迫撤出武字区，北上照金，渭北根据地失守。

10月2日 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指挥部队伏击陕西旬邑县张洪镇民团，俘敌40余人。

10月4日 刘志丹、王世泰等历尽艰险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

10月16日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孙友仁团及民团数千人，配属炮兵，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红军被迫撤离薛家寨，照金根据地陷落。

10月18日 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红军攻克合水县城，歼敌连长、团总以下100余人。

10月27日 红军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当地反动民团。

10月28日 红军在华池县毛家沟门击溃国民党警一旅赵文治团800余人的进攻，俘虏100余人。

11月3日至5日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陕北、南梁、关中三个战略区，建立一、二、三路游击队指挥部。

11月8日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和骑兵团，王世泰、黄子祥分任团长，共计500余人。

是月 刘志丹率部返回南梁，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红四十二师派习仲勋、张策等负责地方工作。任务是组织、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支援红军。合水、庆阳、保安三个游击队成立。合水游击队长张振东，庆阳游击队长杨培盛，保安游击队长刘约三。

12月上旬 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南下正宁地区，恢复了正宁根据地，打开了关中游击区的局面。红军在正宁县一带发展武装，刘志丹编写《军事教育大纲》作为教材，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

12月底 谢子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为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领导西北革命武装斗争。

冬 刘志丹亲自起草了关于建立陕甘边一、二、三路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在陕北、陕甘边和关中建立三个革命根据地，逐步把南梁同关中地区的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成一片。

1934 年

1月上旬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返回连家砭。经红四十二师党委同意，王泰吉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行至淳化县通润镇被捕，后在西安遇害，师长由刘志丹接任。

1月下旬 高岗因违反军纪，被红四十二师党委撤销师政委职务，由杨森接任师政委。

1月 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二路指挥部成立，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2月25日 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召开临时工农兵代表大会，再次选举成立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被选为主席，白天章、牛永清为副主席。同时在南梁、豹子川、小河沟成立第一赤卫军大队。大队长郑德明。在玉皇庙川、马莲岔成立第二赤卫军大队，大队长高生贵。在白马庙川成立第三大队，大队长朱志清。二将川成立第四大队，大队长梅生贵。在葫芦河成立第五大队，大队长王殿斌。共约 1000 人，配合红军，打土豪，保卫根据地。

2月 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张明吾（后由王安民、陈国栋接任），政委黄子文（后由张仲良、张邦英接任）。

2月 国民党陕甘当局调集8个团的兵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3月上旬 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由南梁出发，从宁县、正宁南下，进入照金地区。

4月 酈西县革命委员会在暖泉寺庙宣布成立，主席韩明奎。政府驻地雷家沟。

4月 酈甘县革命委员会在甘泉县府村川曹家沟成立，主席张尚达，后为王居仁、李彦。

5月10日 甘军警备第二旅杨子恒部仇良民团和谭世麟部1000余人，乘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之机，窜入南梁革命根据地烧杀抢掠。

5月11日 阎家洼子村群众为保护红军物资与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5月13日 国民党军在阎家洼子村活埋干部和群众数10人。

5月28日 红四十二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会议，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成立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全面负责陕甘边红军和各路游击队的作战指挥。并决定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5月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中部（今黄陵）小石崖设立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黄子文。

7月25日 谢子长率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及赤卫队200余人南下陕甘边，同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南梁会合。

7月28日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红四十二师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以上干部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派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治委员职务，任命谢子长为红四十二师政治委员。

7月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迅速成立红二十六军第一团、第二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协同陕北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打通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创造条件，改变临时政权为苏维埃政权，于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7月 安塞县革命委员会在安家坪（现属甘泉县）正式成立，王聚德任主席。**12月**，安塞县革命委员会转变为安塞县苏维埃政府。

8月初 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赤卫队和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返回陕北根据地。

8月17日 谢子长指挥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与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联合作战，在安定县武家塌歼灭国民党军1个连。**22日**，在绥德张家圪台歼灭国民党军2个排。

9月18日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以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所属的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并从正宁五支队等抽调部分人员建立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全团辖一、二两个连，共计200余人。

本月 陕甘边南区党委在黄陵县小石崖成立，张邦英任党委书记。南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黄子文任主席，委员会下设秘书长及军事、财政、土地、劳动、肃反等委员会。

秋季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转嘴子创办列宁小学，霍建德任校长。

10月20日 郭宝珊率部于庆阳新堡起义，进至南梁与红军会合。

11月7日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志清当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同时，还成立了华池县和赤安县两个县苏维埃政府，直接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在南梁荔园堡成立，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

11月7日 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在何沟门宣布成立，贾生秀任主席，李彦任副主席。

11月9日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在河北省委主办的《火线》杂志上发表《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指出：“你们目前的中心政治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来巩固现有的游击区域，在最强固基础的区域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与反帝土地革命的根据地。”并要求“响应红军北上抗日，开始直接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在西北与全中国的胜利”。^①

11月10日 郭宝珊率领的起义部队在荔园堡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治委员，参谋长于振学。下设3个大队，段荣启、王东来、杨茂堂分任大队长。

11月 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在米家沟正式成立，政府主席边金山，副主席黄廷雄。

11月 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在阎家洼子组建。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辖一、二两个连及先锋连，共200余人。

12月 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在柳树湾柏树掌成立，强家珍任主席，高世清任副主席。

是年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公开刊物《红色西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行了票面为壹圆、伍角、贰角、壹角的布制苏币。苏币与银元等值。

①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6页。

1935年

1月中旬 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达陕北根据地，在安定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二人就建立陕甘边、陕北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机构，制定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计划等问题交换意见，取得了共识。

1月22日 红四十二师骑兵团袭击长武县城。

1月30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在安定县白庙岔成立，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

1月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创办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负责人龚逢春。

1月 庆北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王英任革命委员会主席。

2月5日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西北军委成立后，西北红军实现了组织指挥的统一，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2月18日 刘志丹发布《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西北军委命令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与红八十四师大部组成红军主力兵团，重点打击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地带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

2月21日 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

2月 蒋介石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总兵力约4万多人，对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2月 赤淳县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宋飞任主席。

2月 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在太白镇正式成立，李彦任主席。

3月初 红八十四师主力部队在清涧县贺家湾全歼向延川护送军饷之国民党军1个连，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2000多元银币。红四十二师第二团抗击进犯陕甘边的国民党骑兵，毙俘伤各数10人。

3月 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于今郿县的寺仙、前桃园等地区宣布成立，主席张仲良，副主席李百顺。

4月21日 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在南梁地区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在杨清川伏击杨虎城警三团骑兵连获胜。

4月下旬 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从陕甘边北上陕北作战。途中在横山寺儿沟歼灭国民党军1个连。

4月 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在西部桃梨圪正式成立。主席周子恒（后阴云山）。

春 荏掌办事处在宁县盘克塬荏掌村正式成立，许兴堂任主任。

春 新正办事处在槐树沟成立，郭廷藩任主任，封正宝、杜宛协助工作。**8月**，新正县革命委员会在正宁湫头镇正式成立，郭廷藩任主席，左怀玉、李进荣为副主席。同年**10月**，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正式转变为苏维埃政府。

春 宁县办事处在子午岭的上畛子正式成立，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刘永培兼任宁县办事处主任，李尚勤任副主任，机关先驻九岷，后驻金村。**1935年11月**，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在杨家塬子正式成立，张有鹏任主席。

5月1日 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八十四师主力会师于赤源县白庙岔村，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

5月2日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和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章。

5月3日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在安定玉家湾成立，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治委员。

5月7日 西北红军主力首战安定县吴家寨获胜，歼灭国民党军1个营。

5月9日 西北红军主力在安定县马家坪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五〇〇团1个营和1个机炮连。

5月10日 安定县国民党守军被迫撤至瓦窑堡，安定县遂告解放。这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解放的第一座县城。同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刘志丹代表前敌总指挥部做了军事形势的报告，对下一阶段作战方针、计划提出了建议。

5月中旬 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在宜川县屯石岵岷，歼灭宜川县民团。

5月20日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绥德清涧县交界处张家圪台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四九九团1个连。

5月30日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延长县城。

5月 定边县革命委员会在宁塞川凤凰寺(今属吴旗县五谷城乡)成立，主席王玉海，副主席赵国雄。

6月1日 延川县城国民党守军连夜北逃清涧，延川县城遂告解放。

6月15日 西北红军主力在延安县高桥镇击溃国民党军1个连，击毙县民团总指挥李汉华。

6月20日 西北红军主力解放安塞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

6月28日 西北红军主力攻克安塞县国民党军最后一个据点李家塌，安塞全境解放。至此，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6月28日 西北红军占领靖边县城。

6月30日 保安县城国民党守军北逃安边，保安县城遂告解放。这是西北红军解放的第6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6月 肤甘县革命委员会在龙儿寺（今属延安市柳林乡）正式成立。主席刘秉温，副主席陈传高。

7月3日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北区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进驻延川永坪镇。

7月17日 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八十四师在绥德县老君殿全歼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1个营，击溃2个营。

7月 中共西北工委在永坪镇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北、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及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对西北形势作极“左”的估计，通过了《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第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陕甘全党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加强对红军、游击队、群众和革命战争领导，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

7月 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移驻正宁县三嘉塬，后又移至南邑，唐洪澄继任南区党委书记，张邦英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7月 蒋介石调集以东北军为主力的10多万兵力，并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开始部署对西北红军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

7月 红泉县革命委员会在临镇宣布成立，驻地炭窑沟（今麻洞川乡炭窑沟村），主席刘大才。

7月 赤川县革命委员会在雷多村成立，黑志德任主席。机关驻地北赤镇。

8月11日 西北红军主力全歼清涧慕家塬国民党守军1个连，第二天击溃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国民党援军1个营又2个连。

8月21日 西北红军主力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在吴堡县定仙塬歼灭晋军1个团，首次取得消灭国民党军1个整团和旅部的胜利。

8月 赤淳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姚殿森任主席，王振喜任副主席。

9月9日 红二十五军经庆阳、合水县抵达保安县永宁山，受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等人的热烈欢迎。

9月11日 西北红军主力攻打横山县城未克。

9月16日 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会师。

9月17日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

9月18日 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永坪镇召开庆祝两军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

9月 撤销肤甘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肤施县革命委员会，驻地龙儿寺，主席刘秉温。

9月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华池战区苏维埃政府，高生荣任主席。

10月1日 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劳山地区设伏，歼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大部，击毙国民党师长何立中，俘敌 3700 余人，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劳山战役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大搞错误肃反，将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等一批党政领导干部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被逮捕，整个陕甘革命根据地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

10月12日 红十五军团攻克鄜县（今富县）榆林桥据点，歼东北军一〇七师 4 个营，俘虏国民党团长高福源。

10月19日 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中央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10月20日 毛泽东等了解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在错误肃反，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

10月 永红县苏维埃政府在正宁县下南坡头西村正式成立，梁文汉任主席，李银清任副主席。

10月 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在淳化县桃渠塬正式成立，姚殿森任主席，卢德明、陈洪财分别任副主席。

10月 赤水县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王振喜任主席，任贵选、吕宏德任副主席。

11月初 陕甘支队在甘泉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会师。

11月3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同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

11月7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被释放。刘志丹出狱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11月10日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陕北安定县瓦窑堡。

11月21日至24日 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1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任。成立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周恩来兼任主任，刘志丹任副主任。撤销陕甘晋省委、陕甘边区、陕甘边南区党政机构，成立陕甘省、陕北市、关中特区、神府特区。

12月8日 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们书》，号召劳苦群众参加红军，保卫苏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2月30日 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下辖3个团，全军共1200余人。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其 所属各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名录

李杰夫

李杰夫，原名高维翰，1907年生，陕西长安人。早年入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任少共第四组组长，1930年2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军委书记，1931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管宣传工作；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常委李杰夫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1932年3月下旬，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李杰夫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5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同年10月，中共渭北特别委员会成立，李杰夫任特委书记。1933年初，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正式成立随营学校。李杰夫担任校长，汪锋任政委。后被党组织调往江苏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叛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的秘书。全国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党务顾问和台北多所大学客座教授，1995年9月在台北病逝。

张静元

张静元，1905年生，甘肃正宁人。出身于赤贫之家，母亲因病早亡。他和父亲终年给地主扛长工，历尽艰苦，备尝辛酸。张静元为

人有胆气，善言辞，大小场合不怯阵。1932年初，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红军游击队来到寺村塬的新庄、苟仁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积极报名参加赤卫军。此后，他奔走于各村之间，串连群众，号召穷苦农民起来闹革命。同年3月下旬，在寺村塬新庄子召开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张静元当选为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在五顷塬一带开展土地革命。张静元带领赤卫军和贫雇农，没收了西城村、于家庄、琴宅村数户土豪的牛羊牲畜和浮财，除部分留作军需外，其余分配给穷苦农民。接着在龙嘴子、五顷塬等地开展土改，使穷苦农民第一次尝到了革命的甜头。同年8月下旬，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红军陕甘游击队被迫撤出寺村塬，转移到石底子、转角一带，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追捕，张静元被迫携家人离开家乡，迁往三嘉桃花山种地栖身。

翌年2月，红二十六军返回寺村塬，恢复苏区。张静元闻讯后又回到车家沟，投身革命活动。他带领积极分子，深入湫头一带摧毁国民党的保甲组织，着手恢复基层政权。之后，他参加正宁县第八游击支队，配合红军镇压反革命分子，保卫红色政权。1934年2月，他随正宁八支队配合平子游击队处决了勾结民团、破坏革命的首恶分子郭彦升、陈大财等人。同年3月，国民党军队马瑞卿部一骑兵营进犯湫头，正宁八支队、四支队和底庙游击队奉命阻击。张静元主动承担了侦察任务，很快摸清敌情。在各支队的紧密配合下，击毙国民党连长1人，缴获战马7匹，步枪3支。同年下半年，张静元身患重病，

久治不愈，回到家中养伤。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 4 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1962 年，张静元因病去世，终年 57 岁。

唐贵荣

唐贵荣，出生年月不详，甘肃正宁人。1932 年初，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红军游击队来到寺村塬的新庄、苟仁一带开展革命活动，3 月下旬，宣告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李杰夫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唐贵荣当选副主席。他和张静元等一起组织贫雇农和赤卫军，没收豪绅地主的牛羊和浮财，分配给贫苦农民。同年 4 月 1 日，唐贵荣积极参加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并动大家带上沙毡和锣以抵挡国民党军的子弹。①同年，唐贵荣被国民党军杀害。

①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58—359 页。

习仲勋

习仲勋，1913 年生，陕西富平人，192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 年转为中共党员。

1930 年初，习仲勋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 年 4 月，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 9 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33 年 3 月起，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

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2月起，习仲勋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陕甘边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坚持壮大红军武装，积极探索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工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红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等职。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

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解放战争期间，他和彭德怀、贺龙等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四人帮”迫害。1978年4月后，主政广东，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002年5月，习仲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白天章

白天章，1909年生，甘肃华池人，是华池县有名的老党员白阳珍之子。1933年冬，张策、习仲勋到南梁创建革命政权，常常落脚白阳珍家里。在张策、习仲勋等人的引导下，年已花甲的白阳珍和其

子白天章先后走上革命道路。1934年初，白天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宣告成立，白天章当选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夏至11月，兼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长。1935年春，任合水游击队指导员。同年6月，调往关中工作，1938年3月调三边分区工作，任盐池县民兵大队大队长；1944年2月调任定边县武装部科长。1947年8月，定边县游击大队成立，白天章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郝玉山兼任政治委员。1948年10月，白天章调任盐池游击四大队大队长。1949年9月解放军进军宁夏时，白天章随军进入银川城，担任宁夏省公安总队大队长；1955年8月经组织批准，担任盐池县副县长。1956年8月至1958年2月，在甘肃省委党校学习进修，结业后担任吴忠关马湖劳改农场场长。1962年10月，白天章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1975年担任吴忠县（市）政协副主席，1990年5月在吴忠逝世，享年81岁。

贾生秀

贾生秀，1902年生，祖籍陕西省横山县。1929年逃荒到甘肃省华池县林镇乡范台村定居。受刘志丹等革命思想影响，1933年冬，贾生秀参加赤卫军，翌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小河沟恢复成立，贾生秀被选为革命委员会肃反委员长，后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同时宣告成立，贾生秀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经常深入村庄、农户，宣传党和

政府政策、法令，在短短几个月中，组织建立起 13 个乡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动员上百名青壮年参加了赤卫军。1935 年春，国民党军对南梁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随边区政府撤至洛河川后，贾生秀因病被党组织安排在甘泉县搞地下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贾生秀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坚持战斗和工作在农村，并担任基层干部，在伤病员安置、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等工作中表现突出，多次受到上级表扬。1947 年，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贾生秀落入敌手，遭受酷刑拷打，但未暴露任何机密，后获释。全国解放后，他因病辞去了干部职务，但他不坐享清福，不要组织照顾，对村上的事件件都很关心，被群众誉为“编外干部”。1979 年 9 月病逝，享年 77 岁。

牛永清

牛永清，出生年月不详，甘肃华池人。二十世纪 30 年代初，刘志丹等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闹红”，牛永清和当地贫苦农民一起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秘密聚会，开始组织起来，从事抗粮、抗租等抵制官府压迫和地主剥削的革命活动。1934 年 11 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牛永清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期间，他认真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法令，帮助区、乡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受到群众拥戴。1935 年春去世。

黄子文

黄子文，1909年生，陕西三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回陕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到武字区开展农民革命斗争。

1928年4月，领导三原县万名农民群众的交农斗争。5月上旬，领导了与渭华起义相呼应的三原起义。1929年春，关中到处饥荒，黄子文在武字区成立了地方筹赈委员会，带头捐粮，救济穷苦农民。是年9月，担任中共三原特支书记，领导泾阳、淳化、三水（今旬邑）、正宁、邠县（今彬县）等县的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

1930年2月，被国民党三原驻军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逮捕关押，不久获释。7月，当选为陕西省委候补执行委员，并任省委军事科主任。次年1月，到山西从事兵运工作，并任晋西游击队政委。1932年5月至6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8月，回到武字区，成立了“渭北游击队”。10月，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宣传部长。11月初，担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次年9月，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与张邦英一起，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建立了赤水、淳化、耀县、新正、新宁、永红等县革命政权。

1935年9月陕甘苏区错误“肃反”中，被“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关押于瓦窑堡，11月获救出狱，被安排在兵工厂工作。1936年春，调任中央红军学校政治教员。次年随袁国平来到陇东，任庆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1938年到安吴青训班学习。后来，他曾去延安马

列学院学习。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中，因各种原因离开延安返回家中，并失去中共组织关系。解放战争时期，黄子文活动于渭北一带，发动群众和国民党军展开斗争，1947年6月，在与国民党军的遭遇战中，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9岁，1948年11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追认黄子文党籍。

张邦英

张邦英，1910年生，陕西耀县人。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陕西省西安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特支书记。1928年冬中学毕业回到家乡，成立了耀县第一个党小组。1930年到杨虎城部队任中央营委书记，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秋建立了中共耀县县委，任县委书记，领导农民斗争。1933年参加了著名的耀县王泰吉起义，建立了耀县第一支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任党代表。部队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时，被命名为陕甘边红军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仍任支队党代表，在刘志丹等领导下转战陕甘边南北。1934年1月，任红二十六军三团二连政治指导员。7月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组织部部长，9月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书记兼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开辟革命根据地，扩大红色政权。1935年7月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936年初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壮大革命武装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等职。之后任陕甘宁边区延属地委书记兼三五九旅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及行政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后任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8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10年6月病故，享年100岁。

马文瑞

马文瑞，1912年生，陕西子洲人。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春任中共安定（今子长）县委书记。1932年任中共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1933年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1934年11月到达以华池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根据刘志丹、习仲勋意见，留任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员。1935年6月任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秘书长兼省委白军工作部部长、省委安塞东北军驻军工委书记。1937年春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6月任陕甘宁特区党委秘书长，不久调任陕甘宁特区陕北西区区委书记。1937年10月奉调到庆阳，先后任中共陕甘宁分区党委、庆环分委、陇东分

区特委、陇东地委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陇东军分区政委。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受到表彰奖励，毛泽东亲笔为其题写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奖状。1944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西北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4年1月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张 策

张策，1911年生，陕西高陵人。中学时代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社。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红二十六军作政治工作。1934年秋，受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派遣，负责陕甘边西区工作，兼赤安县领导工作。1935年秋陕甘苏区错误“肃反”中被捕。出狱后，任中央党校白区工作班班主任。1936年任陕甘省委常委兼白区工作部部长、关中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8年任陕西省委委员兼蒲城地下党中心县委书记。后奉调敌后，任中共冀南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日寇投降后，先后任嫩江省委常委兼白城子地委书记、东蒙工委书记、兴安省副主席、东北骑兵纵队政委、吉林省委常委兼吉南地委书记、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松江军区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张策先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编制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西安军分区政委。1963年受“左”倾路线迫害，被撤职调中央党校学习。1978年重新工作，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书记。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中共八大代表，中共十三大特邀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99年1月在京逝世，终年88岁。

韩明奎

韩明奎，1910年生，陕西郿县人。1931年与张庆才、兰英魁等人率西川农民手持农具，拥进县城，交农拥堂。1933年10月，参加小河子川宋定金带领的赤卫军，11月，参加边德荣领导的郿县游击队。1934年1月，经张邦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再次率领县境西部农民拥进县城，迫使国民党县长乔廷瑾减免租税一年，是郿县群众公认的抗租反霸农民领袖。

1934年4月，郿西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韩明奎任主席。1935年11月，郿西、郿甘两个革命委员会在北道德乡卧虎原联合成立郿县苏维埃政府，贾生秀任主席，韩明奎任副主席。

1935年11月中旬，韩明奎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在短期内为参加“直罗镇战役”的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筹集粮食10万多公斤，组织担架队员1000余人，担架500余副，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1936

年春，中共酈县县委改称为中共酈县战地工作委员会，韩明奎任书记，做收集情报的地下工作。1936年5月，东北军一一一师侵占了酈县北道德原道德村一带。为了牵制南线之敌，配合主力红军西征，保卫苏区，扩大新区，遵照周恩来指示，抽调酈县、甘泉县独立营和10支地方游击队，共1000多人，于6月初在酈县北道德寺成立了南路军，曹力如兼总指挥，吴立昌任政委，曹永科任参谋长，韩明奎任政治部主任。南路军历时4个月，转战陕甘两省，行程数千里，大小战斗几十次，消灭国民党军两个营兵力和地方民团，计800余人，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

1937年3月，韩明奎服从组织分配，任中共酈县城关区委书记、区抗日救国会主任，体现了共产党员能上能下的优良品德。同年8月，因重病回家治疗。1940年双龙中心区成立，5月，中心区区长贺荣山调韩明奎担任第三区行政助理员，9月，任三区区长。1942年，双龙中心区改为中宜县，韩明奎仍任三区区长。1947年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肆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宜县县、区干部就地疏散，从此与组织失去联系。1947年后，韩明奎多次寻找组织衔接关系未果，遂定居甘肃省宁县盘克乡荏掌村务农。新中国成立后，曾积极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经济，深受群众爱戴。1985年病故，终年75岁。

张尚达

张尚达，出生年月及籍贯均不详。中共早期党员，早年跟随习仲勋参加革命。1934年4月，酈甘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张尚达任主席。

1935年9月上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调张尚达任赤安县委书记，刚到职四五天，即在陕甘边区错误“肃反”中被逮捕并杀害。

王聚德

王聚德，1909年生，陕西清涧人。1927年春加入共青团，三个月后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王聚德考入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后因家贫失学，回家务农。1932年，王聚德到山西冯玉祥部做兵运工作，派驻柳林镇任招待所主任，和晋西党组织发生关系，恢复党籍。1933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成立，王聚德任副队长兼经济员。10月，任队长。1934年春，奉命前往南梁，沟通陕北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的联系。不久，被派往安塞开展地方工作，7月，安塞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王聚德任主席。12月，安塞县革命委员会转变为安塞县苏维埃政府，王聚德任政府主席兼县委书记。1935年9月，王聚德在错误肃反中被诬为“右派”、“反革命分子”，11月初获释。1936年2月，随红军东征，中途染疾返回。5月，又随红军西征到三边。曾任定边县委书记、三边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三边分区党委宣传部长等职。1939年7月，王聚德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办公室工作。次年4月，受社会部派遣，随同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赴绥远大青山地区，承担搜集情报，建立同苏联和蒙古国的联系，争取国民党人员抗战的特殊使命，任绥蒙区党委社会部长、绥西地委书记等职。在艰苦环境里，不顾个人安危，爬山穿林，深入敌后。由于叛徒告密，1941年12月27日，王聚德同绥蒙游击

队长高凤英等 10 余名战友，在万家沟被日伪军秘密包围，突围未成，全部壮烈牺牲。王聚德牺牲时，年仅 32 岁。

边金山

边金山，1898 生，祖籍陕西省横山县。1926 年横山大旱，全家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到合水县太白镇王茂庄定居。边金山 13 岁丧父，自幼挑起家中生活重担，饱受官绅豪门欺压。1928 年积极参加陇东饥民打富济贫、开仓放粮斗争。1930 年 10 月，参加刘志丹创建的南梁革命武装。1933 年正式参加游击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 2 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恢复成立，边金山当选军事委员长。同年 5 月，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是年 11 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华池县、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边金山当选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 年 3 月，国民党军队马鸿宾部“围剿”南梁革命根据地，边金山随南梁政府迁徙洛河川下寺湾。年底，重返南梁革命根据地。1936 年 3 月，边金山调任庆北办事处主任。4 月，为加强地方骨干力量，又调任华池县林锦区政府主席。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边金山随八路军民运工作团来合水县二区八乡搞民运工作。他四处奔走，串联发展了刘宗裕等一大批共产党员。1937 年 3 月，边金山调任合水县太白区抗敌后援会主任，与秘书万青山一起开展工作，于 1940 年 10 月劝降了国民党太白镇联保主任黄有发。1940 年 2 月，合水县工农民主政权建立，边金山任太白区委书记兼区长。1941 年 5 月，

调任西华池市（乡级市）市长。在任 6 年，不遗余力开展市政建设，使西华池镇成为边区通往国统区的贸易集散地，为边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47 年 4 月，任太白区委书记。1949 年 7 月，调任庆阳专区合作办事处主任，1955 年 2 月病逝，终年 58 岁。

强家珍

强家珍，1915 年生，陕西韩城人。1932 年，在韩城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鼓舞人民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1934 年初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 12 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在柳湾沟柏树掌村正式成立，强家珍任主席，高世清任副主席。1935 年 5 月，定边县游击大队在凤凰寺（今吴旗县属）建立，强加珍、王德成先后任大队长，王玉海任政委（兼）。1935 年 4 月，任赤安游击支队一支队中队长。1935 年秋，在宁条梁附近，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围剿”的战斗中，冲锋陷阵，奋勇作战，光荣牺牲。

王 英

王英，1914 年生，又名王振民，小名忍安，陕西临潼人。1931 年，因家庭经济困难，在西安杨虎城部宪兵营当兵。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冬，进入西安绥靖公署所属骑兵团作兵运工作，先后任团部副官、班长等职。1933 年春，骑兵团驻防三原，王英受赵伯平（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三原中心团县委书记）等

指示，积极组织第四排起义。1933年7月，王泰吉率骑兵团起义，宣告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自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后起义部队在三原县辘辘把村与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遭遇，发生激战，余部100余人退到照金苏区。陈家坡会议后，王英任组织科长。9月中旬，主力红军转向外线，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相机歼灭敌人。王英随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及少年先锋队参加了旬邑底庙原战斗，智取张洪镇，奔袭合水县城及毛家沟门反击战等战斗。

1933年11月，保安游击队成立，刘约三任队长，王英任政治指导员。1934年1月，保安游击支队扩编为三个中队，刘景范任队长，王英任政委主要在南梁平定川、荔园堡、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太白一带活动。

1935年1月，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委派，开辟庆北苏区，成立了赤卫军、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并建立了临时红色政权——庆北县革命委员会。1935年夏，调中宜苏区工作。同年11月，任中共中宜县委宣传部长。之后，王英奉调担任安塞县委书记等职。1938年10月，王英引导胞妹王颖强进入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

全国解放后，王英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任西北第一土建公司总经理。1959年任西安市城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下放到草滩农场劳动改造。落实政策后，任西安市政协常委，后按地市级离休。1994年6月，在西安逝世。

宋 飞

宋飞，1908年生，陕西永寿人。7岁起，就给富人家里放羊，受尽磨难。1932年7月参加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底，受刘志丹、杨森派遣，赴何高侯部、旬邑县保安团朱鸿章部等从事兵运工作，任朱鸿璋保安团传令班班长。1933年9月，红四团在宋飞的引导下，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打死国民党保安团团总朱鸿章，缴了保安团的械；镇压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谢骞、县党部书记长吴信诚等。不久，宋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红四团一连一班班长。1933年冬天，在攻打耀州寺沟镇战斗中，宋飞表现英勇顽强，被任命为红三团一连一排排长，不久调任连长。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宋飞任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副大队长。1935年2月成立了赤淳县苏维埃政府，宋飞任主席。1936年春，任陕甘宁省保卫局科长。1937年10月，任安定县人民民主政府保安大队大队长。1939年9月，任固临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等。1949年4月，任新设中共咸阳地委常委、咸阳军分区司令员。从1952年6月起，宋飞转入地方工作，参与了西安人民大厦、红旗机械厂、东方机械厂、南圆门礼堂和一些大中水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1967年，彭真对宋飞的为人、工作曾作过很高的评价，称他是革命队伍中过得硬的老干部。1998年，宋飞病逝，享年90岁。

袁万祥

袁万祥，1902年生，陕西吴旗人。家庭贫困，世代以耕牧为业。1933年10月，刘志丹委派刘景范在吴堡川、脚扎川等地秘密活动，组织赤卫军。受刘景范启发鼓励，当年11月，袁万祥正式参加赤卫军，先后任赤卫军副班长、班长、大队长。在袁万祥领导下，赤卫军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34年1月，赤卫队员人数由最初的10余人发展到30余人。3月，袁万祥带领赤卫军先后打败大地主蔡丰、蔺士升等反动民团，缴枪30多支。4月，又打开小蒜川刘老庄寨子，活捉民团团总刘永年，缴枪多支，俘虏团丁20多人。1934年7月至10月间，袁万祥与刘景范率领的保安游击支队互相配合，协助当地农会组织先后建立了吴堡区、义正区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7日，赤安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边金山任政府主席，袁万祥任赤安县赤卫军大队大队长。此后，张策、边金山、袁万祥等积极开展扩大苏区、创建区乡政权的革命斗争。他们跨越洛河，向东发展，很短时间内就将根据地和游击区发展到高嘴子等区域。1934年12月初，正式成立高嘴子区。1935年2月，袁万祥继任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在洛河川的曹塔一带创建了曹塔区苏维埃政府。并建立了曹塔区赤卫队，发展赤卫队员60多人。此后，他还配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长李生华在赤安县永宁区的何家畔、碾庄等村开展土地革命试点工作，先后将李林芳、路登高等200多户地主的庄园、田产和钱粮进行划分，为贫苦农民分配了田产，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也为整个陕甘边区土地革命的开展提供了典型经验。1936年8月被叛徒出卖，在安边壮烈牺牲。

李彦

李彦，1900年生，本名李世德，字厚民，亦名李炎，甘肃甘谷人。10岁时，父亲李钧病逝。藉母纺线幼劳，厉节抚孤。李彦幼学勤奋，1923年毕业于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曾任徽县政府第三科科长，赡母济家。后考入甘肃省警官学校，毕业后，于1931年任合水县警察局长。

期间，李彦积极追求进步，多次与活动在子午岭山区的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并于1931年8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调遣红四团、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攻克合水县城，释放囚犯，宣传革命。李彦迅即率20多名警察起义，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北上南梁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34年初，他受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派，同陈国栋、高岗、兰志敏等人前往郿县雷家沟等地开展秘密活动，继在南川创建赤卫军，打土豪，分财产，扩红建政。1934年11月，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在南梁何沟门成立，李彦任副主席；1935年3月，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在太白镇成立，李彦任主席。1935年3月间，国民党军马鸿宾部进攻南梁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由荔园堡迁到志丹县石峁湾。10多天后，迁到洛河川的闫家湾。1935年9月，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边区开展“肃反”运动，李彦遂以特嫌罪而被活埋，时年35岁。1987年，陕西省为其平反昭雪。

张仲良

张仲良，1907年生，陕西耀县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当地农民运动。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小学教师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先后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

1932年春，因领导农民进行抗捐斗争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3年夏与张邦英等组织起游击队。不久，率部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活动，1934年2月任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指挥部政治委员。1935年3月，参加了中部、宜君、郿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任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1936年夏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后任陕甘省军事部副部长、关中分区军事部部长、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关中分区专员等。

1945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6年3月，被党中央派往陇东分区工作，任司令员、地委书记、专员，很快稳定了那里的局势。同年11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成立，任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了瓦子街、西府、扶眉和兰州等战役，接着进军青海，直取西宁，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贡献。

1949年9月任青海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在追歼残匪、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后改任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同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 年出席中共八大，并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60 年 8 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1 年 1 月改任甘肃省委第三书记。1965 年 8 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和迫害。“文革”结束后，先后任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列席了中共十二大，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 年 2 月逝世。

周子恒

周子恒，出生年月不详。1935 年 4 月，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在桃梨圪正式成立，周子恒任主席。同年 10 月，在陕甘边区错误“肃反”中，周子恒在下寺湾被活埋。^①

^①《李生华 1983 年 7 月 4 日谈陕甘边‘肃反’》，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4—495 页。

许兴堂

许兴堂，生卒年不详。早年参加革命，曾任红二十六军连长，1935 年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荏掌办事处成立，许兴堂任主任。

郭廷藩

郭廷藩，1905 年生，甘肃正宁人。幼读私塾，16 岁毕业于县中心小学，在村学任教数年后，归家务农。

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湫头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对素有正义感的郭廷藩触动颇大，萌发了投身革命的念头。1933年春，被吸收为正宁县第一批中共党员，10月，中共正宁县支部成立，郭廷藩当选为支部统战委员，并兼农会会长。1934年2月，他带领游击队回到正宁，大义灭亲，镇压了以叔父郭书娃和郭彦升为首的哥老会骨干分子。1935年春，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正宁办事处成立，郭廷藩任办事处主任，先后在沿子午岭山区一带建立起12个党支部，并相继建起了湫头、三嘉、阳坡头3个区党委和区政权。是年8月，中共新正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又任县委统战部长、县革命委员会主席。1936年2月，任新正县独立二营政委，率部英勇反击，恢复了新正苏区。4月，被任命为中共新宁县委书记兼独立一营政委。

抗日战争开始后，郭廷藩调任中共新正县委书记。1941年7月，被选为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1943年10月，当选为新正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队长。1945年8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副议长。1947年2月，郭廷藩代理新正县委书记。1949年2月，任中共陕西省路东工委书记、关中军分区副政委兼路东总队政委。4月，调任三原军分区副政委，9月任三原分区专员。1950年3月，调任宝鸡专区专员。1952年4月调往青海省工作，先后担任黄南州委书记、省监察厅厅长。1960年任青海省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书记、省委委员。1977年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80年离休。1993年9月去世，终年88岁。

刘永培

刘永培，1904年生，甘肃宁县人。1934年10月参加革命并入党，创建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队宁县第三支队，任支部书记、指导员，后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春兼任宁县办事处主任。1935年11月任独立一营政委，1936年2月任红三团政委，7月任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政委，1937年秋任八路军三八五旅辎重营教导员。1942年2月，任淳耀县县长，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群众一起开荒积肥、织布纺线，同时还开展改造“二流子”工作。1943年11月至1944年2月任新宁县县长。后任关中警一旅二团政委，陇东独立一团政委。1947年8月任中共合水县委书记，兼中共宁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建国后历任陇东军分区副政委、党委书记、甘肃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政协甘肃委员会一至四届专职常委等职。1983年离休。1991年5月，刘永培病故，享年87岁，

王玉海

王玉海，1910年生，陕西定边人。1934年3月参加保安游击队，1935年2月，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指派，在定边南部山区乱石头川、颍颥川、宁塞川一带（今吴旗境内）开辟苏区，组建区乡红色政权。同年5月，在宁塞川凤凰寺成立定边县革命委员会，王玉海任主席，赵国雄任副主席。1936年8月至12月，任定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7年至1940年，参加中央党校二期六班学习，任中队长。之

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团级巡视员、甘泉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等职。1942年后从事商业经济工作，在关中等地为解放区购买军需物资。1952年后回家务农。1990年去世。

刘秉温

刘秉温，1912年生，陕西米脂人。1935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肤甘县革命委员会在登山峪成立，刘秉温当选为主席，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巩固红色政权。1935年11月，任肤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任肤甘保卫局长。1937年3月，肤施县与延安县合并后，首任延安县县长。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他响应党中央、毛泽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组织“变工队”，领导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创办南区合作社，创造了“刘秉温生产方式”。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笔题词赞扬他“善于领导群众”。

1943年，刘秉温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兼延属分区保安处处长。1945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6年至1948年，任边区联防军区司令部武装部长，延安军分区副政委，陕甘宁边区警备司令部第四旅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十二师副政委。1947年7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毫不畏惧，深入敌后，配合主力，瓦解敌军，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为保卫延安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后，历任郑州铁路局局长，西北交通部运输局局长，交通部第五公路勘察设计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陕西省交通厅厅长，交通部西北运输局筹备处负责人，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副局长等职。1964 年，他从西北调到西南，参加攀枝花建设，组建了渡口交通指挥部、交通部汽车运输总公司、交通部第四公路工程局。“文化大革命”期间，任渡口市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组长、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市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市计委主任、社队企业局局长等职。并先后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1976 年 6 月，调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工作。1979 年 8 月在西安病逝，终年 68 岁。

刘大才

刘大才，生卒年籍贯均不详。1935 年 7 月，红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大才任革命委员会主席。1935 年 10 月，与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等被错误“肃反”的执行人逮捕关押。

黑志德

黑志德，1913 年生，陕西延长（原宜川县）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革命活动，次年转为中共党员。黑志德参加革命后，历任中共宜川特派员，宜川抗日义勇军指挥等职；1935 年 7 月任赤川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此后任西北抗日反蒋大同盟组织部部长，陕甘工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酈县、宜川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固临县

委统战部长、县委书记，中共延属地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洛川特委副书记，黄龙专区专员，中共黄龙地委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中共陕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2月起，任中共陕西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陕西省工会联合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副主席、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黑志德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五一”观礼。“五一”节后，因患肝癌，即转莫斯科，后回北京治疗。1956年6月，病逝于北京人民医院，终年43岁。

阴云山

阴云山，1910生，陕西蒲城人。少年时即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受红二十六军派遣到靖边工作，任靖边游击队指导员，在靖边西南部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活动。在游击队里，他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9月，根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政府指示，建成蒋家寺区革命委员会，阴云山任主席。1935年4月，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阴云山任副主席，8月后任主席。11月，西靖边警卫一连连长宗文耀和游击队一中队队长金林叛变，破坏了三边特委和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阴云山被叛匪杀害，年仅25岁。

姚殿森

姚殿森，生卒年不详，陕西淳化人。1935年8月，任赤淳县革命委员会主席，1935年10月，任淳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高生荣

高生荣，1904年生，甘肃华池人。1933年冬，刘志丹、习仲勋、张策等在南梁开展革命活动期间，高生荣积极联络10多名青年参加赤卫军，配合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侦察敌情，传送情报。1934年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林镇、小河沟等建立村级红色政权，高生荣被选为小河沟村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华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任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翌年春，国民党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高生荣随政府机关转移到陕北，任安塞县延家湾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受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政府指示，任华池战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恢复华池战区的革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做了大量工作，期间，同崔凤鸣一起执行王明路线，酿成错误“肃反”，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之后，历任白马区区长和白马区五乡、八乡党支部书记。1949年底，因病回乡务农。1980年病逝，终年76岁。

李培福

李培福，1912年生，曾用名李丕福，甘肃华池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庆北办事处土地委员。同年9月，受党代表马仰西派遣到田河一带

筹备成立了田河区苏维埃政府并当选为主席，同年 12 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李培福任政府土地委员。1935 年 2 月，国民党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悦乐一带被国民党军马鸿宾部占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被迫撤离，李培福奉命就地坚持隐蔽斗争，在群众掩护下，躲过敌人搜捕，与会合的游击队员李树林、田生地等人建立庆北游击队。8 月，红二十五军北上进入陇东，马家军闻讯撤离悦乐，李培福乘机收复苏区，壮大了游击队。1935 年 9 月，在李培福主持下成立了庆北办事处，李培福任办事处主任。他率领游击队，相继恢复了柔远、田河区政府，稳定了庆北苏区。1936 年 6 月任陕甘宁省曲子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7 年 9 月当选为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3 年 1 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受到表彰奖励，毛泽东亲笔为其题写了“面向群众”的奖状。同年 8 月入中央党校学习。1946 年 11 月任陇东分区副专员。1948 年 2 月任陇东分区专员，10 月任中共甘肃工委委员。全国解放后，先后任兰州市军管会民政处长、甘肃省民政厅厅长、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甘肃省景泰电灌工程总指挥兼党组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政协第四届副主席、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副主任。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代表。1983 年 4 月在兰州病逝，享年 70 岁。

王振喜

王振喜，1896年生，陕西淳化人。1932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本地区组织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创建革命根据地。曾任村长、贫农团长。1935年8月，任赤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0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苏维埃政府在赤淳西区成立赤水县苏维埃政府，王振喜任主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振喜先后任赤水县县长、关中专员公署民政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三原分区（专署）副专员、陕西省农协会副主席、陕西省合作社联合社监事会副主任、省供销社副主任等职。1963年病逝。

梁文汉

梁文汉，1912年生，甘肃正宁人。1924年入本村私塾读书，1927年进入郭村小学读书，两年后因家贫辍学，后在琴宅一家药店当店员。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寺村塬一带活动，受过教育的梁文汉很快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明确的认识，被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发展为骨干分子。1934年，梁文汉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后来，他又在产场村以开设染坊为掩护，在南坡头至底庙间的数10个村庄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1935年10月，永红县苏维埃政府在正宁县下南坡头西村正式成立，梁文汉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不久，因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永红县苏维埃政府人员转入地下斗争。此后，按照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政府指示，梁文汉离开产场，到底庙开了一家药店，继

续开展地下斗争。全国解放后，梁文汉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1960年受“左”倾路线迫害，病故狱中。

张有鹏

张有鹏，1901年生，甘肃正宁人，早年参加革命，1935年11月，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张有鹏当选为主席。1936年4月，国民党东北军“围剿”新宁县，受国民党军威胁，张有鹏脱离革命，回家务农。1974年去世。

主要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集、第 12 集，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 3.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 4.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版。
- 5.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编委会编：《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 6.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年版。
- 7.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西省委历史简介》第一辑（1927—1937 年），内部资料。
- 8.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 9.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 10.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 11.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1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 13.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二、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14.《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年版。
- 15.梁星亮、姚文琦编：《建国以来刘志丹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16.张宏志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17.中共庆阳地区组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庆阳地区组织史资料》。
- 18.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19.刘凤阁、任愚公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20.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内部资料。
- 21.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内部资料。
- 22.马兴文主编：《宁县党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 23.淳化县军事志编梁委员会编：《淳化县军事志》，内部资料。
- 24.黄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陵县志》，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5 年版。
- 25.富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 2008 年版。
- 26.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27.志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志丹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28.志丹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志丹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 2009 年版。
- 29.安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塞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30.牛小梅：《我的父亲牛书申》，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 31.宜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32.延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安地区志》，西安出版社 2000 年版。
- 33.中共铜川市委、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照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 34.唐志宏、谭继和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成都出版社 1993 年版。

- 35.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
- 36.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白山出版社 1994 年版。
- 37.《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38.《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 39.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40.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41.贾巨川：《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 42.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 43.刘力贞、张光编：《纪念刘志丹》，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
- 44.刘力贞、张光编著：《人民英雄刘志丹》，内部资料。
- 45.《峥嵘岁月》，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46.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富平丰碑》，内部资料。
- 47.革命回忆录：《陇原星火》，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4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49.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50.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51.康民、秦生著：《西北五四运动与大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52.陈永恭、秦生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53.王晋林、秦生著：《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54.曲涛、李仲立著：《陇东老区红军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55.李仲立、曲涛著：《陇东老区政权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56.《马文瑞传》编委会编：《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年版。

后 记

大西北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片红色的热土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播火陕甘边区，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西北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西北革命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的成功实践，是中华苏维埃运动在北方地区的最主要成就，在西北革命历史和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014 年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八十周年。为了使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建的历史，不断深化陕甘边区革命历史的研究，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2010 年以来，笔者着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历史的研究，耗费 3 年多时间完成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一书。该书共 12 章 50 多目，内容包括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建设、南梁精神及历史功绩 等，比较系统地展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创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艰辛历程，初步总结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各项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力图为新世纪、新阶段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史》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央、省、市许多领导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是大家支持帮助取得的共同成果。

在资料调查收集过程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文琦、志丹县委党史办主任崔炜、志丹县志办副主任姜永明、黄土情联谊会联络员石振华等给予热情帮助，提供了许多珍贵史料。

在书稿审读过程中，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的专家、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李荣珍、陇东学院政法经管学院院长、教授曲涛等先后多次审读书稿，修正了许多史实上的错误。

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庆阳市委、市政府、华池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欧阳淞曾就该书出版工作作出过专门批示，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副主任高永中、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汪晓军，中共甘肃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元忠，甘肃省长助理、中共庆阳市委书记夏红民、庆阳市政府市长栾克军、市委副书记任燕顺、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市委秘书长闫晓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普生，中共华池县委书记赵昌军、县长张万福、常务副县长曹维祥等对出版工作高度重视，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在繁忙的研究之余，亲笔拨冗作序，给了作者莫大地鼓励。文化部体制改革处处长占善钦、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继凯、张国定、文世芳，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王鸽子等为该书的出版出谋划策，热忱帮助。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办主任张桂山、副主任赵晓红、华池县副县长杨添翼、镇原县副县长孔荔维、市工商联副主席王祜涛、华池县委党史办主任折兴发等给予了很大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编写好一部史实充分、评价准确、分析深刻、系统完整，集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党史著作，是作者的初衷和追求，并为之而不懈努力。但由于资料搜集还不充分，加之个人水平有限，本书错讹、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研究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同志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加以修改与订正。

编 者

2014 年 4 月